

第 19 回法律與宗教研討會

宗教基本法之必要性及其應有 規範之探討

會議手冊

114 年 11 月 27 日（週四）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1705 會議室

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與宗教研究中心
台灣宗教聯合會
財團法人全國宗教聯合發展基金會
中華人權協會
社團法人宇宙大愛行願聯盟中華總會
天人合一永續發展聯盟

第19回法律與宗教研討會

主題：宗教基本法之必要性及其應有規範之探討

時間：114年11月27日週四 09:00~17:30

| 會議議程 | | |
|---------------------|---|--|
| 8:40-9:00 | 報到 | |
| 9:00-9:25 | 釋法藏大和尚 魏億龍副理事長 朱武獻教授 陳清秀教授 | (台灣宗教聯合會創辦人兼執行長) (中華人權協會副理事長) (前銓敘部長及人事行政局局長) (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與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
| 9:25-11:00 | 主持人：釋法源師父 題目一：宗教基本法之幾點思考 主講人：張永明教授 與談人：張文郁教授 題目二：宗教基本法草案—宗教法論壇報告 主講人：朱武獻教授 與談人：李惠宗教授 | (西蓮學苑執行長、雲陽寺住持) (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系系主任) (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 (前銓敘部部長) (國立中興大學法學院兼任教授) |
| 11:00-11:10 | 茶敘 | |
| 11:00-12:10 | 主持人：陳春生名譽教授 題目三：宗教基本法的應有內容—司法權介入宗教領域的界限 主講人：李建忠法官 與談人：趙萃文助理教授 題目四：宗教對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貢獻法律如何加以保障 主講人：王派滄總會長 與談人：彭禎祥牧師 題目五：宗教基本法草案相關爭議之評析 主講人：林清汶教授 與談人：陳明堂前次長 | (前司法院大法官，台灣行政法學會理事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退休法官) (國立空中大學助理教授) (社團法人宇宙大愛行願聯盟中華總會總會長) (基督教改革宗長老會信望愛教會牧師) (世新大學法律系兼任教授) (東吳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 |
| 12:10-13:30 | 午餐 | |
| 13:30-15:00 | 主持人：胡文中博士 題目六：從宗教教信聯盟《宗教基本法草案》出發之法哲學與法律建構 主講人：邱子宇助理教授 與談人：黃錦堂教授 題目七：猶太教的神/哲學—起源與分化 主講人：廖金河牧師 與談人：陳顯武教授 題目八：宗教基本法之探討 主講人：劉君毅律師 與談人：林之鼎神父 | (理教總公所總執行長) (玄奘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退休教授，輔仁大學法學院兼任教授) (基督教台灣資格會中心教會牧師)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退休教授) (合曜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秘書長) |
| 15:00-15:10 | 茶敘 | |
| 15:10-16:40 | 主持人：鄭泰祥董事長 題目九：從對教會奉獻之財產歸屬，論《宗教基本法》之財務規制 主講人：蔡志方教授 與談人：陳惠馨教授 題目十：宗教管理法制與國際人權規約之接軌：以宗教基本法為例 主講人：周志杰教授 與談人：宮文祥副教授 題目十一：從天人合一思想，探討宗教基本法之必要性與立法方向 主講人：陳清秀教授 與談人：林清淇前司長 | (財團法人台北清真寺基金會董事長)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名譽教授、兼任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兼任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暨副主任) (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與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內政部宗教及禮制司前司長) |
| 綜合討論 16:40-17:10 | 主持人兼主講人：釋法藏大和尚 | (台灣宗教聯合會創辦人兼執行長) |
| 閉幕 17:10-17:20 | 陳清秀教授 | (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與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

◎ 報告時間18分，與談時間10分

◎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與宗教研究中心、台灣宗教聯合會、財團法人全國宗教聯合發展基金會
中華人權協會、社團法人宇宙大愛行願聯盟中華總會、天人合一永續發展聯盟

◎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1段56號 東吳大學崇基樓7樓城中校區1705會議室

◎ 交通：捷運西門站(2號出口)或小南門(1號出口)

◎ 聯絡人：02-23111531轉3506徐秘書



【發言計時規則】

一、發言時間分配

- 1、主持人：不限時間
- 2、主講人：每人 18 分鐘
- 3、與談人：每人 10 分鐘
- 4、討論時間：每人每次 3 分鐘

二、計時按鈴規則

- 1、主講人：時間終了前二分鐘，按鈴一響；
時間終了時，按鈴二響；
之後由主持人決定。
- 2、與談人：時間終了前二分鐘，按鈴一響；
時間終了時，按鈴二響；
之後由主持人決定。
- 3、發問與討論：時間終了前一分鐘，按鈴一響；
時間終了時，按鈴二響；
之後由主持人決定。

三、發言規則

- 1、參與發問或討論之與會者，發言前請先敘明服務單位、職稱、姓名。
- 2、發言時請簡明扼要、控制時間。

【用餐地點及會場注意事項】

- 一、歡迎各位與會貴賓於午餐時間移駕至(第 1 大樓)五樓 1503 教室用餐。
- 二、本棟大樓各樓層皆有洗手間可供使用，敬請各位與會貴賓善加利用。
- 三、會場內禁止飲食，請勿將飲料攜入場內！請各位貴賓共同維護會場清潔。
- 四、與會貴賓若有任何疑問，請洽研討會工作人員，我們很樂意為您服務。
- 五、感謝您的參與和配合！

題目一

宗教基本法之幾點思考

張永明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財經法律系系主任）

宗教基本法之幾點思考（初稿）

張永明（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

壹、前言

憲法第 13 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從法條規定之文義來看，制憲者僅將信仰宗教自由列為保障之對象，嗣經釋憲機關之解釋，將源自信仰而生之宗教行為，以及為實踐信仰所需之宗教結社自由，亦列為保障之對象。然而，當宗教自由不以內在之信仰自由為限，而及於表現於外之宗教行為與宗教結社自由時，隨著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寬廣化，其他同受憲法保障之自由權利，即很容易與宗教自由產生衝突，而國家作為人民各項基本權利實現之擔保者，即負有義務去調和陷於衝突之自由權利。

我國目前對於宗教相關之立法，具法律位階之規定，僅有監督寺廟條例與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但前者被司法院釋字第 573 號解釋宣告部分條文違憲停止適用，尤其是該條例規定僅適用佛、道教，被大法官指摘違反國家宗教中立原則與宗教平等原則，以致不具代表性；而後者則為過渡期間之暫時性規定，因此，基本上我國尚無適用全部宗教之專法。

然而，各界對於整體宗教相關事務之立法，期盼仍極為殷切，無論是主管機關或宗教團體均給予重大之關注，繼內政部民國 90 年以來大力推動宗教團體法草案之立法，最終卻告失敗之後，制定宗教基本法之聲浪，一時之間取而代之成為主流，宗華教信聯盟等宗教團體，於民國 106 年提出篇幅共 32 條之宗教基本法草案，民國 113 年底與 114 年年初則有許智傑、邱志偉、葉元之等立法委員與國民黨黨團等共提出 3 個版本之宗教基本法草案，這 3 個版本草案之條文均只共有 6 個條文，與宗教團體提出之版本形成強烈之對比。

歷經宗教團體法草案立法之失敗之後，似乎直接針對宗教相關事務之詳細立法，很難達成共識，因此退而求其次，先制定宗教基本法，突破目前無法立法之困境，僅確立未來可能之立法方向，等待適當時機再完成立法，則宗教基本法真有立法之必要嗎？若有，應有那些必要之內容？本文僅提出個人之淺見供參考。

貳、制定宗教基本法之基本思考

在宗教相關之立法沒有進展，而改弦易轍推動宗教基本法之立法時，首先面臨之問題，乃制定宗教基本法是否合適與必要，以及為何要制定宗教基本法，最後，當確定要制定宗教基本法時，應以何者為內容。

一、制定宗教基本法之疑慮

近來台灣盛行制定基本法，依據一般理解，其目的乃期使特定領域之多部法律規定，能被收納在一個具共同理念之上位法律規定之下。因此，無論是先有基本法，再有相關之子法，或者先有子法，再制定基本法，基本上是因該領域有高密度立法之需求，為求規範之完整與周延，因此不以制定個別之法律為滿足。

經查我國目前計有 11 部基本法：文化基本法、社會福利基本法、客家基本法、科學技術基本法、原住民族基本法、海洋基本法、教育基本法、通訊傳播基本法、新住民基本法、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以及環境基本法等。其中以新住民基本法最晚完成立法，亦最為單薄，迄今尚未見有與新住民事務直接相關之法律規定，與其他基本法均有多數個別法律存在，形成強烈之對比。

觀各該基本法第 1 條所揭櫫之立法目的¹，均為各該領域必不可少之願景，但基本法之條文內容卻鮮少能成為課予主管機關義務之依據，或者成為受規範人民請求權之基礎。相較之下，諸多未制定基本法之領域，並非無願景，而在未有基本法規定下，亦難謂該領域之法制殘缺不全或混亂無章。因此，基本法之用語、用途與必要性，似乎尚未有定論。無論如何，對於尚無相關法律規定之領域，先制定基本法確實具有宣示效果。

就宗教領域而言，藉由宗教基本法之制定，或許可以突破目前尚未能有得適用於全部宗教之法律存在之困境，一旦完成宗教基本法之立法，確立了各細部領域之立法方向之後，即可如其他領域之發展般，體系完整之宗教法制即指日可期，爾後與宗教產生之紛爭，即可依據各該法律之規定予以解決，不再有所謂之亂象。

然而，宗教領域本質上是否適合採用基本法帶動完整立法之模式，不無探究之餘地。首先，以宗教本質而言，在政教分立之今日，宗教與政治基本上有聖俗之分，且以不相隸屬之方式並存。法律作為規範人民言行之準據，基於民主原則之要求，具有拘束力之法律規範，必須經過議會以政治折衝之方式完成立法。倘若宗教基本法之規定內容，涉及宗教之神聖面，勢將出現以世俗之法律規範信仰之神聖事物，則在政治不介入信仰領域之原則下，宗教基本法本身即存在某種程度之矛盾。倘若宗教基本法之規定內容未涉及宗教之核心事物，則又與宗教基

¹ 如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 條：「為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精神，保障新住民基本權益，協助其融入我國社會，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特制定本法。」文化基本法第 1 條第 1 項：「為保障人民文化權利，擴大文化參與，落實多元文化，促進文化多樣發展，並確立國家文化發展基本原則及施政方針，特制定本法。」

本法之用語，似乎有所未合。

當然，宗教基本法亦可以獨樹一格，與其他領域之基本法不同，此在基本法之訂定為晚近出現之風潮，尚無固定之立法模式與強制之要求可為依循下，確實是可以容納各種可能之想像與期望，只是名實未能相符之法，能否完成立法以及產生何等之效益，尚有待觀察。

二、定位為宗教之基本法可能之爭議

宗教基本法最狹義之規定方式，乃依其字面意義，僅規定與宗教直接相關之事項，透過廣泛蒐集宗教團體之訴求，以表列清單之方式一一加以規定，藉由形諸於法條文字獲致之明確與固定，作為後續詳細立法，或者爭議出現時之處理依據。

將宗教基本法定位為宗教之基本法時，勢必要對宗教之本質為規定，但如上所述，這將與國家對宗教負有中立之義務相牴觸，在政教分立之下，立法者不應決定宗教之本質事務，而應任由宗教自己去形成其內涵，則制定宗教基本法時，立法者必須嚴格遵守宗教中立原則，對於涉及宗教核心之事項，均應以尊重宗教之方式完成立法，立法者對於宗教團體所提形塑宗教內容之法律草案，即不能為取捨更改，如此則與民主國家立法時，由立法委員衡酌各方意見，協商妥協而獲得共識之立法基本模式相悖，則實質剝奪立法權限之法案能否完成立法，不無疑問。

在立法者不得實質為立法審查，但又要藉由立法程序完成宗教基本法之立法時，勢必是法案規定之內容，本身即屬於不受爭議者。涉及宗教事項之法案，能不出現爭議者，理論上有二部分：如同所有草案版本均共通將釋憲機關歷來對宗教自由所作未受爭議部分之解釋，納為宗教基本法草案之內容²，此為其一；或者法案內容不會與宗教本身產生衝突，亦不會與其他領域之法益產生衝突者，此為其二。

司法院釋字第 490、573 號解釋揭櫫宗教自由之保障，包含內在之信仰自由，以及外在之宗教行為自由與宗教結社自由。由於此部分之解釋不受爭議，本有拘束國家各機關與人民之效力，將之納為宗教基本法之內容，似乎僅具重覆宣示之效果，而無實質之意義。至於法案內容要能不干涉宗教，而無違宗教中立原則，以及與相關領域不產生衝突，而無需於立法過程中由立法者多方折衝衡量者，應該僅有關於宗教未來可能發展願景之建議性規定，不具法律拘束力，僅具柔性指

² 所有草案版本均將司法院大法官對宗教自由保障範圍所作之解釋納為條文之內容。

引之效果。果真如此，宗教基本法似乎亦無制定之迫切必要性。

三、替代宗教之基本法之立法思考

倘若將宗教基本法定位為不涉及宗教核心內涵，但又與宗教有所關聯之法律，即將宗教俗世面向之事務，尤其是可能出現衝突之領域，確立未來可以依循之方向，則如此之法律可能不宜再使用宗教基本法之名稱，而必須使用能凸顯係就宗教俗世面向可能產生衝突之事務，所為原則方針式之規定。果若如此，立法者即得依循制定一般法律之立法模式，在無損宗教中立之原則下，進行衝突權益間之權衡，最後確定法律規定之內容。

在立法者僅得就宗教俗世面向之事務制定處理之規範下，只能將外顯之宗教行為與外界之人事時地物產生之衝突，基於國家負有保護人民，調和衝突法益之義務，作成立法決定，供各該主管機關行使職權時引為執法之依據。

由於宗教信仰已深植人心，不同之宗教藉由各式之宗教行為實現信仰，為利各自宗教信仰之永續存在與發展，宗教結社亦成為常態。因此，宗教行為與宗教結社，即與其他俗世之人間行為與結社一樣，均有可能與所處之環境產生衝突。雖然宗教行為與宗教結社均屬人類之外顯舉止，無法不顧慮與之陷於衝突之其他法益，但因其與宗教信仰密切相關，鑒於宗教信仰對於有信仰者，具有重大不可輕忽之意義，立法者雖然不應因宗教因素刻意作成偏袒有宗教信仰者之決議，但亦不妨給予宗教相關事物，更完整與周詳之思慮，則預先明訂各種可能衝突面向之處理準則，基於法律規範之明確與長久性，亦有益有宗教信仰者權利之實現。

現行已有多部環境保護之法律規定，涉及外部之宗教行為，由於各該法律規定之主要目的，係保護該法設定之環境利益，將各種可能之侵害源納入管制或處罰之範圍，而不以是否有宗教因素而作差別待遇，因此並非是以限制宗教為目的之特別法律，宗教行為僅是如同其他會出現法益衝突之行為般，得由立法者就此訂定彼此應作何種程度互相讓步之準據。此外，在稅法領域亦有諸多稅種將宗教團體如同其他公益性團體般，同等納為租稅減免之優惠對象。諸此規定均非單獨以宗教因素而為差別待遇之規定，無違憲法上之宗教中立與平等原則。

當宗教基本法不以宗教核心事項為規範對象時，即有可能在現有法律規定之基礎上，將與宗教行為未來有可能產生衝突之其他受法律保護之法益，預作一個衝突解決之原則性規定，以及在現行法律規範框架內，將宗教行為未來發展之願景形諸於法律條文中，發揮督促與激勵之作用，此時宗教基本法將轉變成為預先調和可能與宗教行為陷入衝突之法益之基本法，以及引導開拓宗教發展與現行

法制相符之新領域行為。

由於基本法之主要作用在於宣示與預告所規定之事項，以方針條款之形式呈現，可以涵蓋廣泛之範圍，但規定之篇幅與數量應精簡，而將詳細之內容交由立法者制定相關連之一般法加以落實，如此方能發揮基本法帶動相關領域立法之功能。

參、處理與宗教行為可能衝突準據法之立法方向

當宗教基本法不以宗教核心事物為規範內容，而對於與宗教可能產生衝突之事物預作方針規定時，首先即應探究宗教與外界可能存在之關聯為何，再就各該領域探尋出處理之基本方向。宗教作為人類信仰之對象，可能與宗教產生關連者，至少有宗教與信徒、宗教與社會，以及最多元之宗教與國家等面向，這些不同之組合均含有相互衝突利益之調和以及相輔相成兩個部分。

一、宗教與信徒間之外部關係

宗教與信徒間純粹宗教性質之關係，原則上屬於各宗教之核心事項，國家不得制定法律加以規範，但隨著人民權利意識之提升，有信仰之人民與無信仰之人民均為國家法律應予保護之對象，宗教與信徒間之關聯已經無法全部以信仰全部涵蓋，與內部信仰關聯較弱之部分逐漸外部化，在這過程中極易出現，何者歸屬於宗教能自主決定之信仰部分，何者為信徒得以一般人民身分，主張應受國家制定法律保障之對象，就此，最顯著者乃涉及宗教與信徒間之財務問題。

（一）妥善處理非典型宗教捐贈

人民對宗教團體與對宗教人士之捐贈，長久以來即有所得稅法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等規定可資適用，若要完全推翻現有規定，主張宗教捐贈完全免稅，則必須要有充分之正當化理由，此在國家不得對宗教為定義，無法防止藉宗教名義規避納稅義務下，不無疑義。倘若基本法僅是重申現有之規定，則無必要。

然而，就與宗教信仰有關聯，但雙方對於是否歸屬於典型之宗教捐贈有不同見解，但不涉及納稅義務之有無，卻經常成為宗教與捐贈者間爭議者，倘若能藉由基本法之立法，促使未來之立法者依循基本法之處理原則為詳細之立法，則對雙方均屬有利。

目前與宗教捐贈有關連而較易出現爭議者，要屬領受宗教服務者，以宗教捐贈方式完成付費後，後續卻產生糾紛。就此因宗教團體與捐贈者間存在認知差異，倘若發展結果與捐贈者之預期相符，基本上不會出現爭議，但若超乎捐贈者

之預期或負擔能力，則易出現捐贈者提出宗教詐欺之指責，對於宗教團體整體造成頗大之傷害。

實則如同各項性質之勞務交易，所有之勞務提供者均有成本費用必須負擔，宗教性勞務雖具有其特殊性，但仍無法憑空完成，受領給付者若全無成本費用之概念，雙方出現誤會之可能性即大為增加，而有心操弄者亦有上下其手之空間，則最後受害者，乃正常宗教勞務提供者與受領者。因此，宗教基本法就非典型之宗教捐贈為原則性規定時，即應將受領捐贈者，以及捐贈者之權益保障一併納入，始能真正解決問題。

在消費時代，消費資訊之揭露為保障買賣雙方權利之重要配套規定，雖然宗教性勞務之提供，不以買賣方式而以捐贈方式達成時，為避免事後爭議之出現，必要之資訊揭露仍屬不可免。雖然消費資訊之揭露彷彿將宗教性勞務貶低為商業性勞務，但在消費時代與權利保障意識高漲之今日，任何財物之交付都會影響到所有者之權利，不論其性質為何，國家均有保護人民權利不受侵害之義務，必要資訊之強制揭露，已成為最低限度之要求。宗教與信徒外部關係間之權利保障，國家除不應偏廢任何一方外，在資訊高度流通時代，要求涉及財物往來之必要資訊，符合最低限度之資訊揭露要求，已成為必要之義務內容。

（二）建構信仰爭議解決機制

一般情況下，求助宗教為多數現實生活無助者之最後解方，宗教給予慰藉、開導與歸屬感，可以讓陷於無主見者，有繼續前行之明燈，此為宗教對信仰者具正面意義之面向，補足俗世國家無法提供人民之精神給付。然而，宗教之精神給付亦開啟不肖份子，藉由宗教之說服力，實現詐騙侵害求助者權益之情事。雖然在涉及刑事犯罪時，檢察官與警察可以介入調查，但因刑事偵查必須有明顯之違法徵兆，檢警機關於取得充分證據後，始能開啟刑事制裁手段，最終由法院定罪對侵權者產生威嚇效果，而受害者往往仍需遂行民事訴訟始能獲得賠償。傳統正規解決紛爭之機制，對於任何種類之紛爭均有適用，但因須兼顧雙方權利，無不審慎為之。

近來隨著權利意識高漲，各領域紛紛建置輔助傳統民刑事訴訟救濟制度之替代方式，以求有需求者可以有快速有效之解決途徑可供選擇，並以此彰顯權利救濟設計之完善，以及權利保障之高水準。宗教信仰本身之爭議屬於宗教內部核心之事項，外界無置喙之餘地，但當信仰爭議演變至具外部化徵兆，即損及關係人受法律保障之權利時，國家亦不得以宗教中立為由，脫免保護權利受損人民之義務。

迄今我國對於過去被認為與國家之關係具特殊性之族群：學生、公務員、軍人、囚犯，現今就其與國家特殊關係產生之權利受損時，不僅均能獲得法院之救濟，且都有訴訟前之先行制度，可以供權利受損者及時簡易地提出救濟之主張。宗教信仰雖具特殊性，但權利救濟之需求並不因是否有宗教信仰而有差異，為彰顯宗教亦注重是關係人之權利保障，並確實提升與宗教信仰發生衝突者之權利保障，宗教基本法應宣告研擬設置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由於台灣非制度化宗教之數量龐大，多數宗教團體彼此間又未必有上下隸屬關係，宗教內部控制之自律機制難以成立，外部爭議處理機制又缺乏時，遇有任何紛爭皆無簡易有效之紓解管道，形成在未達提起民刑事訴訟階段前，有心人士持續為所欲為，受害者則在認為求助無門下，轉而詆毀宗教，長此以往對於信仰關係之破壞，不容小覷。

現行其他領域爭議之自我處理制度設計，均適度引進外部人員，以提升爭議處理之公信力，進而讓爭議事件快速獲得解決，而不致演變成全國矚目之民刑事案件。因此，基於宗教信仰無法僅發生內部關係，外部關係人在信仰關係之發展中亦居重要之位置，其權利具有保護之必要性，何況能有效解決信仰關係發生之爭議，不僅有助於特定長遠信仰關係之維繫，對於宗教未來之發展，亦有正面之意義，則研擬建立法庭外之紛爭解決機制，對於信仰關係之雙方權益維護均有助益。

二、宗教與國家間之外部關係

現代國家對於宗教內在之信仰，基於政教分立原理，不得立法規範宗教信仰之事務，但對於外顯之宗教行為，在遵守宗教平等原則，不因宗教因素加重或減輕法律責任下，現行已有多部法律將具有外部性之宗教行為，納為規範對象。宗教基本法對於現行法制欲為變更，在時空背景未有重大變更下，難有正當化之理由，尤其是草案版本整體成為宗教福利法時，恐怕更難獲得外界共鳴。然而，宗教信仰作為人民之基本權，關係宗教存續與發展之重要基礎，乃國家作為人權保障義務者，應以立法加以落實者，宗教基本法就此自得有所規定。

（一）實踐宗教信仰之空間保障

宗教信仰既為國家應予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宗教當然有權要求國家給予實現信仰之場所。目前各家草案版本均提及宗教場所之保障，以使宗教活動有固定之聚點，藉以凝聚信眾，實踐常態性之宗教行為，應屬合理。然而，歷來有關空間規劃之規定與執行均未被嚴格遵守，以致現有宗教場所違反相關法律規定者眾，宗教基本法草案要求場所保障，若宗教場所不屬於合法建築，即無正當性要求特

權待遇，否則將形成因宗教因素而獲不平等之優惠，如此主張勢難通過立法。何況實際上各地荒廢未使用之宗教場所數量亦不少見，單純全面性地給予存續保障，應無必要且難獲共鳴。

在可見之未來，無論是全國性之國土規劃或區域計劃，被落實之程度應該會被提升，屆時現存但不合乎法律規定之建築物去留問題固然要解決，但更重要的是，未來宗教場所如何合法設置之問題。因此，賦予宗教團體參加未來之空間規劃與都市計劃之討論與決策機會，似乎更具長遠性。

從居住環境品質之提升觀點而言，空間任意錯置之現象應避免一再出現，宗教建築物沒有規劃地被任意興建現象，可望在空間美學素養提升，區域規劃法制上軌道之後獲得改善。自古以來，宗教場所即為當地居民之信仰中心，當然有存在之必要，倘若能給予宗教團體參與空間規劃進行之機會，或能聽取其提供之意見供決策參考，應該比現行草案給予宗教場所之保障，來得有意義。

（二）宗教發展之保障

國家作為人民各項給付之供給者，自應竭盡所能地充足供應，但在資源有限之客觀事實下，則應思考如何由最適當者從事其最擅長之工作，以符合成本效益並提升效率，宗教信仰為信徒之精神寄託所在，宗教可以成為滿足人民精神給付需求之一種選項，則國家將宗教信仰納入精神給付之供應來源，可望豐富人民之精神生活，亦可有利於宗教之發展。因此，宗教基本法可以明定宗教團體有權參與國家對人民精神給付之任務執行，至於其細節則由相關之法律視情況定之。如此規定僅是將現行文化、衛生、內政等相關之委託行政，特別於基本法上明定，強調宗教團體與其他符合資格要件之人民團體，同樣具有申請承辦之資格，並非獨厚宗教之規定，故可免除牴觸平等對待之疑慮，但同時又可以發揮鼓勵與保障宗教發展之效果。

宗教基本法明訂宗教團體得依法參與國家各項行政委託案，藉以豐富人民給付來源以及宗教團體未來發展之可能選項時，除揭示宗教團體得參與現行實務運用上已臻成熟之委託行政種類外，亦得在國家積極推動下，鼓勵宗教團體參與新興之委託行政類型，甚至原本是宗教行為與之經常出現衝突之領域，化解原本對立衝突，轉而成為助力，不僅減少對公益之危害，亦讓宗教未來之發展多一項選擇。

以今日普遍受到重視之環境保育領域而言，歷來諸多宗教行為每成為環境保育之加害源，但比較觀察宗教與環境保育，可以發現兩者並非不能相容，宗教基本法之立法可發揮引導之作用：由於宗教之教義無不在探索人類今世及來生之

問題，此與環境保育工作不僅關注人類活動對當下環境造成之負擔，亦關心後續對未來之影響，兩者本質具有類似之處，而環境對人之影響甚深，亦為宗教教義現代化應探索之因素，宗教基本法之立法可以有意識地規定，宗教團體得參與環境保育之任務，藉此引導宗教團體減少對環境保育造成危害之宗教行為，另一方面，亦提供宗教團體未來發展方向選擇之機會。

就此，德國梅肯堡邦憲法關於環境保護之規定³，或可作為參考。於宗教基本法明定宗教團體得參與國家之環境保育工作，宗教團體或受機關之委託，或自主決定將環境保育工作融入教義修行中，前者雖然是以委託行政方式，由主管機關將職權之一部分，委由宗教團體來行使，但政教之連結點僅為環境保育而不及於其他，宗教團體如同其他人民團體，並不因此而喪失其宗教事務之自主決定權。

宗教團體若自主決定將環境保育工作融入教義修行時，係如同其他環保公益團體，於章程中明訂環境保育為宗教團體之設立宗旨之一，宗教團體依其年度計劃之實施，達成自訂之目標。由於環保相關法律已明文賦予環保公益團體提起公益訴訟之法源，信仰理念相近之宗教團體若亦具環保公益團體之地位，亦得運用此制度，既達成教義之目的，亦落實環境保育，對於團體聲譽之增進大有助益。

三、宗教之社會義務

宗教信仰若維持在內心思想層次，而無外部關係時，應是個別宗教得完全自主決定何去何從，除非是出現自我傷害之宗教修行，而有需要國家介入保護之例外情形。事實上絕大多數之宗教均以入世之方式存在於社會，宗教生活化之後，宗教團體更是如同其他人民團體，均共同利用社會資源以達成各自之目的，則在強調社會責任之今日，宗教基本法亦應規定宗教應依其情況，自行選擇與承擔社會責任，落實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之理念。

相較於宗教與信徒間之外部關係，因信徒為法治國家應予保護之權利主體，宗教基本法得在既有之法制基礎上，思考如何增加與補強信徒外部關係之權利保障，宗教之社會責任則為抽象之規範，沒有明確之相對人，但涉及者，乃如何提升個別與整體宗教之社會形象。

同樣地，宗教社會責任亦不同於宗教與國家間之外部關係，宗教作為人民

³ 德東之梅肯堡邦為例，該邦憲法第 12 條規定（Art. 12 Verfassung Mecklenburg-Vorpommern, Umweltschutz）：「I. 邦、鄉（鎮、市）、縣以及其他公行政主體，在其管轄範圍內，負有保護與照顧現在與未來生活之自然基礎以及動物；這些政府機關應該努力節約自然資源之使用。II. 邦、鄉（鎮、市）與縣應保護與照顧土地... III. 每個人均被要求，致力於前兩項規定目的之實現。IV. 應避免對自然與土地造成干預；無可避免之干預所造成之損害，應被補償；已出現之損害，若仍有存在之可能，應予以排除。V. 其他細節另以法律定之。」

信仰之對象，有信仰之人民享有請求國家給予某種程度之給付，以實現其宗教自由；宗教社會責任則是思考宗教如何回饋社會之問題。由於社會責任與具強制力之法律責任有別，宗教基本法有關宗教社會責任之規定，僅具宣示呼籲之效果，可望激發宗教團體在現已有投入心力之社會救助、關懷與照顧等領域之基礎上，開發更多新領域，讓宗教信仰之正面影響不僅存在於有信仰者個人，亦能有助社會穩定與發展，提升社會風氣。

肆、宗教基本法草案簡評

綜觀現有宗教基本法草案，可以概分為兩大類：一為立法委員與政黨黨團提出之內容精簡之版本，主要是以司法院大法官對宗教自由保障範圍之解釋，以及國際公約對宗教人權之保障規定為其內容，另外再加一條宗教立法權限專屬中央，不得授權地方自治團體訂定，以避免一國多制之不平等現象，但中央制定有關宗教之規範得委由地方政府執行；另一為宗教團體聯合提出之版本，內容涵蓋較廣，將宗教與宗教團體同列為規範對象，整體主軸為規定宗教與宗教團體各項權利與需求之保障，但亦有提出一個條文規定宗教團體之社會責任。此外，與精簡版之各宗教基本法草案一樣，亦要求宗教立法權限應專屬於中央機關，不得授權地方自治團體訂定自治條例。

宗教自由為人民受國家保障之基本權，在基本權具動態發展之特性下，基本權之保障範圍應由憲法解釋機關透過解釋之方式，不斷增加其與時俱進之新保障，則立法機關規定宗教自由之內涵，除涉及宗教核心事項國家不得立法規定之政教分立原則外，亦僅能採取例式性之規定模式，以免阻斷宗教自由受保障範圍之發展，則若僅將司法院解釋與現行法制之規定再次宣示，意義可能不大。

由於宗教自由之保障不以內在信仰為限，實現宗教自由之保障必然與外界產生齟齬，已提出之宗教基本法草案版本卻幾乎完全不提與其他法益衝突時之解決原則，未能發揮指引未來周詳立法之方向，以致成為僅謀求宗教（團體）權益保障之基本法。至於諸多賦予宗教或宗教團體特有法律地位之規定，若真能通過立法，若未能有效排除假冒宗教名義者同享特權，將形成法律規範之漏洞，開啟投機取巧規避法律規範之方便門，在劣幣驅逐良幣之作用下，真正之宗教與宗教團體未必能獲得特別立法之好處。

題目二

宗教基本法草案—宗教法論壇報告

朱武獻教授
(前銓敘部部長)

宗教基本法草案

宗教法論壇報告

朱武獻教授 114.11.27

一、草擬緣起：

宗教聯盟黨（前身為宗華教信聯盟）於民國 106 年 6 月創立後，本人身為黨主席深覺宗教法之重要性及現有宗教法令規範不足，乃成立研擬小組除本人擔任召集人外並邀請李建忠法官（現已退休）、見引大法師（現任中國佛教會副理事長）、心茂大和尚（現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陳國勳（現任中華民國道教會副理事長）、范國廣（前內政部中部辦公室副主任）及蔡振坤（前行政院南部辦公室技正）等人研擬，迄 106 年 11 月 19 日間，共邀中國佛教會、中華民國道教會、台灣佛教總會、台灣道教會、中華佛教比丘尼協進會、台灣道教團體聯合總會、中華佛教護僧協會、台北市道教會及台灣宗教聯合會（籌備處、現已成立台灣宗教聯合會）等團體宗教領導人及前輩共同開會，經密集討論始定稿完成。

二、立法原則：

1. 依據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第十三條宗教信仰自由及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之基本國策，予以研訂。
2. 採納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已納為我國法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十八條之規定(包括宗教或信仰自由)。
3. 由於行政院自民國九十五年至一百零五年間多次將「宗教團體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均未能完成立法(迄今已六次均未完成立法)，遂將宗教團體法草案之多項重要內容納入宗教基本法草案中，希望畢其功於一役。

三、 立法總說明、草案要點及條文內容暨立法理由如附錄一

題目三

宗教基本法的應有內容—
司法權介入宗教領域的界限

李建忠法官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退休法官)

宗教基本法應有的內容----司法權介入宗教領域的界限----

壹、緣起

憲法有如金字塔的頂端，是一個國家所建構法律秩序的最高規範。此從憲法第 171 條第 1 項規定：法律與憲法牴解者無效；與同法第 172 條規定：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解者無效，可以看得出來。

從世界人權宣言、民權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後兩者簡稱兩公約，具有國內法的效力）中，均有許多關於宗教自由的相關規定，乃至各界各國憲法都有保障宗教自由的規定來看，**宗教自由具有普世價值**已無庸置疑。惟在台灣，因為長期戒嚴，包括宗教自由等的各種基本人權受到侵害者，**所在多有**¹。另外，因為**憲法教育的形式化**，一般人民與國家機關，並不瞭解宗教自由的內涵，往往在個別與宗教有關的社會事件發生後，要求國家管制或介入²。甚至宗教團體也不了解宗教自由的保障範圍，主動要求國家立法加以管制或介入³。

另外，從宗教團體專法的立法歷程以觀⁴，單以法律名稱均冠以管理或監督之名，乃至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財團或社團法人的相關監督管理規定，毫不考量宗教團體的特殊性與自主權，甚至連其下位規範的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亦如法泡製，就以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的相關規定而言，明顯侵害了宗教團體的組織規章及人事自治⁵。迨至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73 號解釋宣告監督寺廟條例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8 條違反了憲法第 13 條有關宗教結社自由的保障，並於理由書中，除了再次引用釋字第 490 號解釋所謂宗教自由的保障範圍包含內在信仰自由、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之外，並進一步提及「…宗教性結社，

¹ 有關一貫道及基督教老教會遭迫害的詳細內容，請參閱林本炫，台灣的政治衝突，稻香出版社，1994 年 3 月再版。另外，星雲法師提到民國 18 年（1929 年）制定的監督寺廟條例是在佛教最衰微的時期訂定下來的，實行至今已將近百年，從未加以修訂；究其原因，是因為這許多地方的鄉鎮公所的官員，到縣政府、省政府、內政部等民政廳、社會司，幾乎沒有懂得宗教的人。可以說，讓佛教在所有宗教裡面所受的損失最大。例如，民初的廟產興學、寺廟軍隊駐兵、寺廟收容災民，乃至於寺廟也要像民間一樣，必須繳納苛捐雜稅，這對於真正在做弘法利生的工作者來說，實在是一種藐視。參見星雲大師，宗教立法之我見，收錄於星雲大師全集，佛教管理學第 21 冊，頁 276。<https://books.masterhsingyun.org/ArticleDetail/article9685>，最後瀏覽日：2025.11.12。另請參考淨心法師，現行寺廟法令的適法性與功能，1987 年 12 月，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會印行。

² 許育典，宗教自由保障下的宗教團體自治，月旦法學雜誌 114 期，2004.11，頁 212。

³ 星雲大師認為政府應該明訂宗教團體領導人資格許可，要有宗教學院畢業證書，或是教會的證明文件，才有擔任資格，參見星雲大師全集，同註 1。

⁴ 詳細內容，請參閱李建忠，信教自由之研究—以近代宗教立法之沿革與內容為中心—台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85 年度研究發展報告。

⁵ 許育典，同性婚姻、同性平權與宗教自由，元照，2017 年 5 月，初版，頁 261-264。

就其內部組織結構、人事及財政管理應享有自主權，…寺廟內部之組織結構、是否加入其他宗教性人民團體（教會）成為團體會員，及其與該宗教性人民團體之內部關係，暨寺廟財產之管理、處分等事項，均屬宗教結社自由之保障範圍。」此後，宗教團體主管機關內政部始大力推動宗教團體法的相關修法，但前後將近 20 年，行政院六次將宗教團體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但都無功而返。究其原因，主要是各方團體及朝野立法委員有不同意見；另外，學者間就宗教事務是否應單獨立法及其內容，也有不同觀點；再者，宗教事務也牽涉到土地（包括農地）、建築、稅捐、殯葬納骨塔等諸多領域，牽涉不同主管機關業務；即使在法律領域，也會涉及行政法、民法、商法、訴訟法及稅法。由此可見宗教立法的複雜性，而有訂立宗教基本法的必要。正因為如此，宗教界與學術界及司法實務者，集思廣義制定宗教基本法草案，並獲得朝野政黨及立法委員的支持而於 2018 年提出於立法院，惟因社會上有些團體及部分立法委員反對，而未完成立法程序。

然而，適用已將近百年的宗教團體專法監督寺廟條例，除了其中有 2 條被宣告違憲之外，其他的條文也多有違憲之嫌⁶。另外，財團法人法也將宗教性財團法人排除在外；而屬於社團性質的宗教社會團體，則亦被列為社會團體而一體適用人民團體法，然而該法並未顧及宗教團體的特殊性⁷。

此外，近代國家為保障宗教自由，造成國家世俗化（die Sakularisierung）的發展，並出現近代憲法強調國家與教會分離。因此，宗教自由的憲法保障，也始終要求著國家不可介入宗教團體的自治⁸。另外，無論是採取政教分離原則或者是國家的宗教中立性原則，國家與宗教應互不介入對方事務⁹。而司法權亦屬國家權力之一，故應嚴格禁止法院介入國民與宗教團體的宗教信仰領域（神聖性領域）¹⁰。不過，宗教徒與宗教團體也都有在世俗的現實社會裡從事各項

⁶ 學者吳志光認為因為監督寺廟條例第 2 條第 1 項一旦無法適用，其實監督寺廟條例整體即失其附麗。收錄於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與宗教研究中心第 12 回研討會，宗教團體自治權之保障—從司法院釋字第 573 號解釋談起。

⁷ 內政部所建置的全國宗教資訊網中的宗教行政問答中，就現行宗教法制的侷限提及：現有宗教法制並無顧及宗教之特殊性：依民法或人民團體法所成立之團體，其組織屬性不符宗教傳承及宗教內部規定之需求。民法為基本民事法律，尚難針對宗教團體予以特別修法考量。人民團體法強制人民團體內部運作應有民主與公開的原則，也背離了宗教各教派的傳統。<https://religion.moi.gov.tw/FAQContent/Index?ci=0>，最後瀏覽日：2025.11.12。

⁸ 許育典，宗教自由保障下的宗教團體自治，月旦法學雜誌 114 期，2004.11，頁 211。
另前大法官王和雄及許玉秀在司法院釋字 573 號協同意見書，亦均表示相同的見解。

⁹ 平野武，宗教と法と裁判，晃洋書房，1996 年 8 月初版，頁 100。

¹⁰ 桐ヶ谷章，宗教團體の自治と司法權の介入，收錄於世俗社會と宗教--對立を越えて，特集，頁 145-146，https://www.totetu.org/assets/media/paper/tl12_145.pdf，最後瀏覽日：2025/11/10。

活動，也不免發生糾紛不少的糾紛；基於憲法第 16 條人民訴訟權的保障，法院負有權利救濟的任務，有權利就應有救濟。因此，世俗的司法也有保護其世俗權益的必要。於此情形下，法院應如何處理應對呢？換言之，法院應以何種方式與程度介入呢？這應該是宗教法制的一大課題。此在日本已有不少判例，並有許多學者著文加以評論¹¹。又值我國宗教基本法與宗教團體法制歷經多年尚未能制定之際，介紹日本法制及實務並學說見解。惟囿於時間及能力，本文主要以日本相關判例及學說為對象，並以我國相關判決加以比較，希望有助於我國宗教法制的建立。惟囿於時間及篇幅，僅就民事部分而論，而不及於刑事及行政事件，並將之限縮於有關住持地位相關事件的比較說明。

貳、日本種德寺事件（確認罷免無效、請求損害賠償及交付不動產等事件）：

一、事實概要：

X於昭和31年（1956）3月28日由Y1（曹洞宗=包括宗教法人、所謂宗派・本山）任命為宗教法人A寺（Y1・曹洞宗之被包括宗教法人、所謂之末寺）之住持，同時成為A寺之代表役員。可是X從昭和35年初左右每每行方不明而不在寺內，因而影響信徒的葬儀法要及其他寺務，特別是在昭和35年2月間有15天、從同年6月30日之後共42天、從37年4月3日到6月2日之間，X所在不明。因此，除了信徒總代們之外，警察也介入搜尋；而信徒對X的批判也隨之高漲，再加上Y2（擔任A寺責任役員之信徒總代）及Y3（信徒總代）等的忠告，因X之進退一再成為問題而召開了信徒發起人會議。昭和37年6月2日，X回山後雖然承諾辭任住持，但之後又撤回辭任，信徒的心情極度地惡化，終於在同年7月12日由大多數信徒連署對X不信任及罷免請願書，而向Y1的宗務廳呈報。因此，依照宗派曹洞宗寺院住持任免規定11條，翌年38年4月25日X住持之職位被罷免。所以X以宗派Y1為相對人，並以罷免住持無理由而無效為根據，請求確認其為A寺代表役員地位及對Y2、Y3、Y4請求損害賠償（在此省略損害賠償）。

二、第一審判決要旨

¹¹ 與本主題相關的日本判例，就以蘆部信喜・高橋和之所編憲法判例百選Ⅱ（第2版）就有一篇野坂泰司著，宗教上の教義に關する紛争と司法權，有斐閣，1988.2，別冊ジュリスト 96 期，頁 374-375（此篇亦收錄於宗教判例百選（第2版）；另蘆部信喜・若原茂所編宗教判例百選（第2版），有斐閣，1991.1，別冊ジュリスト 109 期中，亦收錄有：涉谷秀樹，住持の地位確認と法律上の争訟、佐藤幸治，宗教上の教義、信仰を理由とする住職に對する擯斥處分と法律上争訟；飯塚重男，カトリック修道會員の地位と法律上の争訟；松村和徳，被處分者の生活の基盤に關わる懲戒處分と法律上争訟，頁 68-77。另龍谷大學宗教法研究會編之宗教法研究，亦有收錄相關的文章。我國學者劉玉中在其所著民事審判權之界限—以宗教紛争之解決為中心的文章中，亦有提及與本主題相關的本門寺事件、板曼陀羅事件、蓮華寺事件、大經寺事件、銀閣寺事件、白蓮院事件、妙真寺事件，中原財經法學，21 期，2008 年 12 月，頁 157-161。

第一審（橫濱地方法院小田原支部判決（昭和45.10.16）依下列理由駁回X對Y1之請求，即「因為宗教法人A寺與宗教法人Y1（曹洞宗）在法律上是個別獨立之法人，…所以X與Y1間之訴訟判決效力當然不及宗教法人A寺。從而，X未主張以其作為代表役員之該宗教法人A寺為訴訟當事人，而對Y1請求確認X為法人代表人地位之本件訴訟，縱令本件准許X之請求而為判決，但因為在與宗教法人A寺之間，任何人均無妨主張相反於該判決之法律關係，故不可能根本解決有關宗教法人A寺代表人地位的關係當事人紛爭，不能認為是作為解決紛爭法律關係之有效適當方法。如此提起的訴訟即欠缺確認之利益，是不合法之訴。」

X不服上開一審判決而提起上訴，並在上訴審追加對Y1請求確認其為A寺之住持地位；主張「就A寺之包括宗教法人Y1（曹洞宗）而言，A寺住持之地位與代表役員之地位，是不即不離的關係；住持之地位是能成為代表役員之基本資格。上述住持任免權是Y1之固有權限，且其住持地位是法律上地位，得為即時確認之對象。」

三、第二審判決要旨（東京高等法院昭和45年（ネ）2816號及49年（ネ）964號）

- （一）「在Y1，其所包括的每個寺院的住持，應該都是從曹洞宗的『教師』（即宗教師）之中選任，而住持是僅限於掌管寺院之葬儀、法事及其他佛事，及在傳佈教義等宗教性活動上擔任主持人的地位。而且，在宗教法人法，僅以宗教財產之財產活動作為法律上的規範對象（宗教法人法8條6項、85條參照）、在宗教活動面並非規範之對象。這也是為了避免在宗教活動的領域成為法律上之紛爭，而由政府公權力介入判斷，此可以說是要實質性地確保信仰自由的旨趣。如果依現在A寺的章程，規定只有是A寺住持地位者得為其代表役員，雖然正如X之主張，但就基於住持地位而為宗教性活動主持人地位以外，有可以獨自從事財產性活動的權限部分，X並未主張及舉證證明（關於住持就宗教性活動以外之事項，特別是財產性活動，有其獨自的權限；就其在宗教上地位有關的信仰、規律、習慣等宗教上之事項，反而在法律上有招來可以干涉其內容之餘地，即使從宗教法人法來看，也會帶來不令人滿意的結果。）
- （二）因為住持同時兼有代表役員之地位，基於代表役員地位而為之行為，特別是有關財產性活動的行為，乍看之下也有可能被視為住持所為，但是這究竟是基於代表役員の地位而為，決非基於住持地位本身。因此，住持一職徹底地僅限於宗教性、信仰上之對象的地位，縱令住持是兼有代表役員地位，兩者乃各自獨立者，住持並非法律上規律對象的地位…（略）…。

（三）如上所述，住持地位不該當於法律上判斷對象。從而，請求確認其地位之本件訴訟，不必進行其他之判斷，應認其為不合法而駁回。」（參考法條：法院法第3條）¹²

四、第三審判決要旨昭和51年（才）第958號確認罷免無效、請求損害賠償及交付不動產等事件（最高法院昭和55年1月11日第3法庭判決）¹³

如前所述，本事件的第一審判決，就有關請求確認代表人地位部分，認為不得以 Z 為被告，欠缺即時確認的利益，以程序上駁回（不受理判決）；而就損害賠償部分則以欠缺實質違法性而判決駁回其訴；另外，罷免住持的處分有理由，而准許原告 Z 的請求。X 則對上述兩事件均提起上訴，上訴審將兩事件合併審理。X 則主張追加請求確認住持地位，但是上訴審的判決，則以住持地位並非法律上的判斷事項，而駁回此追加的請求；同時其他的上訴也被駁回。X 仍不服又提起第三審上訴¹⁴。本判決要旨有二：

- （一）請求確認寺院住持地位之訴，在只是確認宗教上地位的存否，即使該住持地位是得成為宗教法人寺院代表役員的基本資格，本訴仍屬欠缺確認之訴的訴訟標的適格，本件起訴不合法。
- （二）在特定人的住持地位存否，就判斷有關其他具體權利或法律關係的紛爭之請求當否是前提問題的情形，法院以其判斷內容不涉及宗教上教義的解釋為限，就有關於該住持地位的存否，則有審判權¹⁵。

五、本事件評析

本件主要爭點為：（一）、得否提起確認住持地位存否之訴？（二）判定特定人的住持地位存否，為該人請求具體權利或法律關係有關紛爭的適當與否之前提問題時，有關法院就住寺地位存否有無審判權？

（一）、日本學者安武敏夫就第二審法院判決有下列的分析：

- 1. 寺院的住持地位是宗教上而非法律的地位，此為戰後宗教法人法施行以後的判例所採取之立場，本件判決也是承續此一判例者。特別是在慈照寺（通稱銀閣寺）事件¹⁶之上訴審大阪高等法院，就關於住持地位，在判

¹² 本件東京高等法院判決的事實概要及第一審、第二審判決要旨，均引用可參考安武敏夫，住職の法的地位，收錄於宗教法研究第1輯，龍谷大學宗教法研究會編，法律文化社，1979年9月，頁223~226。

¹³ 本件判例雖然是在1981年，但其後的相關判決亦多有引用，如最高裁判所第三小法庭平成21年9月15日（2008）平成20(受)1565號土地明渡等，代表役員の登記抹消手續請求事件；大分地方裁判所中津支部平成30年（2018年）2月13日宣判的平成26(ワ)55號地位確認等請求事件及建物明渡請求反訴事件，均有引用本判例。

¹⁴ 涉谷秀樹，住持の地位確認と法律上の争訟，收錄於蘆部信喜・若原茂編，宗教判例百選（第2版），有斐閣，1991.1，別冊ジュリスト109期，頁68。

¹⁵ 登載日本法院官網 <https://www.courts.go.jp/hanrei/53286/detail2/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25.11.15。

¹⁶ 有關銀閣寺事件最高法院判決簡要的事實摘要、判決要旨及相關評析，可參考平野武，宗教と法と裁判，晃洋書房，1996年8月，初版，頁102~103。

決中宣示「在宗教法人法之下的寺院住持，與向來住持作為寺院的主管、代表人而掌有執行儀式、傳佈教義等宗教性機能面的中樞地位，同時也代表寺院而有綜理關於寺院之禮拜設施、其他財產之維持運用與寺院業務乃至有關事業營運事務的權限並不相同，僅僅不過是有在儀式的執行、教義的宣佈等宗教性活動乃至機能面的主持人地位，並沒有作為寺院管理機關之組織法上地位。」本判決認為住持地位不是法律上地位的理由，在於宗教法人法的立法目的是「為有助於宗教團體所有、維持及運用禮拜設施與其他財產以及其他為達成其目的之業務及事業」（宗教法人法第1條1項），並沒有將住持設計作為宗教法人機關，此與向來住持作為寺院主持人、代表人，無論在宗教行事的層面或綜理有關寺院所從事事業的經營事務層面，都有代表寺院的權限不同。在宗教法人法之上，從其立法旨趣觀之，兩者被賦與個別獨立的地位。從而，寺院的住持也並非藉由是住持而當然成為該寺院宗教法人之責任役員、代表役員之地位；即使是住持，也有可能不是宗教法人的責任役員或代表役員的情形，宗教法人法可以說是預定如此。慈照寺之上訴審也基於原審認定之事實，「依（寺院）**代表役員以在同寺住持之職位者充之的慈照寺章程規定**，不過是同寺之宗教上地位被賦與同寺代表役員法律上地位而已」（最高法院判決昭和44・7・10民集23卷8號1427頁）與重視寺院章程之存在。

2. 以宗教上地位作為住持本來的性質，並非意味住持的地位不帶有法律性質。前述慈照寺之最高法院判決也承認「住持被賦與宗教上地位、作為代表役員及責任役員之法律上地位並其他權利義務（例如報酬請求權與寺院建物使用權等）之存在。」如此的意義不只是法律地位，在作為宗教團體之寺院未取得法人格之情形，即若考量所謂無權利能力財團之寺院的情況下，問題就變得更清楚。不待民事訴訟法第46條之規定，代表這種寺院者一定是住持。此種法律意義之寺院代表人地位，在戰前很多的判例都宣示以住持作為寺院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此判決意旨即使在今日，就有關非法人寺院住持而言，也很合適。如果能如此解釋，原本在一般寺院依「以位居住持之位者為代表役員」等的寺院章程或宗派章程的規定，住持地位是否應被賦與寺院代表役員之法律上地位，值得思考；因為若從宗教團體沿革與其本來應有的狀態來思考，原本應包含於一個主體而具有宗教上地位與世俗性財產活動上地位的機能。但是，**藉由以保持宗教純粹性為目的之宗教法人法的制定**，可以說將之分化為二。即維持宗教性權威、保持純粹性之典型體現者為宗派之主持人・管長與法人代表役員・宗務總長之分化；而提到二種機能依然實質上未分化如故之住持，仍係寺院之代表役員地位，則是一般寺院。
3. 宗教團體是由自管長到住持、信徒的信仰集團之宗教性・階層性關係，與從宗派宗教法人到寺院宗教法人之管理經營財產的統制關係之二種系列的機構，相互補充結合而構成者。前者以精神性、宗教性活動作為其

本來任務的關係即教團關係。就教團關係而言，加以規範之法律規範完全不存在，勿寧應依憲法第20條、宗教法人法第85條之規定，對於國家機關，要求有關「宗教團體之信仰、規律、習慣等宗教上事項」，「作為法律上紛爭避免政府公權力介入判斷」（本件判決理由）。就後者的關係而言，依宗教法人法之旨趣、規定，宗派宗教法人與寺院宗教法人完全是各別的人格，是獨立、平等的關係，宗派並非寺院之上級機關或統制支配機關¹⁷。

（二）日本學者涉谷秀樹對於最高法院判決的評析意見如下：

1. 一般寺院的住持，是指具有僧侶及教師資格者，也是依照教團內部的自律規範任命為該當寺院宗教上的管理者，並從事傳佈教義、執行儀式法會及教化信徒。在此意義下，住持的地位僅止於宗教上、信仰上的地位，並非法律上的地位。住持的任免權，依宗派章程（包括宗教法人的章程）或宗制（宗教團體的自律規範）等，通常是在包括宗教法人（團體）。一般的寺院依宗教法人法成為宗教法人，設立其管理機關 3 名責任役員。雖然該當法人的代表人係以責任役員互選為原則，但是該當寺院的章程如有特別規定（宗教法人法第 18 條 2 項），該當寺院的住持成為代表人則是通例。宗教法人的機關是具有法律上的地位。
2. 法院法第 3 條規定法院的裁判對象是法律上之爭訟，但是依據判例，更具體地說有二個要件：①有關當事人間的具體權利義務或法律關係的爭執及②依據法令的適用能終局解決者。
3. 以宗教法人代表人等地位存否的確認，作為訴訟標的之訴訟，而成為法律上的爭訟並沒有問題，問題是有關住持地位的紛爭。本件當事人的主張可區分為二種態樣，即①以住持地位本身的存在、不存在的確認作為訴訟標的，與②訴訟標的本身雖然是以金錢、物品的給付請求權，但其前提問題則是爭執住持地位存在與否。
 - ①關於第 1 種態樣，本判決沿襲慈照寺（通稱銀閣寺）事件的最高法院判決（最判昭和 44/7/10 民集 23 卷 8 號 1423 頁），認為確認住持不過是請求確認宗教上地位，因而駁回其請求。
 - ②關於第 2 種態樣，本判決認為以最高法院的前揭判決所示，住持地位存否的判斷，因為涉及宗教上教義的解釋而不被允許，除此之外則可以。另外，本門寺事件的最高法院判決認為代表人地位存否的判斷之前提，雖然是住持地位存否之爭的事件，但是就有無違背住持選任的程序上規定及探求住持選任程序上的規則，則是可以審理及判斷。

¹⁷ 安武敏夫，住職の法的地位，收錄於宗教法研究第一輯，龍谷大學宗教法研究會編，法律文化社，1979年，頁223-232。

4. 住持地位本身不能成為確認的標的之理由何在？從法律上爭訟的第 1 個要件，或者從民事訴訟法理論認為過去的法律關係或事實的存否不可作為確認標的。但是，住持的地位與代表役員的地位，果真能截然區分是有問題的。現行宗教法人法將宗教團體區分為宗教面與世俗面，並限定於只規範後者而制定，前者則是公權力規制的對象之外，（同法第 1 條 2 項、第 85 條）。不過，現實上的包括宗教法人宗教活動的負責人（管長、法主等）與法人的代表人（宗務總長等），一般而言是分離的，但在一般的寺院，由住持兼任代表人則是通例。本判決與慈照寺事件的第二審判決，均認為住持的地位如果與具體的財產活動或法律上的權利義務結合的情形，則承認有起訴請求確認的餘地。再從根本解決紛爭的觀點，勿寧肯認住持地位本身可以作為訴訟標的，是一件很好的方向。不過，如果從對於信教自由、政教分離、結社自由給予最大限度的保障，是憲法 20 條、21 條 1 項的觀點，因為如此強勢的解決紛爭機能，正是作為國家權力之一的司法部門應該以儘可能節制對於宗教團體的介入之政策性判斷為優先。訴訟標的本身是純粹宗教性的地位時，在此階段作暫緩介入的結論也是具有充分正當性。
5. 法院在宗教上的紛爭如果採取一切都不介入的立場，倒還說的過去，既然不是如此，至少在訴訟標的採取世俗性的請求的型態時，則會產生到如何的限度為止，法院可以介入宗教上紛爭的問題。本判決及本門寺事件二審判決，都是在限定得審理的範圍（無關解釋教義的事項、或程序事項）上，對於作為前提問題的住持地位，肯認其有審判權。這可以評價為從權衡信教自由、政教分離及結社自由導出的宗教團體自律權與受裁判權利（憲法 23 條）而找到一定的妥協點。不過，何種事項是與教義的解釋有關聯的判斷，則是非常地微妙。最後的衡量在具體事件上，應該是從紛爭解決的必要性加以調整。
6. 最後，關聯法律上爭訟的二個要件的問題是，此要件限定在訴訟標的之關係？還是攻擊防禦方法所提出的實質性爭點關係？法律上的爭訟如果僅是關係到訴訟標的，在住持的地位非訴訟標的是實質性爭點的情形，就是本案判決結果之所在。與本案不同，而從判斷法律上的爭訟性有無的板曼陀羅事件二審判決的理解不同。在充分根據宗教團體的特殊性、紛爭的形式與內容的多樣性的基礎上，將劃定司法權界限的關鍵字「法律上爭訟」，從憲法學、民事訴訟法學兩方面，加以整理分析，是一個迫

在眉睫的課題¹⁸。

7. 日本學者田中謙太引用學者新堂幸司的見解，認為從種德寺及本門寺事件的判決所示，最高法院在此之前對宗教團體內部產生的紛爭介入，表現出相對積極的態度，但據說隨著「板曼陀羅」事件判決的出現，最高法院的態度轉為消極。關於具體權利義務的紛爭，法院原則上應予解決的種德寺與本門寺事件判決的思路，反而比本判決的法庭意見，更貼近請求駁回的結果¹⁹。另外，其亦表示對於最高法院而言，比起通過本案判決使作為國家機關的法院呈現出偏袒宗教衝突一方的外觀，更希望通過程序上駁回判決來表明對宗教衝突的不干涉態度，這一點從要求國家機關宗教中立的政教分離原則來看，是更為理想的。實際上，在蓮華寺判決中，比起以往的判例，更加重視法院對宗教的中立與不干涉姿態，並且能明顯看到司法權行使上的迴避態度²⁰。其又提到法院判例對於採用尊重自律權的做法持消極態度，引起學者的批評，也可能是因為尚未充分證明可以僅對於對立雙方中的團體一方給予有利對待的理由。其依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信仰自由條款及國教禁止條款，判例上已承認對教會自治權的尊重，且由於對宗教團體內部紛爭有豐富的判例與討論累積，因此值得參考。在美國，關於宗教團體的自主權，也就是教會自主權，近年來的一個重要動向是聯邦最高法院對「聖職人員例外」（ministerial exception）法律原則的認可。「聖職人員例外」法律原則排除了各種法律禁止就業歧視規定在「宗教團體」與「聖職人員」之間的僱傭關係上的適用²¹。

（三）本件最高法院的判決是在昭和 51 年（1976 年），距離現在已有相當時間，但其見解，仍為當前日本法院所引用，此由平成 21 年（2008 年）9 月 15 日最高法院第 3 小法庭裁判的平成 20(受)1565 號請求土地交付等及代表役員の塗銷登記事件，法院認為就起訴請求交付宗教法人所有土地，認為不該當於

¹⁸ 涉谷秀樹，住持の地位確認と法律上の争訟，頁 68~69。

¹⁹ 田中謙太，宗教団体の自律権の基礎——宗教団体の内部紛争を題材として——，同社法學，71 卷 6 期（通卷 409 期），2020，頁 197。

²⁰ 田中謙太，宗教団体の自律権の基礎——宗教団体の内部紛争を題材として——，頁 200。

²¹ 田中謙太，宗教団体の自律権の基礎——宗教団体の内部紛争を題材として——，頁 210。另有關於自願性原則的討論，可參考林榮光，自願性原則作為解決宗教團體自主權與個人基本權之衝突的途徑——評歐洲人權法院 Fernández Martínez v. Spain 之判決，2021 年 12 月（167 期）。

法律上爭訟而判決不合法駁回的事件。其裁判要旨為：起訴請求交付宗教法人所有土地，而決定其請求之當否的前提問題，為判斷對於作為占有人即住持所為斥退處分的效力，在無法避免涉入宗教上教義乃至信仰內容而審理，判斷的情事時，即不該當於法院法第 3 條所謂的「法律上爭訟」，是不合法。

另外，在日本大分地方裁判所中津支部平成 26 年（ワ）第 55 號地位確認等請求事件，同第 113 號建物明渡請求反訴事件，於平成 30 年（2018 年）的判決中可亦可看到法院就有關法院審查標的的見解；該法院在判決理由一開始就提到有關司法審查標的：「法院依其固有權限得審判之標的，為日本法院法第 3 條所定之法律上之爭訟，即當事人之間具體權利義務或法律關係存否之爭議；而且，限於得以適用法令而終局解決者。即使是有關具體權利義務或法律關係之爭議，如果不適合依據法令的適用而終局解決者，不得作為法院審判的標的。（參照最高法院昭和 51 年（オ）第 748 號同 56 年 4 月 7 日判決，民集書第 35 卷第 3 期，第 443 頁）。（此即前述已經提及的有關板曼陀羅事件的判決）」其次，該法院亦提及「2. 本訴事件前述第 1 之 1(1)乃至(3)的各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宇佐神宮的勞動契約上權利及基於與被告宇佐神宮的勞動契約而請求給付工資；反訴原告宇佐神宮請求反訴被告（即原告）基於所有權而請求返還本件各建物，兩造的請求均屬有關具體權利義務乃至法律關係的紛爭，但其主要爭點的前提問題，即是神職（權宮司）的地位與其應從事的宗教活動之爭。此前提問題的神職（權宮司）地位與所應從事的宗教活動，法院在有必要判斷關於原告與被告間的具體權利義務或法律關係的情形，其判斷內容以不涉及宗教上教義的解釋為限，應有審判權限，但是為了判斷神職（權宮司）之地位與應從事的宗教活動，在無法避免就有關被告宇佐神宮宗教上教義乃至信仰內容為一定評價的情形時，則不應審理判斷。關於判斷本件原告被告宇佐神宮之間的具體權利義務或法律關係的紛爭，作為前提問題的神職（權宮司）的地位或應從事的宗教活動，在就被告宇佐神宮宗教上教義乃至信仰の内容，給予一定的評價是必要的情形下，前述第 1 之 1(1)乃至(3)的請求及反訴事件的請求，其實質上是不能依法令適用而終局解決，即不該當於法院法第 3 條所稱之「法律上爭訟」，故應駁回其訴。（最高裁判所昭和 51 年（オ）第 958 號同 55 年 1 月 11 日判決・民集 34 卷 1 號 1 頁（即本文介紹的種德寺事件），最高裁判所昭和 52 年（オ）第 177 號同 55 年 4 月 10 日判決・裁判集民事 129 號 439 頁，最高裁判所昭和 51 年（オ）第 749 號同 56 年 4 月 7 日判決・民集 35 卷 3 號 443 頁（即有關宗教上教義・本尊と法律上の争訟板まんだら事件），最高裁判所昭和 61 年（オ）第 943 號平成元年 9 月 8 日判決・民集 43 卷 8 號 889 頁等參照）。足見日本法院就有關宗教上教義乃至信仰內容非法院審判標的，已有相當的共識。

參、我國相關事件

我國有關宗教團體內部爭訟的事件，學者劉玉中曾以「寺廟內部」為關鍵

字搜尋司法院判決，並以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5 月 31 日之間為限，共搜到地方法院判決 4 件，高等法院判決 2 件，最高法院判決 2 件，並非常簡要的說明，其內容雖有提及法院判決有關信徒資格之取得開除與否及寺廟管理人的任免，**依內政部函示**，屬寺廟自治事項等，然並無與住持地位有關的訴訟²²。惟其中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445 號民事判決，劉玉中只提及「本件之法院雖然未針對寺廟內部事務相關事項表示意見，但就**確認信徒大會決議無效等訴訟為實質的審理**。」關於此最高法院的事件，本件爭點除了確認圓覺寺系爭信徒大會決議無效之外，還有撤銷系爭信徒大會決議、**確認被告與圓覺寺間信徒、管理委員會委員、住持、管理人等法律關係不存在等**，筆者曾就此事件加以評析²³，另外，尚有幾件有關住持的訴訟，亦分述如下：

一、請求確認信徒大會決議無效等民事事件（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第 445 號判決）

（一）事實概要：

1. 上訴人甲主張：「伊為台北市登記有案之募建寺廟，即被上訴人乙寺（下稱圓覺寺）之信徒，圖覺寺於民國 91 年 5 月 7 日召開信徒大會（下稱系爭信徒大會），決議追認顏等 107 人之信徒資格，將鄭等 15 名舊信徒列報異動，並通過其寺廟之組織章程（下稱章程）修訂，取消信徒大會之設計，另行成立住眾會，管理寺廟一切財產及行使財產處分議決權、年度收支決算之審訂等重要事項，而住眾會成員資格之取得，則須經住持認定；並廢除管理委員會，**僅設住持及管理人一人綜理一切寺務，住持並得掌管寺廟財產並監督經費收支運用**。」
2. 惟圓覺寺管理委員會於 89 年 4 月 11 日並未舉行會議，亦無會議記錄，更無審核被上訴人丙為信徒，故**丙根本不是信徒、管理委員或管理人之身分**。縱有開會，該次會議自始即為非法無效之會議，則丙亦不可能取得信徒身分。何況圓覺寺於 90 年 4 月 10 日有信徒 56 名，但該次信徒大會僅有 34 人出席，其中尚有 9 人為新申請加入者，故斯時具有信徒資格出席會議者僅 12 人，自未達法定開會人數，故丙亦未取得管理委員身分無疑。又管理人係由管理委員中互選之，丙既未取得管理委員身分，即無從取得管理人身分無疑。為此，求為判決（先位聲明）確認圓覺寺系爭信徒大會決議無效。…」

²² 劉玉中，民事審判權之界限—以宗教紛爭之解決為中心，頁 168-173。

²³ 李建忠，行憲後台灣宗教自由的回顧與展望，司法院帶職帶薪自行研究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2014 年 12 月，頁 79-85。

3. 而被上訴人丙主張：「依伊寺廟章程第 4 條規定，申請加入為伊寺廟信徒者，僅經管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即為信徒，並無須經信徒大會追認之必要。『台北市寺廟信徒異動須知』僅為補充性之行政指導規範，無逾越宗教團體章程效力，自無於章程規定外，另加該一條件之理論依據。何況丙於 89 年 4 月間經伊寺廟管理委員會通過為信徒，並經主管官署核備而取得信徒身分，復於 90 年 4 月 10 日於伊寺廟信徒大會中，與上訴人同時受推為管理委員，同日信徒大會後，第六屆第一次管理委員會議中，受選任當選為第六屆管理人，其取得信徒資格、擔任管理委員及管理人完全符合圓覺寺章程之規定，而上訴人甲均有參與其事（擔任記票人）而從未表示異議，嗣再起訴爭執，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二）最高法院判決要旨：

1. 按當事人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係撤回原訴而提起新訴者，原訴已因訴之准許變更而視為撤回，第一審法院就原訴所為之判決，因此失其效力，第二審法院僅得就變更後之新訴審判，不得就第一審之原訴更為裁判（本院66年台上字第3320號判例參照）…；**原審以上訴人甲主張丙非被上訴人圓覺寺之住持，雖非無據，然因住持為一種身分，上訴人執意以身分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顯無權利保護之必要，不能准許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
2. 惟查上訴人甲在第一審原僅係以圓覺寺為被告請求判決（先位聲明）確認圓覺寺系爭信徒大會決議無效；（備位聲明）撤銷系爭信徒大會決議。嗣提起第二審上訴後追加丙為被告後變更聲明求為判決：確認丙與圓覺寺間信徒、管理委員會委員、**住持**、管理人等法律關係不存在。核其在原審之聲明與其在第一審之聲明已有變更，原審既准許上訴人上開聲明之變更，則就圓覺寺部分，應僅就合法變更後之新訴為裁判，而不得就已失效之第一審判決復為駁回上訴之判決，乃原審一方面准許上訴人為訴之變更，復認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將上訴人之上訴駁回，非無違誤。
3. 原告提起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雖以不能提起他訴訟者為限，但如得利用同一訴訟程序提起他訴訟者，審判長應闡明之，為民事訴訟法所明定。**審判長疏於此項闡明義務，其踐行之訴訟程序難謂無重大瑕疵。**查上訴人在原審言詞辯論期日曾表明所請求確認者包括法律基礎及事實，其真意如何？原審審判長未再闡明以審認上訴人有無他訴訟得提起而不能提起之情形，即以上訴人**未經釋明不能提起他訴訟**，而認其追加之訴欠缺權利保護要件，予以駁回，亦有未合。因而，最高法院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三）本判決評析：

1. 本件最高法院的判決，主要係依據程序法即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認定台灣高等法院之判決就訴訟審理對象有誤及未盡闡明義務之重大瑕疵，而廢棄原判並發回更審。惟從法院認定的事實觀之，**本件主要爭點是在：**
「丙之圓覺寺信徒、管理委員、管理人資格取得程序，以及圓覺寺修訂章

程取消信徒大會，另行成立住眾會，管理寺廟一切財產及行使財產處分議決權、年度收支決算之審訂等重要事項；而住眾會成員資格之取得，則須經住持認定；並廢除管理委員會，僅設住持及管理人一人綜理一切寺務，住持並得掌管寺廟財產並監督經費收支運用是否合法有效。」惟最高法院於本判決中並未就此表示其見解，如認章程修正合法有效，則圓覺寺的代表人為住持，其不只兼任管理人，又兼任監察人，又有認定住眾成員資格之權力，可謂集一切權力於一身。此種制度設計，與現行民法一般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的相關規定，均有所違背，如果不從憲法保障宗教團體自主權的觀點，不可能認為合法。

2. 惟從本件第一審法院即台灣士林地方法院91年度訴字第920號判決要旨觀之，地方法院以「…四、…查被告（即圓覺寺）信徒大會之決議為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並非法律關係本身，依前揭法條規定，原告（即甲）既非不能提起其他訴訟，該基礎事實本身自不得作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是原告請求確認系爭信徒大會決議無效，尚非合法，不應准許。…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系爭信徒大會之決議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請求確認該決議無效或撤銷該決議，均無理由，應予駁回。」是本件地方法院的判決，主要在於依民事訴訟法從程序上審查，故未就信徒大會之決議內容是否有效及修正章程之實質內容等實質上的問題進行審查。
3. 至於本件第二審法院即台灣高等法院 92 年度上字第 128 號民事判決，其判決要旨則提及本件上訴人欲確認者係：「被上訴人（即圓覺寺）與追加被告乙（按即最高法院之丙）間之信徒、管理委員會委員、管理人、住持之法律關係不存在」，核其情形係屬確認身分之訴，以管理人為例，管理人與寺廟間，其法律關係，不能稱之為「管理人之法律關係」，其理至明。上訴人甲訴之聲明雖用「法律關係」之字樣，但實則仍屬身分之事實問題，而身分為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非屬法律關係之本身，依前揭說明，上訴人如提起確認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須上訴人不能提起他訴之情形時始得為之。惟查上訴人對於其不能提起他訴，並未釋明，其於原審時亦係就事實為確認之訴之標的，經原審予以駁回，上訴至本院，本院歷經多次開庭，曉以其上訴聲明並非法律關係，上訴人仍執意就該聲明認為係法律關係，而本件既非不能提起其他訴訟，上訴人猶以確認身分事實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其訴顯欠缺權利保護要件，而不能准許，應予駁回。
4. 第二審判決理由五、有針對被上訴人是否圓覺寺之信徒、管理委員、管理人、住持等分別說明，惟本文重點在住持部分，故只提及（四）住持部分。法院認為：「依章程第 3 條規定，本寺設住持乙名，以本山本派之出家法師為原則。其由管理委員會推薦，提經信徒大會追認，管理人聘任之。」經查被上訴人圓覺寺第 6 屆第 1 次管理委員會會議討論事項「本寺住持聘任案」，決議：「本寺管理委員會通過推薦乙擔任本寺住持」，惟管理委員會推薦乙擔任住持後，迄未據其提出有經信徒大會追認之證據，則乙擔

任住持顯然尚未完成章程所規定之聘任程序；上訴人主張乙非被上訴人之住持，雖非無據，然因住持為一種身分，上訴人執意以身分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依前述說明，本件上訴人之請求顯無權利保護之必要。六、綜上所述，上訴人確認身分之訴，不具權利保護要件，不能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4. 最高法院認為高等法院以上訴人甲所提起確認者係寺廟與信徒丙之間的信徒、管理委員會委員、管理人、住持之法律關係不存在，實則仍屬身分之事實問題，而身為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非屬法律關係之本身，且上訴人對於其不能提起他訴，並未釋明，其於原審時亦係就事實為確認之訴之標的，經原審予以駁回，而提起上訴，曉以其上訴聲明並非法律關係，上訴人仍執意就該聲明認為係法律關係，而本件既非不能提起其他訴訟，上訴人猶以確認身分事實為確認之訴之訴訟標的，其訴顯欠缺權利保護要件，而不能准許。此部分法律見解，固屬我國通說及為實務所肯認，但與日本則有所不同（詳下述）。
5. 就住持而言，依圓覺寺章程第3條規定「本寺設住持乙名，以本山本派之出家法師為原則。其由管理委員會推薦，提經信徒大會追認，管理人聘任。」又住持為管理委員會之當然成員，而住持又須具備所謂本山本派出家法師身分，其他管理委員則未限制其必須具備神職人員身分，則管理委員會成為僧俗共治的機構。雖然這樣的組織型態，基於宗教團體自治自律的原則，國家應予尊重，惟值得注意的是，本件圓覺寺管理委員會的職權為何，並無法從本判決中得知，但是如果管理委員會職權除了處理世俗性（法人）事務之外，又能決定傳教、儀式等宗教上事務時，則恐有聖俗不分之虞；如果寺廟的管理委員會乃決定世俗性事務的決定機關，則從世俗性法律的規範而言，參諸日本宗教法人第18條第4項即明文規定「責任役員依其章程決定宗教法人之事務。」同條第6項並規定「代表役員及責任役員關於宗教法人事務之權限，並不包含該當役員對於宗教上機能有任何支配權及其他權限」。舉一簡單例子而言，日本的宗教法人之代表役員或責任役員並無權限任免宗教法人之神職人員。再者，住持只是管理委員會成員之一，應該不具有決定性地位，就佛教而言，似乎與其傳統制度有所違背。惟從宗教團體自治權的角度，則應尊重該宗教團體的自治及自律。

二、請求確認住持委任關係不存在民事事件（台灣高等法院 101 上字第 137 號。原審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1042 號）

（一）事實概要

1. 妙法寺係設於桃園縣大溪鎮，依桃園縣政府核發之寺廟登記表及寺廟登記證所載，其住持之產生方式係由寺廟所有者選派，組織型態係採取住持制，宗教別為佛教，建別記載為私建。又妙法寺並無信徒名冊或執事名冊，亦

無召開信徒大會或執事會、訂立組織或管理章程、選舉組織代表。釋如田法師於民國 98 年 9 月 30 日死亡，甲（原告、被上訴人）為其繼承人。妙法寺所坐落之桃園縣大溪鎮○○○段 137 地號、137 之 2 地號、137 之 16 地號、1935 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均登記為林○○（即釋如田法師）；而桃園縣大溪鎮○○○段 309 之 1 建號、309 之 2 建號、324 建號建物，均記載妙法寺為所有權人。此外，妙法寺於 98 年 10 月 2 日經住眾即葉○○（性覺）等 9 人，及其他僧侶釋性通等 3 人，於 98 年 10 月 2 日召開妙法寺第 2 屆第 1 次全體常住僧侶會議，為維持寺務運作，就選舉接任住持一事進行選舉，經上開住眾推選結果，由乙（被告、上訴人）當選為住持。

2. 甲主張妙法寺係釋如田法師一人創建，且依上開寺廟登記證及寺廟登記表之記載，妙法寺係私建性質，釋如田法師生前未指派由何人接任住持，甲亦未指派乙為妙法寺之住持；妙法寺自應由其繼承人即甲繼承，而由甲成為妙法寺之所有者。乙則抗辯妙法寺係由釋如田法師、釋如觀法師、釋如濟法師 3 人搭建茅蓬建立道場，後經信徒捐納建寺緣金，妙法寺之財產係向四方信徒募捐而來，且建物所有權人登記為妙法寺，依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 6 點之規定，堪認妙法寺為募建之性質；甲對於乙對外聲稱業經寺內其他法師推舉，接任妙法寺住持，並以妙法寺住持身分對外為一切法律行為，而有害於甲私法上之地位，致甲對妙法寺之權利關係不明確。從而，向台灣桃園地方法院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住持委任關係不存在。
3. 桃園地方法院經審理結果，認為妙法寺為由釋如田法師私家獨建之私建寺廟，所有者即為釋如田法師，妙法寺之負責人（即住持）之產生，應由妙法寺之所有者選派，惟釋如田法師生前既未選派被告為妙法寺之住持，其死亡後由原告繼承而為妙法寺之所有者，原告亦未選派被告為妙法寺之住持，是被告以妙法寺住持之身分，管理妙法寺，即屬無據。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被告與妙法寺間住持之委任關係不存在，即屬有據應予准許，並於民國 100 年 12 月 30 日判決原告勝訴並宣示確認被告與妙法寺間住持委任關係不存在。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台灣高等法院審理結果，認為妙法寺係募建寺廟，乙係妙法寺之住持，乙與妙法寺之委任關係存在，從而甲請求確定乙與妙法寺間住持的委任關係不存在，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因而於 103 年 4 月 15 日以 101 年上字第 137 號判決將原判決廢棄，改判甲第一審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又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 104 年度台上字第 653 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

（二）第二審判決要旨：

1. 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 247 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妥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 52 年台上字第 1237 號參照）。本件甲主張妙法寺私建，屬原所有權人釋如田法師之遺產客體，嗣由甲繼承為所有權人，釋如田法師及甲均未選派乙為住持，乙自任為妙法寺之住持對外進行事務，侵害甲私法上對妙法寺權利關係之地位。乙予以否認，並抗辯妙法寺係募建，係為**非法人團體之權利主體**，乙因妙法寺住眾之選任及釋如田法師之指派為妙法寺之現任住持等語。**乙與妙法寺間住持之委任關係**是否存在，顯不明確，甲主觀上認其私法上地位有不妥之狀態存在，且得以本件訴訟除去，依前揭說明，甲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應認有法律上之利益。

2. 妙法寺為私建或募建（本件有無監督寺廟條例之適用）？

①按寺廟屬於左列各款之一者，不適用本條例之規定：(1)**由政府機關管理者**。(2)**由地方公共團體管理者**²⁴。(3)由私人建立並管理者；寺廟財產及法物，應向該管地方官署呈請登記；寺廟財產及法物為寺廟所有，由住持管理之，監督寺廟條例第 3 條、第 5 條、第 6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募建寺廟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應登記為寺廟所有；私建寺廟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應登記為私人所有。土地及建物所有權已登記為寺廟所有者，不得登記為私建寺廟，94 年 2 月 3 日內政部函訂定發布之辦理寺廟登記須知²⁵第

²⁴ 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89 號民事判決提及乾德宮為領有寺廟登記證之寺廟，向由歷屆彰化縣田中鎮（下稱田中鎮）鎮長隨任期擔任主任委員。被上訴人鄭俊雄（原田中鎮鎮長）於第 17 屆鎮長謝文賢上任後卸任乾德宮負責人職務，繼由第 18 屆鎮長即上訴人洪麗娜接手管理。又於判決要旨指出：寺廟為宗教團體，關於其信徒或執事資格之取得，監督寺廟條例並無規定，基於憲法保障人民宗教結社自由，應優先依寺廟章程規定辦理，若無章程或章程未規定者，得參考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 12 點規定，由寺廟就(一)寺廟開山、創辦者、(二)依教制辦理皈依傳度者、(三)於寺廟人力、物力、公益慈善、教化事業等有重大貢獻者，**本於寺廟事務自治原則，自行認定，若對於信徒或執事資格有爭議時，非不得提起民事訴訟以確認之**。又「備查」乃指下級政府或機關間就其得全權處理之業務，依法完成法定效力後，陳報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知悉之謂，並未進行審查或作成決定，**僅具有通知的性質，核非行政處分，對該事項不生公法上法律效果**，此觀地方制度法第 2 條第 5 款規定即明。

²⁵ 2018 年 8 月 6 日內政部以寺廟登記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 25 年 1 月 4 日發布，規範辦理寺廟登記相關事項，於 102 年 8 月 8 日修正部分條文。經評估本規則第 1 條至第 8 條規範寺廟登記之規定與辦理寺廟登記須知（以下簡稱登記須知）重疊，其功能亦可由登記須知取代；本規則第 10 條至第 12 條有關強制執行寺廟登記或革除負責人職務等規定，基於宗教自治原則，並考量監督寺廟條例另有規定，應無繼續施行之必要，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第 2 款規定廢止。登載於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網 <https://religion.moi.gov.tw/Content/Detail?ci=90&ContentID=F01180806101751>

6 點亦定有明文。該登記須知第 6 點嗣經 102 年 9 月 10 日內政部函令修正更改為第 19 點，規定「寺廟之不動產應登記為寺廟所有」，立法理由則表明因配合該須知修正規定及相關表件均不再註記寺廟建別。惟該須知修正施行前，登記有案且於 92 年間即有建別登記之妙法寺，於判定其為私建或募建寺廟時，解釋上應仍有修正前 94 年寺廟登記須知之適用，合先敘明。

②次按「監督寺廟條例第 3 條第 3 款所稱由私人建立並管理之寺廟，雖不限於私人之為一人，要必自始以自己所有之意思建立寺廟並管理之，而非以捐助為目的者，始足當之，此觀司法院院字第 715 號解釋『監督寺廟條例第 3 條第 3 款所稱之私人，非指一私人而言，集多數私人，非以出捐為目的，而以個人私有財產建立寺廟並管理者，均應適用該條之規定。現行法例對於僧道私人建立私有寺廟，並不禁止。如僧道不以出捐為目的而以其一私人或集合多數人之個人私有財產建立寺廟並管理，自應與一般私人同視。』即明。至所謂『募建』，係指信徒大眾捐資建立之寺廟，苟私建之寺廟如後來又有募捐情形，即應改為募建…信徒，於出資建立該寺廟時，如無出捐之意，而係約定為信徒所有或共有，自應將所有財產登記為信徒所有或共有，何須逕行登記為該寺所有，是依其財產登記為寺廟所有之方式以觀，應可認定該寺廟為信徒大眾捐助建立，為「募建」，而非「私建」…寺廟登記係就寺廟所為行政管理之措施，主管機關僅為形式審查而不及於實體，故有關寺廟之登記，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之效力…寺廟管理人提出申請登記時所為之記載，行政機關僅為形式審查並不涉及實體事項…原登記內容經主管機關查證結果，非屬『私建』，應依職權變更其建別為『募建』，使該寺廟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監督管理，以維公益」（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111 號判決參照）。是寺廟財產已為寺廟所有權名義登記者，於寺廟總登記時，自應依照監督寺廟條例第 6 條之規定認定為募建，有內政部 61 年 6 月 24 日台內民字第 459907 號函可參。為避免募建寺廟其財產已登記為寺廟所有而主管機關所發寺廟登記表、寺廟登記證之建別欄仍登載為「私建」情事，於 92 年寺廟總登記時，如有上述情形，應依據監督寺廟條例第 6 條規定，認定為募建寺廟，逕將其建別改為「募建」後再核發寺廟登記表證，則有內政部 91 年 8 月 23 日函研商 92 年寺廟總登記作業會議決議二可參。

3. 上訴人與妙法寺間住持之委任關係是否存在？

①妙法寺業經該法院認定係「募建」，則於審定本件乙與妙法寺間住持之委任關係是否存在時，自應以妙法寺僧眾有無選任乙為妙法寺住持為斷。

②甲不爭執妙法寺於 98 年 10 月 2 日經登記有案之住眾即葉○○（性覺）等

9 人，及其他僧侶釋性通等 3 人，於 98 年 10 月 2 日召開妙法寺第 2 屆第 1 次全體常住僧侶會議，為維持寺務運作，就選舉接任住持一事進行選舉，經上開住眾推選結果，由乙當選為住持。

4. 綜上所述，乙抗辯妙法寺係募建寺廟，其係妙法寺之住持，乙與妙法寺間住持之委任關係存在，自屬可信；甲主張乙與妙法寺間住持之委任關係不存在，為不足採。從而，甲請求確認乙與妙法寺間住持之委任關係不存在，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乙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

(三) 本件判決解析：

1. 本件原告甲主張妙法寺係私建寺廟，其係所有者，並有指派住持之權利，而被告乙以妙法寺為募建寺廟，且其被選為住持。**兩造爭點主要是妙法寺是否募建寺廟及乙是否為妙法寺之住持。**
2. 私建寺廟依寺廟監督條例第 3 條第 3 款規定不適用本條例，是寺廟財產及法物本係私人所有，本不必依同條例第 5 條向該管地方官署呈請登記，亦不必依同條例第 6 條置住持管理之；也能自由動用寺廟財產，處分或變更寺廟之不動產及法物時，更不必經所屬教會之決議並呈請該管官署許可；收支款項及所興辦事業不用報告該管官署並公告，也不必興辦公益或慈善事業（同條第 7-10 條參照）。私建寺廟既不適用本條例向該管地方官署呈請登記，則寺廟登記規則第 1 條規定私家獨建之壇廟寺院庵觀除依關於戶口調查及…外，並應依本規則登記之的行政命令，顯有牴觸監督寺廟條例，應屬無效。再者，本條例主要目的，應在管理及監督募建寺廟的財產及其住持之行為，私建寺廟或公建寺廟本非本條例之適用對象。是主管機關訂定執行本法律行政規則，本應只針對募建寺廟即可。主管機關內政部於 102 年 8 月 8 日以內政部台內民字第 1020276576 號令修正發布第 1、2、7、10 條文；並刪除第 9、13 條文。其中第 2 條即規定「本規則所稱寺廟，指適用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換言之，即僅指募建寺廟而言。內政部並於修正總說明中表示基於**政教分離原則**，不宜再受理**公建寺廟登記**，以及監督寺廟條例第 3 條所稱私人建立並管理之私建寺廟，因其財產為私人所有，並聽憑私人處分，辦理寺廟登記並無實益。此項修正應屬符合監督條例之精神，也不會產生命令牴觸法律之虞。
3. 依**妙法寺之章程**，**既無信徒大會，亦無執事會**，顯與內政部所 102 年 9 月 10 日台內民字第 1020287824 號令修正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 5 點「申請寺廟設立登記，應由寺廟負責人檢具（六）組織或管理章程及信徒或執事會議紀錄。」之規定不符。又該須知第 12 點規定寺廟負責人應造報信徒或執事組織成員名冊，列冊信徒或執事組織成員人數至少須 5 人以上。惟此二項規定之依據為何，顯有疑問。**蓋因監督寺廟條例僅規定住持為寺廟的負責人及管理人，並無信徒或執事會的規定；而依上述最新的寺廟登記規則第 5 條也僅規定寺廟人口登記以僧道為限，但其他住在人等，應附帶聲**

報。前項僧道指僧尼道士女冠而言。姑不論上述辦理寺廟登記須知強制性的規定，可能違反宗教團體自治精神，蓋是否組織信徒並成立信徒大會或組織執事會，本即應尊重各個宗教團體自己的決定；就法律保留原則而言，亦有命令牴觸法律之嫌。

4. 此外，依時任內政部民政司宗教科科長黃慶生之見，執事會的組織型態，以佛教寺院為多，前台灣省政府民政廳於 79 年 7 月 4 日邀集台灣省各縣市政府業務有關人員，就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會所送佛教寺院章程範例進行研商修正後，並於 79 年 10 月 6 日提請當時台灣省宗教諮詢委員會第 13 次會議諮商通過，除佛教寺院章程範例外，尚有道教、一貫道章程範例，作為上述 3 種宗教所屬寺院、宮廟、佛堂等會員團體訂定管理章程之參考。當時佛教寺院章程範例已提出設置執事會的構想，故其章程範例中對執事產生、組織及職權已有明確規定。82 年開始，佛教界對信徒大會的組織在佛道教管理規定上一體適用，感到非常的不能認同，終至演變成 83 年 3 月 18 日佛教團體相偕走上街頭，激化出一場反對信徒大會制度的自力救濟的抗爭事件。內政部及前台灣省政府民政廳緊接者佛教團體訴求後，於 84 年總共修正不合時宜或停止原函適用之相關解釋函令計 20 則。同時內政部並對佛教內部組織定位，作成寺廟得於章程內訂定設信徒大會、執事會或委員會分別行使職權，也就是說寺廟不一定以信徒大會為其最高權力機構，而可於其章程中規定由執事會或管理委員會來行使職權；至此佛教寺院對信徒大會作為其內部最高權力機構的抗爭事件可謂完全告一段落，執事會取代信徒大會成為佛教寺院內部行使職權的另一個新的紀元從此開始²⁶。
5. 惟從尊重宗教團體自治而言，此項主管機關未經授權而訂定的行政規則，雖然有助於佛、道兩教的宗教團體自由選擇其組織型態。但是，從司法院釋字第 573 號解釋憲法保障宗教結社自由保障的宗教團體人事結構與組織的自主權而言，既然尊重宗教團體享有人事及組織的自治權限，就不應該以法律或行政規則訂定其組織型態類型及要件，進而要求宗教團體配合辦理，而是應該聽任各宗教團體的自治自律，縱使該宗教團體章程決定由寺廟負責人一人單獨決定寺廟世俗性業務，也應無不可，因為依監督寺廟條例第 6 條的規定，就是規定由住持管理寺廟的財產，而非行政機關違法所創設之雙頭馬車（一為住持，一為管理人）²⁷。甚至在 102 年 9 月 10 日台

²⁶ 黃慶生，寺廟經營與管理，永然文化，2000 年 11 月，初版，頁 238-239。

²⁷ 按管理人乙詞，並未見諸監督寺廟條例，而是出現在寺廟登記規定，惟寺廟登記規定規則中，僅在寺廟登記時，應由住持聲請之，無住持者，由管理人聲請之。其訂定理由不得而知，惟有可能原因，其一、寺廟登記規則所規範者，除募建之寺廟外，尚有公建及私建寺廟，募建寺廟有僧道住持是常態，而公建或私建的寺廟有可能沒有僧道住持；另一個可能是寺廟之住持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而暫時無住持時，

內民字第 1020287824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6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之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 22 條仍保留有關「寺廟依本須知完成登記程序後，寺廟負責人得依財團法人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設立為財團法人制之寺廟。²⁸」之規定，鼓勵具有權利能力即法人地位之寺廟同時又立財團法人。果真如此，一間寺廟之負責人將有住持、管理人、董事長（含董事）三位，如又分屬三人，可能形成三頭馬車，對寺廟之運作是否有所幫助，不無疑問。而且，佛、道兩教的宗教團體之中，也有可能有其另外不同於上述三種的組織型態之選擇自由，更遑論尚有其他不同於佛道二教的宗教團體存在。

6. 因此，日本宗教法人法第 12 條有關設立宗教法人之章程應記載事項中，僅於第 5 款及第 6 款就世俗性事項規定代表役員、責任役員（相當於我國社團或財團的理事或董事）、代理人、臨時代表人及臨時董事之稱呼、資格及任免並有關代表人之任期及職務權限、關於董事之人數、任期及職務權限、關於代理人其職務權限的事項。前款所列以外，於有議決、諮詢、監察或其他機關之情形，關於其機關之事項，應有值得參考之處；而更重要的是，依日本宗教法人法第 18 條第 6 項規定，宗教法人法上之代表人或責任役員，雖有關於宗教法人事務的權限，但並沒有賦與其對於宗教上機能有任何支配權或其他權限。明文**強調政教分離及聖俗分離原則**。然而，從我國監督寺廟條例的規定來看，住持一職是兼有宗教性及世俗性職權；另外，黃慶生前揭著作所引執事會職權，亦包含世俗性與宗教性事務²⁹。如果從政教分離原則乃至憲法保障宗教自由中宗教結社自由、國家的宗教中立性原則與尊重宗教團體自主權及自律權的觀點，法院應僅能受理具有法律爭訟事件，若為宗教上爭訟，則非法院所得審理之對象。
7. 寺廟的成立要件，依監督寺廟條例第 1 條規定「凡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上建築物，不論用何名稱，均為寺廟。」是寺廟僅須有僧道住持及有宗教上建築物；另外同條例第 6 條規定寺廟財產為寺廟所有。換言之，就宗教上建築物而言，只要該建築物所有權歸屬於寺廟，即符合本條例所規定的要件。本條例並沒有規定寺廟必須同時所有其基地的所有權，始能成立募建寺廟。而且，依現行行政實務以觀，在申請建造寺廟時亦只規定應提出土地使用同意書即可³⁰，而司法實務亦承認之³¹。因此，本件第一審法院以妙法寺所坐落之基地均為釋如田所有，即認為妙法寺非募建，似嫌速斷。

才規定以管理人代為聲請登記。是依寺廟登記規則，管理人之權限亦僅限於登記而已，並未規定管理人尚有其他任何權限。

²⁸ 2018 年 8 月 1 日發布的財團法人法第 75 條規定：「宗教財團法人之許可設立、組織、運作及監督管理，另以法律定之。於完成立法前，適用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

²⁹ 黃慶生，寺廟經營與管理，頁 239-240。

³⁰ 黃慶生，寺廟經營與管理，頁 170。

³¹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第 361 號民事判決參照。

8. 又本件被告亦提及妙法寺為募建寺廟，是非法人團體。關於此點，因為非屬本件爭點所在，且妙法寺又非本件當事人，故法院均在就此一問題並未多加著墨。然而，學說本無定見，而歷來法院就此問題，亦尚乏一致見解。最高法院 43 年台上字第 143 號判例認寺廟不具法人資格，不具有權利能力，而係非法人團體，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判字第 648 號、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字第 929 號、台灣士林地方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1115 號亦同此見解；但亦有認為已向主管機關辦畢寺廟登記之寺廟為有權利能力，亦即具法人地位（最高法院 80 年度台上字第 437 號及 92 年度台上字第 427 號判決、台灣士林地方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710 號及 99 年度訴字第 47 號及 1012 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上字第 601 號判決等。另就刑事部分而言，亦有認為未成立財團法人但已為寺廟登記之寺廟，於權益受損時，屬非法人的寺廟，無所謂行為能力，不得為告訴人，縱該寺廟設有董事等代表或管理之人，亦不得由其以該團體之名義提起告（自）訴之事實³²。而令人不解的就是，主管機關曾鼓勵已辦登記的寺廟另行成立財團法人，似冀望解決寺廟法人格的問題，但也製造更多法律問題（信徒大會就是其中最惱人的問題），將兩種不同組織型態及管理、監督機制的制度設計，加諸寺廟身上，使寺廟受到更多的束縛與監督，但似乎也得不到大多數寺廟的支持，此從內政部民政司 2011 年統計資料所示已登記的寺廟有 13145 座，而成立財團法人的只有 395 個³³，即可知之。主管機關應思考的是建立一個尊重宗教團體自治且符合各種宗教團體的法人制度，而不是削足適履，僅牽就現行有關法人之法規及行政機關行政命令。
9. 依監督寺廟寺條例之立法意旨，其主要在於寺廟財產之監督及管理。依該條例第 1 條規定「凡有僧道住持之宗教上建築物，不論用何名稱均為寺廟」。而僧道依寺廟登記規則第 5 條第 2 項規定，係指僧尼道士女冠而言，換言之，即是指佛、道兩教的神職人員或宗教師。又同條例第 6 條規定「寺廟財產及法物為寺廟所有，由住持管理之。」足見住持乃寺廟之負責人及代表人，且依此規定而得認為其具有法人格。
10. 依最高法院 73 年度台上字第 3908 號民事判決要旨略以「主張以所有之意思為占有，惟有權利能力者，始得為之。依原判決記載：被上訴人於民國 62 年 5 月 30 日始完成財團法人之登記，自其登記取得法人資格，具有權利能力時起算。至於 70 年 11 月 30 日為所有人登記申請時，既僅 8 年有餘，當不能謂其占有訟爭土地依上開規定之取得時效已經完成。雖又云：被上訴人之城隍廟，於 44 年 2 月曾為寺廟登記，依監督寺廟條例第 6 條規定，係為寺廟之財產具有法人之實質要件，亦應認為有權利能

³² 陳樸生著，刑事訴訟法實務，頁 295，最高法院 83 年度台上字第 4778 號、88 年度台上第 4411 號判決及法務部 88 年 9 月 10 日法檢字第 331227 號函參照，轉引自同註 139，黃慶生，寺廟經營與管理，頁 446。

³³ 陳惠馨，宗教團體與法律——非營利組織觀點，巨流出版社，2013 年 2 月，初版，頁 34。

力。自為寺廟登記之時起算，其占有訟爭土地，業逾 26 年，不得謂取得時效尚未完成。惟監督寺廟條例所稱之寺廟，依第 1 條之規定，係指有僧道主持之建築物而言。被上訴人在財團法人登記前，其城隍廟是否有僧道主持？原審未加認定。苟非僧道主持，不得謂與該條例所稱之寺廟相當，即難謂其具有權利能力³⁴。」由此判決意旨可知，最高法院認為寺廟是否屬監督寺廟條例之寺廟而具有權利能力，應就該寺廟是否有僧道住持加以審查，惟此種審查究係形式審查或者是實質審查，最高法院並未進一步闡明。如僅就形式面而未就實質面加以審認，則應無干涉宗教自由或宗教自治事項可言。蓋神職人員的認定，係屬宗教核心領域，應屬宗教團體自治的範疇，基於宗教中立性的原則及宗教團體自主權，國家理應不得介入，僅應就世俗性事項加以規範，如由國家行政機關實質性去認定何人具有僧、道之身分或資格，恐有違憲之虞³⁵。

肆、結論

有關宗教團體內部紛爭的問題，涉及憲法宗教自由特別是宗教結社自由的保障與人民訴訟權的保障之基本權衝突的問題。從而，法院如何處理，就值得探討。此類訴訟在日本也有很多。因為宗教團體有自己制定其內部規範，作為其成員活動的規律，而法院對於有關此部分的紛爭，究竟應該採取何種態度？在早期的昭和35年（1960年）的大津地方法院有關於天台宗的教區宗務所長及宗議會議員的選舉是否按程序舉行的事件中，法院明提出依據所謂的「部分社會」論，即部分社會如不違背法律、以不違反公序良俗、公共福祉為限，自己得依自治的法而規律、行動，此並非指自治性的法規範的實現與所有的紛爭，必須經由法院的公權力解決，而是必須考量以國家的法律特別是法院沒有權限為限，應任憑由其社會內部的自治性處理。該判決認為應委由該當宗教法人本身的認定，其效力如何「與市民的權益無關，而是天台宗內部組織、構關的問題。」故將原告之該訴駁回。其後也有幾件有關確認ほのみち（本道）教負責人地位的事件及臨濟宗的一間寺院法人住持地位等單獨確認宗教上地位的訴訟，均被大阪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以並非法律上的權利關係而予以駁回³⁶。另外學者新堂幸司則提出兩段審理模式，即在第一階段首先針對訴訟標的本身是否可謂法律上之爭訟及是否涉及市民法秩序的角度思考。其次在第二階段，應判斷自律性決定是否存在及其決定是否適當，從程序、處分內容及事由上加以認定³⁷。

日本學者阿部照哉等人認為：所謂受裁判的權利，由於係請求法院就當事人間有關權利義務的具體法律上爭執（事件性）做成法的判斷（作為司法作用的裁判）。從而，須是有必要請求做成此種法判斷的人（當事人適格），就適於請求法判斷的事件（權利保護資格），實際上有請求判決的必要（權

³⁴ 民事裁判發回更審選輯（四），司法院編印，1987/07/01，司法週刊社，頁 589。

³⁵ 本判決的相關介紹及評析，筆者於前述司法院帶職帶薪自行進修報告已有提及（99-107 頁），惟當時尚未判決確定，嗣已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而確定，本文再稍加補充。

³⁶ 佐藤幸治，現代國家と司法權，有斐閣，平成 2 年 2 月初版，頁 184。

³⁷ 詳細分析，請參考新堂幸司，審判權の限界—團體の自治の尊重とのから—講座民事訴訟②，弘文堂，1984，轉引自劉玉中，民事審判權之界限，頁 164-165。

利保護必要)時,始得被認為有向法院起訴的利益(訴之利益)。從而,當欠缺此要件,法院不須判斷事件的實體時,縱使以訴不合法為由予以駁回,亦非侵害裁判請求權。因為司法作用的特質,在於透過法的適用,裁判當事人間有關具體權利、義務的爭訟;法院的任務不在於裁定社會生活中一切種種的紛爭,而是依法判斷有關權利、義務之具體法的爭訟。所以,各人相互間單純的感情對立、學術上的爭論、宗教信仰與教義的爭議,以及政治上的政策選擇適當與否的爭議等,皆非構成裁判對象的事項。從而,縱使以此等問題作為作為訴的內容起訴於法院,將為法院所駁回,此不構成對各人裁判請求權的拒絕³⁸。

我國學者就司法權行使的界限,與宗教團體相關者,有許育典與李惠宗,其均認為:宗教團體內部的爭議,如宗教教義的解釋、教團領袖身分的確認(例如住持身分)、聖物的象徵意義、僧尼是否還俗等等,不屬於司法權的範圍,司法權原則上不應介入;惟涉及非宗教性事務,與一般人民的生活事務無異時,如販售靈骨塔引發的買賣糾紛等等,司法權仍應作成裁判³⁹。又學者劉玉中於前揭文章中提到「能夠藉由訴訟加以解決的紛爭,限於法院得依三段論法,亦即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最後以判決解決者。而事實認定,並非僅為對於客觀事實的認知,亦包括法院運用經驗法則對於事實所為之評價在內。然而,對於宗教上紛爭的事項,法院無從為事實上之評價。…就某宗教團體所崇拜之本尊之真正與否發生爭執之事案,普通法院民事庭無法為事實上之評價,從而,亦無法針對是否有錯誤為判斷。⁴⁰」而適用法律,更遑論下判決。是故就此類事件,法院應當自我謙抑、節制,不為審理⁴¹。

就本文關注的主題即住持地位而言,住持依其本義應為宗教師或神職人

員,而非世俗之人;其本係傳佈教義、舉行禮拜儀式及教化信徒等宗教活動的主持人。惟在傳統上,住持亦多兼任世俗事務之執行者,且依司法院釋字第200號解釋及監督寺廟條例第6條的規定,賦與住持有管理寺廟財產地位,亦即處理世俗性事務之寺廟負責人。此外,在目前宗教行政及寺廟實際經營

³⁸ 阿部照哉、池由政章、初宿正典、戶松秀典編著,憲法(下)基本人權篇,許志雄審訂、周宗憲譯,元照,2001年3月,初版,頁297。

³⁹ 許育典,憲法,元照,2020年修訂10版,頁435;李惠宗,憲法要義,元照,2018年10月7版,頁634-634。另許志雄、蔡茂寅、蔡宗珍、陳銘祥、周志宏合著的現代憲法論乙書中,雖提及司法權的行使存有一定的界限,通常指除治外法權及其他國際法規定者外,主要有國會的自律權、立法裁量、行政裁量及統治行為或政治問題。並未提到宗教團體的內部爭議。參閱許志雄等,現代憲法論,元照,1999年1月,初版,頁319。

⁴⁰ 伊藤真,民事審判權の限界,これからの民事訴訟法,日本評論社,1985,24頁,轉引自劉玉中,民事審判權之界限,頁153。

⁴¹ 劉玉中,民事審判權之界限,頁154。

管理上，住持也往往擁有上述雙重身分。就如同上述所舉確認信徒地位訴訟的案例中，圓覺寺的住持也兼管理人。不過，依據憲法保障宗教結社自由之精神及釋字第573號解釋所揭示的國家宗教中立性原則，或者是政教分離原則，住持之地位本來主要就是涉及宗教性事務，國家本不應介入認定；縱使是從事世俗性事務或業務，基於保障宗教團體自治及自律的精神，有關宗教團體內部組織、人事及財務，國家應給予最大的尊重，在不違反比例原則下不得介入。國家縱使得制定法律撤換寺廟等宗教團體的世俗性負責人（一般社團或財團，稱為理事長或董事長，在訴訟上則稱之為法定代理人或代表人），但應不得撤換其具有宗教上地位的住持。參諸日本的宗教法人法已不採取其戰前宗教團體法的立法方式，而則僅針對世俗性事項予以規範，故其稱呼宗教法人之負責人為代表役員之世俗性稱呼，而未使用神職諸如住職、宮司、神父或牧師等等的稱呼。因此，我國司法院釋字第200號的解釋，恐也有過度介入宗教團體內部宗教性事務之虞，是在重新制定有關宗教基本法的立法時，就宗教團體自主權與自律權的保障，日本的宗教法人法及相關法院判例，可以說是實質性地確保信仰自由，而值得借鏡參考。

題目四

宗教對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貢獻法律如何加以保障

王派滄總會長

（社團法人宇宙大愛行願聯盟中華總會總會長）

宗教對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貢獻法律如何加以保障

王派滄¹

壹、前言

宗教目前在全球文明的發展上，站舉足輕重之地位，不論在地球的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宗教信仰的影子。從人類有史以來，在不同的文明有其特殊或屬代表性的存在，小從一個部落大到一個社群，都有其宗教文明的根源可考。因此宗教人類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發展的根源來自該族群原始生活習慣與安頓心靈之鎖鑰，在文化的起源往往從這軸線發起，慢慢的形成此群族或此部落共同的心靈寄託與歸向。

故宗教所涉及之宗旨與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貢獻，係心靈與物質並重的。如今全世界都以宗教自由為其社會進步的表徵，想盡辦法來保護，但也有些國家社會想辦法要利用宗教作為政治或控制人民的工具，此乃愚蠢之行徑。因此，吾人以法律如何來保障宗教的發展，堪稱非常之重要。

貳、宗教的社會功能

法國「現代社會學之父」愛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他在1887年出版了一篇探討有關德國的道德科學論文，在探討的文章中指出在原始宗教裡，包含著兩種交互相關的現象，其一是對自然與事物則是形上思維；另一種是行為的準則與道德紀律，同時宗教提供了人們為之奮鬥的理想，而且成為使社會凝聚的一股力量。其論述真正價值在於他認識到宗教在社會上極為重要的社會功能，並從社會或互動層面探討宗教所具有之社會功能包括如次：

- 一、宗教是一個社會化的力量，一個社會控制的工具。
- 二、宗教系統藉著提供和指導正確行為的便利，而支持社會中其他制度的運作。
- 三、許多宗教組織，愈來愈牽涉到改善人類生活條件的活動。
- 四、宗教系統擔任著延緩激烈社會變遷的功能。
- 五、宗教系統同時扮演著增高和減輕衝突兩功能，也同時具有整合和分隔兩種力量。²

就社會學家涂爾幹的觀察研究，宗教係扮演著多樣性社會功能，時至今日，雖然在某些原理原則仍可適用，但是時空背景不同的社會環境下，則應以更開放的層面上，讓宗教作為一種可以在現行的制度與狀況下，對人們賦予新的、積極的意義，使社會導向更積極、正面的方向自由發展而

¹ 王派滄，現任「社團法人宇宙大愛行願聯盟中華總會」創會總會長。

² 施義聰，《涂爾幹「宗教凝聚-社會擴散論」思想之教育意義》，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2001.07.01，頁99。

不受約束，以符宗教在宇宙之原始意涵。

參、當前台灣的宗教現象

一、台灣宗教的傳承與來源

台灣的宗教發展非常蓬勃，尤其在民間信仰方面，筆者曾擔任「宗教聯盟」秘書長之職，當時就有十三個不同宗教參與其組織，尤其亦有類似宗教之團體亦非常的活躍，至今仍是，這是全世界很奇特的現象，尤其在同一個家庭成員中，容許多種宗教信仰存在，這是全世界的奇蹟。

二、台灣宗教發展過程

在台灣地區並無如同西洋歷史中的宗教戰爭，宗教問題也不如西洋歷史中曾經出現的那樣強烈，亦少見引起眾人高度恐慌的宗教激進事件，也未曾發生過以宗教為名的戰爭。但是早期官方對於宗教信仰的控制，例如對一貫道的查禁與解禁、為管制新約教徒所引發的錫安山事件，對長老教會教務的介入等，其管制的規模與過程，顯示出早期官方的為統治而控制的立場。

相對於此，未曾被嚴禁的民間信仰或其他信仰，就處於較放任的狀態。也就是說，雖然這些信仰有蓬勃發展的空間，但是因為政府的容忍，而不是基於人民的權利，政府還是在它想控制的地方做了控制，只是習以為常的人民覺得自己是自由的。

另一直以來台灣宗教信徒所發生之事件亦層出不窮，例如寺廟內部的廟產糾紛，個人涉及詐財、性侵害犯罪，特定信仰的教徒對於國家兵役制度的反抗，年輕男女集體剃度出家等，對於這些不同的問題，由於視規模主題可看性各有不同，所產生並不一致的社會關注與反應。

此外，盛大而正面的宗教活動如：媽祖文化季則是帶著地方政府力量的參與被報導，而特定宗教團體的社會價值、公益性格也持續被社會肯定與讚揚。³

三、台灣宗教發展的原因

(一)台灣的文化來自大陸，中華文化五千年之文化中，孕育了目前台灣宗教的發展，雖然在很多活動的場合中有其宗教的特殊性，但大部分可說是從來都是和諧相處，尤其是學術論壇或舉辦共同性的公益議題時，亦是爭先恐後，如此仁愛、良善之心正符合了上帝諸維度主宰之心，亦就是良心。

³ 周敬凡，《宗教自由的法建構-兼論「宗教團體法草案」》，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研究所，台南，2002.07.01，頁 13。

(二)台灣的宗教很多元，舉凡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新興宗教，其教脈、宗旨、都其來有自，各有其傳承。

(三)台灣為何能發展如此多的宗教和教派呢？

這是很有意思的議題，筆者觀察如下：

1. 台灣有傳承五千年文化之根基，台灣的宗教不論是道教、佛教、新興宗教都有因果觀，輪迴觀，這是在台灣社會中普遍的現象。故在成長的文化背景、生活環境及爾後所遇到的各種宗教人士都非常的友善。

由於是多神的社會，自然可容納不同的宗教人士，尤其當天災人禍發生時，所有的人不分宗教派別均受災殃。故此種五千年來的文化思想，要以一種宗教來涵蓋，或以某種不當的法律來限制，或操控乃是不智之舉。

2. 台灣社會長久以來受中華文化多元之學說影響很深，尤其在佛教、道教方面，他們的修煉方式，非一般宗教可以理解的，更何況目前的宗教、人文、科學、醫學等，多以西方的文明觀點去思考，他們很難去理解東方宗教，尤其是中華文化之下的宗教底氣是什麼？為何有天人合一、⁴扶鸞、觀落陰、祭改等民俗文化存在。他們也很難想像媽祖繞境，竟然有三十萬人在多天的活動中不分晝夜的跟隨；也很難想像在花蓮光復的災難，有如此多的「鑊子超人」出現，這不敢說這是宗教的力量，但卻是宗教要倡導的愛、慈悲、和諧的大愛。
3. 台灣社會容許不同的宗教、教團和民間信仰的存在，台灣人的善良亦是聞名全球，但是也有不少的有心人，利用宗教之名，騙財、騙色、牟取不當之利益；也有少數不屑的政客利用宗教來謀取不當之取得，因而可能抑制了良善的宗教發展，這是我們要注意與重視的。

參、台灣各宗教對社會文明的貢獻

一、台灣各宗教在近七十餘年來對社會發展之貢獻

(一)宗教係社會安定的基石

就全面觀察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到了台灣之後，都被一視同仁的看待。在台灣儒釋道思想、因果輪迴、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觀念深植人

⁴ 陳清秀，《天人合一之王道法律思想》，五南出版社，台北市，2024.07.01.頁2。作者指出：天人和一是指天與人，天道與人道，信狀與價值上團構互通與同一，不同學派對於「天、天道」與「人、人道」及其關係的不同主張，形成關於天人合一的不同學說，「天人合一」思想在探討「天、天道」與「人、人道」的關係，期能建立天地萬物與人類之間友善和諧共存關係，打破彼此對立而趨向統一融合為一體的思想體系理論。

心，並落實在民間的底層社會中。故台灣民間的百姓當時有些沒念什麼書，知識也不高，但是他們相信有神明、有祖先、有前世、有來世，因此台灣這七十餘年來，有如此的安定，在基督教、天主教的奶油、麵粉的協助下，幫助了台灣。這些所謂大道修行者或是宮廟的信徒在此種條件下，奠定了台灣社會安定的基礎，這些安貧樂道的前輩，所帶給台灣社會的安定、身心的安頓，讓台灣在二次大戰後之發展到現在令世人刮目相看，這些前輩們可說是居功厥偉。

(二)宗教在人倫、文化、心靈之貢獻

1. 台灣在人倫心靈上的發展，在宗教的貢獻上、在宇宙觀、靈學、神學的角度，均有其脈絡可循。
2. 在基督教方面有很多的支脈發展出來，例如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⁵、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⁶靈糧堂⁷等新興宗教被發展出來，雖然一開始被稱之為異端、異教，這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場來看，但是若站在宇宙的高度看，這何嘗不是上帝的旨意？何嘗不是宇宙因果律法則的演化？就目前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在全世界 170 幾個國家都有教會，其信徒在國際的舞台上表現優異。故宗教所帶來的社會、國家安定的力量才是真正的進步。
3. 在回教方面，對台灣的貢獻更是不容小覷，目前台灣的老人很多，都受到外勞的照顧，這些遠從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來的人士，幾乎都是穆斯林，他們奉行可蘭經的教義，到台灣當勞工賺錢回去養家，這些年輕人愛家、孝順父母的情操，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三)宗教在政治上的貢獻

1. 安定民心士氣，各宗教以教義教化信徒，讓信徒能夠信仰先聖先賢的教導，使社會更加的和諧與良善，這點台灣做的很好。
2. 台灣宗教信仰在政治上的影響
台灣宗教團體所帶給政治的作用是一股良善的社會風氣與穩定的力量，這是在其他國家地區少有的社會現象。因此宗教對台灣政治的穩定

⁵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一般稱「摩門教」，屬基督教之另一支脈，於 1830 年由先知約瑟夫·史密斯所創立。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是後期聖徒運動的主流派別，教會總部位於美國猶他州鹽湖城，分支遍及世界。據該教會統計，該教會擁有 31,000 所教堂、信徒超過 1,750 萬人。該教會成員稱為「後期聖徒」或「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信徒」。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瀏覽日期：2025.11.20。

⁶ 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一般稱統一教，由文鮮明牧師於 1954 年在韓國成立。

⁷ 一般認為屬基督新教福音派與靈恩派背景。1954 年由原上海靈糧堂在台會友於發起成立，並曾邀請上海靈糧堂創辦人趙世光牧師來台舉行多場佈道會，至今於全球設立分堂與福音中心共計 706 座。
[https://zh.wikipedia.org/zh-tw/%](https://zh.wikipedia.org/zh-tw/) 瀏覽日期：2025.11.20。

，是有非常大的貢獻，我們可從社會風氣、家庭倫理、科技發展、社會救濟等各方面的觀察，其正面的效應可說是宗教的影子隨處可見。

肆、法律如何保障台灣宗教的發展

就前項所論，宗教對台灣社會精神文明之進步有如此多的貢獻，在法律上應如何立法來保障呢？此乃本報告之重點，茲分述如次：

一、宗教之任務：

宗教的定義是宇宙至高無上的真理，透過教育教導黎民百姓，安頓身心安身立命的一個團體組織。因此在地球上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區之風土民情生活習慣均不同，故發展出不同的方法與教派出來。在目前所重視的多維、多元空間因素下，宗教係多維空間之運作的一種教化方式，它是「天人合一」的，故要人間界法律的保障是應該的。

二、國家制度上的保障就是「保障與鼓勵」

這裡所指的保障就是「保障與鼓勵」，而非限制、管理或管制。既然宗教是宇宙真理的教育，若有信徒以私心、利己之心，其作為不如理、不如法，自然會受天、人之自然處置或淘汰，只是時空的問題而已。姑且不論宗教人士在教義、管理、制度、財務上的表現，都在物理世界做演化，而演化出來的表象，隨著修為、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觀之立場角度不同，各有各的解讀與詮釋外，而所表現出來的態度亦不同，故就宇宙觀言，宗教根本就不必管制或管理，自然有天律、因果律在運行。

宗教在國家的制度上是要鼓勵與保護的，這樣才能符合天道，如果過於管理或限制，對社會的影響將有負面的結果出來，宗教越是貼近社會基層的生活，越能安頓身心。若有不良的結果出來，宗教本身要負責，故宜由宗教自己管理自己的體系。

三、立法之根源要有眾生平等的觀念

既然有野生動物保護法、⁸海洋保育法⁹等等，在宗教上更要以其對國家、社會、文明進步之貢獻與影響看待，給予充分的自由，若有違反，則以世間法之民法、刑法論之。

理由：

- (一)宗教本身教人為善，它是一個公益、教育機構或單位，要以比一般更自由與寬廣的立法才能保障其正能量的發展與推動。
- (二)在立法上雖可考量其將來可能犯錯的動機與結果，但也危害或扼殺了潛能力量，

四、台灣宗教目前所面臨之困境

台灣目前在宗教的掌握方面，雖然一直都想立法為之，但始終難以

⁸ 《野生動物保育法》，是中華民國為保育台灣野生動物資源於 1989 年 6 月 23 日訂定的法規。民國 113 年 07 月 31 日成立，摘自《全國法規資料庫》。

⁹ 《海洋保育法》是台灣在 2024 年 7 月三讀通過的一項重要法律，旨在保護海洋生態環境、保育生物多樣性，並合理利用海洋資源。該法授權主管機關劃設和管理海洋保護區，實施分區管理（核心區、緩衝區、永續利用區），並推動生態調查、保育復育措施和建立海洋保育觀察員制度。此法旨在解決台灣海洋資源枯竭、生物多樣性喪失等問題，並與《海洋基本法》相呼應。

達成。在宗教人士的努力下，欲將目前為宗教爭取權益之立法，以利爾後發展亦不乏其人，故兩者之間，公心與私心、正能量與負能量之間很難取得平衡，惟如何才能取得平衡達成朝野之共識，這是雙方角力之處，也就是正能量與負能量角力之處，絲毫不能勉強，屆時自然能水到渠成。

五、保障之原則

(一)集會之自由、論述之自由。

(二)宗教歸宗教、司法歸司法。

(三)具體作法：

1. 在人民結社方面與充分保障。
2. 財產之制度上以公私分明之觀點立法。
3. 政府不得將宗教信徒所來之良善捐款收為國有(在某種條件下列為國有)。
4. 宗教人士在某種階層上要有司法免責權，此乃要審慎為之。
5. 對宗教人士之鼓勵與獎勵勿淪為政治之工具。

六、建議事項

(一)在政府方面：

希望政府的業管部門，能體認台灣宗教的發展是爾後世界和平、人類升維的重要門階，如台灣的宗教無此高度，地球就沒有希望。說的嚴重一點，台灣目前宗教融合的現況，若不受重視不但台灣沒救，整個地球即受負能量的控制。

故政府部門的業管單位，如何讓台灣發光發熱，除了晶片 AI 之外，在靈性、心性方面的領先亦是不可忽視。因此政府部門如何輔導與協助，則是很重要的關鍵。

(二)要有世界觀及宇宙觀

人類的文明發展與宗教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不論科技發展如何，身心無法安頓則災禍不斷，越是高位者越是需要安頓身心，越是需要心靈上的慰藉，但可要知道這是宇宙因果律的演化所呈現的現象。故如何在各方面執行良善的政策這是很重要的關鍵。而在國際上，各國對宗教的管理與決策，幾乎都考量利益團體本身之利益做前置的考量。故法律所公佈的法規，不見得適合宗教團體之發展，可能會對國家財政不利，或對行政管理的不利等，可說各有各的考量與立場，所以在這三維空間的法律要來保障和規範是很難去制定的，只有在原則可以列舉，但不必太多，做太多的保障，反而會有很多的遺漏或被誤用。故對宗教的保障宜以宇宙觀、世界觀的角度來論述。

1. 就世界觀言：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世界矚目的地區，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於文化素養，人民百姓對宗教的認知非常的開放，故如何保障宗教，就其法律層面言：

(1) 台灣宗教法屬基本法，¹⁰就目前所訂的筆者看法如次：

就目前台灣社會對宗教而言是相對自由，故人民要立法保障，擬定目前的「宗教基本法草案」之內容，為何遲遲不立法之因，則涉及政府指導部門之權限。

(2) 部分立法人員根本不關心，或涉及其他政治因素，故在無法順利通過。

(3) 目前的草案雖已參考世界各國擬定，如：美國、日本、德國等，但主要是立法部門有其它相關考量因素。

(4) 立法與否，對目前廣大的民眾毫無影響，但對少數宗教人士是有利的，故不願意通過其草案。

以上為目前未能通過的背後原因之列舉，為要宗教團體，尤其是民間信仰、道教方面更應受到重視。以上筆者提供之淺見，故與其要目前的政府保障不如先自立自強。

2. 就宇宙觀言：

在宇宙因果法則之前提下，先提升自我單位教化的功能與管理人才的培訓。就宇宙觀之立足點觀之，則視其適當之機緣，再予檢討現有之草案與爾後發展之需要，故如何的作為與不作為，均看當時的政治氛圍。

伍、結 論

本主題「宗教對人類社會文明的貢獻法律如何加以保障」，就以主、客觀條件，及對社會影響的程度甚微，似暫無立即之迫切性。且對某些政治既得利益者，亦不輕言棄守。故只能以現有之默契、共識與態勢繼續堅守其本位主義。其餘我們宗教界就先培養人才，以使台灣之宗教人才能真正的在「天仁合一」的共識與成就下，共同為我們後代子孫在台灣建立美好的良善生存空間而努力，以符台灣稱之所謂「蓬萊仙島」之美譽。

¹⁰ 台灣目前並沒有所謂的「宗教基本法」單獨立法，但《中華民國憲法》第 13 條保障了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並規定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雖然憲法有此規定，但台灣現行關於宗教團體的法規過於陳舊，僅有針對傳統佛、道教的《監督寺廟條例》，已無法因應社會發展需求，因此各界曾多次推動希望能立法保障宗教團體權益的《宗教團體法》或《宗教基本法》草案，但因各方意見分歧而尚未通過。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瀏覽日期：2025.11.22

題目五

宗教基本法草案相關爭議之評析

林清汶教授

（世新大學法律系兼任教授）

宗教基本法草案相關爭議之評析

林清汶 灣警察專科學校 兼任 教授

壹、前言

我國目前惟一的宗教法規，係於國民政府於民國 18 年制定的《監督寺廟條例》，但僅限於規範佛、道寺廟。93 年 2 月司法院釋字第 573 號解釋卻曾宣告頒布該《監督寺廟條例》違憲；然而，迄今仍無其他相關宗教法制訂定。且民法對於財團及社團公益法人諸多高密度管理之規定，亦不全然適用於宗教團體，因此讓諸多宗教團體心存芥蒂，憂心政府對宗教問題不夠重視，引發國際不良觀感，在法制上欠缺全盤之規劃設計；至於《宗教基本法》草案等相關法制迄今仍尚未完成立法程序，至有缺憾。為此，本文特列舉宗教法制相關爭議，不揣淺陋提出評析，並列舉以土地使用、財務收入申報、校園弘法等作為題材，並對宗教未來展望提出建議。

我國憲法第 7 條及第 13 條明文揭示宗教國內法之效力，再者《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亦明文規範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促使宗教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尤其，前揭兩人權公約關於宗教權利之保障及宗教生活之增進等相關規範，明定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宗教與信仰自由以及行使前項自由所需保障之相關權利；以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之文化權利之一，即人人享有文化生活之權利¹。宗教自由與保障乃全世界國家，對宗教信仰不分性別、種族、貧富、貴賤、地域、老少，時空背景、文化等之共同理念，特別在生命垂危親人生離死別之際，宗教更是扮演著重要穩定元素，宗教讓在世者得與往生者保持心靈相繫，再盼來生結緣；也讓更多物質生活無虞者，懂得感恩與回饋。臺灣近來在經濟與文化的成長令人傲視成為先進國家，因此宗教基本法相關制度的頒定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讓宗教法制定的保障與落實，未來迎向康莊大道。

貳、宗教基本法草案的立法過程

當法制領域遭遇困難無法克服時，常在宗教經典及其相關規範中出現，或作不同剖析、論述²，鑑使宗教立法有其必要性與密切性。《宗教團體法》草案民國 82 年提出、84-85 年宗教社會爭議事件(新興宗教的興起)，促使政府部門研議宗教立法。民國 90-105 年宗教團體法草案即曾多次進出立法院，之後基本法草案的立法過程如下：

一、105 年行政院版本草案

行政院版宗教團體法草案(98 條)，被認為以管制、防弊為目的；其擬定程序則相對不周延；違背「尊重宗教組織自主、自律原則」的精神；對宗教組織

¹ 周志杰，宗教基本法草案——民國 110 年 4 月版本，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第 38 期，2021 年 8 月，頁 31。

² 陳清秀，天人合一之王道法律思想，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 7 月，頁 304。

自主權及財產處分權加以限制，妨礙宗教活動自由已逾越必要之程度」之明顯違憲疑慮，勢將阻礙我國人權與宗教自由的發展，進而造成我國民主與人文的衰退。106 年眾神上凱道捍衛信仰大遊行，暫緩推動宗教團體法草案之立法，俟取得各界共識後再行推動。

二、106 年立法院版本草案

106 年宗教保障基本法草案 28 條。107 年少數宗教團體透過立委提出宗教基本法 31 條版本草案，立法背景政府處理宗教事務無法可用，但行政命令多如牛毛，不統一且違憲。政府立法單位缺乏憲法、兩公約等保障宗教人權的具體意識。行政部門對宗教團體的特殊性、多元性缺乏了解，各級行政官員侵害宗教權益之事實迭有所聞。認為宗教是國家的最重要的文化心靈資產，宗教的人權位階高於憲法。基於宗教及宗教團體之自主性與特殊性，限縮國家管制宗教權限或擴大宗教團體之權限，如「第 10 條法院不得干涉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之組織及人事任免、第 16 條宗教信仰知識應納入國民義務教育課程、第 17 條公共節目播放時段應包括社會宗教教育等規定。以宗教及宗教團體之自主性與特殊性，排除現行法律之適用，如第 14 條宗教法人或宗教團體聘僱人員不受就業服務法之規範、第 22 條宗教固有不動產不受殯葬管理條例之限制、第 27 條宗教用地取得不受農業發展條例之限制等規定，等規定受到質疑。」

惟前揭規定倘因宗教團體之身分即享有特殊待遇，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合理原則，尚有爭議遭強烈反對。

三、110 年中華人權協會版本草案

110 年中華人權協會提出(20 條)認為目前寺廟或宗教性法人雖屬廣義之公益法人，享有與其他公益法人相同之免稅 待遇，但因其具有別於其他公益法人之固有性、特殊性及自主性。而且我國民法對於財團及社團公益法人諸多高密度管理之規定，亦不全然適用於宗教團體。前揭解釋更宣示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除內心信仰自由與宗教行為自由之外，亦包括具有組織結構、人事及財政管理等自主權之宗教結社自由。該解釋同時揭示國家負有保持宗教中立之義務，以確立國家不介入宗教事務之聖俗分離原則。第 14 條:「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各級政府及主管機關應考量各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之合理需求，協助其取得宗教用地，並簡化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及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申請；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四、114 年立法院版本草案

113 年、114 年少數宗教團體再度透過立委提出宗教基本法(6 條)草案，交付審查。我國宗教界、法學界、各級政府及社會大眾，都甚少對保障宗教人權之深義，進行深入的研究與對話，多淪為空洞的「尊重宗教自由」之口號，難以內化成我國文化的內涵。再者，又常因少數團體或個人假借宗教名義所發生之不法行為，使政府在制定宗教相關法規或實務作為時，模糊了必要的宗教人權保障分際。廣泛參考世界各民主先進國家宗教相關法例制定本法，作為上位法源，使日後政府宗教相關法規之制（訂）定及行政措施之執行有所準據。

叁、宗教基本法部分草案面臨的困境與認同

一、宗教基本法部分草案推動受到的爭議

《宗教團體法》草案從民國 82 年提出至今，歷經多次立委及政府提案，但因部分條文涉及宗教團體的捐款及財務報告仍有爭議，內政部於今年初暫緩推動《宗教團體法》，又《財團法人法》亦將宗教財團法人排除在外，規範宗教團體的相關法令《宗教基本法》至今難產，面臨同樣困境。

(一)基本權利的爭議³

107 年立委提出的《宗教基本法》草案卻強調「聖俗分離原則」，提供宗教團體各項保障，除了宗教團體不須揭露財務狀況、非法占有公有地得以合法化、法院不得干涉教務事項及組織人事任免，第 13 條更強調「民法及其他法律有關公益社團及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監督、管理規定，不適用於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顯然，《宗教基本法》若通過，政府對宗教團體將陷入「無法可管」的困境，更會傷害禁止就業歧視與教育中立等原則，對社會公益與社會正義的傷害甚大。草案存在諸多爭議，民間團體質疑該草案若通過，將凌駕許多基本人權之上，有破壞民主法治之疑慮。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翁國彥表示，依據大法官釋字 490 號釋憲，憲法對於宗教自由的保障係指「信仰自由」，但信仰自由並未高於其他基本人權保障。而從草案觀之「該法強調宗教自由要獲得百分百的保障，直接將宗教自由凌駕於其他權利之上，是對憲法的嚴重誤解。

西方的「聖俗分離原則」旨在明確宗教與國家間的界線，「保障宗教自由的同時，不代表世俗的法規應該要退後」。法律應該要保障一個人落實自身宗教信仰的權利，但關於土地取得、財務透明與勞資聘用關係，已經有其他法律明確規範，毋須在「宗教自由」前退縮、讓步。西方的「聖俗分離原則」旨在明確宗教與國家間的界線，「保障宗教自由的同時，不代表世俗的法規應該要退後」。有其他法律明確規範，毋須在「宗教自由」前退縮、調整。

(二)學校傳教爭議

性別平等教育大平台專案經理張明旭質疑，草案條文第 7、9、13、15、16、19 條規定，學校可以合法傳教，恐讓校園陷入宗教爭奪的混亂中，傷害學生受教權與教師專業自主權，亦讓《教育基本法》第 6 條規定之教育中立原則遭受挑戰。草案一旦通過不同宗教皆能合法進入校園，而學生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接受「宗教情操」的宣揚。現代教育在鼓勵學生獨立思辨之際，此草案卻讓家長、教師與宗教團體得以決定學生之宗教信仰，更已牴觸《憲法》第 21 條「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第 19 條「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得設立宗教人才培育機構，其師資、修業內容及證書之核發，為宗教自主事項」，張明旭強調，草案通過，學校便可合法要求教職員與其信仰相同，「若是信仰不

³ <https://npost.tw/archives/47806>

《宗教基本法》草案凌駕憲法與人權，民團怒批只保障宗教「團體」未保障「人」
BY 游家榕，2018 年 10 月 25 日。

同，或是教義不符合，如身為同志、曾經中止懷孕，或非主流性別樣貌等，皆可能面臨被解聘、解雇的問題」，恐傷害工作權益。

(三)就業勞資的爭議

長期關心勞動權益者認為，草案已經違反就業服務法第五條第一項，不可以因為性別或宗教傾向、思想等為由，作為僱用或不僱用的考量。而目前有許多宗教團體組織龐大，旗下如醫院、學校等雖非屬公益性質，卻仍屬《宗教基本法》範疇，通過後將對就業環境影響甚鉅。

(四)土地環境的爭議

環境法律人協會祕書長指出，《宗教基本法》對於環境的影響在於未來宗教團體在取得土地使用、蓋宗教建築時，不再受上述相關法規影響，除了環境敏感地區的破壞，亦可能造成人民安全上的威脅。草案規範凡宗教建築物在該法實施以前便已占用公有地，且從事宗教活動超過5年者，就可以申請借用、租用，甚至讓售，以宗教之名合法侵占公有土地。據財政部國產署清查，非法占用公有地的宗教建築，從2009年的2,189筆暴增至3,220筆，面積已經達到116公頃，危害社會公平正義，更是對環境的開腸剖肚。對於公有地占用可就地合法，環境影響難評估引起民間團體擔憂的是草案第22條與27條中，排除了殯葬管理條例、農業發展條例、建築管理法規、消防法規、國土計畫與都市計畫等相關法令。

宗教豁免乃限於宗教團體自律事項。而國家權限不可及者，係指宗教信仰當中，涉及人們內心最深層之思想，而屬於對上帝、神明、佛、菩薩以及天堂、地獄等概念，非現代科學所能掌握及驗證之對象之部分。至於基於宗教信仰而顯現於外之行為，倘若有限制他人權利或危害公共利益之虞時，基於國家對於人民權利之保護義務，國家應積極介入。是以，宗教豁免事項應侷限於內心信仰深處衍生屬國家權限不可及，足以被認定為宗教團體之自律事項者為宜。

(五)捐款免申報爭議

宗教團體的捐款及財務報告向有爭議，即是，依法「寺廟及宗教財團法人『有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或有附屬作業組織者及宗教團體捐助成立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應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但對於宗教部分事項不屬於銷售貨物或勞務行為，被認為是宗廟重要財源，卻仍可不必申報引發爭議。

二、宗教基本法部分草案推動受到的肯定

宗教人權既為人類心靈自由之基本權，故其位階高於國家，更非由國家所賦予。今為落實憲法及兩公約施行法保障宗教自由之精神，體現國家對宗教之中立及寬容原則，尊重宗教（團體）之特殊性與自主性，維護宗教團體應有權益，加強國民宗教常識修養與國際文化視野，翻轉宗教價值認識失衡現象，充實多元文化，以厚植國家之精神文明。乃廣泛參考世界各民主先

(一)大法官會議的認同

司法院釋字第 573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保障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係為維護人民精神領域之自我發展與自我實踐，及社會多元文化之充實，故國家對宗教應謹守中立及寬容原則，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畀予優待或不利益，前已述及；且憲法第七條明文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國家如僅針對特定宗教而為禁制或畀予不利益，即有悖於宗教中立原則及宗教平等原則。」司法院釋字第 490 號解釋理由書：「所謂宗教信仰之自由，係指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以及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畀予優待或不利益，其保障範圍包含內在信仰之自由、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司法院釋字第 460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第十三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係指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以及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國家亦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助或禁止，或基於人民之特定信仰為理由予以優待或不利益。」

「是以政教分離之根本意義，乃政治與宗教兩不互相隸屬，不惟政治不得干預宗教，宗教亦不得主宰政治，而依國家之宗教中立原則，於宗教組織本身之事務，國家尚無與聞之權利，遑論有監督之權限？現代自由多元之民主國家，本於寬容之原則，率皆以憲法保障宗教之信仰自由，無非以宗教既為國民之共同生活形態，乃一基本且應予保護之法益，從而憲法亦保障宗教團體於公領域完全獨立於國家之外，有不受任何妨礙而運作之權利。至於何謂宗教自主權所及之本身事務，則應以是否為實現宗教目的所必要為斷，除信眾與善款之募集、宗教儀式之進行、宗教教義之研習與傳佈、宗教慈善活動之籌辦及生老病死之照料等組織內部之事項外，尚有何等事項屬於組織本身之事務，而得享宗教自主權限，於目的原則之下，僅得逐案論斷⁴。」「回顧人類之歷史，宗教與國家，為彼此之定位而爭鬥、糾葛，歷一千多年之歲月，始由政教合一而走向政教分離，並在國家最高之法律規範—憲法中明定宗教信仰之自由乃是人民之基本權利，應受憲法之保障，其根本之意義乃在確立國家與宗教機能之分離，宗教信仰因涉及人們內心最深層之思想，是屬於對上帝、神明、佛、菩薩以及天堂、地獄等非現代科學所能掌握及驗證之對象，係國家權限所不可及之領域，國家自不得介入或干預，乃將之劃歸人們之私事，由宗教團體自律⁵。」

(二)社會階層的支持

法藏法師呼籲各宗教界一同重視宗教合法性，宗教界當共同推動制定《宗教基本》以保障我國宗教合法權益。再者，宗教教義和世俗法律之間的管轄分際法院還是採取了宗教權的尊重精神，認可基於宗教或道德理由下宗教機構的決定，且嚴守界限不介入評估信仰團體的教義，或宗教信條制定《宗教基本

⁴ 司法院釋字第 573 號解釋許玉秀大法官協同意見書（節錄）

⁵ 司法院釋字第 573 號解釋王和雄大法官協同意見書（節錄）

法》乃有其必要性⁶。目前國內仍有許多法界、宗教界人士及專家學者對於立法不斷地進行研討，為我國宗教信仰的發展及捍衛宗教自由而努力發聲，宗教團體、「中華人權協會」人權團體也發表「國際宗教人權影子報告」提供政府建言，政府應重視宗教界及人權團體的聲音，呼籲儘速完成《宗教基本法》立法，並將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8 條的精神落實到《宗教基本法》中，以符合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73 號解釋⁷。宗教團體之宗教自由的保障，除「財產權」外，政府更應積極落實釋字第 573 號解釋，及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8 條所揭櫫的宗教自由維護。長期以來，主管機關以行政管制的思維，對於宗教團體進行管理及規範。然而，我國既然已實施兩公約且具國內法律效力，因此主管機關仍應先趕緊訂定《宗教基本法》草案並完成立法，揭櫫保障宗教自由之基本原則及其綱領；進而以此儘速完成《宗教團體法》，使台灣宗教自由的保障能具體落實，如此方符合以「人權治國」之理念⁸。2018 年跨黨派立委已提出《宗教基本法》草案迄今仍無結果，不禁質疑政府對宗教立法的態度⁹。

肆、宗教基本法草案爭議之解析

一、土地使用爭議

(一)長期既成宗廟團體用地應放寬編定使用

宜蘭冬山「慈濟祖宮」於民國 109 年受到冬山河整治拓寬工程影響，在現址空地斥資 2 億多元，蓋了三層樓大廟、有地下室、高達 21 公尺、樓地板面積 5 千平方公尺、佔地近 2000 坪。惟經縣府普查該地為農牧用地，2 次開罰 30 萬元、4 次勒令停工；最終決議 111 年 8 月大批動員警力與縣府人員拆除，乃該宮廟全部違建¹⁰；此舉無奈，乃突顯台灣宗教團體目前用地的取得之困境。目前宗教寺廟團體土地，倘座落於非都市土地中之甲、乙、丙、遊憩等建築用地，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應限期完成合法化，否則將形成實質違建，面臨被拆除及高額罰鍰。此對於宗教團體毋寧是一場災難，嚴重侵害既有之宗教活動自由與財產權，並涉及國家對宗教自由與國際形象觀瞻，政府應迅早提出因應與化解對策¹¹。依國土計畫法規定重新編定之使用地類別公告時（至遲 114 年 4 月 30 日），我國之土地使用管制體系（制度）將轉換至國土計畫法所定，全面以計畫

⁶ 仇貴美，由政教分離宗教中立論《宗教基本法》得必要性，宗教基本法 宗教基本權保障，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 9 月，頁 45。

⁷ 釋宏安法師，仇貴美，由政教分離宗教中立論《宗教基本法》得必要性，宗教基本法 宗教基本權保障，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 9 月，頁 35。

⁸ 李永然律師、林彥廷，完善立法，確保宗教團體的財產——從《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談起，東森雲。

⁹ 林清汶，防止廟產淪私財宗廟條例通過的詭譎現象，ETtoday 新聞雲 雲論，2022 年 05 月 27 日。

¹⁰ <https://www.kamalan-news.com/local/4/13941>

¹¹ 林清汶，台灣宗教寺廟用地在法制上應有之保障予尊重，取自《宗教團體不動產之確保與宗教自由之完善》，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10 月，頁 63。

（包括國土計畫、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引導土地使用管制之機制。國土計畫法規定編定之使用地公告時，位於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範圍之原有宗教團體使用之土地（含地上建築物與設施），如仍屬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且使用又與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內容不符者，無得依法申請變更使用分區或使用地類別之途徑，亦無循國土計畫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容許為從來使用之可能；其繼續使用依同法第 38 條規定裁罰，甚至強制拆除之¹²，對宗教用地之取得衝擊甚大。

然而反觀，政府為解決農地工廠問題，「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 105 年 5 月 20 日以前的既存農地工廠在 20 年可完成土地、建物可以合法化，惟業者須於 111 年 3 月 19 日以前申請納管。從經濟發展觀之，農地上之工廠本是營利事業，政府卻大可以彈性放寬並輔導合法化。宗教團體用地之取得與國土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及都市計畫法並事實上無直接關聯性。再者，關於宗教使用土地之管制，又更是涉及諸多龐雜、繁複之公法管制及變更議題。要言之，有關宗教團體用地之議題面向雖屬多元，如同時處理有關宗教團體用地之土地取得及使用管制問題，整體面向與內容將過度錯綜複雜¹³。對於農地上既存違規工廠（估計約有 1.4 萬公頃）（立法院公報 108 卷 51 期、頁 243）之處理，政府於 108 年 7 月修正工廠管理輔導法，增訂「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管理及輔導」專章（第 28 條之 1 至 28 條之 12），對於既有未登記工廠（違規工廠），全面納管及就地輔導，以使合法化或轉型、遷廠。其立法理由乃期以「全面納管保護環境及農地」及「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勞工就業三贏」（立法院公報 108 卷 51 期、頁 243）。

農牧用地、山坡地依新法規定原則上不能蓋宮廟，蓋宮廟須先將土地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國土計畫法規定「沒有登記寺廟將被視為違建」，而新北市就高達 3000 多間；由於登記程序繁瑣、耗資千萬元、人事變更、歷程極久，且有部分禁止規範，極不容易短期間完成¹⁴，並非宗廟團體不願作變更。又早期宗廟團體住持沒有登記概念且有任期制，包括不動產產權登記，因而錯失了變更寺廟登記時機；然而，事實上「有登記寺廟」卻未必符合水土保持等規範，卻捷足先登取得保障。而寺廟用地面積不若工廠用地大，且屬於公益非營利事業；因此，對於同屬違規之宗教團體使用之土地，政府何妨比照工廠輔導法，制定輔導宗教土地使用合法化之相關簡易法律程序；對於現行長期間既成宗教團體使用之土地處理，應當考量影響對象性質與程度之差異及其本質之特殊，另作合理處理¹⁵。

（二）《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具有意義

早期宗教團體取得不動產礙於法令規定而暫以「自然人」名義，做為「出

¹² 陳立夫，第九回法律宗教研討會暨綜較基本法研討會，2022 年，9 月，頁 17-18。

¹³ 陳立夫，第九回法律宗教研討會暨綜較基本法研討會，2022 年，9 月，頁 22。

¹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cjDNYVeLJg>

¹⁵ 林清汶，台灣宗教團體目前用地取得之困境與突破，第 11 回法律宗教研討會，2023 年 11 月。

名登記人」的情形極為普遍。該等不動產未登記於宗教團體名下原因有多端：或因尚未辦理寺廟登記而非屬權利主體、因法律限制而無法承受不動產，或因無力負擔移轉不動產之稅賦等，情況不一而足。而倘若「出名人」心生貪念，而拒不移轉不動產所有權予宗教團體、或「出名人」死亡，而其繼承人不承認「借名關係」不願配合移轉宗教團體時，會使宗教團體的財產淪為該「自然人」所有，不但違背捐贈者本意，也有殃於宗教團體的財產。尤其最高法院曾於民國 106 年民庭總會決議認為，「借名登記關係中，縱使出名人（即自然人）未經借名人（即宗教團體）同意，即擅自將不動產處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仍屬『有權處分』」；將宗教團體所有的不動產，盡速從自然人名下更名登記為宗教團體所有，實有其迫切性¹⁶。所幸，113 年 7 月 15 日終於完成《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立法，已經得以解決宗廟團體不動產權屬困境。暫行條例迄今已協助超過 600 家宗教團體，完成超過 500 筆不動產更名登記、1,300 筆不動產限制登記。

本條例係為確保宗教用地權利取得而設，而逕為更名時免除負擔移轉稅賦，立意堪稱良善；惟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依法應繳交回饋金，而宗教用地乃屬於公益性事業用地，與一般變更性質不同，本條例並無特別規定是否得以免除，衍生爭議乃為德不卒。

二、財務收入申報

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機關團體及其附屬作業組織，應合併辦理結算申報。然而，宗教團體有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或有附屬作業組織者及宗教團體捐助成立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應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並依行政院頒訂「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規定徵、免所得稅。依據《所得稅法》第 71 條之 1 規定：「非營利性質的宗教團體每年 5 月還是需要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然而，若符合以下條件，就可以享有免申報的優惠：該團體須為寺廟、宗教社會團體或宗教財團法人，並已依法向內政部或其他政府機關完成立案登記。無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未設立附屬作業組織。」而不屬於銷售貨物或勞務的行為，為尊重宗教信仰與習慣，國稅局認為以下情況產生的收入，不屬於銷售貨物或勞務，無需辦理所得稅申報情形：「1.舉辦法會、進主、研習營、退休會等宗教活動，或為信眾提供誦經、彌撒、婚禮、喪禮等宗教服務所產生的收入。2.信眾基於自願，隨喜捐贈的油香錢。3.信眾隨喜佈施的香燭、金紙、祭品、齋飯費用或借住廂（客）房的收入(不能訂有固定收費標準)。4.信眾隨喜佈施的納骨塔骨灰或神位安置費用(不能訂有固定收費標準)。」

亦有人士指出，宗教團體財務透明不得侵害宗教自由，必須合於比例原則、法律保留原則，仍應審慎為之¹⁷。惟本文認為：為避免宗教寺廟落入口實建

¹⁶ 李永然律師、林彥廷，完善立法，確保宗教團體的財產——從《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談起，東森雲。

¹⁷ 李永然，由政教分離宗教中立論《宗教基本法》得必要性，宗教基本法 宗教基本權保障，

立制度；又目前電腦作業程序簡便、迅速，與傳統作業不同，可以考慮申報制度使財務更加健全透明化；且宗廟團體負責人都有任期制，在交接時避免爭議更為方便，俾以健全宗教團體財務制度。

三、校園或特定場域弘法

美國憲法第 1 修正案：「國會不得制訂關於設立國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世界上不少國家仍然有宗教背景濃厚的政黨，不論是佛教、基督教、天主教或伊斯蘭教，不少政治人物與宗教團體有關聯性，宗教團體對政府仍有影響力。然而過去，灣宗教縱使百家爭鳴之際，卻未見校園有宗教尚的紛爭。

反對人士擔心宗教進入學校校園或特定場域弘法，如部隊、公務機關等，在校園恐讓「校園陷入宗教爭奪的混亂，傷害學生受教權與教師專業自主權」等，亦讓教育中立原則遭受挑戰。事實上，灣民眾對宗教虔誠但並不熱衷，並且相互尊重，同時信奉或改變宗教信仰者常有之。且依《教育基本法》6 條規定：「教育應本中立原則。學校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從事宣傳或活動。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亦不得強迫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參加任何政治團體或活動。公立學校不得為特定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公立學校亦不得強迫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參加任何宗教活動。私立學校得辦理符合其設立宗旨或辦學屬性之特定宗教活動，並應尊重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參加之意願，不得因不參加而為歧視待遇。但宗教研修學院應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辦理。」等法律均已原則性、合宜性之訂定，讓校園保持純淨自由的空間，宗教基本法制似不必另作規範。

伍、結論與建議

司法院釋字第 573 號解釋曾宣告《監督寺廟條例》違憲，迄今又無其他相關宗教法制訂定；107 年跨黨派立委提出《宗教基本法》草案，認為政府應展現發揚宗教事業誠意，加速完成制定法制。國家既為滿足人民之基本需要而存在，而人民之需要蓋分為物質及心靈兩大部分，物質之滿足可由政府所完成，然心靈之滿足則需由宗教之協力，因此建構保障宗教發展之良善法制環境，乃為國家回應人民需要之重要義務。因此，未來宗教基本法的誕生應恪遵如下事項：

一、尊重宗教團體自律

臺灣民眾向來敦厚淳良，對於不同宗教均能展現高度之包容與融合，彼此不會因宗教不同而惡目相向或撕裂情感，民眾對於宗教的接受與包容又不同於他國，顯少因為不同信仰引爆爭執。部分國家輒因宗教引爆戰爭，如十字軍東征 1096 年—1291 年近 200 年，將異教徒敵視為異類戰火頻仍。反觀灣在選舉時，各種宗廟更成為政治人物爭相奔走之處，迎合選民之信仰取向，不斷調整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政府對於宗教團體權益更應極度重視，並從法制上提出合理、具體保護對策。政府應權衡世界潮流趨勢，在法制確保宗教信仰自

由，如對於早期宗教宮廟建築物用地，基於法律不溯既往原則，應有積極、彈性變通法制策略，有效合理解決困境。

信仰自由乃是人民之基本權利並受憲法之保障，宗教信仰涉及人們內心最深層之思維，係對上帝、神明、佛、菩薩以及天堂、地獄等，非現代科學所能驗證，精神層面更為國家權限所不可及之領域，應尊重宗教團體自律；法院不宜過度干涉教務事項及組織人事任免。

二、宗教立法應從輔助取代管理

灣宮廟淵源流長，諸多藏身於山林之中，所謂「名山古剎」就是年代久遠之宮寺廟，成為民眾頂禮膜拜信仰之聖地。惟目前有很多宗教宮寺廟由於用地取得困難，如早期興建於山坡地上或農地、原住民地等；而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對於建築用地嚴加緊縮管制，似永遠無法解禁放寬成為建築用地；因而該宗教寺廟乃成為長期寺廟籌備處而似無法取得寺廟之資格，且住持之更迭，在法律上均處於「妾身未明」狀態。早期建築物包括土地分區法規或未能合於現行法制。未來如何協助宗教用地之合理取得、財產賬目制度化等，都成為重要課題。

又灣早期對於佛、道宗教似互不夠尊重，因此《「監督」寺廟條例》條文上有「監督」二字，可鑑有行政凌駕作為管理之意；未來在立法上應予避免。

三、推動宗教交流拓展灣視野

宗教無國界，世界上宗教都尊重信仰，信仰不限於一國、一地，都具有世界性。以佛教來說，「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而是實際為人類所接受的信仰；所有的宗教，都應該有「人人有佛性、人人皆平等」的認知。愛無邊界、宗教無差別，透過宗教的交流散布光明與正道，提昇國際視野，並可以息紛止爭減少衝突。尤其，灣宗教廟會具有特色，經常成為國際觀光的側目成為焦點，推動國與國之間宗教交流，可以有效拓展灣視野，宣揚世界和平。

題目六

從宗華教信聯盟《宗教基本法草案》出發之
法哲學與法律建構

邱子宇助理教授

（玄奘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從宗華教信聯盟《宗教基本法草案》出發之法哲學與法律 建構

邱子宇¹

摘要

宗教自由為台灣憲法秩序中最核心的基本權之一，其內容包括信仰自由、儀式自由、宗教結社、宗教教育、宗教自主等多層次結構，並受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90、573 號等解釋所確認。然而，台灣在宗教法制面向長期呈現碎片化，既無完整宗教基本權架構，亦缺乏統一的宗教法人制度，使宗教團體在治理、財產、責任與行政程序方面均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本文結合自然法的法律哲學視角，運用 Adrian Vermeule 的共同善憲政主義（Common Good Constitutionalism）與 Aquinas-MacIntyre 傳統的目的論法理學，論證宗教自由不僅是抵抗國家干預的防禦性自由，更具有積極法秩序與公共善維度。

本文進一步對照《宗教基本法草案》之規範架構，指出其中關於宗教平等、宗教自主、財產與法物保障、國家中立及法律保留原則之法理意義，並分析其與日本《宗教法人法》之制度共通性。最終，本文主張台灣宗教法制之重構應以「目的論宗教自由」為理論基礎，形成一套整合性的宗教基本權保護法制與宗教法人治理架構，以落實憲法所保障之宗教自由與公共利益。

關鍵字：宗教自由、宗教法人、共同善憲政主義、宗教自主性、宗教基本法

¹ 玄奘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From the “Religious Basic Law Draft”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Buddhist Alliance: A Jurisprudential and Legal-Philosophical Reconstruction

Chiou, Tzu-Yu²

Abstract

Religious freedom occupies a central position within Taiwan’s constitutional order. Its content encompasses multiple dimensions—freedom of belief, ritual practice, religious associatio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autonomy—and has been affirmed by the Council of Grand Justices in Interpretations No. 490 and No. 573. Yet Taiwan’s regulatory landscape remains fragmented: there is no coherent framework for protecting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religious freedom, nor is there a unified system governing religious juridical persons. As a result, religious groups face significant uncertainty in matters of governance, property, legal responsibility,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This article employs a natural-law jurisprudential perspective, drawing on Adrian Vermeule’s theory of *Common Good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teleological legal philosophy of the Aquinas–MacIntyre tradition, to argue that religious freedom is not merely a defensive right against state interference. Rather, it possesses an affirmative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aimed at sustaining legal order and the common good. The article further examines the structure of the *Religious Basic Law Draft*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Christian–Buddhist Alliance, analyzing its provisions on religious equality, organizational autonomy, protection of religious property (*res sacrae*), the principle of state neutrality, and the requirement of legality.

Comparative insights are also drawn from Japan’s Religious Corporations Act, highlighting institutional parallels in the governance of religious bodies. Ultimately, the article contends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aiwan’s religious law should be grounded

²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w,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Taiwan.

in a teleological conception of religious freedom, thereby establishing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the protection of religious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or the governance of religious juridical person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commitment to both religious liberty and the common good.

Keywords: Religious Freedom; Religious Juridical Persons; Common Good Co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Autonomy; Religious Basic Law

壹、緒論

宗教自由在民主社會中具有特殊地位，其不僅是最早被承認的基本權之一，也是人格發展、倫理共同體與文化傳承的重要基礎。我國憲法第 13 條明文：「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此自由並非僅止於內在信仰，而包含外顯儀式、傳教、結社、宗教教育與組織治理等多面向。司法院大法官於釋字第 573 號、第 490 號等均明確指出宗教自由受到強固且廣泛的保護，其包含宗教自主（organizational autonomy）、宗教平等（religious equality）、國家中立原則與免於國家干預之權利。

然而，宗教自由之高度保障並未伴隨完整而現代化的宗教法制。台灣目前最接近宗教專法者為 1929 年的《監督寺廟條例》，僅及僧道體系，且多處違反憲法原則。其餘宗教團體大多依《民法》社團章或《人民團體法》，甚至另以財團法人進行規範。然此並非以宗教團體需求為核心之制度，造成法律地位不明、財產缺乏明確治理機制、組織責任界定不清等問題。

在此背景下，宗華教信聯盟於 2017 年所提出之《宗教基本法草案》，提供了一套以宗教自由、宗教平等、宗教自主與國家中立為核心的法律藍圖，試圖重新建構宗教法制的基礎秩序（宗華教信聯盟，2017）。

本文期盼透過整合立法討論與法哲學視角，從共同善憲政主義與目的論出發，提供宗教自由更深層之法理基礎，並強化宗教法制之制度化治理模型。

貳、宗教自由的法哲學基礎：以 Aquinas 與 Vermeule 為中心

宗教自由作為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其正當性並非僅來自自由主義傳統所強調「個人選擇之自主」，更深層的基礎來自宗教在倫理、德性、共同體與法秩序中的目的性地位（teleological status）。無論是在古典自然法、德性倫理學或共同善憲政主義中，宗教均被視為人類指向善、形成德性、建構共同體的核心活動。此一目的論基礎，不僅提供宗教自由的哲學理由，也直接形塑憲法中宗教自由的制度展現，包括宗教自主、宗教團體地位、宗教教育自由以及國家中立原則等。

本文透過 Aquinas(Thomas Aquinas, 1225–1274)與 Vermeule(Adrian Vermeule, 1968–)的論述，建構宗教自由之法哲學基礎，並說明此目的論視角如何支撐宗教法人制度、宗教基本法與宗教自治的法律正當性。

一、Aquinas：宗教作為人類指向「終極善」的自然法實踐

（一）宗教自由的自然法根基：人類追求「終極善」的自由

Aquinas 在《神學大全》中指出，「宗教」(religio) 乃人類指向上帝、履行敬拜義務之德性 (virtus) (ST II-II, q.81)。此宗教德性屬於「正義」的分支德性 (sub-virtue of justice)，因為宗教行為旨在給予上帝「其所當得」(what is due to God)。這意味着宗教活動不是單純主觀偏好，而是一種關於人與終極真理、宇宙秩序與道德理由的客觀實踐。因此，Aquinas 的宗教自由觀包含三層：

1. 內在信仰的自由 (libertas credendi)
2. 外在實踐的自由 (exterior worship) ——儀式、教義實踐
3. 宗教共同體的自由 (religious communitas) ——透過團體維繫德性與敬拜傳統

此三層結構，可謂奠定了今日宗教自由的核心內容。

(二) 宗教自由之不可侵犯性：內在信仰屬於「意志不能被強迫」的領域

Aquinas 認為，內在信仰屬於理性與意志無法被外力強迫的領域，並指出：「信仰是自願的行為；強迫無法產生真正信仰」(ST II-II, q.10, a.8)。本文認為，此論點即為現代憲法中對於宗教「內在領域絕對自由」之前身或指引。

而從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90 號、第 573 號解釋中，亦可呈現相似之概念。例如：釋字第 490 號理由書中，對於宗教自由的意義，以及其與人民所擁有之其他憲法上權利、義務等關係，有了完整的說明，節錄如下：

現代法治國家，宗教信仰之自由，乃人民之基本權利，應受憲法之保障。所謂宗教信仰之自由，係指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以及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畀予優待或不利益，其保障範圍包含內在信仰之自由、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內在信仰之自由，涉及思想、言論、信念及精神之層次，應受絕對之保障；其由之而派生之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則可能涉及他人之自由與權利，甚至可能影響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因此，僅能受相對之保障。宗教信仰之自由與其他之基本權利，雖同受憲法之保障，亦同受憲法之規範，除內在信仰之自由應受絕對保障，不得加以侵犯或剝奪外，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在必要之最小限度內，仍應受國家相關法律之約束，非可以宗教信仰為由而否定國家及法律之存在。因此，宗教之信仰者，既亦係國家之人民，其所應負對國家之基本義務與責任，並不得僅因宗教信仰之關係而免除。(節錄自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90 號解釋理由書第一段)

若以 Aquinas 的自然法觀點，與上述釋字第 490 號大法官的論述相互比對，可以發現兩者在本質上呈現高度呼應。大法官所謂內在信仰自由之「絕對保障」，正是承認信仰作為精神與理性活動之不可強迫性，亦即承認信仰自由具有「本質絕對性」。換言之，大法官的憲法解釋與 Aquinas 的自然法哲學所指向的結論一致，即內在信仰所屬之心靈領域 (forum internum) 不僅無法受到國家有效控制，也不應成為任何法律限制或國家干預的對象。

然而，釋字第 490 號同時指出，宗教行為與宗教結社作為「外在層面」的宗教自由，因可能影響他人權利、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因此國家得在必要最小限度內加以規範。此亦與 Aquinas 的二分論 (內在信仰 vs. 外在行為) 一致。Aquinas 認為外在儀式屬於社會性的行為 (acta exteriora)，具有外部效果 (詳後述)，因此國家可以基於公共善的理由予以正當規範，但不得因此侵害信仰的內在自由。

(三) 外在儀式自由與社群性：宗教需要「團體」才能存續

Aquinas 在討論宗教德性 (virtus religionis) 時，明確指出宗教並非單純個人心靈中的私密

信念，而是一種必然透過群體行動而展開的共同實踐（Aquinas, 1947/2012）。宗教行為作為德性的一部分，其完成需要「共同體的秩序、儀式的協作與共同參與的生活方式」，而無法單憑個人即完整實現宗教之德性。

進而，Aquinas 認為敬拜、祈禱、教義教導等宗教行為具有濃厚的公共性；若缺乏共同體，宗教便無法形成穩定的行為模式，也無法延續其德性目的（Aquinas, 1947/2012）。

其次，宗教儀式本質上具有集體性。各宗教的禮拜、彌撒、誦經、講道或科儀皆屬於協作性儀式，需要共同體的參與才能完成。Vermeule（2022）指出，儀式不僅是信仰表達的外在形式，更具有「社群形成」與「公共善維繫」的功能。透過儀式，信徒得以共享象徵、延續教義、凝聚身份並共同形塑共同體的道德生活（Witte & Green, 2011）。

再者，宗教的教義、傳統與規律皆具有共同體結構。宗教若無組織性的團體來承接教義的詮釋、神職編制、聖典詮釋、教學機構等，就無法在歷史中延續。MacIntyre（1988）指出，傳統是透過共同體持續討論而存續，宗教作為具有千年歷史的道德傳統，沒有共同體便會瓦解。因此，宗教共同體的存在並非宗教自由的附屬，而是其本質部分（Stout, 2004）。

綜上，宗教之社群性不僅是宗教實踐的結果，而是宗教得以被稱為「宗教」的必要條件之一。正因如此，宗教結社自由與宗教團體之自主（organizational autonomy）在法理上必然屬於宗教自由的內在結構，而非外加之附屬性自由。換言之，若宗教不能組成團體或不能以自主性治理其內部事務，其信仰生活便會陷於無法展開的困境。

也正因如此，現代法治國家普遍以「宗教法人制度」來保障宗教共同體之存在，使其具備法律人格、財產能力、組織治理結構與宗教活動之自治空間（Smith, 2011）。宗教法人制度並非賦予宗教團體特權，而是承認宗教共同體作為宗教自由核心之一的社群性，使宗教能以組織化、穩定性與自主性方式在公共秩序中存續（Witte, 2019）。從自然法與目的論法理而言，「宗教共同體→自治→法律人格」形成一條一致的邏輯線：宗教需要團體，而團體需要自治，而自治需要法律的承認與制度化保障。

因此，宗教團體自治與宗教法人制度，並非宗教自由的附屬制度，而是其本質性制度化展現；其理論基礎正由 Aquinas 的德性宗教觀、MacIntyre 的傳統共同體論與 Vermeule 的共同善憲政理念共同支撐。

二、Vermeule：共同善憲政主義中的宗教自由

Vermeule 在《共同善憲政主義》（*Common Good Constitutionalism*, 2022）中明確指出，憲法秩序不應被理解為價值中立的程序工具，而是一套旨在促進「公共善」（common good）與維護「正當秩序」（right order）的實質性法秩序。此觀點拒絕自由主義將宗教視為「純私人偏好」的理解，並重新闡釋宗教自由在憲法中的功能：宗教自由不僅是防禦國家干預的個人自由，更具有積極維繫社會德性、社群結構與文化秩序的公共角色（Vermeule, 2022）。因此，在共同善憲政的語境下，宗教自由是憲政秩序的一部分，其制度化保障不只是權利保護，更是法秩序促進公共善之實現方式。

（一）宗教自由作為「公共善」的重要組成

Vermeule 指出，宗教自由在共同善憲政主義中的核心地位，源自宗教本質上對社會德性、倫理結構與文化傳承所做出的貢獻（Vermeule, 2022）。首先，宗教具備培育德性的能力，提供道德養成的框架，是許多社會內部倫理秩序的重要基礎。宗教鼓勵慈善、同情、節制、饒恕、社群責任等德性，這些皆是穩定社會秩序所不可或缺的品格（Finnis, 2011）。

其次，宗教團體構成中介團體（intermediate associations）的一部分。這些中介團體是位於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社群，包含家庭、教會、寺廟、慈善機構、教育團體等，其存在使社會不至被國家與個人主義雙重夾擊（Stout, 2004）。Vermeule 認為，中介團體是自然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因為人天生在共同體中生活，並透過共同體形成德性、身份與意義（Vermeule, 2022）。宗教共同體尤其如此，其具備代間傳承、禮儀實踐與教義教育等功能，因此，國家應維持宗教團體在法秩序中的穩定地位，使其能繼續為社會提供倫理與文化資源（Witte, 2019）。

基於這樣的社群性結構，Vermeule 主張國家在保障宗教自由時並非僅止於「不干預」，而是具有「積極義務」確保宗教團體得以存在、運作並實踐其宗教生活（Vermeule, 2022）。換言之，宗教團體的法律地位並非特權，而是為使宗教能履行其公共善功能所必要的制度條件。

因此，在共同善憲政主義下，宗教法人制度便獲得強而有力的法理正當性。宗教法人制度使宗教共同體能以「法律人格」形態存在，獲得財產能力、自主治理能力與程序化的法律地位，這使宗教能持續在社會中發揮其公共善功能，而不致因個人所有、利益衝突或不穩定治理而瓦解（Sullivan, 2005）。

（二）國家中立不是「價值中立」，而是「宗教事務之適當角色界定」

Vermeule 反對自由主義主張宗教應完全私人化、國家應完全對宗教「價值中立」。在共同善憲政中，「國家中立」不是否定宗教價值，而是指國家應適當劃定其角色範圍，使其尊重宗教在社會倫理中的正當位置（Vermeule, 2022）。國家不得審查宗教教義、不得介入宗教內部人事，也不得對宗教給予差別待遇；然而，在「世俗治理面」（secular aspects）——例如財務管理、組織透明、公益活動、財產運作——國家可制定程序化、一般性之規範。

這種制度設計既能保障宗教團體的核心宗教活動不受干預，又能確保其在公共領域中的活動符合基本的法治要求（Witte & Green, 2011）。Vermeule 指出，此模式反映了「聖俗二分」的治理哲學：神聖領域完全交給宗教共同體治理，而涉及公共秩序的部分則可由國家制定合理規範（Vermeule, 2022）。

（三）宗教法人制度與宗教基本法：共同善的制度化形式

在共同善憲政的視角下，宗教法人制度與宗教基本法並非單純保障宗教自由的技術性制度，而是憲法促進公共善的制度化展現。Vermeule 認為法律在宗教領域的角色包括：

1. 承認宗教團體為法律主體（preservation of intermediate associations）

透過法律人格化承認宗教共同體，使其可持有財產、管理場域、組織治理，並以制度化方式存續。

2. 建立透明與穩健的治理制度

法律可要求最低治理標準，以避免宗教團體因不透明或內部權力衝突而侵害信徒權益

(Sullivan, 2005)。

3. 避免宗教淪為私人所有物或政治權力工具

若無法人制度，宗教團體可能被自然人所有或操控，危及其宗教本質與公共善角色 (Smith, 2011)。

4. 維護宗教作為文化與道德資產 (moral and cultural assets)

宗教的存在對於文化保存、德性養成、家庭教育與社群穩定具有深遠影響，法律應維持其運作條件 (Witte, 2019)。

因此，從 Vermeule 的共同善憲政主義觀點出發，宗教法人制度與宗教基本法皆是國家實現公共善的重要工具，其目的在於確保宗教作為中介團體得以維持其在社會與公共秩序中的正當地位。

三、自然法下的宗教法制與宗教法人制度

綜上所述，宗教自由之正當性不僅體現在個人內心信念的自主上，更建立於宗教作為人類追求「終極善」之德性活動 (Aquinas, 1947/2012)。Aquinas 認為，宗教德性 (*virtus religionis*) 是一種「給予上帝其所當得」 (*rendering to God what is due*) 的行為，此行為具有內在與外在層次，而內在層次屬於意志與理性不可被強迫的領域 (*Summa Theologica*, II-II, q.10–81)。因此，宗教自由不僅是消極自由 (*freedom from coercion*)，更具積極目的，即保障人能在共同體中完成其指向善的宗教實踐。

進而，Vermeule (2022) 在《共同善憲政主義》中延續此傳統，將宗教自由定位為構成「公共善」 (*common good*) 的制度之一。宗教共同體在道德教育、社群支持、文化傳承與慈善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宗教在憲法秩序中具有「社會基礎功能」。因此，國家在保障宗教自由時，除不得干預信仰內在自由外，更具有積極義務為宗教共同體提供必要的制度條件，使宗教活動得以在穩定的法秩序中運作。以下說明上開論述如何支撐宗教法制與宗教法人制度：

(一) 宗教法人制度的必要性

在 Aquinas 的目的論中，宗教行為不可能孤立於個人，而需由共同體執行。禮拜、祈禱、教義教導、祭儀等皆必須在群體中完成，因此宗教共同體 (*religious community*) 是宗教自由的本質結構之一，而非附屬權能 (Aquinas, 1947/2012)。

然而在現代法秩序下，宗教共同體若沒有法律人格，宗教共同體可能被視為自然人之附屬物，甚至可能因個人死亡、財產繼承或內部爭議而遭破壞。Vermeule (2022) 指出，允許宗教共同體以法人地位存在，可避免宗教淪為私人財產或工具，並維持其在公共善中的本質角色。

因此，宗教法人制度並非給予宗教特權，而是保障宗教共同體能以制度化方式存在，避免信仰生活完全依賴自然人的意志，確保宗教活動脫離私人控制並穩定延續 (Witte, 2019)。

(二) 宗教自主性 (*organizational autonomy*) 之必要性

Aquinas 將宗教的「內在信仰」(forum internum) 視為不可強迫之領域，任何外在權力均不能介入人的理性與意志，使其相信或不相信特定宗教 (ST II-II, q.10, a.8)。然而，宗教自由的外在層次 (如：教義、禮儀、人事、紀律等) 雖非絕對自由，但其屬於宗教本質活動，因此國家不得介入其宗教性核心。

Vermeule (2022) 進一步將此內在—外在區分制度化，認為宗教共同體的「宗教性領域」(intrinsically religious domain) 應享有高度自治，包括：教義教導、禮儀與儀式、神職任命、宗教紀律等。

上開領域不僅關乎宗教自由，也是共同體延續其宗教傳統與德性目的的條件 (Sullivan, 2005)。因此，宗教自主性不是「特別優惠」，而是宗教自由之必要內容，倘若國家干預上述領域，即破壞宗教的目的性與社群性本質。

(三) 財務透明與組織治理制度的正當性

共同善憲政主義之所以特別強調「宗教的神聖領域不可干預、世俗活動得以規範」，其背後並不是一種折衷式的技術妥協，而是一套一貫的法哲學立場。Vermeule (2022) 主張，宗教作為面向終極真理與超越性價值的實踐，其核心內涵 (例如：信仰內容、教義詮釋、禮儀設計、神職人員任命與宗教紀律) 屬於一種本質上宗教性的活動 (intrinsically religious activities)，國家在此領域既沒有專業判斷權，也缺乏正當性介入。若國家試圖審查教義、規定儀式內容或左右宗教內部人事，等於以世俗權力篡奪宗教共同體在「神聖領域」的自治權，不僅違背宗教自由，也破壞宗教本身的目的結構 (Aquinas, 2012；Vermeule, 2022)。

然而，宗教共同體在現代社會中，必然同時涉及大量「世俗活動」(secular activities)，例如購買不動產、管理捐款、設立學校或醫院、僱用員工、投資營運或承租場地等。這些活動本質上與一般法人、社團或企業所從事之行為相似，其效果也會直接影響信徒的財產權、契約關係與社會整體的法秩序。Vermeule (2022) 認為，正因為宗教團體兼具神聖與世俗雙重面向，法律才有必要在「世俗活動」層面引入一般性、可預測、程序化的規範，透過這種「聖俗二分」(sacred-secular distinction)，既避免侵犯宗教核心，又維持法治國家基本秩序。

在此意義下，法律在宗教團體的世俗活動中，主要扮演四項角色：1. 要求基本的財產管理規範，例如不動產登記、資產負債表的編製與財產處分程序，以避免宗教財產被個人非法占有或暗中移轉。2. 建立最低限度的會計透明，例如年度財報、捐贈收入與支出明細，使信徒與利害關係人得以合理監督。3. 設定法人治理程序，要求宗教法人設置負責人、董事或監督機制，並以一定程序作成重要決議，避免權力集中於少數人而無救濟管道。4. 建立公告制度，對於重大財產處分、組織變更或章程修訂，要求向信徒或主管機關公開，增加資訊可近性與決策正當性 (Witte & Green, 2011)。

更進一步地看，這樣的制度設計在實際上反而有助於保護宗教自由本身。若宗教團體長期處於財務不透明、權力高度集中且缺乏外部信賴的狀態，社會大眾很容易對宗教產生「特權領域」或「法外空間」之印象，進而促使國家採取更嚴苛的管制乃至懷疑態度 (Sullivan, 2005)。相反地，當宗教法人在財務與治理面向能展現出基本的透明、可預測與責任結構時，反而能換取社會與國家的高度信任，減少外部對宗教團體的干預與敵意，使國家更無正當理由介入其神聖領域。

換言之，財務透明與治理制度，表面上似乎是對宗教團體施加了某種法律負擔，實則是一種「反向保障」：透過在世俗層面建立規範化、可被檢驗的制度，維護信徒與社會大眾對宗教法人之正當期待，長期而言更有助於維護宗教在憲政秩序中的正當性與自由空間。共同善憲政主義所主張的並非「削弱宗教」，而是透過聖俗分工，使宗教在法律框架中獲得一種穩定、可長可久的存在方式（Vermeule, 2022；Witte, 2019）。

因此，從目的論宗教自由的觀點來看，財務透明與組織治理制度不但沒有侵害宗教自由，反而是宗教自由在現代法治國家得以穩定延續的必要條件。法律透過在世俗層面提供一套清楚、可預測、程序化的規範，使宗教共同體得以安心地在公共空間中活動，而無須時時面臨任意的不信任與全面管制。這種「有限規範以換取充分保障」的模式，正是宗教法人制度與宗教基本法背後的法理核心（Witte & Green, 2011；Vermeule, 2022）。

參、宗教基本法理論及其框架：以「宗華教信聯盟宗教基本法草案」為中心

《宗教基本法》的概念，乃我國首次企圖以一般性、系統性法律規範宗教自由與宗教團體制度的立法嘗試。本文將以「宗華教信聯盟」所提出的《宗教基本法》草案為基底，並就前述法哲學基礎作為分析工具，評估該草案是否在制度設計上充分回應宗教自由的本質、宗教共同體的法秩序需求，以及憲政國家在宗教事務中的適當角色。以下將進行文本之直接分析，本文並將草案移置附錄(詳見附錄一)，以供對照。

一、宗教自由概念

Aquinas 認為宗教屬於指向終極善的德性，其核心包括：內在自由（forum internum）不可強迫（Aquinas, 1947/2012）。外在宗教行為必須以共同體形式實現（禮儀、教義、教團）。該草案在其「立法目的」及「宗教自由之內涵」部分，明確區分內在信仰與外在宗教行為，與憲法第 13 條、釋字第 490 號與第 573 號並無二致。就此而言，草案確實反映出「人之宗教自由具有本質性與不可剝奪性」的自然法基礎，例如：第 4 條明確指出：「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以及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第一項）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之機關行使公權力，應尊重憲法保障之宗教信仰自由。（第二項）」並在第 6 條中說明，任何人不得請求個人或宗教團體為其教制、教義外之其他行為或儀式，以確保宗教之自主性。

二、共同善憲政主義下的宗教基本法

Vermeule（2022）指出，宗教團體是介於國家與個人之間的中間團體，具備社會整合、倫理教育與社群支持的功能，國家應加以維護。該草案透過宗教法人制度、宗教自主制度及行政協助等規範，確實肯認宗教團體的獨立性，並避免其被個人或政黨所挾持。

雖然目的論宗教自由與共同善憲政主義均強調，國家應在「世俗活動層面」提供最低限度的程序化治理，以防止宗教團體被私人化、隱蔽化或濫用（Vermeule, 2022；Witte & Green, 2011），但本草案並未納入任何形式的「財務透明」或「治理公開」規定。此種立法選擇雖可能基於尊重宗教自主、避免國家過度干預的初衷，但在制度設計上亦造成若干法理上的不足。

首先，若宗教法人不具財務透明義務，極易造成宗教財產被自然人掌控、挪用或繼承的

風險。Aquinas 指出，宗教應作為共同體實踐而存在，並非個人附屬物（Aquinas, *ST II-II*）。若無透明制度保障宗教財產的共同體性，宗教團體即可能因個人操作而失序，違反宗教共同體之本質目的。

其次，缺乏透明規範將削弱社會與國家對宗教團體的信賴。依共同善憲政主義，宗教作為中介團體，需維持良好治理才能在公共秩序中保持正當地位。Vermeule（2022）強調，若宗教團體在世俗層面完全無規範基礎，反而會增加國家因不信任而介入的可能性，使宗教自由更容易受到實質侵害。

三、比較法下的宗教基本法討論

此外，從比較法觀察，若以鄰近國家之日本《宗教法人法》加以觀察。該立法之重要精神，即是「聖俗分離」原則。其意義與前面論述邏輯相近，即在於「宗教活動本身」與「伴隨宗教而產生的經濟活動」二者應加以區分。為保障人民信仰宗教之自由，《宗教法人法》之整體立法概念，便是有關「伴隨宗教而產生的經濟活動」（濱田源治郎 1978, 123）³。

而所謂「聖俗分離」的重要體現，則可透過「津地鎮祭訴訟（つじちんさいそしょう）」加以了解。該訴訟是日本三重縣津市在市立體育館動工儀式上舉行神道教式奠基儀式，並使用公共資金支付費用，是否違反了日本憲法第 20 條規定的政教分離原則而引發的行政訴訟。而在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判決中，承認該活動兼具「社會儀禮」與「世俗慣行」的性質。最高裁判所採取「目的效果標準」（目的—效果基準），認為若政府行為的主要目的不是推廣特定宗教，且實際效果未使特定宗教受到援助或促進，則不違反「聖俗分離」原則。

進而與本文有關的最重要制度，則為「公告制度」。此制度乃國家廢除對於宗教團體的監督與干涉後，為保障宗教法人自主性，又兼顧人民參與宗教的保障下，所設計出。如《宗教法人法》第 23 條（財產處分等之公告）⁴、第 25 條（財產目錄等之製作、備妥、閱覽及提出）⁵等規範，就宗教法人之財產處分，應公開向信徒或利害關係人以新聞、公布欄等方式進行公

³ 而所謂「聖俗分離」的重要體現，則可透過「津地鎮祭訴訟（つじちんさいそしょう）」加以了解。該訴訟是日本三重縣津市在市立體育館動工儀式上舉行神道教式奠基儀式，並使用公共資金支付費用，是否違反了日本憲法第 20 條規定的政教分離原則而引發的行政訴訟。而在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判決中，承認該活動兼具「社會儀禮」與「世俗慣行」的性質。最高裁採取「目的效果標準」（目的・效果基準），認為若政府行為的主要目的不是推廣特定宗教，且實際效果未使特定宗教受到援助或促進，則不違反「聖俗分離」原則。詳參：塚田，穗高（2025）。政教分離問題が立ちあがるとき—津地鎮祭訴訟の宗教社会学的検討—。《文教大学国際学部紀要》，36(1)：61-77。

⁴ 宗教法人法第二十三条 1：「宗教法人（宗教団体を包括する宗教法人を除く。）は、左に掲げる行為をしようとするときは、規則で定めるところ（規則に別段の定がないときは、第十九条の規定）による外、その行為の少くとも一月前に、信者その他の利害関係人に対し、その行為の要旨を示してその旨を公告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但し、第三号から第五号までに掲げる行為が緊急の必要に基くものであり、又は軽微のものである場合及び第五号に掲げる行為が一時の期間に係るものである場合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⁵ 宗教法人法第二十五条 1：「教法人は、その設立（合併に因る設立を含む。）の時に財産目錄を、毎会計年度終了後三月以内に財産目錄及び収支計算書を作成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告。甚至若違反此類規定，將處 10 萬日圓以下之罰鍰⁶。

綜觀日本《宗教法人法》的制度設計，可知其對於宗教事務管理的核心精神在於「以有限管理換取充分保障」。一方面，國家透過認證制度、責任役員制度與公告制度，要求宗教法人建立組織治理結構、維持財務透明並定期公告重大財產處分，以確保信徒與社會大眾均能掌握宗教法人之運作情況。此公開機制若能對應兩岸宗教交流之制度，不僅能防止宗教組織內部資產遭不當處分，亦能避免宗教團體成為資金洗錢或政治滲透的管道。

綜上所述，雖然共同善憲政主義明確主張在宗教的「世俗活動」領域，國家得提供一定程度的程序化治理（Vermeule, 2022），但《宗教基本法草案》並未設置任何財務透明或治理公開的最低規範。此種立法選擇，雖可能出於尊重宗教自主之考量，然而在制度層次上仍存在明顯不足。

宗教團體若無透明或程序正義機制，可能使宗教財產落入由自然人控制之風險，將可能違反 Aquinas 所揭示的宗教共同體性本質（Aquinas, 1947/2012）。此外，國際經驗如日本《宗教法人法》顯示，適度透明制度有助於增加信徒信賴，亦避免宗教成為不法活動之庇護空間（Witte & Green, 2011）。過度薄弱的世俗治理反而可能促使國家於未來因缺乏信賴而強行介入，造成更嚴重的宗教自由侵害。

因此，本草案在尊重宗教自主之外，建議可補強最低限度的財務程序規範，以防止宗教財產私有化或不透明化，並確保宗教共同體在現代法治國家中具有可持續性與正當性。

肆、結語

本文從自然法傳統與共同善憲政主義出發，重新審視宗教自由在憲法秩序中的意義，並以此作為理論基礎，評析「宗華教信聯盟宗教基本法草案」之規範結構與可能缺漏。透過 Aquinas 對宗教德性與內在／外在自由的區分，以及 Vermeule 所提出以「公共善」與「正當秩序」為中心的憲政觀，本文主張：宗教自由並非僅為個人選擇之結果，而是人依理性追求終極善的自然法權利，同時亦是維繫倫理共同體與社會秩序的制度性條件（Aquinas, 1947/2012; Vermeule, 2022）。

在此法哲學脈絡下，宗教自由至少包含三個彼此關聯的向度：其一，內在信仰的絕對自由，作為理性與意志不可被強迫之領域；其二，外在宗教行為與宗教結社之相對自由，得以在必要且合乎比例原則的範圍內接受調整；其三，宗教共同體作為中介團體，透過法人制度、自主治理與適度的世俗程序規範，得以在憲政秩序中維繫其德性與文化功能。此一三重結構，既可與我國釋字第 490 號、第 573 號對宗教自由的理解相互印證，亦為建構宗教法制與宗教法人制度提供一致而連貫的法理基礎。

⁶ 宗教法人法第八十八條：「次の各号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場合には、宗教法人の代表役員、その代務者、仮代表役員又は清算人は、十万円以下の過料に処する。...

三 第二十三条の規定に違反して同条の規定による公告をしないで同条各号に掲げる行為をしたとき。

四 第二十五条第一項若しくは第二項の規定に違反してこれらの規定に規定する書類若しくは帳簿の作成若しくは備付けを怠り、又は同条第二項各号に掲げる書類若しくは帳簿に虚偽の記載をしたとき。...。」

就「宗華教信聯盟」所提出的《宗教基本法》草案本身而論，其在幾個關鍵面向上確實呈現出與上述法哲學分析相契合之處。一方面，草案在立法目的與宗教自由條款中，明確採取內在信仰與外在行為之區分，並重申信仰與不信仰、參與與不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與憲法第 13 條及現行解釋實務相互呼應。另一方面，草案透過宗教法人制度、宗教自主條款與對宗教團體法律地位的承認，使宗教共同體得以作為一種具有法人格的中介團體，承接教義、禮儀與宗教生活，是朝向制度化保障宗教自由的重要一步。從共同善憲政主義角度觀之，這些規範皆指向宗教自由的「公共善功能」，而非將宗教侷限為狹義之私人偏好。

然而，若進一步檢視草案在「聖俗二分」與世俗治理層面的具體設計，則可發現其仍有若干待補強之處。共同善憲政主義強調，國家對宗教之尊重，並不意味著在所有面向均採取消極中立，而是應在嚴格尊重神聖領域（教義、禮儀、紀律、人事）的前提下，於宗教團體所涉及的財產、會計、法人治理等世俗活動，建立最低限度之程序與透明機制，以防止宗教財產私有化、宗教法人被挪為工具，並保護信徒的財產權與信賴利益。相較之下，現行草案對於財務透明、治理公開及信徒參與等面向幾無著墨，難以回應實務上高度集權、財產集中與資訊不對稱可能引發的風險，也不利於在長期內鞏固社會與國家對宗教團體的信任。

從比較法觀察，日本《宗教法人法》透過認證制度、責任役員制度與公告制度，結合「有限管理換取充分保障」的思維，一方面嚴格排除國家對教義與禮儀之干預，一方面則要求宗教法人在財產處分與財務管理上遵守必要的程序並對信徒公開。此種以公告與程序正義為核心的治理模式，並非出於不信任宗教，而是透過制度化的世俗規範，避免宗教法人淪為「法外空間」，從而在實際運作上為宗教自由本身提供「反向保障」。相較之下，我國宗教基本法草案若完全欠缺此類透明與治理設計，恐怕難以承擔長期維繫宗教自由與公共善之雙重任務。

在未來的研究與立法實務中，如何進一步結合比較法、宗教社會學與兩岸宗教治理脈絡，對宗教基本法的制度細節予以精緻化設計，將是台灣在邁向成熟宗教法制、深化憲政秩序與多元民主的重要課題。本文所提出之法哲學分析與制度建議，期能作為此一進程中的一項理論起點與討論基礎，而非終局結論。正如自然法傳統所揭示的，法律若欲與正義相稱，必須不斷在具體制度中回應人的善、共同體的善與政治社群的共同善。宗教基本法的立法與修正，正是檢驗我國憲政秩序是否真能兼顧自由與共同善的一項重要目標。

參考文獻

一、中文與日文資料

《宗教法人法》〔Religious Corporations Act〕。(1951)。日本法律第126號。

《監督寺廟條例》。(1929)。

司法院大法官。(1999)。釋字第490號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2004)。釋字第573號解釋。

宗華教信聯盟。(2017)。宗教基本法草案（送黨團版本）。

最高裁判所。(1977)。昭和52年7月13日判決（津地鎮祭事件），民集，31（4），533。

濱田源治郎。(1978)。宗教法人法。東京：日本評論社。

二、國際文件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1966).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United Nations.

三、英文專書與論著

Aquinas, T. (1947/2012). *Summa theologiae*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 Trans.).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265–1274)

Finnis, J. (2011).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Intyre, A. (1988). *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Smith, S. D. (2010). *The disenchantment of secular discour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tout, J. (2004). *Democracy and tra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ullivan, W. F. (2005). *The impossibility of religious freed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ermeule, A. (2022). *Common good constitutionalism*. Polity Press.

Witte, J., Jr. (2019). *Religion and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experiment* (4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tte, J., Jr., & Green, M. C. (Eds.). (2011). *Religion and human right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立法總說明、草案要點及條文內容暨立法理由如附錄一**

題目七

猶太教的神/哲學一起源與分化

廖金河牧師

(基督教台灣貴格會中心教會牧師)

私立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
宗教法律研究中心
專案報告

猶太教的神/哲學
起源與分化

發表人:廖金河牧師

台大法律系法學組/1985/6
中華福音神學院道學碩士/1994/6
台大國發所碩士在職專班/2019/6

基督教台灣貴格會中心教會
台中市南屯區大聖街 308 號/大業路口
電話:04-2327-3671
0923-155800
Pastor520428@gmail.com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感恩節

大綱

壹、緣起:創世紀

貳、猶太教的神/哲學(起源與分化)

一、宗教的起源:亞當夏娃(第一家庭)的墮落

二、宗教的傳承:祭壇生活

三、宗教的律法:摩西五經(妥拉、塔木德、塔納赫)

四、宗教的迷思:彌賽亞情結(法利賽人)

叁、總結:宗教文化品味

一、猶太教和基督宗教相互對立

二、伊斯蘭教對猶太教和基督宗教發動的衝突戰爭

三、基督宗教對伊斯蘭教發動的十字軍東征

四、宗教聖戰的零和遊戲:溶解對話

五、宗教信仰的柱化動力:文化的品味

附錄:以色列民族和伊斯蘭民族的起源

壹、緣起:創世紀

論到三大一神教(猶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的起源與分化,不得不從文化的向度¹和聖經神學角度,來鳥瞰神在人類文明並宗教歷史中的作為,這實在是再也貼切不過的思考方法,因普世一神教的經典源起來自聖經,包括猶太教所用的希伯來文舊約聖經和基督宗教所共用的希臘文新約聖經,而正典以外其他的次經、旁經和伊斯蘭教所用的可蘭經,也都和聖經息息相關不可須臾;聖經記載了三大一神教的發展脈絡,特別是舊約的創世紀更紀錄了以色列民族和伊斯蘭民族共同祖先的軌跡,原來這兩大宗教的源頭竟來自同一個家庭或家族即信心之父亞伯拉罕(亞伯蘭)的真實生活故事,有機會讓我們在娓娓道來細細品味其文化的內涵。

貳、猶太教的起源與分化

一、宗教的起源:亞當夏娃(第一家庭)的墮落

話說猶太人一向自信為神的選民,高人一等並有民族的優越感,關於猶太人的宗教觀,其實最早起源於先祖亞當吃禁果犯罪墮落後,自覺赤身露體後產生的羞恥罪咎感,於是自行用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遮羞,但這種懺悔自義行為在上帝眼中是無濟於事的,最後,上帝主動找著他們,出面宰殺羔羊獻祭代替亞當贖罪,並作首件皮衣,給亞當和妻子夏娃穿上,以遮蓋他們夫妻赤身露體後產生的羞恥罪咎感,亞當顯然有感受到上帝所作的皮衣,有別於他們自己的裙子,在敬拜意義上是截然不同的²。

二、宗教的傳承:祭壇生活

這樣典型的敬拜獻祭觀念,傳承到其子亞伯的身上,所以,亞伯懂得將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上當作供物,以致蒙上帝的悅納看中,當然亞伯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被其兄弟該隱忌妒惱怒殺害在田間³。亞當明顯失去了一個敬虔的兒子,後來上帝又賜給他們另一個兒子以挪士代替亞伯,亞當喪子傷痛的心,算是得到安慰滿足,從此人才開始求告耶和華上帝的名⁴,亦即猶太人開始祈禱上帝的宗教生活。其實猶太先祖中有代表性的族長,包括挪亞、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皆已養成隨處築壇獻祭敬拜上帝的習慣⁵,這就形成猶太民族的整體宗教行為外觀。

三、宗教的律法:摩西五經(妥拉、塔木德、塔納赫)

¹ 引自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edit by Stuart Hall and bramgieben,p230~234

文化的五種定義:

(1).文化=培育(栽培)土地、動物、農作物
(2).文化=心志上的培養(薰陶),如文明、藝術
(3).文化=普遍(一般)社會發展的進程
(4).文化=一個國家或世代或群體的意義、價值或生活方式
(5).文化=創造意義的實踐;象徵性的實踐

五個定義都不能完全消失或互相取代,即皆是現代性下會使用到。

² 引自舊約聖經創世記第三章第 1~7 節經文

³ 引自舊約聖經創世記第四章第 1~8 節經文

⁴ 引自舊約聖經創世記第四章第 26 節經文

⁵ 引自舊約聖經創世記第八章第 20 節、第二十二章第 1~14 節、第二十六章第 25 節和第三十五章第 7 節經文

猶太人的宗教觀發展,來到偉大神人摩西在西奈山領受啟示後,下山頒布上帝的十誡律法時,算是達到最高潮,也是一神信仰生活的巔峰,上帝的十誡律法界定人面對上帝和面對人的基本規範⁶,是猶太人宗教生活必須奉行的指導律法,也是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和申命記所謂摩西五經(Pentateuch)形成的**妥拉**⁷(Torah)的核心價值,妥拉的字面意思為指引,是猶太人教徒的生活方式,連同先知書和作品集或聖錄⁸,更形成所謂的**塔納赫**(Tanakh),即是最普遍使用的希伯來文所稱**法則**,另外還有猶太人獨有的**塔木德**(Talmud)⁹,這不屬於聖經,但是地位僅次於聖經的經典,起源自於猶太人的口傳傳統,內容為律法、條例和傳統,多達兩百五十萬多字¹⁰,包括「密西拿」、「革馬拉」,這是一旦涉及猶太法律,意即「哈拉卡」的規則定義時,一定會參照的首要文獻¹¹。猶太人為在家落實**妥拉**教育,特別採用一套**親子共學吃飯聊天**的學習方法,即兩人一組互相提問,再一起討論的「哈伯露塔」,這是猶太人獨步全球的教養秘訣,教出個性獨立,卻喜歡主動跟父母親進的孩子¹²。

四、宗教的迷思:彌賽亞情結(法利賽人)

猶太人對律法的持守到極致,即是將那位自己僭越聲稱是舊約所預言的**彌賽亞救世主基督耶穌**,給釘死在十字架上,至今猶太教徒只承認希伯來文舊約聖經,仍然在等候那位**彌賽亞**的榮耀降臨,不承認耶穌的神性¹³,這正是**猶太教與基督宗教的信仰分水嶺**。AD70 年在一次猶太人起義之後,羅馬軍團提多將軍佔領並摧毀猶太人聖殿,千年以來這幾乎是作為猶太人信仰的敬拜中心,此後服務聖殿的祭司撒督該人幾乎消失,猶太教由另一重要派別重組,亦即由文士組成的**法利賽人**負責希伯來聖經的知識、教育和闡釋方面的大師,所謂的「**拉比**」從他們之中於焉產生,這是一群希伯來聖經的專家,專職講解並執行聖經教訓的人,之前就是這群人敵對耶穌的啟示,決定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¹⁴。

參、總結:宗教文化品味

一、猶太教和基督宗教相互對立

整體鳥瞰這三大一神教後發現,猶太教和基督宗教本為同宗,具有民族血緣上密切關聯,然因對耶穌的神性爭議和對**彌賽亞**的預言認知,卻陷入嚴重的相互對立,猶太教在初代教會時期,甚至還曾逼迫過基督宗教。

⁶ 引自舊約聖經出埃及記第二十章第 1~17 節經文

⁷ 賽日·拉菲特 Sergee Lafitte 著,聖經與古蘭經,認識猶太教、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的第一本書,p29~30

⁸ 賽日·拉菲特 Sergee Lafitte 著,聖經與古蘭經,認識猶太教、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的第一本書,p44

⁹ JS KRUGER GJ ALUBBE HC STEYN 著,比較宗教,p178,國立編譯館主譯/出版

¹⁰ 金聲洙著,哈伯露塔-猶太人的教養秘訣,p24,大是文化出版

¹¹ 賽日·拉菲特 Sergee Lafitte 著,聖經與古蘭經,認識猶太教、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的第一本書,p74~76

¹² 金聲洙著,哈伯露塔-猶太人的教養秘訣,p127,大是文化出版

¹³ 賽日·拉菲特 Sergee Lafitte 著,聖經與古蘭經,認識猶太教、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的第一本書,p179

¹⁴ 賽日·拉菲特 Sergee Lafitte 著,聖經與古蘭經,認識猶太教、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的第一本書,p65~66

二、伊斯蘭教對猶太教和基督宗教發動的衝突戰爭

至於伊斯蘭教誕生後,因自認認定為**唯一真正的宗教**,又只認定耶穌僅為如同亞伯拉罕、摩西等級的先知而已,並公開否認基督宗教的**三位一體**,顯然猶太教和基督宗教不容於伊斯蘭教,在伊斯蘭教成立的初期,還曾因此打了一次所謂的**宗教聖戰**;晚近 AD2013 年 4 月~2017 年 7 月 11 日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竄起又敗落的**ISIS 伊斯蘭國**哈里發巴達格迪,即是屬於敘利亞遜尼派所發動的聖戰,而基督徒則是成為電視媒體面前**勒索綁票、撕票斬首示眾的頭號戰犯**,伊拉克北部大城摩蘇爾大城原本是**唯一基督城**,但在 ISIS 伊斯蘭國的蹂躪下,幾乎是屠城收場,雖然伊拉克政府軍順利在 2017 年 7 月 11 日攻克收復,但這西部第二大城早已面目全非,需全面重建,其他被 ISIS 佔領統治過的地區慘烈之狀態,大同小異無可言喻。

三、基督宗教對伊斯蘭教發動的十字軍東征

令世人難忘的另一件教會歷史傷痛,厥屬中古世紀 AD1096~1291 年,羅馬大公教會為協助希臘東正教會收復被穆斯林統治的**聖地耶路撒冷城**,乃由羅馬天教皇授意,由西歐國家聯合發動**五次十字軍東征**,這場宗戰爭長達接近 200 年,十字軍東征對西方基督教世界造成了深遠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影響,如同美國學者朱迪斯·M·本內特在他的著作《歐洲中世紀史》裏寫道,「**十字軍遠征聚合了當時的三大時代熱潮：宗教、戰爭和貪慾**」,真是一語中的,相當貼近這段慘痛的史實,值得我們引以為鑑戒,細膩建構將來具有宗教文化的品味。

四、宗教聖戰的零和遊戲:溶解對話

宗教本質在文化的實踐中,原本應是勸人發願向善,卻因各別一神教的教義信仰主觀排他性,產生非我族類(我群)的他群,以致陷入群體間無法溝通互動對話的**宗教對立**,誠為令人扼腕遺憾!

然而如前所述,AD2016 年 2 月 14 日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與俄羅斯正教主教長基里爾(Patriarch Kiril)終於在古巴相會大和解,倒是在宗教界中,讓宗教聖戰的零和遊戲,露出一絲溶解對話的曙光,是否能進一步促進拉近三大一神教之間的信仰對話,相互作生命的理解?值得吾人高度的關注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接續的**宗教和解行動**,這將是紀念宗教改革 500 年和慶祝以色列復國 70 年最具指標意義的**宗教界美事**,深信這是上帝和世人都以為美的事。

五、宗教信仰的柱化動力:文化的品味

我們理解人類、認識世界,無法迴避**宗教命題**,尤其是數千年來深深影響人類世界的三大一神教信仰:猶太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此三大教剛好都是屬於「**書的宗教**」,均以「**經典**」作為信仰根基,因此,我們必須先認識「**希伯來聖經、希臘文聖經、古蘭經**」。總之,「**宗教是心靈的依託,有時為世俗所用,但也可以反過來引導世界**」¹⁵,這就是我一向所主張的「**宗教信仰在世界發展中的柱化動力,如光和鹽般的真實有文化的品味**」。

¹⁵ 賽日·拉菲特 Sergee Lafitte 著,聖經與古蘭經,認識猶太教、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的第一本書,封面底,

附錄:以色列民族和伊斯蘭民族的起源

一、創世紀十六章(以色列民族和伊斯蘭民族的共同原生家庭亞伯拉罕)

- 1 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撒萊有一個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
- 2 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得孩子：原文是被建立)。」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
- 3 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那時亞伯蘭在迦南已經住了十年。
- 4 亞伯蘭與夏甲同房，夏甲就懷了孕；她見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主母。
- 9 耶和華的使者對她說：「你回到你主母那裏，服在她手下」；
- 10 又說：「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甚至不可勝數」；
- 11 並說：「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就是上帝聽見的意思)，因為耶和華聽見了你的苦情。
- 12 他為人必像野驢。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邊。」
- 13 夏甲就稱那對她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上帝」。因而說：「在這裏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
- 15 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
- 16 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亞伯蘭年八十六歲。

二、創世紀二十一章(以色列民族先祖以撒後代)

- 2 當亞伯拉罕年老的時候，撒拉懷了孕；到上帝所說的日期，就給亞伯拉罕生了一個兒子。
- 3 亞伯拉罕給撒拉所生的兒子起名叫以撒。
- 5 他兒子以撒生的時候，亞伯拉罕年一百歲。
- 12 上帝對亞伯拉罕說：「你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使女憂愁。凡撒拉對你說的話，你都該聽從；因為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 13 至於使女的兒子，我也必使他 的後裔成立一國，因為他是你所生的。
- 17 上帝聽見童子的聲音；上帝的使者從天上呼叫夏甲說：「夏甲，你為何這樣呢？不要害怕，上帝已經聽見童子的聲音了。
- 18 起來！把童子抱在懷中(-懷：原文是手)，我必使他 的後裔成為大國。」

三、創世紀二十五章(亞伯拉罕庶子並伊斯蘭民族先祖以實瑪利後代)

- 1 亞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
- 2 基土拉給他生了心蘭、約珊、米但、米甸、伊施巴，和書亞。
- 5 亞伯拉罕將一切所有的都給了以撒。
- 6 亞伯拉罕把財物分給他庶出的眾子，趁著自己還在世的時候打發他們離開他的兒子以撒，往東方去。
- 12 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是以實瑪利。
- 13 以實瑪利兒子們的名字，按著他們的家譜記在下面。以實瑪利的長子是尼拜

約，又有基達、亞德別、米比衫、14 米施瑪、度瑪、瑪撒、15 哈大、提瑪、伊突、拿非施、基底瑪。

16 這是以實瑪利眾子的名字，照著他們的村莊、營寨，作了十二族的族長。

18 他子孫的住處在他眾弟兄東邊，從哈腓拉直到埃及前的書珥，正在亞述的道路上。

題目八

宗教基本法之探討

劉君毅律師

(合曜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從道學視角談我國宗教基本法

立法的意義、作用與目標

主講人：劉君毅博士

一、前言

政治是一時的，文化則是淵遠流長的。蓬萊仙島的台灣，漢族人口佔逾 97%，主流文化中，民間文化包括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家庭倫理、節日習俗等中華文化的核心要素，概源於清代大陸之移民，而官方文化則與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後，蔣介石積極強化臺灣與中華文化的連結息息相關，包括：官方語言、教育制度均以中華文化體系為藍本，故宮文物典藏成為中華文化藝術史的寶庫，同時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高中生必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等，將中華民國在台灣定位為中華文化的唯一正統繼承者，並據以與中國大陸十年文革浩劫相區別。1996 年以後，中國國民黨完成建國大綱第三階段「還政於民」的總統直選，嗣經三次政黨輪替後，台灣民主化的進程使得台灣社會逐漸形成的獨立思考、文化批評與在地化創新之風氣得以蓬勃發展。雖然綠營當局不斷地在教育、歷史觀和公共空間中強調台灣歷史和本土文化已經形成獨特、多元且充滿生命力的文化體系，但如此並無礙於台灣文化是從既有中華文化的根開出臺灣社會自身的花與葉之客觀歷史事實。

有鑑於西方民主政權移植到中東國家後，因未與當地千年伊斯蘭文化土壤相結合所導致的民主試驗失敗與峰

火戰亂循環,筆者認為,吾人探討此一攸關傳統倫理價值與神道設教,同時廣納多元宗教共善思想的根本大法——宗教基本法,應有必要立足於中華文化獨特而深刻的本源哲學:道的視角,進一步釐清、論證與說明其立法的意義,作用與目標,如此,方能期待我國宗教基本法的立法,能夠滿足:一方面落實國際公約有關宗教人權保障的精神,一方面解決台灣現行宗教法制碎片化導致宗教運行管理治絲愈棼之困境,一方面為全球治理配套所需的全球倫理共識之形成,提供法制化的有益參考。

二、道、自然法、宗教人權保障與宗教基本法:

(一)筆者於2021年10月9日在天主教主辦的跨宗教研討會所發表的「全球善治的未來——理順人為法與自然法的互動關係」一文中,主張:不論東西方宗教,均強調「道」。只是各宗教教化的側重點不同而已。西哲自然法與老子天道觀既然均是造化萬物,一切規則的代表,那麼信仰自然法與天道觀所設立的各大宗教,其教化的宗旨自然不應偏離道。各大宗教雖然對象徵終極實在,化生天地人的道共同尊崇仰止,但就如何體現終極道德進而生發秩序的知識論、本體論、神性論、世界觀、人生觀及社會、文化與歷史觀,則不盡相同。因此,發展道學,即是明確各大宗教共同的發展方向,又能尊重各大宗教分殊的教義義理,並促成跨宗教深度對話,避免宗教戰爭與文明衝突,建構與全球治理配套的全球倫理,最重要的核心課題。

(二)就道學的中、西文化相關概念而言,中華傳統的

「道」和「天人合一」思想與西方「自然法」

(Natural Law) 間,可謂具有精神共鳴的哲學概念。

「道」著重在宇宙的本源和客觀規律,「天人合一」則關注人與宇宙在道德上的和諧統一,「自然法」則強調通過理性推導出法律和道德的客觀基礎與普遍正義,三者分別屬於本體論、倫理學和法律學的範疇。筆者認為此三者亦可以對應天、地、人三個面向的普遍法則,可謂是符合《易經、繫辭傳》中「生生之謂易」所揭示的宇宙運作規律、生命意義和道德實踐的最高指導原則。易言之,中華文化思想中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經所指導的人生智慧,乃在於人類可以透過自強不息的修煉,在永恆的變動中、掌握不變的規律,並將此規律用以促進生命、創造發展,最終完成自我實現,收歸圓滿的最高目標。

(三)承前所述可知,發展道學有益於跨宗教對話進而建構全球倫理,而生生不息之道則是人類修煉天、地、人和合之道的最高指導原則。故而,筆者以為,與聯合國高倡的「永續發展」相契合的「生生不息」之易道,理應可以成為以人為法方式規範自然法系統(宗教)的宗教基本法之上位指導理論,進而檢視此一根本大法所派生的宗教法制規範系統,其具體實踐操作的結果,能否達成前述各大宗教均一致尊崇的天地人和合之共善目標。其中,最重要的判斷標準在「宗教基本法」的立法是否能夠體現「自然法引領人法,人為法呼應自然法」的生生之道(詳後述)。

三、道學視角下，宗教基本法的立法意義：

(一)文明的興衰，盡在歷史無情的考驗與人類自覺的回應之中顯露端倪。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會議頒佈的《世界倫理宣言》對於世界正在經受的苦難、地球生態系統的濫用，各國社會的混亂動盪，以及貧富懸殊導致的悲劇等，發出了沈痛的譴責與建構世界倫理的呼求，宣言認為這種苦難可以避免，只要立基於世界各大宗教共同核心價值的倫理基礎並展開行動，就有可能擺脫普遍的苦難、絕望與混亂，迎來更好的個人和新的全球秩序。然而三十多年來，世界依然烽火連天，文明衝突與政治經濟博弈不斷加劇！作為國際上宗教自由與宗教活動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寶島台灣，除了連續舉辦跨宗教論壇活動以總結各大宗教的共善智慧外，更積極地進一步推動世界首部「宗教基本法」的立法，可以說是針對前述《世界倫理宣言》有關擺脫人類普遍苦難迎來世界新秩序的呼求，展開具體行動的重要回應。

(二)西哲亞裡斯多德認為，人為法是忠實開展、維護和服務於終極道德規範之自然法的國家政治權力實在支撐框架，此一論述與我國《黃帝內經》中「由道生法，以明得失曲直」的觀點如出一轍。亦即「自然法派生出人為法」、「人為法須呼應自然法」、「自然法應引領人為法」，此三者乃「生生之道」的宇宙精神與普遍法則。然而，我國宗教立法，刻正面臨著以下二個主要挑戰：一方面是舊法單薄過時，新法久審不過，各界意見分陳，看法難以統一的困境；另一方面，則是政府超前引進來源於西方解構主義的新文化馬克思主義

所提倡的主觀道德系列人權，對於傳統的宗教文化之客觀道德價值產生強烈衝擊的普遍焦慮。

(三)筆者以為,就我國當前有關立法保障宗教自由與宗教人權所面臨的上述二大挑戰而言，從道學（或自然法）的視角而言，宗教基本法的立法應該具有以下幾項重要意義：

1. 有利於道學或自然法的本體論應對新文化馬克思主義的解放論之開展。
2. 針對政教分離背景下,宗教法制碎片化,宗教受政治管制而未能反哺政治，悖離道生法原理的倒錯結構加以調和轉化。
3. 落實國際公約有關宗教人權保障的精神,同時彌補中華傳統權利意識不足的缺憾。
4. 將生生不息的中西自然法共識,作為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理念的哲學基礎，掀起人類共同追求天地人三才和合的第二次啓蒙思潮。
5. 形塑「和而不同」的開放、多元與自律的態度,面對人類歷史的挑戰與回應之間,打造出一個讓宗教蓬勃發展俾利於人類共同價值的形成之法制環境。

四、道學視角下,有關具代表性的宗教基本法的草案之立法特徵及作用評析：

針對《宗教基本法》的幾個代表性草案觀之：

(一)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領銜提案的《宗教基本法》草案，對於保障人民宗教信仰自由部分，明確定義了宗教自由保障之範圍及內容，確立了國家宗教平等中立及寬容之原則，聖俗分離原則（國家不得介入宗教教務），以及宗教自由限制的具體要求等；對於維護宗教團體之特殊性及自主性部分，則明確了宗教自主權之內涵，就業歧視之例外，宗教財務自主原則，宗教資訊處理的守密義務，以及宗教育才自主權等；另對於協助人民精神領域之自我實現，充實多元文化部分，則明確要求將宗教知識教育納入國民基本教育，以及有限電視和公共電視應提供社會宗教教育之頻道播送時段等。

(二) 而另一中華人權協會提案的《宗教基本法》草案除了宗教自由、平等、自主權及宗教資訊之保密義務與前述草案內容相近外，特別突出制定《宗教基本法》作為各級政府據以保障宗教自由、增進宗教生活、兼以規範政教關係及適用各宗教團體運行之上位法的定位，期能建構善意良性及務實可行之規範架構，俾利各級政府、宗教團體及全體國民攜手保障宗教人權，完善宗教治理，進而達成公私協力、教俗和諧、官民共贏之正向循環目標。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國家義務**」的提出，用以落實《經濟、文化與社會權利國際公約》關於文化權利保障之最低核心義務。其內容包括：營造教俗友善和諧、政教互相尊重的環境；鼓勵教俗間對話交流及國際合作；中央政府應該每二年召開全國宗教會

議、行政院應該定期召開宗教治理會報、各級政府於制定法律、政策時應提出宗教自由影響評估報告，地方政府每四年召開地方宗教治理與發展會議、中央主管機關每四年應提出宗教自由白皮書、國家洽簽國際條約及參與國際組織時應評估有否影響宗教自由及多元發展之虞始得締結，以及宗教研究預算寬列和調查統計建立資料庫等。此外，有關宗教團體得興辦公益事業與政府應協助宗教團體取得宗教用地等，亦予以明文規定。

(二)有關宗華教信聯盟的宗基法草案,筆者提出以下幾點供提案人參考:

1. 第 16 條有關「宗教中立原則」，內容為何限定是「私立學校」而不包含公立學校?因德國基本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宗教教育為公立學校課程的一部分」。
2. 第 17 條（宗教自主）關於「各宗教基於固有之傳統，國家不得強制要求宗教團體遵守民主與公開之原則」，惟該條並未言明其監督、管理適用宗教團體內部之規範，倘無規範時，應如何處理？
3. 第 15 條明定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之機關不得禁止燒香、金銀紙錢及燃放炮竹、蠟燭等宗教行為，此條是符合民間信仰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特別規定，殊值贊同！
4. 第 29 條(耕地取得)搭配第 2 條(宗教團體定義)，在第 2 條未明定宗教教義不得有悖於生生不息之道學

或天人合一之自然性思想,以及目前政府對於宗教之認定採開放政策態度的情形下,是否會遭有心人士以登記宗教團體之名義行快速取得耕地圖利自己之實,似宜一併斟酌。

(四)至於國民黨版宗基法草案,第1條(立法目的)並未提及落實政教互助之精神,亦未清楚說明為何宗基法是為「充實多元文化」之目的而制定。概多元文化原本是基於針對弱勢者之權益保障,所為尊重差異、欣賞多元,追求實質平等與社會正義之目的而存在,但宗教團體並非屬傳統意義上之弱勢族羣,如:原住民族、身障人士等,則宗基法之立法目的說明是為充實多元文化而制定,其理由在邏輯論證上似有牽強跳躍之嫌。第2條(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特別強調國家應保障人民在內國或國際,與個人或團體建立、保持宗教聯繫之自由,將保障範圍擴及國際層面,殊值贊同!

(五)陳清秀教授撰「從天人合一思想,探討宗教基本法之必要性與立法方向」一文中,有許多突出的見解亮點,筆者認為有必要將其觀點逐一轉為宗基法的條文內容,例如:政教合作原則、宗教文化保存原則,宗教與公共事務合作機制,以及不妨害政府在有正當理由下,發布新興宗教可能危害社會之警訊,包括:依世界性標準進行評價,與基本權享有者公開進行宗教和世界觀的爭辯等。

五、道學視角下，等對於宗教基本法立法可能達成的目標之期許：

宗教基本法的立法不僅是建構台灣宗教法制的根本大法，亦是回應世界倫理宣言呼求凝聚各大宗教眾善智慧，在全世界範圍內首開先河之立法行動，更是為全面解決台灣立法滯後造成東西方宗教面臨的各種適法需求，進一步打造政教互助環境，據以應對全球蔓延的倫理拔根之新馬解放運動的重要護國定海神針。故而，筆者於肯定宗基法各種代表性的版本對於落實憲法及國際公約有關宗教權益之保障外，於本文尚提出從道學視角而言，對於宗基法立法可能達成以下幾點目標之期許：

1. 宗基法的內容應為目前各大宗教實際運行的主要問題及適法需求提供有效解決問題的方向和邊界。
2. 宗基法的內容，宜有體現自然法引領人為法的具體規定，例如：宗教界的代表機構應有定期公開發表對於台灣社會治理與文化多元整合的建言和要求當前政府檢討修正的權利，以及不定期舉辦就家庭、學校、社會道德教育之立法內容及方向重新檢討之論壇及跨界座談之義務。
3. 宜將道學或自然法與時俱進的觀點灌注在宗基法的條文之中，例如：宗教界可以公開的方式與政府或基本權所有人對於新興人權是否與事物的本質相一致？是否違反人類本性的三個層次原則？進行辯論，使各大宗教可以合法且積極地守護數千年來人類基本善的價值傳統之地位得以確保。

4. 宗教基本法的立法設計，宜考量將有利於跨宗教間共識的形成，各宗教內部集中與分散共識的形成，以及宗教團體與政府及民代間政教互助共識的形成等具有生態和諧指標意義的重大事項，納入常設機制的規範內容。
5. 可以考慮將生生不息或永續發展的理念作為促成跨宗教共同行動的共善源頭價值，當各宗教存在多元意見而無法透過集中對話形成共識時，適時發揮理論的指導作用，進而調和轉化各方不同意見，順利達成「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理想目標

參考文獻

1. 劉君毅撰，「全球善治的未來——理順人為法與自然法的互動關係」。2021 年 10 月 9 日天主教舉辦「道，宗教倫理與宗教人權」論文集第 19 至 35 頁。
2. 劉君毅撰，「談宗教立法設計對宗教組織發展和政教互動關係的影響」，於 2023 年在佛教舉辦的宗教法律論壇中發表。
3. 劉君毅撰，「從自然法的立場談立法保障宗教人權的意義」，於 2024 年 11 月 5 日在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與宗教研究中心等單位主辦的法律與宗教研討會中發表。
4. 宗教基本法草案，宗華教信聯盟，2017 年 11 月 28 日聯合版本。
5. 陳清秀撰，「從天人合一思想，探討宗教基本法之必要性與立法方向」，2025 年 11 月。

題目九

從對教會奉獻之財產歸屬，論《宗教基本法》之
財務規制

蔡志方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名譽教授、兼任教授）

從對教會奉獻之財產歸屬，論《宗教基本法》之財務規制

(On the Financial Regulation of the Basic Law on Reli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 Donated to the Church; Zur Finanzregelung des Religionsgrundgesetzes aus der Perspektive des Eigentums an kirchlichen Schenkungen)

蔡志方

(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

(Prof. Emeritus Dr. Peterus Chih-Fang Tsai)

— 論次 —

| | |
|---|------------------------------------|
| 壹 | 對教會之奉獻，其財產權屬於神或人？—問題之提出/2 |
| 貳 | 天主教徒於彌撒儀式中之奉獻，其財產權之歸屬/2 |
| 一 | “藉天主之物，奉獻於天主”—財產權歸屬於天主/3 |
| 二 | 教徒將辛勤所得，奉獻於天主—財產權歸屬於天主/3 |
| 參 | 天主教徒於彌撒儀式外之奉獻，其財產權之歸屬/4 |
| 一 | 堂區教友「自養關係」下之財產權歸屬/4 |
| 二 | 堂區教友「彌撒外奉獻關係」下之財產權歸屬/4 |
| 三 | 教友與神職人員間「供養關係」下之財產權歸屬/5 |
| 四 | 教友集資興建與維修教堂下之財產權歸屬/5 |
| 五 | 教友集資添購教堂聖物、聖書等之財產權歸屬/5 |
| 六 | 教友集資辦理共餐下之財產權歸屬/6 |
| 肆 | 天主教“教堂稅”之財產權歸屬/6 |
| 一 | 財產權歸屬於天主/11 |
| 二 | 財產權歸屬於教區與教堂/11 |
| 伍 | 非天主教徒“隨喜捐獻”之財產權歸屬/12 |
| 一 | 歸屬於天主？/12 |
| 二 | 歸屬於教會？/12 |
| 三 | 歸屬於教堂？/12 |
| 陸 | 天主教救災解難勸募之財產權歸屬/13 |
| 一 | 歸屬於天主，但限於救災解難使用？/13 |
| 二 | 歸屬於教會，但限於救災解難使用？/13 |
| 三 | 歸屬於教堂，但限於救災解難使用？/14 |
| 柒 | 天主教會之財務法制與《宗教基本法》財務規制之關係/15 |
| 一 | 天主教會之財務法制依據《天主教法典》規定，不適用《宗教基本法》/15 |
| 二 | 天主教會之財務法制，仍應適用《宗教基本法》？/17 |
| 捌 | 結論/18 |

壹 對教會之奉獻，其財產權屬於神或人？—問題之提出

《宗教基本法》草案採取“宗教財務自主原則”，於第 20 條規定：「**①**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所有之財產及法物，其管理、使用、收益或處分，悉依章程定之；無章程者，依教制或傳統定之。**②**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收益，應用於章程所定目的任務支出，不得為盈餘分配及為他人保證；違反者，其行為無效。**③**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處分全部固有不動產時，應事先報請主管機關備案。**④**宗教師死亡時，其遺產之歸屬，依其遺囑定之，民法有關特留分之規定，不適用之。」

於茲有疑問者，乃諸如天主教會與基督教會，甚至是其他宗教之寺廟道觀等，接受信徒與非信徒之奉獻，其財產權究歸屬於神，還是人(包括宗教團體)？¹對於此等捐獻財產之管理，是否應納入/應如何納入《宗教基本法》之財務規範？此本文所以撰述之基本動機也。以下擬以天主教會接受之奉獻，作為探討之核心，至於其他宗教似亦可類比處理之，合先敘明。

貳 天主教徒於彌撒儀式中之奉獻，其財產權之歸屬

根據《天主教主日感恩祭典》的說明，彌撒的結構除“進堂式”的“準備禮”與“聖道禮儀”外，“聖祭禮儀”係根據主耶穌基督於“最後晚餐”時所留下的典範與訓誨，後世教徒為紀念主耶穌基督的神聖犧牲，而形成的極為隆重之儀式。其中除“領聖體禮”外，準備祭品(餅與酒)後之“奉獻”，除集體吟唱“獻禮經”之同時，並將當日參與彌撒信眾之“奉獻”(通常為現金)，經由主持彌撒之神父，呈獻予仁慈與全能的天父，並誦唸感恩經。通常參與彌撒的信眾(教徒)，並無硬性規定奉獻之金額，從一百元～數千元者，頗為常見，但一次即奉獻數萬元或黃金、乳香者，則較為少見。由於參與彌撒信徒於“聖祭禮儀”之“奉獻”對象，是天主，而非經辦理財團法人登記之教堂，更非主持彌撒之神父個人。因此，當然無“捐獻收據”，亦不可能據以抵免綜合所得稅。

天主教中之“奉獻”，無論是聖祭禮儀中之“奉獻”、“奉獻箱”中之“隨喜奉獻”、信徒之“專案奉獻”與信徒之“長年奉獻”，對於天主教為推行教義、共融信徒與教會，甚至是維持基本的教會運作，均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其中，特別是聖祭禮儀中之“奉獻”，不僅是提供教會財務的穩定性來源，同時更是穩定教徒信仰的核

¹ 六十多年前，臺灣曾發生媽祖廟產出租，而承租人違約，致鬧上法院的趣事。承審法官開庭時點呼原告“林默娘”，律師甲以其係“代理人”而起立應訊，而法官請其提示“委任狀”，發現原告“林默娘”並無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與設籍地址之記載，且無親筆簽名或蓋章用印，乃命律師甲於二週內補正，再擇期開庭。其後，律師甲當然無法補正！由於類此情形，並不在少數，為解決此種困境，稍具規模之寺廟，乃紛紛根據當時之民法規定，辦理財團法人登記，組成董事會，選舉代表人與管理人，才根本解決上述窘境。

心要項。至於“專案奉獻”與信徒之“長年奉獻”，其單筆金額固然可能甚高，但是，畢竟不是常態與多數，可謂“可遇而不可求”的項目而已。

一 “藉天主之物，奉獻於天主”—財產權歸屬於天主

上述天主教徒於彌撒儀式中之奉獻，其本質為何？在神學上，似乎甚有深入探討之必要：

《新約聖經》瑪竇福音第4章第1-11節記載：「¹那時，耶穌被聖神領往曠野，為受魔鬼的試探。²他四十天四十夜禁食，後來就餓了。³試探者就前來對他說：『你若是天主子，就命這些石頭變成餅罷！』⁴他回答說：『經上記載：『人生活不只靠餅，而也靠天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⁵那時，魔鬼引他到了聖城，把他立在殿頂上，⁶對他說：『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經上記載：『他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們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⁷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載：『你不可試探上主，你的天主！』」⁸魔鬼又把他帶到一座極高的山上，將世上的一切國度及其榮華指給他看，⁹對他說：『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這一切交給你。』¹⁰那時，耶穌就對他說：『去罷！撒殫！因為經上記載：『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惟獨事奉他。』」¹¹於是魔鬼離開了他，就有天使前來伺候他。』²

上述這一段經書的記載，其意義與啟示，歷代神學家已經有所分析與闡釋，毋庸本文在此贅述。本文於此擬特別指陳者，乃上述第三個試探中，魔鬼把耶穌帶到一座極高的山上，將世上的一切國度及其榮華指給他看，對他說：『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這一切交給你。』其中所謂的“世上的一切國度及其榮華”與“我必把這一切交給你”，或許當時，甚至是現在“世上的一切國度及其榮華”，都受到“魔鬼”的支配。但是，即使天主(神)的國，尚未降臨人間，可是“世上的一切國度及其榮華(物質與權位)”，無一不是天主所創造的！因此，我們“藉天主之物，而奉獻於天主”，其財產權歸屬於天主，乃天經地義之事！

二 教徒將辛勤所得，奉獻於天主—財產權歸屬於天主

其次，根據天主教《主日感恩祭典》(全)—彌撒常用經文第6頁～第7頁之“聖祭禮儀”，有如下之記載：「主祭：上主，萬有的天主，**您賜給我們食糧**，我們

² 類似記載，另參見路加福音第4章第1-13節：「¹耶穌充滿聖神，由約但河回來，就被聖神引到荒野裏去了，²四十天的工夫受魔鬼試探；他在那日期內什麼也沒有吃，過了那日期就餓了。³魔鬼對他說：『你若是天主子，命這塊石頭變成餅罷！』⁴耶穌回答說：『經上記載：『人生活不只靠餅。』」⁵魔鬼引他到高處，頃刻間把普世萬國指給他看，⁶並對他說：『這一切權勢及其榮華，我都要給你，因為全交給我；我願意把它給誰，就給誰。』⁷所以，你若是朝拜我，這一切都是你的。』⁸耶穌回答說：『經上記載：『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惟獨奉侍他。』」⁹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把他放在聖殿頂上，向他說：『你若是天主子，從這裏跳下去罷！』¹⁰因為經上記載：『他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保護你，』¹¹他們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¹²耶穌回答說：『經上說：『不可試探上主，你的天主。』」¹³魔鬼用盡了各種試探後，就離開了他，再等時機。』

讚美您；我們將大地和人力的產物，呈獻給您，使成為我們的生命之糧。信眾：願天主永受讚美。主祭：上主，萬有的天主，您賜給我們飲品，我們讚美您；我們將這葡萄酒，呈獻給您，使成為我們的精神飲品。信眾：願天主永受讚美。主祭默唸：主，我們懷著謙遜和痛悔的心情，今天在您面前，舉行祭祀，求您悅納。主祭向祭品及祭台奉香。(洗手)主祭默唸：上主，求您洗淨我的罪污，滌除我的愆尤。(請信眾祈禱全體起立)主祭：各位兄弟姊妹，請你們祈禱，望全能的天主聖父，收納我和你們共同奉獻的聖祭。信眾：望上主從您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為讚美並光榮祂的聖名，也為我們和祂整個聖教會的益處。」

準上，教徒將辛勤所得，奉獻於天主，則其財產權自應歸屬於天主，亦應與天主教之教理無違，甚至深相契合！

附帶一提者，乃《天主教法典》第 1308 條規定：「❶減少彌撒責任，僅因正當及需要原因始可行，此權由宗座保留，但應遵守下列規定。❷如在基金創立書上明白指出，教會教長得因收益微薄而減少彌撒責任。❸教區主教有權因收益短缺，幾時原因持續，如無人有提高獻儀之責任，或無法有效使人提高時，得將遺贈或任何方式所設的彌撒，依教區內現行的獻儀標準，減少彌撒數目。❹如教會團體由於收益少，以適當達成本團體的目的時，教區主教亦有權減少該教會團體的彌撒責任。❺宗座立案之聖職修會的總會長，亦享有上述第 3 項及第 4 項付與之權力。」

參 天主教徒於彌撒儀式外之奉獻，其財產權之歸屬

《天主教法典》第 1261 條規定：「❶基督信徒得將現世財物作捐獻，以支援教會。❷教區主教應勸告信徒盡第 222 條第 1 項所規定的責任，並應以適當的方法督促其盡此責任。」第 1262 條規定：「基督信徒應依主教團公佈的法則，以捐助方式資助教會。」

再其次，如果天主教徒於彌撒儀式外，奉獻財物給教會、教堂、神職人員或應教會之號召，捐資濟貧解難，則其財產權之歸屬又如何？

一 堂區教友「自養關係」下之財產權歸屬

臺灣自從十大建設完成後，經濟逐漸起飛，擺脫過去的貧窮，天主教會梵諦岡與其他教會國家，亦相繼停止經濟支援臺灣教區，而臺灣各教區之教堂堂區教友，也就主動承擔起“自養”的責任，以維繫堂區所有需要，甚至如仍有剩餘，還可上繳教區、總教區公署。雖然在堂區教友「自養關係」下，堂區之財產權仍歸屬教會，而不成立類似我國《民法》上之“合夥”，當然亦不適用《民法》第 668 條規定：「各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共同共有。」

二 堂區教友「彌撒外奉獻關係」下之財產權歸屬

在虔誠的天主教教友中(如我尊敬的姑丈 黃添遜先生)，亦不乏對教會作“長年”、甚至是“終生的奉獻”。其座右銘，乃是主 耶穌基督所言：「你們不要在地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在地上有蟲蛀，有銹蝕，在地上也有賊挖洞偷竊；但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那裏沒有蟲蛀，沒有銹蝕，那裏也沒有賊挖洞偷竊。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必在那裏。」³

證諸當下，財富的確容易惹來詐欺、竊盜、強盜，甚至是殺身之禍！因此，以其腰纏萬貫、終生汲汲營營於累積億萬財富，希望留給子孫繼承、供其揮霍⁴，還不如將之用於慈善、將它轉換為“德財”與“福財”，而存放於天上，由聖神與天使經營的“天堂銀行”來得妥當！因為那裏利息豐厚、不會突然降息、不會倒閉、更不會被盜領！這也是我尊敬的姑丈 黃添遜先生，留給我的最佳遺產！

基本上，堂區教友於「彌撒外奉獻關係」下所為之奉獻，必須依照其意願，而決定其奉獻之財產權歸屬。如其屬意奉獻給 天主(神)者，其財產權歸於 天主(神)；奉獻給教堂者，其財產權歸於教堂；奉獻給神職人員者，其財產權歸於神職人員，但神職人員應避免接受過多之“奉獻”，以免失去“神德”與“神功”！

三 教友與神職人員間「供養關係」下之財產權歸屬

如教友與神職人員間成立「供養關係」，則供養之財產權，當然歸屬於該神職人員。然如上所述，於此種「供養關係」下，神職人員自應以維持其基本物質生活所需為度。否則，如刻意接受奢華的錦衣玉食、勞斯萊斯或賓士，甚至是億萬 Bugatti 豪車代步，超越神職人員擁有“神德”與“神功”所必要的範圍，則值得深加警惕！蓋此時教友已經被撒殫所控制，以人世間的奢華誘惑神職人員，讓神職人員心靈離開了 天主(神)，而墮落至撒殫的羅網中，卻毫不自知，可謂悲矣！

四 教友集資興建與維修教堂下之財產權歸屬

如教友集資興建與維修教堂，並不成立我國《民法》上之“合夥”，當然亦不適用《民法》第 668 條規定：「各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共同共有。」其財產權當然歸屬於教會！不過，在天主教會中，教友並不能未經同意，私自集資興建教堂，即使維修教堂亦須經過教區公署同意！

五 教友集資添購教堂聖物、聖書等之財產權歸屬

如教堂之聖物或聖書，過於老舊或因天災(如火災或水災，甚至蟲害)等原因受損，亦不得隨意當作一般“事業或家庭廢棄物”拋棄，而必須依規定審慎處理。如有必要，而教友樂意集資，經教區公署同意後為教堂添購聖物、聖書等，則其財產權自亦應歸屬於該教堂。

³ 見《新約聖經》—瑪竇福音第 6 章第 19-21 節。

⁴ 當前不少“躺平族”與“好吃懶做者”講到呷，爭頭加卡額；講到做，全身軟縮縮”的年輕人，只要聽到長輩老人家有錢，就千方百計地騙、偷與搶，讓老人家冷不提防，以致於生不如死！

六 教友集資辦理共餐下之財產權歸屬

當前的天主教會，甚至是基督教會，通常會於主日彌撒(禮拜)之後，舉行“共餐”，以紀念主耶穌基督受難前的“最後晚餐”精神，甚至是初期教會的“共產制度”。此種“共餐制度”所需資金，通常均係由固定參與教堂主日彌撒(禮拜)的主內弟兄姊妹們，共同集資採買所需之餐點與飲料、水果等。因此，教友集資辦理共餐下之財產權歸屬，即使不適用諸如我國《民法》第 668 條規定：「各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共同共有。」亦應適用《新約聖經》所記載的初期教會傳統，以為準據。

肆 天主教“教堂稅”之財產權歸屬

天主教得以對其信徒與教會法人等，課徵“宗教稅”或稱“教會稅”與“教堂稅”。此種課稅高權(Steuerhoheit)或財政高權(Finanzhoheit)，原本屬於其信仰上之“固有權能”，並無須世俗國家之法律(特別是憲法)的承認或授權。《天主教法典》第 1260 條即規定：「教會依**天賦權利**，得向基督信徒**徵收**為達成本身目的所需要的一切。」

此外，天主教中之“宗教稅”的明文規定，尚見於《天主教法典》第 264 條規定：「**①**為籌募修院的費用，除第 1266 條所指的獻金外，主教得在教區內制定捐稅。**②**應負擔修院的捐稅者，為一切教會法人連設立在教區內的私立法人在內，但賴救濟維生者，或為推動教會的公益而設的學習或教學的團體不在此限；此類捐稅應該是一般性的，配合負擔人的收入及按修院的需要而定。」

第 1263 條又規定：「教區主教為教區需要，於徵詢經濟委員會及司鐸諮議會後，有權向隸屬自己管轄的公法人，徵收配合收入的小量稅；而對其他自然人和私法人，只可在嚴重緊急情況下並在相同的條件下，**課少量的稅**，但有個別法規和習慣給與主教更優惠的權利者不在此限。」

除上述明文規定外，在傳統上，尚有所謂的“什一奉獻”，甚至成為嗣後早期西方國家的“什一稅制”之由來。關於“什一奉獻”制度之起源，見諸於《舊約聖經》一出埃及記、戶籍紀、申命紀與希伯來書等。

首先，《舊約聖經》一出埃及記第 34 章第 18-26 節記載：「¹⁸你要按照我所吩咐的，在阿彼布月所定的日期內，守無酵節，七天之久吃無酵餅，因為在阿彼布月你出離了埃及。¹⁹凡初開母胎的都應歸於我；你的牲畜中，凡首生的公牛羊，都應歸於我。²⁰首生的驢，應用羊贖回；若不贖回，應打斷牠的頸項。你的子孫中，凡是長子，你應贖回。空着手的，不可到我台前來。²¹你六天作工，但第七天應安息，連在耕種收穫的時期，也要安息。²²在收穫初熟麥子時，應過七七節；在年尾過收藏節。²³凡你所有的男子，一年三次應去朝拜主，上主，以色列的天主。²⁴幾時我從你面前趕走異民，擴展了你的疆域之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拜上主你天主的時候，沒有人敢圖謀你的國土。²⁵不可同酵麵一起給我祭獻犧牲的血；

逾越節的犧牲，不可留到早晨。²⁶ 你田中最上等的初熟之果，應獻到上主你的天主的殿中。不可煮羊羔在其母奶之中。」

其次，《舊約聖經》—戶籍紀第 18 章第 1-32 節記載：「¹ 上主對亞郎說：『你和你的兒子，連你的家族，應與你共同對聖所負責；你和你的兒子，應對司祭職負責。² 你也要令你家族的眾兄弟，——肋未支派，與你一同前來；他們應協助你，服事你；當你和你的兒子在約幕前供職時，³ 他們應照料你和全帳幕的事務，但不應接近聖所的器皿和祭壇，不然他們該死，連你們也該死。⁴ 他們協助你照料會幕的事務，作會幕的各種勞役，俗人不可接近。⁵ 你們應照料聖所和祭壇的事務，免得義怒降在以色列子民身上。⁶ 是我由以色列子民中，選拔了你們的兄弟肋未人，交給你們當作獻於上主的人，為給會幕服務。⁷ 至於你和你的兒子，在有關祭壇和帷幔以內的一切事上，應留心盡你們司祭的職務；你們應獻身於我賜予你們的司祭職務。俗人若敢近前，必處死刑。』⁸ 上主又對亞郎說：『看，我託你照管獻於我的獻儀，即凡以色列子民祝聖於我的，我都賜給你和你的子孫，作為應得之物，這是永久的權利。⁹ 火祭中所剩餘的至聖之物都屬於你；凡他們獻於我的素祭，或贖罪祭，或贖過祭的祭品，都是至聖之物，都應屬於你和你的兒子。¹⁰ 你們應在至聖之處分食，凡是男子都可以吃；你應視為聖物。¹¹ 此外歸於你的尚有：凡以色列子民行搖禮所獻的祭品，我都賜給你，你的兒子和與你尚在一起的女兒：這是永久的權利；凡你家內潔淨的人都可以吃。¹² 凡最好的油、酒和五穀，作初熟之物獻給上主的，我都賜給你。¹³ 凡他們地中的一切出產，作初熟之物獻給上主的，都屬於你；凡你家內潔淨的人都可以吃。¹⁴ 凡以色列中照禁物法所獻之物，都屬於你。¹⁵ 凡動物中應獻於上主的開胎的首生者，不論是人是獸，都屬於你；但你應叫人贖回首生的人，和首生的不潔之獸。¹⁶ 關於贖價，為一月以上的，你應叫人依所定的估價，照聖所的衡量，交五『協刻耳』銀子。（每一「協刻耳」為二十「革辣」）。¹⁷ 但是牛或綿羊或山羊的首生者，卻不可令人贖回，因為是聖的；你應將牠們的血灑在祭壇上，將脂肪焚化成煙，作為悅樂上主馨香的火祭。¹⁸ 至於牛羊的肉卻歸於你，就如搖過的胸脯和右腿歸於你一樣。¹⁹ 凡是以色列子民奉獻與上主為聖物的祭品，我都給你和你的兒子，以及同你尚在一起的女兒：這是永久的權利，這是在上主前，與你的後裔所訂立的永久不變的鹽約。』²⁰ 上主對亞郎說：『在你們的土地中，你不可有產業，在他們當中，也不得有屬於你的份子；在以色列子民中，我是你的份子，你的產業。²¹ 至於肋未的子孫，我將以色列人的什一之物給他們做產業：這是為酬報他們在會幕內所服的勞役。²² 免得以色列子民接近會幕，負罪死亡；²³ 因此只有肋未人准在會幕內服役，應負全責。這為你們世世代代是一條永久的條例：肋未人在以色列子民中不應佔有產業，²⁴ 因為我把以色列子民獻給上主的什一獻儀，給了肋未人作為產業；所以我對他們說：他們在以色列子民中，不應佔有產業。』²⁵ 上主訓示梅瑟說：²⁶『你告訴肋未人說：幾時你們由以色列子民中，取得了我賜予你們作為產業的什一之物，你們應由這什一之物中，取十分之一獻給上主，²⁷ 這算是你們的獻儀，好似禾場上的新糧和榨房中的新酒。²⁸ 這樣你們也由以色列子民所收的

一切什一之物中，取一份獻給上主作獻儀，應將這獻與上主的獻儀，交給亞郎大司祭。²⁹ 由你們所得的一切獻儀中，應取出獻於上主的一切獻儀，且應取出最好的來，獻作應祝聖的一份。³⁰ 你再對他們說：幾時你們奉獻了其中最好的一份，其餘的為你們肋未人就如禾場上和榨房內的出品，³¹ 你們和你們的家人，可在任何地方分食，因為這是你們在會幕內服役所得的報酬。³² 如果你們奉獻了其中最好的一份，就不致於有罪；你們不應褻瀆以色列子民的祝聖之物，免遭死亡。』」

再其次，《舊約聖經》—申命紀第 14 章第 22-29 節記載：「²² 你每年在田地內播種所得的出產，應繳納十分之一。²³ 你應在上主選定為立自己名號的地方，於上主你的天主面前，吃那五穀、酒、油的十分之一，及你的頭胎牛羊，好使你能學習着常敬畏上主你的天主。²⁴ 如果為你路途太遠，你不能把十分之一之物運去，因為上主你的天主選定為立自己名號的地方離你太遠，那麼若上主你的天主祝福了你，²⁵ 你可以把物品換成銀錢，手中帶着銀錢，往上主你的天主所選的地方去，²⁶ 在那裏可隨意用銀錢買牛羊、清酒和濃酒，以及你願意要的，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吃喝，與你的家屬一同歡樂；²⁷ 但在你城內的肋未人，你不可忘記，因為他在他中間沒有分得產業。²⁸ 每過三年，你應取出全部出產的十分之一，儲藏在你城鎮內，²⁹ 那沒有與你分得產業的肋未人，和在你城鎮內的外方人、孤兒、寡婦都可來吃喝，得享飽飫，好叫上主你的天主，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業上祝福你。」、第 18 章第 1-8 節：「¹ 肋未人司祭即全肋未支派，在以色列中沒有分子和產業，他們靠獻與上主的火祭祭品，和他們應得的一分維持生活。² 他在兄弟中間沒有產業；照上主向他所說的，上主自己要作他們的產業。³ 這是司祭由人民應得的一份，就是宰殺牛羊作祭獻的人，應將前腿、兩腮和胃臟給司祭；⁴ 初收的五穀、酒、油和初剪的羊毛，亦應給他，⁵ 因為上主你的天主由各支派中揀選了他，叫他和他的子孫，時時以上主的名義服役供職。⁶ 如果一個住在以色列境內任何城鎮的肋未人，離開了本地，一心一意地要到上主所選的地方去，⁷ 他可因上主的名義供職，如同在那裏侍立於上主面前的肋未弟兄們一樣，⁸ 分享同樣的口糧，不必變賣祖產。」、第 26 章第 12-15 節：「¹² 在第三年，即獻什一之年，當你把你一切出產十分之一，完全取出，分給肋未人、外方人、孤兒和寡婦，並使他們在你的城鎮中吃飽之後，¹³ 你應到上主你的天主面前說：『我由我家中完全交出了這祝聖的一份，分給了肋未人、外方人、孤兒和寡婦，全照你吩咐我的命令；我沒有違犯你的命令，也沒有忽略。¹⁴ 這些聖物，在我居喪時，我沒有取食；在不潔中，我沒有交出，更沒有獻給死人；我聽從了上主我的天主的話，全照你吩咐我的一切履行了。¹⁵ 願你由你神聖的住所，由天上俯視，祝福你的人民以色列，和你賜給我們的土地，即你向我們祖先所誓許的那流奶流蜜的地方。』」

最後，《舊約聖經》—希伯來書第 7 章第 1-10 節亦記載：「¹ 原來這默基瑟德是撒冷王，是至高者天主的司祭；當亞巴郎打敗眾王回來時，他來迎接，且祝福了他。² 亞巴郎就由所有的一切之中，拿出十分之一分給了他；他的名字默基瑟德，第一可稱作「正義之王」，他也可稱作「撒冷之王」，就是「和平之王」之

意。³ 他無父，無母，無族譜，生無始，壽無終：他好像天主子，永久身為司祭。⁴ 你們要想想：這人是多麼偉大，連聖祖亞巴郎也由上等的戰利品中，取了十分之一獻給了他！⁵ 那些由肋未子孫中領受司祭職的，固然有命向人民，按法律徵收什一之物，即向他們的弟兄，雖然都是出自亞巴郎的腰中；⁶ 可是不屬於他們世系的那一位，卻收了亞巴郎的什一之物，並祝福了那蒙受恩許的。⁷ 從來，在下的受在上的祝福，這是無人可反對的。⁸ 在這裏那些領受什一之物的，是有死的人；但在那裏領受什一之物的，卻是一位證明了常活着的人。⁹ 並且可說：連那領受什一之物的肋未，也藉着亞巴郎交納了什一之物，¹⁰ 因為當默基瑟德迎接亞巴郎的時候，肋未還在祖先的腰中。」⁵

關於“什一奉獻”的用途，首先，《舊約聖經》一戶籍紀第 1 章第 47-54 節記載：「⁴⁷ 但是肋未人沒有依照自己的宗派同他們一起登記，⁴⁸ 因為上主曾訓示梅瑟說：⁴⁹『只有肋未支派，不要登記，不要將他們列在以色列子民內。⁵⁰ 你應派肋未人管理會幕和其中一切器皿，並一切附屬物。他們要搬運會幕和其中一切器皿，在會幕中服務，住在會幕的四周。⁵¹ 會幕要遷移時，肋未人拆卸；會幕要搭紮時，肋未人張搭；若俗人走近，應處死刑。⁵² 以色列子民應分隊紮營，各歸本旗。⁵³ 但肋未人應在會幕四周紮營，免得以色列子民會眾觸犯天怒；肋未人應負責看守會幕。』⁵⁴ 以色列子民都照辦了；上主怎樣吩咐了梅瑟，他們就怎樣辦了。」、第 4 章第 1-33 節：「¹ 以色列！現在你要聽我教訓你們的法令和規律，盡力遵行：這樣你們纔能生活，纔能進入佔領，上主你們祖先的天主賜給你們的地方。² 我吩咐你們的話，你們不可增刪，而應全守我向你們所訓示的，上主你們天主的誡命。³ 你們親眼見了上主在巴耳培敦爾所做之事：凡隨從巴耳培敦爾的人，上主你們的天主都由你們中間消滅了；⁴ 你們依附上主你們的天主的人，今日都還活着。⁵ 看，我授與你們法令和規律，都是上主我的天主吩咐與我的，好叫你們在你們要去佔領的土地內，依照遵行。⁶ 你們要謹守遵行，因為這樣，在萬民眼中，纔能顯出你們的智慧和見識；他們一聽到這一切法令說：『這實在是一個有智慧，有見識的大民族！』⁷ 有那個大民族的神這樣接近他們，如同上主我們的天主，在我們每次呼求他時，這樣親近我們呢？⁸ 又有那個大民族，有這樣公正的法令和規律，如同我今天在你們面前，所頒佈的這一切法律呢？⁹ 你應謹慎，加意留心，不要忘了你親眼所見的奇事，終生日日不要讓這些事遠離你的心，並要將這一切傳於你的子子孫孫。¹⁰ 當你在曷勒布，站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的那一天，上主曾對我說：『你給我召集民眾，我要叫他們聽清我的話，使他們在世有生之日，學習敬畏我，以此教訓自己的子女。』¹¹ 你們遂走上前來，站在山腳下，其時山上火焰沖天，且為黑暗和烏雲籠罩着。¹² 上主由火中對你們說話，你們聽到說話的聲音，卻見不到什麼形狀，只有聲音。¹³ 他將他的盟約，即那十條誡命，給你們宣布出來，吩咐你們遵守，又將這誡命寫在兩塊石版上；¹⁴ 同時上主也吩咐我將

⁵ 詳請參見拙文，《基督教法制史—以天主教法制為發展中心》，頁 18-21，法源法律網(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dt_article.aspx?AID=D000023862)。

法令和規律教訓你們，叫你們在要去佔領的土地內遵行。¹⁵ 你們應極其謹慎：因為上主你們的天主，在曷勒布由火中對你們說話的那天，你們既然沒有見到什麼形狀，¹⁶ 那麼，你們切不要墮落，為自己製造任何形狀的神像，無論是男或者是女的形狀，¹⁷ 或地上各種走獸的形狀，或空中各類飛鳥的形狀，¹⁸ 或地上任何爬蟲的形狀，或地下水裏各種魚類的形狀。¹⁹ 當你舉目望天，觀看日月星辰，和天上的眾星宿時，切不要為之勾引，而去敬拜事奉。那原是上主，你的天主分賜給普天下萬民享用的；²⁰ 至於你們，上主揀選了你們，將你們由鐵爐中——埃及——領出來，作他特有的子民，就如今日一樣。²¹ 可是，上主為了你們的緣故，對我發怒起誓，不讓我過約但河，不許我進入，上主你的天主賜給你作產業的那肥美的土地；²² 我只有死在這地方，不得過約但河；你們都要過去，佔領那肥美的土地為產業，²³ 那麼你們應謹慎，不要忘記上主你們的天主與你們所訂立的盟約，不要製造任何形狀的神像，有如上主你的天主所禁止的，²⁴ 因為上主你的天主是吞噬的烈火，忌邪的天主。²⁵ 當你們生養了子孫，在那地住得久了，如果你們墮落下去，製造任何形狀的偶像，行了上主你的天主眼中視為邪惡的事，惹他發怒，²⁶ 我今天就指着上天下地對你們作證，你們必在過約但河後所佔領的土地上迅速滅亡，決不會在那地長久生存，必全被消滅。²⁷ 上主要將你們分散到萬民之中，在上主領你們所到的外邦中，你們剩下的人，必為數不多。²⁸ 在那裏你們要事奉人手所製造的神，即各種看不見，聽不見，不會吃，不能聞的木石神像。²⁹ 你在那裏必要尋求上主你的天主，只要你全心全靈尋求，你就可尋到他。³⁰ 日後，當這些事都臨於你，使你困惱時，你必回心歸向上主你的天主，聽從他的聲音；³¹ 因為上主你的天主原是仁慈的天主，他不會捨棄你，不會毀滅你，也不會忘卻他起誓與你祖先所立的盟約。³² 你且考察在你以前過去的世代，從天主在地上造了人以來，由天這邊到天那邊，是否有過像這樣的大事，是否聽過像這樣的事？³³ 是否有一民族，如同你一樣，聽到了天主由火中說話的聲音，還仍然活着？」

其次，《舊約聖經》—申命紀第 18 章第 1-8 節亦記載：「¹ 肋未人司祭即全肋未支派，在以色列中沒有分子和產業，他們靠獻與上主的火祭祭品，和他們應得的一份維持生活。² 他在兄弟中間沒有產業；照上主向他所說的，上主自己要作他們的產業。³ 這是司祭由人民應得的一份，就是宰殺牛羊作祭獻的人，應將前腿、兩腮和胃臟給司祭；⁴ 初收的五穀、酒、油和初剪的羊毛，亦應給他，⁵ 因為上主你的天主由各支派中揀選了他，叫他和他的子孫，時時以上主的名義服役供職。⁶ 如果一個住在以色列境內任何城鎮的肋未人，離開了本地，一心一意地要到上主所選的地方去，⁷ 他可因上主的名義供職，如同在那裏侍立於上主面前的肋未弟兄們一樣，⁸ 分享同樣的口糧，不必變賣祖產。」⁶

又《新約聖經》瑪竇福音第 17 章第 22 節～第 27 節記載：「²² 當耶穌同門徒在加里肋亞周遊時，耶穌對他們說：「人子將被交於人們手中。²³ 他們要殺害他，

⁶ 詳請參見拙文，《摩西律法之分析》，頁 136-139，法源法律網(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dt_article.aspx?AID=D000023864)。

第三天他必要復活。」門徒就非常憂鬱。²⁴ 他們來到葛法翁時，收殿稅的人來到伯多祿跟前說：「你們的師傅不納殿稅嗎？」²⁵ 伯多祿說：「自然納的。」他一進到屋裏，耶穌就先對他說：「西滿！你以為怎樣？地上的君王向誰徵收關稅或丁稅呢？向自己的兒子，或是向外人？」²⁶ 伯多祿說：「向外人。」耶穌對他說：「所以兒子是免稅的了。²⁷ 但是，為避免使他們疑怪，你往海邊去垂釣，拿釣上來的第一條魚，開了它的口，就會找到一塊『斯塔特』。拿去交給他們，當作我和我的殿稅。」

瑪竇福音第 22 章第 15 節～第 22 節又記載：「¹⁵ 那時，法利塞人去商討怎樣在言談上叫耶穌入圈套。¹⁶ 他們遂派自己的門徒和黑落德黨人到他跟前說：「師傅，我們知道你是真誠的，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不顧忌任何人，因為你不看人的情面。¹⁷ 如今請你告訴我們：你以為如何？給凱撒納稅，可以不可以？」¹⁸ 耶穌看破他們的惡意，就說：「假善人，你們為什麼要試探我？」¹⁹ 拿一個稅幣給我看看！」他們便遞給他一塊「德納」。²⁰ 耶穌對他們說：「這肖像和名號是誰的？」²¹ 他們對他說：「凱撒的。」耶穌對他們說：「那麼，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²² 他們聽了大為驚異，遂離開他走了。」⁷

一 財產權歸屬於天主

不管係根據《舊約聖經》記載之“什一奉獻”，奉獻之祭品，其財產權當然屬於天主，而天主又屬於肋未族人的產業。因此，“什一奉獻”中除舉行燔祭焚燒給天主者外，即歸由大祭司、祭司與肋未族人享用外，舉凡當時城中居住、旅遊的外方人、孤兒和寡婦吃飽！畢竟神愛世人，祂要光照善人，也光照惡人；要衣養善人，也要衣養惡人！

二 財產權歸屬於教區與教堂

雖然當今之天主教國家，多數已經不再強制性對教徒徵收“什一稅”，但是，在仍依法徵收“宗教稅”或“教堂稅”(Kirchensteuer)之德國⁸，其徵收之“宗教稅”或“教堂稅”，除委託國家(邦)稅捐機關代徵者，須先扣除稽徵之行政費用外，於則歸屬於教區，而統一支用於傳教與牧養神職人員，以及支給聘僱之非神職人員薪資之用。

⁷ 類似記載，另參見路加福音第 20 章第 20-26 節：「²⁰ 於是他們窺察耶穌，派遣奸細，假裝義人，要抓住他的語病，好把他交付於總督的司法權下。²¹ 他們就詰問他說：「師傅，我們知道你說話施教，都正直無私；又不看情面，但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²² 敢問：我們給凱撒納丁稅，可以不可以？」²³ 耶穌覺察出他們的詭計，便對他們說：²⁴ 「你們拿一個『德納』來給我看！這『德納』上有誰的肖像，有誰的字號？」他們說：「凱撒的。」²⁵ 耶穌對他們說：「那麼，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²⁶ 他們在民眾面前，不能抓到他的語病，且驚奇他的應對，遂噤口不言。」

⁸ 關於德國當今之宗教稅制與問題，詳請參見拙文，《論宗教之財務法制——以臺、德天主教會主要收入為核心》，頁 21-235，法源法律網(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dt_article.aspx?AID=D000024541)。

此外，《天主教法典》除於第 264 條規定：「❶為籌募修院的費用，除第 1266 條所指的獻金外，主教得在教區內制定**捐稅**。❷應負擔修院的捐稅者，為一切教會法人連設立在教區內的私立法人在內，但賴救濟維生者，或為推動教會的公益而設的學習或教學的團體不在此限；此類捐稅應該是一般性的，配合負擔人的收入及按修院的需要而定。」第 1260 條亦規定：「教會依天賦權利，得向基督信徒**徵收**為達成本身目的所需要的一切。」

伍 非天主教徒“隨喜捐獻”之財產權歸屬

通常各天主教會也會在教堂入口處或教堂內適當地點，擺設“奉獻箱”，供信徒、尚未受洗之“慕道者”，甚至是“教外人士”隨喜捐獻。此種“隨喜捐獻”，並無開立“捐獻收據”，故即使教區經辦理財團法人登記，亦無法據以抵免綜合所得稅。

於此甚值得研究者，乃非天主教徒“隨喜捐獻”之財產權，究竟其歸屬為何？其理論依據何在？

一 歸屬於天主？

由於非天主教徒未經“受洗”，並不屬於“天主子民”⁹，即使其仰慕 天主與主耶穌基督，而前來教堂參觀，甚至也跪下禱告與懺悔，而於“奉獻箱”內投入“奉獻錢財”。但是，我們能否以其進入教堂下跪下、禱告與懺悔，並於“奉獻箱”內投入“奉獻錢財”，即認定其有將該“奉獻錢財”奉獻給 天主與 主耶穌基督之意？矧非天主教徒前來教堂，可能純屬參觀，而不進行跪禱與懺悔，只是渠等純粹因教堂之肅穆與崇高氣氛，而一時心生感動或愛慕，遂舉手之勞、隨手捐獻於“奉獻箱”內。此時，其內心真意為何，委實無從探知，教堂財務人員亦無從追問與調查。

二 歸屬於教會？

如上所述，由於非天主教徒未經“受洗”，並不屬於“天主子民”，如其仰慕 天主與主耶穌基督，而單純前來教堂參觀，或者也跪下禱告與懺悔，而於“奉獻箱”內投入“奉獻錢財”，且明示其擬對天主教會捐獻，則該捐獻之錢財，自應歸屬於“天主教會”所擁有。但是，通常非天主教徒進入教堂，純粹係因受教堂之肅穆與崇高氣氛所感動，而隨手捐獻於“奉獻箱”內。此時，通常雖欠缺明示其擬對教會捐獻，但似乎可以其默示之表示，而推知其擬對教會捐獻。

三 歸屬於教堂？

當然，上述二所述之情形，由於非天主教徒對於“天主教會”與“天主教堂”於神學上之意義仍有不同，並不見得有所認知。因此，如以其雙眼所見、雙足所立

⁹ 關於“天主子民”之定義、要件與種類及範圍，詳請參見《天主教法典》第 2 卷第 204 條～第 746 條。

的“教堂”，作為渠等所欲捐獻的對象，似乎亦不離譜，甚至可能正屬於絕大多數一般非天主教徒的內心想法。因此，將渠等投入“奉獻箱”內之“奉獻錢財”，認定為係對該“教堂”之奉獻，而使該“教堂”擁有該“奉獻錢財”之所有權，似亦無不可。

陸 天主教救災解難勸募之財產權歸屬

天主教會有時因社會的重大災變或教會內部臨時的重大需要，而於堂區、甚至是教區，發動信徒“專案奉獻”。例如：為了教堂或修院的重大修繕或興建，甚至是為支持指定的堂區、教區、全國或普世教會的固定事業，而舉辦特別捐獻。此等“特別捐獻”，理論上捐獻者可以要求開立捐獻收據，嗣後辦理所得稅抵繳，但事實上，甚少教友會有如是之舉！

至於如天主教為社會遭逢天災，擬救災解難而為勸募，甚至是於平常接受慈善性捐贈時，其募得或接受之慈善捐贈，其財產權歸屬為何？

就此，《天主教法典》第 1300 條規定：「信徒將自己財物，或于生時或死後留給慈善事業的意願，一經合法接受，即應極謹慎地履行管理或應用的方式，但應遵守第 1301 條第 3 項的規定。」第 1301 條規定：「❶所有慈善意願，無論在生時或死後所為贈與，執行人常為教會教長。❷教會教長依法能且應監督，也得經由視察，使慈善意願得以履行，其他執行人離職時應向其交賬。❸附加於遺囑的條款，其與教會教長權益相抵觸者，視作未附加。」

第 1303 條規定：「❶法律上慈善基金的名稱，有數種，即：1° 獨立慈善基金，即第 114 條第 2 項所提之目的而設的事物總體，且由教會主管權力成立為法人者；2° 非獨立慈善基金，即以任何方式贈與某公法人的財產，受者擔負由特殊法制定的常期責任，從每年收益中獻彌撒或行指定的教會儀式，或完成第 114 條第 2 項所指的目的。❷非獨立的慈善基金的財產，如為交付給屬教區主教的法人者，到期時，應交給第 1274 條第 1 項所指的機構，但創設人另有明文表示的意願者不在此限；否則，財產歸於該法人。」

一 歸屬於天主，但限於救災解難使用？

由於當有天災發生時，天主教會(如同其他宗教慈善團體如慈濟功德會等)如號召教友捐輸救災時，願意慷慨解囊者，不一定侷限於天主教徒。因此，天主教會為救災解難勸募之財產權歸屬，認為歸屬於天主，但限於救災解難使用，與“神愛世人”的教理，自亦無扞格。

二 歸屬於教會，但限於救災解難使用？

同理，當天災發生時，天主教會(如同其他宗教慈善團體如慈濟功德會等)號召教友捐輸救災，而慷慨解囊，即使不限於天主教徒，將該等救災解難勸募所得之財產權歸屬，認為歸屬於天主教會，但限於救災解難使用，自亦與天主教會秉

持“神愛世人”的教理，有異曲而同工之妙。

再者，根據《天主教法典》第 1301 條規定：「**❶**所有慈善意願，無論在生時或死後所為贈與，**執行人**常為教會教長。**❷**教會教長依法能且應監督，也得經由視察，使慈善意願得以履行，其他執行人離職時應向其交賬。**❸**附加於遺囑的條款，其與教會教長權益相牴觸者，視作未附加。」第 1302 條規定：「**❶**凡在生時或由遺囑受託接受慈善事業者，應將自己的受託通知教會教長，並說明所有贈與的動產及不動產以及**附帶責任**；如贈與人明白而完全禁止作此通知時，則不可接受委託。**❷**教會教長應盡力將受託的財產妥為存放，並注意依第 1301 條的規定**履行贈予者的意願**。**❸**財產委託于某修會會士或某使徒生活團團員時，如其財產歸於地方即教區或其居民，或助慈善事業者，第 1 項和第 2 項所提的教會教長則為教區教長；否則教會教長則為宗座立案的聖職修會及聖職使徒生活團的高級上司，或在其他修會之受委本人的教長。」

第 1304 條：「**❶**為使基金有效的被法人接受，必須有教會教長書面的准許；除非先依法獲悉該法人，有能力履行將接受的任務及已接受的任務，教長不可給予許可；尤應注意，要依照當地或地區的風俗，進益應完全符合**附帶的義務**。**❷**為設立和接受基金的其他條件，由特殊法規定之。」第 1305 條規定：「金錢及動產做為贈予時，應立刻存放教會教長批准的妥善地方，其目的為使該金錢或動產保值，並為了基金的利益，以及明文所指的**附帶義務**，迅速遵照該教長在聆聽有關人員及其經濟委員會的意見後，作明智判斷，做謹慎而有利的投資。」第 1306 條規定：「**❶**口頭所設的基金也應以書面簽署。**❷**應將基金清冊一份置於公署檔案，一份置於基金有關的法人檔案內，妥為保管。」

三 歸屬於教堂，但限於救災解難使用？

最後，如天主教堂可以為救災解難，而行勸募(例如：堂區弟兄姊妹遭逢重大變故，以致於生活無著落)，則其財產權歸屬於該教堂，但限於該次勸募之目的使用，似乎亦無不可。

此外，《天主教法典》第 1307 條規定：「**❶**除遵守第 1300 條至第 1302 條及第 1287 條的規定外，應制作從慈善基金接受的義務標示牌，放在顯明的地方，以免忘記應盡的責任。**❷**除第 958 條第 1 項所列登記冊外，應另備一登記冊，由堂區主任或教堂住持保管，冊內注明一切責任，及責任的履行和獻儀。」自亦應成為該教堂處理慈善捐獻時，應時時遵守的至高規範。

附帶提醒者，乃《天主教法典》第 1265 條規定：「**❶**除靠佈施維生的修會會士的權利外，任何私人、自然人或法人，無本人教長和教區教長的准許，禁止為任何善會或教會團體，或為任何目的作募捐。**❷**主教團得規定募捐的章程，命令人人應遵守，即使靠佈施維生的修會亦不除外。」

柒 天主教會之財務法制與《宗教基本法》財務規制之關係

一 天主教會之財務法制依據《天主教法典》規定，不適用《宗教基本法》

《宗教基本法》草案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所有之財產及法物，其管理、使用、收益或處分，悉依章程定之；無章程者，依教制或傳統定之。」準此，《天主教法典》關於財物之管理等，有極為詳盡之規定，堪稱“教制”之典範，較諸一般宗教法人之章程，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天主教會之財務法制，似乎只須依據《天主教法典》規定，而無須再適用《宗教基本法》之簡略規定。

《天主教法典》關於教會財務之主要規定如下：

第 1260 條：「教會依天賦權利，得向基督信徒徵收為達成本身目的所需要的一切。」第 1261 條：「❶ 基督信徒得將現世財物作捐獻，以支援教會。❷ 教區主教應勸告信徒盡第 222 條第 1 項所規定的責任，並應以適當的方法督促其盡此責任。」第 1262 條：「基督信徒應依主教團公佈的法則，以捐助方式資助教會。」第 1263 條：「教區主教為教區需要，於徵詢經濟委員會及司鐸諮議會後，有權向隸屬自己管轄的公法人，徵收配合收入的小量稅；而對其他自然人和私法人，只可在嚴重緊急情況下並在相同的條件下，課少量的稅，但有個別法規和習慣給與主教更優惠的權利者不在此限。」第 1264 條：「除法律另有規範外，教省主教會議得：1° 為執行施惠權力的行為，或為執行由宗座批准的宗座覆文，規定應繳費用；2° 規定在施行聖事及聖儀的時機，應徵的獻儀。」

第 1265 條：「❶ 除靠佈施維生的修會會士的權利外，任何私人、自然人或法人，無本人教長和教區教長的准許，禁止為任何善會或教會團體，或為任何目的作募捐。❷ 主教團得規定募捐的章程，命令人人應遵守，即使靠佈施維生的修會亦不除外。」

第 1266 條：「教區教長得命令在一切教堂及聖堂，以及事實上信徒慣常參禮的修會教堂和聖堂，由其收集特別捐獻，為支持指定的堂區、教區、全國或普世教會的固定事業，然後徑行交納給教區公署。」第 1267 條：「❶ 除有反證外，一切交與教會法人，連私法人在內的上司或管理人的捐獻，推定歸於該法人。❷ 第 1 項所指的捐獻，除有正當原因外，不得拒絕，而在重大關係的事上，如為公法人，則須有教會教長的准許，才可拒收；接受附帶行為責任或條件之捐獻，除遵守第 1295 條的規定外，也需要有以上所指教長的許可。❸ 由信友為一定目的所做的捐獻，只能為該目的而使用。」

第 1271 條：「主教為了合一及愛德連鎖的理由，應照教區的財力給宗座提供依時代環境所需要的補助，以能妥善為普世教會服務。」第 1272 條：「在尚有真正俸祿存在的地區，主教團應依照與宗座達成的協定，和所批准的適當法規，管

理這類的俸祿，使其收入，而且盡力使俸祿的進項逐漸納入第 1274 條第 1 項所列的機構內。」

第 1274 條：「**①**在各個教區內應設特別機構，致力募集財產及捐獻，以維持為教區服務的聖職人的生活，此為第 281 條規定對聖職應有的照顧，但已另有照顧者不在此限。**②**為維護聖職人尚未設立社會福利的地區，主教團應設立機構，使聖職人獲得社會保險的充份照顧。**③**教區依其需要，應成立公共基金，主教藉以滿全其他服務教會人士的責任，以及接濟教區內的各種需要，也讓富有教區資助貧窮教區。**④**在不同環境的地區，為易於完成第 2 項和第 3 項所提目的，各教區的這類機構可互相結盟或互相合作，互相聯合，而且可在主教團的整個地區建立之。**⑤**這類機構的設立，在可能範圍內，應獲得國法上的效力。」

第 1275 條：「從幾個教區所彙集的財產總合，應依有關主教所協議的法則管理之。」第 1276 條：「**①**教會教長應謹慎監督所屬公法人的財產管理，但教會教長因合法名義所享有的更多權益不在此限。**②**教會教長於衡量法律，合法習慣及環境後，在普通與特殊法的範圍內，得頒佈特別訓令，安排管理教會的財產。」第 1277 條：「教區主教在採取管理行動時，對教區經濟狀況有重大關係的行動，應徵詢經濟委員會及教區參議會的意見；並且除普通法或基金會明文規定的情況外，凡採取非常管理行為，皆需此委員會及參議會的同意，主教團得規定何者是屬於非常管理行為。」第 1278 條：「除第 494 條第 3 項和第 4 項的職務外，第 1276 條第 1 項及第 1279 條第 2 項的職務，均可由教區主教委任總務管理。」

第 1279 條：「**①**凡對財產所有人有權直接管轄者，也有權管理教會之財產，但特殊法，章程或合法習慣有異議者不在此限，而且教會教長，在管理人疏忽的情況下，有權干涉。**②**關於公法人財產的管理，如依法或基金會章程或因本身規定無自己的管理人時，公法人所屬的教會教長得委派適當人選為管理人，為期三年，期滿得再被任命。」第 1280 條：「任何法人應有自己的經濟委員會或至少兩位參議員，為依各機構的規定，協助管理人完成職務。」第 1281 條：「**①**除遵守各章程的規定外，管理員如超越正常管理的範圍及方式，除獲得教會教長書面授權外，其行為無效。**②**超越正常管理的範圍及方式的行為，在章程內應加界定；如在章程內對此事無規定，教區主教在聆聽經濟委員會意見後，得為其屬下指定此類行為。**③**除事關本身利益外，法人對由管理員所做無效行為，不必負責，對管理不合法而有效的行為，法人應負責，但可對管理人所加給之損失提出訴訟或請求償還。」

第 1282 條：「所有以合法名義從事管理教會財產者，無論為聖職人員或為平信徒，皆應以教會名義依法律規定，盡自己的職務。」第 1283 條：「管理員在就職以前：**1°** 應在教會教長或其代表前宣誓，承諾將忠實妥善地管理；**2°** 應繕寫詳細而分類的財產清冊，並簽字，以登記不動產，動產：寶物，或文化財物，或其他物品，並應對之附加描述及估價，對所繕寫者加以核對；**3°** 這類清冊一份

保管在管理處的檔案箱內，另一份留在相關公署檔案內；此類資產如有任何變更，應在以上兩檔案注明。」第 1284 條：「**①**所有管理人應勤勉，猶如家主盡自己的職務。**②**為此應當：1° 防範，不使付託照管的財物因任何方式喪失或受損壞，為達此目的，需要時應投保險；2° 設法使教會財產所有權，以國法的有效方式，安全保管；3° 遵守教會法及國法的規定，以及設基金人或贈與人或合法當局所附加的規定也應遵守，尤應留意勿因不遵守國法而使教會受到損害；4° 財產的收入和進益，應準時收取，審密核算，妥善保管，並依設基金人的意願或合法規定應用；5° 因借貸或抵押而應付的利息，應在規定時間支付，也應設法使借出的資金，及時償還；6° 由花費所結餘的錢財，如為法人的目標有益時，得於教會教長同意後作為投資；7° 收支賬簿應妥善整理；8° 每年年終應報管理賬目；9° 教會或修會團體作為財產依據的檔或契約，應整理得當，放入適當的檔案處，妥為保管；如無不便，應將正本存於公署檔案處。**③**敦勸管理人每年做收支預算，但對預算的規定和具體表達方式的指定，則由特殊法規定。」

第 1285 條：「管理人為敬禮或為基督徒的慈善目的，可支付的動產，僅限於日常管理範圍內，而且不屬於恆產。」第 1286 條：「財產管理人：1° 在雇用工人的事務上，應依教會傳授的原則，遵守關於勞工和社會生活的國法；2° 對於由合同而提供工作的人，當給與恰當而公道的工資，為能適宜地維護他及其家人的需要。」第 1287 條：「**①**管理人無論其為聖職人或平信徒，對其所管理的任何財產，依法未脫離教區主教治理權下者，即有義務向教區教長報賬，而該教長委託經濟委員會予以審查；任何相反的習慣均應廢除。**②**關於信徒奉獻給教會的財物，管理人應依特殊法之規定向信徒報賬。」第 1288 條：「管理人除非取得本人所屬教會教長的書面許可，不得以公法人名義在國家法庭起訴或答辯。」第 1289 條：「管理雖無教會公職名義，但管理人不能任意放棄已接受的職務；如因其故意失職而給教會帶來損害，應負責賠償。」

二 天主教會之財務法制，仍應適用《宗教基本法》？

《宗教基本法》草案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所有之財產及法物，其管理、使用、收益或處分，悉依章程定之；無章程者，依教制或傳統定之。」準此，天主教會之財務法制，應無須再適用《宗教基本法》之相關規定。

然而，雖然《天主教法典》對於教會內之財務管理，已經有極為完整而嚴肅的規範，業如上述，但其究竟是根據先於我國《憲法》第 13 條與《宗教基本法》(草案)第 20 條規定之“宗教財務自主原則”？還是本於《天主教法典》之規定自身，先於我國《憲法》第 13 條與《宗教基本法》(草案)第 20 條規定之“宗教財務自主原則”，而無須再適用《宗教基本法》草案第 20 條之規定？在法理與“宗教法學”上，似乎仍屬於一項值得研究的、甚具法學趣味的課題！

個人身為具有 67 年“天主子民”的身分，同時又屬於具有超過半世紀歲月的“法律人”身分與古稀的中華民國國民身分，集此三重身分於一身，仍然認為天主教會之財務法制，並非因適用《宗教基本法》(草案)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的結果，才適用《天主教法典》有關教會財產的規定(教制)，反而，應該係因《天主教法典》自身規定的結果，即適用其本身之規定，而無須再適用《宗教基本法》。蓋《天主教法典》屬於“內宗教法”，亦即真正之“宗教法”，世俗有關宗教之法律，亦即“外宗教法”¹⁰，應無法規範涉及純宗教內部之事務。抑有進者，教徒對教會之奉獻，與一般庶民間之“贈與”，只係基於“現實的利害”，甚至是“感情關係”或“倫常關係”者，仍有天壤之別！蓋教徒對教會之奉獻，純係出於信仰、對於信仰之神的崇敬，具有高度屬靈的意義，不能以世俗的“物質贈與”衡量之！

以真正的天主教徒而言，我們不管是於主日彌撒中之“奉獻”，或於其他場合對教會之“奉獻”及對神職人員之贈與，均係基於“主在我內，我亦在主內”、“主與我已然合而為一”的心靈，我對天主的“奉獻”，絕非在於與天主作交易，以奉獻為代價，而謀求天主相對的賞賜(保佑)。反而，是在實踐主耶穌基督的訓示：「你們不要在地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在地上有蟲蛀，有銹蝕，在地上也有賊挖洞偷竊；但該在天上為自己積蓄財寶，因為那裏沒有蟲蛀，沒有銹蝕，那裏也沒有賊挖洞偷竊。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必在那裏。」

捌 結論

基於前述各節的探討，可知《宗教基本法》草案第 20 條採取“宗教財務自主原則”之規定，其第 1 項規定：「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所有之財產及法物，其管理、使用、收益或處分，悉依章程定之；無章程者，依教制或傳統定之。」第 2 項規定：「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收益，應用於章程所定目的任務支出，不得為盈餘分配及為他人保證；違反者，其行為無效。」均尚屬妥當之立法。至於第 3 項規定：「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處分全部固有不動產時，應事先報請主管機關備案。」其中“固有”二字，究以何時間點為準？易生疑義！再者，如僅以其成立時為準，對於嗣後壯大之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恐亦屬不宜，建議可以刪除。至於第 4 項規定：「宗教師死亡時，其遺產之歸屬，依其遺囑定之，民法有關特留分之規定，不適用之。」反面解釋，對於宗教師生前未立遺囑者，顯然其死亡時，如留有遺產，則其歸屬將仍有我國民法有關特留分規定之適用。再者，如宗教師並不具有我國國籍，則本項規定與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8 條前段、第 60 條，亦可能抵觸，是否排除其適用，亦不無疑問。最後，如宗教

¹⁰ 國內法學者通常僅泛稱其為“宗教法”，但如根據華東政法大學何勤華教授等之見解，則其根本不是“宗教法”，而是“國家法”、“世俗法”！請參見何勤華主編，《法律文明史》第 5 卷—《宗教法》，第 1 版，頁 29-32，商務印書館(2017.12)；拙文，《法律與宗教》，收入：鄧衍森、陳清秀、張嘉尹、李春福(主編)，《法理學》，初版第 1 刷，頁 81 與註 30，元照(2020.3)。

師無分宗教別，一體適用，恐亦可能牴觸不同宗教之法典規定¹¹，似應再斟酌。

總之，我國於制定《宗教基本法》時，切記應先釐清擬規範之事項，其究屬於“外宗教法”之範疇，而得由國家從外部為規範，抑或其純屬“內宗教法”之範疇，僅有宗教本身得自為合乎其教義與宗教本質之規範，決不可侵犯“宗教自由之核心”或“本質”事項，才能避免有違憲之虞！

¹¹ 例如：《天主教法典》第 1299 條規定：「❶凡依自然律和教會法能自由處理自己財產的人，得將財產于生時或死後贈予慈善之用。❷因死亡，為有利教會所做遺囑，應盡可能依國法的手續為之；如忽略此手續，得告知繼承人應負責執行遺囑人的旨意。」

題目九 與談

陳惠馨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兼任教授）

回應蔡志芳教授文章：「從對教會奉獻之財產歸屬，論《宗教基本法》之財務規制」

回應人：陳惠馨（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退休教授）

時間：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15:00 地點：東吳大學

一 蔡教授論文的主要論點

（一）探討天主教會，基督教會以及其他宗教例如寺廟道觀等，接受信徒或非信徒之奉獻，財產權的歸屬？

蔡教授主要針對此種捐獻財產究竟屬於和人所有加以討論。論文中引用《天主教法典》的法規。其中提到《天主教法典》第1261條規定：「**①**基督信徒得將現世財物作捐獻，以支援教會。**②**教區主教應勸告信徒盡第222條第1項所規定的責任，並應以適當的方法督促其盡此責任。」第1262條規定：「基督信徒應依主教團公佈的法則，以捐助方式資助教會。」等等。

蔡教授在這篇論文中提出幾種情況加以討論，例如：

- 1 天主教徒於彌撒儀式中之奉獻，其財產權之歸屬，
- 2 天主教徒於彌撒儀式外之奉獻，其財產權之歸屬，
- 3 教友「自養關係」，
- 4 堂區教友「彌撒外奉獻關係」，
- 5 教友與神職人員間「供養關係」
- 6 教友集資興建與維修教堂，
- 7 教友集資添購教堂聖物、聖書或教友集資辦理共餐等等情況，
- 8 天主教“教堂稅（這應該是在德國的情形）
- 9 非天主教徒“隨喜捐獻”
- 10 救災解難款的歸屬等等的討論。

蔡教授在論文中詳細討論上述幾種財產可能，例如財產可能歸屬於天主，或教會或教堂或神職人員。在論文的討論中，蔡教授提到「聖經」之內容以及在文章中多數討論《天主教法典》之規定。例如論文提到《天主教法典》第1265條規定：「**①**除靠佈施維生的修會會士的權利外，任何私人、自然人或法人，無本人教長和教區教長的准許，禁止為任何善會或教會團體，或為任何目的作募捐。**②**主教團得規定募捐的章程，命令人人應遵守，即使靠佈施維生的修會亦不除外。」

二 評論人回應蔡志芳教授論文

（一）關於牽涉宗教團體或組織之財產究竟再根據不同宗教團體之內部規則，例如《天主教法典》，聖經或者教會內部行為準則等，還是要根據世俗界的立法院通過之相關法律？甚至地方政府訂定的法規範？目前正在討論的《宗教基本法》草案是否應該加以規定。

（二）回應人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從憲法第13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以及目前在臺灣積極落實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規定思考宗教的財務究竟應該如何處理並在宗教基本法或相關法律加以規定，比

較能夠達到保障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讓人民享有宗教生活並增進宗教平等及宗教多元之發展，同時也能尊重宗教團體之特殊性及自主性。（以上用語主要參考2025年提出之《宗教基本法》草案第一條內容）

（三）目前《宗教基本法》草案有多個版本，2025年提出之《宗教基本法》草案僅有6個條。其內容並未針對宗教團體之財產加以規定。

蔡志芳教授論文提到的「宗教基本法草案」則有第20條規定。其規定：「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所有之財產及法物，其管理、使用、收益或處分，悉依章程定之；無章程者，依教制或傳統定之。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收益，應用於章程所定目的任務支出，不得為盈餘分配及為他人保證；違反者，其行為無效。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團體處分全部固有不動產時，應事先報請主管機關備案。宗教師死亡時，其遺產之歸屬，依其遺囑定之，民法有關特留分之規定，不適用之。」（以上取自蔡志芳教授論文引言部分）

（四）蔡教授的論文提醒我們，「宗教基本法草案」有必要針對宗教團體的財產如何處理加以規範。

（五）評論人建議：在「宗教基本法」草案中明確規定 國家應該給予宗教團體取得法人身份之可能，也就是將目前多數宗教團體根據（民法）或（人民團體法）等成立法人之規定，統一納入「宗教基本法」之中，並區分哪些財產屬於具有法人資格之宗教團體（或組織），哪些財產屬於宗教神職人員。基於此，也同時建議在宗教基本法草案中，規定政府應該訂定宗教法人法。建議在「宗教法人法」訂定不同型態的宗教團體或組織，需要符合哪些條件取得具有同等地位的法人資格。立法時特別要注意對於已經取得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身份之宗教團體或組織（寺廟，教會堂及基金會）以及已經具有社團法人身份之宗教團體或組織不需要再重新登記，可以直接取得宗教法人之資格。

（六）目前六個條文的宗教基本法草案牽涉宗教財產相關規定不足，2025年「宗教基本法」草案僅在第二條提到下面可能牽涉宗教財產的文字，例如「製造、取得和使用有關宗教儀式或習慣所需用品之自由。」，「六、徵求、接受個人或機構自願捐款及其他捐獻之自由。」有必要斟酌增加。

題目十

宗教管理法制與國際人權規約之接軌：

以宗教基本法為例

周志杰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第十九回法律與宗教研討會文稿(東吳大學法學院 11/27/2025)

(本文稿為進行之研究，請暫勿引註)

宗教管理法制與國際人權規約之接軌：

以宗教基本法為例

周志杰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美國華盛頓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客座教授

摘要

本文以 ICCPR 與 ICESCR 對宗教與信仰自由保障的條文為主軸，嘗試初步構建制定宗教治理法規的評估指標與核心立法原則，以為我國宗教基本法制定過程之參酌。本文首先梳理兩公約關於宗教自由的內容、限制條件與國家義務，並歸納出宗教自由實踐的完整性、自主性及限制範圍等三項基本原則。其次提出(1)宗教財務自主、(2)宗教土地使用、(3)宗教團體的法律定位、(4)宗教教育的範圍、(5)宗教團體運行的民主原則、(6)不歧視原則、(7)宗教信徒與團體的關係、(8)宗教活動與環境保護等八大指標，作為檢視宗教管理規範是否符合人權標準的評量工具。研究發現：兩公約一般性意見強調宗教與信仰自由涵蓋個人內心信念和公開實踐的權利，應受各國憲法和國際公約的雙重保障；國家介入宗教事務需具合法目的，並通過必要性與比例性檢驗，以最小侵害手段實現該目的，同時避免干預宗教團體運作及宗教活動。依此，本文提出政府制定宗教治理法規的核心立法原則和條文，旨在兼顧宗教自由與政府管理之平衡。學術上，本文結合國際條約文本分析與比較研究，創新性地建立宗教治理法制的評估架構並提供示範性條文；政策上，官民於制定宗教基本法的討論過程中，得以參酌此一評估架構與指標，來完善宗教治理法制之修訂及制定，以兼顧保障宗教自由與穩定社會秩序之雙贏目標。

關鍵詞：

宗教治理、宗教與信仰自由、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宗教基本法、政教關係

一、緒論

宗教自由與國家治理之間的政教關係，以及宗教團體與社會大眾之間的聖俗關係，向來是各國所關注的重要議題。例如，美國主要透過財稅優惠與土地使用規範來管理宗教團體；反觀日本和台灣則以訂定宗教管理專法或適用社團法人的規範來管理宗教團體。因此進行宗教事務管理及宗教自由保障的分析，不僅具有學術研究上的意義，更可作為各國革新宗教管理制度和完善宗教人權規範的政策參考和啟發。

從國際人權規範的標準來看，宗教與信仰自由是少數於第一代人權和第二代人權公約內，同時明定應受保障的人權類型及項目。所謂第一代人權，指涉的是政治與公民權利(基本權利)；第二代人權，則指涉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生存權利)；而第三代人權，則是所謂的群體權利(collective rights)，重視相對弱勢群體的發展權和群己關係的相互尊重與發展，以及人與環境及其他物種的和諧關係。由此可見，宗教人權不僅屬於第一代人權之公民權利，政府原則上應消極不干預及保障宗教權利之行使；亦屬於第二代人權之文化權利，政府更負有積極義務來增進信仰生活的完善。尤有甚者，宗教和信仰行為在現代社會更屬於第三代人權。可見宗教事務的管理和相關法規的制定，確實是衡量民主國家治理績效和施政表現的重要指標。

此外，分析國際人權規範與國家宗教管理法制的接軌和磨合，並非關注多邊人權治理時代的來臨與終結，而是析論全球人權規範能否直接或間接形塑國家行為的合法性，以及透過何種手段達成。換言之，問題的重心是國際人權規約如何透過法制化與內國法化對主權國家及其人權實踐產生影響。人權與主權的爭議總是影響人權規範的發展，但國際人權法的內國法化進程，仍是一個國家人權法制進步與完善的重要指標。在此一過程當中，各國政府如何管理宗教事務和制定宗教人權保障的法律，顯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從保障宗教自由與人權的角度來看，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核心難題，在於如何在尊重個人良心自由與維繫世俗國家中立之間，找到可持續與可審查的制度平衡。以國際人權法而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f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及第18條就思想、良心與宗教自由建立最低保護基準，並由第22號一般性意見具體化其外在表現(forum externum)之保障範圍；《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則從文化權的角度，確認宗教儀式、典禮與制度作為文化生活之一部分，應獲有效參與與平等受益。兩公約共同指向，國家除負有消極不干預義務，亦負有積極建置包容性規範與救濟機制之義務。可見ICCPR及ICESCR所揭櫫有關宗教和信仰自由的規

定，應是各國制定及完善其宗教管理制度之重要原則，以及評估政府在保障宗教人權的表現上的重要指標。

循此，本文首先歸納國際人權法對保障宗教自由的觀點和規定，接著從前述兩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書之相關規定及闡釋，歸納出保障宗教及信仰自由的三項基本原則及面向：(1)宗教自由實踐的完整性及自主性；(2)行使宗教及信仰自由的限制；(3)教導宗教的自由及規範。本文第三節進一步析論政府及管理宗教事務與保障宗教自由時應有的決策思維和權衡原則，並在第四節提出分析及評量政府制定宗教管理法應遵行國際人權規範的指標。另亦以列舉法規條文的方式，歸納出制定宗教基本法應涵蓋的核心立法原則。本文最後提出研究發現及政策建議，俾利於我國宗教治理政策與法規的修訂和改善，評估台灣制定宗教基本法應涵蓋之核心要點，以期在保障宗教自由與穩定社會秩序之間達到官民及教俗共贏的目的。

二、國際人權法對保障宗教自由的觀點和規定

國際人權規約在地化實踐的關鍵，在於國際規約內國法化後與國內相關法制及政策施行的磨合過程，以逐步將國家行為加以「社會化」，進而將規約內化為國內官民共同依循的法律規範，藉此改善相關人權實踐的政策。¹此一進程涉及國家主權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of national sovereignty)與國際規約的規範性(normality of international norms)兩者，在國家公權力機關繼受及內化過程中的互動和平衡。換言之，即是國際人權規約之條文意旨和理念與包括在地治理、規範制度及文化傳統在內的政策環境之間的接軌和磨合。

國際人權法體系當中最核心的三份文件當屬《世界人權宣言》、ICCPR 及 ICESCR。²《世界人權宣言》第 18 條即明文規定人人有思想、良心與宗教信仰自由；而 1966 年通過的 ICCPR 和 ICESCR 則是此理念的法律化體現。ICCPR 第 18 條第一款載明：「人人有思想、良心及宗教之自由……包括有自由選擇宗教或信仰及在個人或集體、公開或私下表現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³ICCPR 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書進一步說明，本條保護範圍應包括各種有神論、非有神論乃至無神論的信念，以及完全不信任何宗教的權利。外在實踐涵攝禮拜、儀式、節期、教育、結

¹ 有關國際人權規約國內法化之討論及歷程，參見 Ryan Goodman and Derek Jinks. 2008. "Incomplete Internalization and Compliance with Human Rights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9 no.4, pp. 725-748; Harold Hongju Koh. 1997. Why Do Nations Obey International Law? *Yale Law Journal*, vol. 106, no.8, pp. 2599-2659

² 國際人權建制是由多邊人權監督機構、判決機構以及一系列國際人權規約所組成。國際人權規約或國際人權法體系，則是由國際人權法典(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與九個核心人權條約，加上其他無條約監督機制的普世人權文件(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struments)等三部份所組成。國際人權法體系的發展的脈絡大體上是依循代際人權的三階段：(1) 政治與公民權利(基本權利)；(2)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生存權利)；(3) 集體權利(collective rights)，重視群己與群體間的相互尊重與發展，以及人與環境及其他生命的和諧關係。參見周志杰，(2018)，〈人權與國際關係〉，收錄於李明主編《國際關係》(第 14 章)。台北：前程文化出版社，頁 285-310。

³ UN OHCHR, ICCPR art. 18.

社、傳教、宗教出版與募款等。任何限制須符合法律保留、追求正當目的（公共安全、秩序、健康、道德或他人基本權利與自由）、且通過必要性與比例審查。⁴換言之，國際人權法採取廣義「宗教與信仰」概念，任何系統性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只要與個人核心認同相關，皆受保障。

此外，文化權利也與宗教自由相關。ICESCR 15 條第一款(a)規定人人有「參與文化生活」的權利；ICESCR 的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書指出，「宗教或信仰系統、儀式和典禮」即屬於個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⁵該意見書進一步要求各國確保個人與群體「有效參與」文化生活，避免直接或間接歧視，並採取積極措施，消弭弱勢宗教團體在場域、資源與程序上的不利。⁶因此對宗教的信仰實踐亦受文化權利的涵蓋與保護。總之，國際人權體系下，宗教與信仰自由不但保證個人「選擇與信仰」的自由，也保障與之相關的集體實踐及文化生活。ICESCR 第 21 號意見書明言政府應創造條件，使人能參與其宗教群體之生活發展及相關政策決策。第 21 號意見書還強調，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含宗教團體）都須承擔責任，有效實踐人人參與文化生活的權利。⁷因此，兩公約及其詮釋文件共同傳達：宗教自由涵蓋個人選擇與公開實踐的權利，同時賦予宗教團體一定程度之組織自治；而對此自由的任何限制，均需符合法律授權並符合比例原則。關於政府對宗教自由的限制，ICCPR 第 18 條第三款規定，唯有法律明文規定且為保護公共安全、秩序、健康或道德或他人基本權利所必要時，方得對宗教表達自由加以限制，而且此一限制必須具備「合法性、必要性與相稱性」，且不得出於歧視目的⁸。

三、宗教及信仰自由保障的基本原則

綜觀人權兩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書之相關規定及闡釋，可大致歸納出保障宗教及信仰自由的三項基本原則及面向：(1)宗教自由實踐的完整性及自主性；(2)行使宗教及信仰自由的限制；(3)教導宗教的自由及規範。

3.1 宗教自由實踐的完整性及自主性

首先，如前所述，《公政公約》所確立的原則在於，表明及行使宗教或信仰自由「包含著許許多多的行為」⁹。此處列舉禮拜、儀式、典禮，及其所衍生的建築禮拜場所、儀禮和器物的使用、陳列象徵物、過節假日和休息日、遵守飲食規定、穿

⁴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2, Article 18: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or religion (1993).

⁵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21: Right of everyone to take part in cultural life (2009).

⁶ Ibid.

⁷ Ibid.

⁸ UN OHCHR, ICCPR art. 18.

⁹ Point 4,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2, Article 18: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or religion (1993).

戴不同的服飾或頭巾、參加若干與生活狀況相關的儀式、使用某種慣用的語言。¹⁰更值得關注的是，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實踐「包括與宗教團體進行其基本事務不可分割的行為」¹¹。此處將「宗教團體」帶入表明及行使宗教或信仰自由的範圍當中，並且成為個人遂行該權利所必要的媒介及載體。另一焦點則在於「與宗教團體進行其基本事務不可分割的行為」之範圍與邊界何在。《公政公約》列舉：(1)選擇其宗教領袖、牧師和教師的自由；(2)開設神學院或宗教學校的自由；(3)編製和分發宗教文章或刊物的自由。

有此觀之，《公政公約》第 18 條及其相應的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書確實賦予宗教團體為實踐宗教及信仰自由之基本事務所需的自主權，並列舉若干事項中。但《公政公約》並未明確涉及政府與宗教團體之間的權責關係及定位，亦未針對政府宗教事務主管機關與宗教團體之間的聖俗分離原則，進行闡釋及界定。不過，《經社文公約》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4 點強調政府不可直接或間接干涉人們享有參加「宗教或信仰制度、禮儀和儀式」等文化生活的權利，而且要求政府採取步驟，「防止第三人干涉人們享有前述權利。」同意見書第 52 點亦指出政府有義務制定政策，使個人能在不受歧視的情況下自由地從事其自己及他人的宗教或信仰制度、禮儀和儀式。循此，宗教團體的自主性範圍及聖俗分離尺度的拿捏，應以有利於保障及實踐個人宗教及信仰自由之目的以及不歧視原則為核心，以此做為協調前述範圍及尺度的基礎及準據。

3.2 行使宗教及信仰自由的限制

《公政公約》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人人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此項限制以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所必要者為限。」《公政公約》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8 點再度重申，「第十八條第三項允許限制表明自己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的情況僅限於法律所規定的限制，以及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所必須的限制。」¹²即便在可允許的限制範圍內，亦須符合平等和不歧視的原則，更「不得基於歧視性的目的或採取歧視性的做法。」其次，「所施加的限制必須以法律作出規定」，且「僅限於明文規定的」目的。再者，「不許基於其中不曾規定的原因施加限制」，即使此一限制已是其他公約中受保障權利的限制。而且限制的施行方式不能「損害第十八條中所保證的權利」。最後，所施加的限制「必須與所指特定需要直接有關且合比例性」。

¹⁰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2, Article 18: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or religion (1993).

¹¹ Ibid.

¹² Ibid.

此外，《經社文公約》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19 點亦強調，「任何限制必須是符合比例，即當有數種限制措施可實行時，必須採取限制性最小的措施。」¹³而且，政府對有關文化生活的限制，必須考量此一限制是否影響了與人們參與文化生活之權利具有「內在聯繫」的權利，例如宗教及信仰自由。是故，由上述規定可以了解，對宗教及信仰自由的限制必須以基於公益性及不侵害他人之自由及權利為限。再者，所為之限制應當符合法規明確性、直接相關性、特定需要性，以及比例相稱性等四原則。

3.3 教導宗教的自由及規範

關於進行宗教教育的合理性，首先要指出的是，《公政公約》第 18 條第 1 項載明對「教導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的保障」。第 4 項亦強調應「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公政公約》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8 點更進一步強調「不能限制父母和法定監護人保證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此外，《經社文公約》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2 點亦同意「個人和群體透過教育傳承其價值觀、宗教、習俗、語言和其他文化來源」¹⁴。但是，學童在公立學校接受有關宗教和道德的一般歷史教育，應採行中立和客觀的教學方式。¹⁵再者，在公立教育體系當中，不應教授特定的宗教或信仰，「除非法規中有提供滿足父母和監護人期望而不發生歧視效果的豁免或替代措施。」而且，「持有非宗教性質的一切信念的人也都得到同樣的保障」，不得限制其受教育，亦不得強迫其改變認知及立場。¹⁶

四、政府管理宗教事務與保障宗教自由的權衡與界限

由前述分析可知，政府在制定和執行宗教相關規範時，必須兼顧公共利益與宗教自由憲制原則。首先，**政教分離與中立原則**為兩公約精神與各國憲法所共同確立。以日本為例，其憲法第 20 條明確保護「信教自由」並禁止國家承認任何宗教

¹³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21: Right of everyone to take part in cultural life (2009).

¹⁴ Point 2,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21: Right of everyone to take part in cultural life (2009)：「...人人都有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還與受教育的權利存在著本質上的聯繫(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個人和群體透過教育傳承其價值觀、宗教、習俗、語言和其他文化來源，教育還有助於培育一種互相理解和尊重文化價值觀的氛圍。」。

¹⁵ Point 6,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2, Article 18: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or religion (1993).

¹⁶ Point 5,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2, Article 18: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or religion (1993).

或補助宗教組織；¹⁷憲法第 89 條則禁止使用公帑支持宗教團體。¹⁸美國《第一修正案》亦規定國會不得制定確立國教的法律，明文禁止政府設立國教或干預信仰自由。¹⁹而且宗教團體具有組織、財政和人事自主權，且國家負有保持宗教中立的義務，即禁止國家介入宗教事務。²⁰基於此，政府雖可為公共安全、衛生等合理目的對宗教活動加以必要的監管，但不得以法律附加過度干預。例如，1996 年日本因應奧姆真理教事件修法，要求教團公開財產資料並賦予政府調查權限，以防止濫用資源；²¹此等措施是在法律許可範圍內、為維護公共安全而非從宗教本身出發的合理管制。

相較之下，如若政府規範超出兩公約允許的範疇（如歧視信徒群體或強制改信），即可能違反國際義務。因此，制定宗教治理法規時應堅持「不偏袒任何宗教、不強迫任何人改變信仰」的基本原則，在確保公共利益與社會秩序的前提下，最小限度地介入宗教團體自主事務。政府對宗教活動的限制，須符合「明確法律依據—正當目的—必要性—最小侵害—可受審查」五點的檢驗；在程序面，政府應確保事前諮商、公開理由與有效救濟。依 ICCPR 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第 4-5 點指出，宗教團體為宗教自由的承載者，享有合宜之自治，包括選任領袖、設立教育機構、財務管理與對外宗教活動。ICESCR 的文化權視角補充指出，政府不得任意限制參與宗教儀式與典禮之權利，並應在教育與文化政策中，避免排除或貶抑特定宗教傳統。²²

從比例原則觀之，行政監理若旨在維護公共安全與秩序，應先盤點較溫和且同等有效之手段（例如資訊揭露與程序型規範），避免一概性、永久性或帶有歧視效果之限制。另就公共給付而言，若政府提供一般可得之利益（如安全補助、設施改善、普惠性教育貸補助等），不得僅以宗教身分而排除受益；若涉及直接資助宗教禮儀或宣教活動，則須更嚴格檢驗目的與效果，以免構成事實上的「建立宗教」。此外，如前述，兩公約亦鼓勵宗教團體積極協助個人行使信仰的自由。然而，宗教團體除享有自治，亦負有遵守一般適用之公益、勞動、安全、財稅與資訊揭露等規範之義務；在公共資源配置上，宜建立透明、問責與衝突利益規則，以回應社會對資金用途與未成年人保護之正當關切。依兩公約之參與原則，立法與重大政策變更應納入宗教團體、少數宗教與非信仰者之實質參與。

¹⁷ Kennedy v. Bremerton School District, 597 U.S. (2022).

¹⁸ Groff v. DeJoy, 600 U.S. 447 (2023).

¹⁹ Supreme Court of Japan (Grand Bench), Tsu City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Case, Minshu 31-4-533 (July 13, 1977).

²⁰ Supreme Court of Japan, Ehime Tamagushi-ryo Case, Minshu 51-4-1673 (Apr. 2,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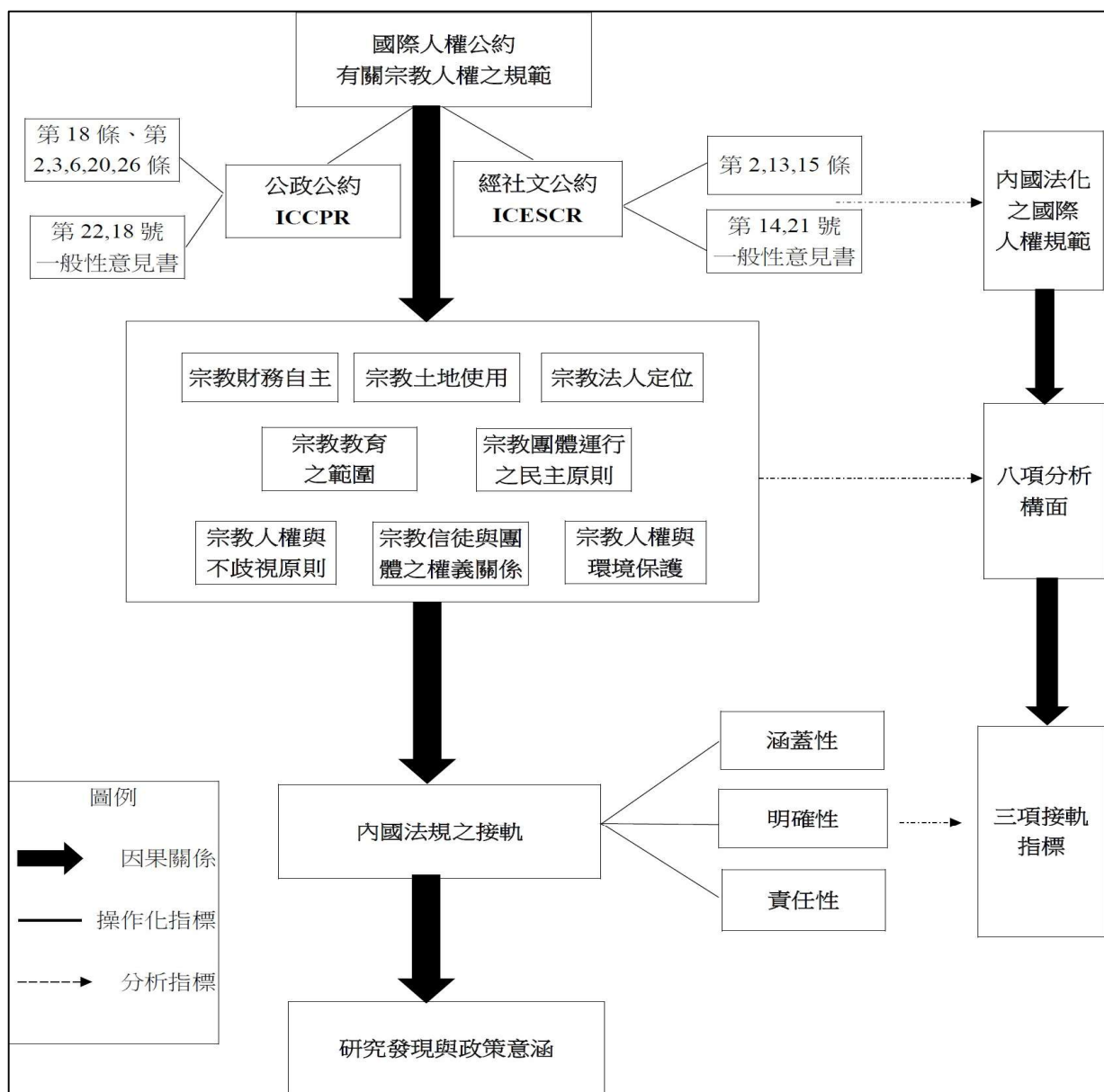
²¹ Supreme Court of Japan, decision of Jan. 20, 2010.

²²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2, Article 18: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or religion (1993).

五、制定宗教基本法的評估指標和立法原則

根據上述的釐清和歸納，本文提出分析及評量制定宗教基本法應遵行國際人權規範的指標(參見表一)以及評估是否接軌國際人權規約的分析架構(參見圖一)。指標共有八項：(1)宗教財務自主、(2)宗教土地使用、(3)宗教團體的法律定位、(4)宗教教育之範圍、(5)宗教團體運行之民主原則、(6)宗教人權與不歧視原則、(7)宗教信徒與團體之權利義務關係、(8)宗教活動與環境保護。

圖一：宗教治理法制與國際人權規約接軌之分析架構



圖表來源: 作者自製

表一：ICCPR 及 ICESCR 公約有關宗教自由規範的評估指標

| 指標 | 1.宗教財務自主 | 2.宗教土地使用 | 3.宗教團體運行之民主原則 | 4.宗教法人定位 | 5.宗教教育之範圍 | 6.宗教人權之不歧視原則 | 7.宗教人權與環境保護 | 8.宗教信徒與團體之權義關係 |
|-------------|-------------------|-------------------|----------------------------|-------------------|---------------------|--|------------------------|--------------------|
| 公政公約 | 第 18 條第 1 至 2 項 | 第 18 條第 1 至 2 項 | 第 18 條第 1 至 4 項 | 第 18 條第 1 項 | 第 18 條第 1 項和 4 項 | 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條；第 18 條第 3 項；第 20 條第 2 項，及第 26 條 | 第 6 條第 1 項；第 18 條第 3 項 | 第 18 條第 1 至 4 項 |
| 公政公約一般性意見書 | 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4 項 | 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4 項 | 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5 項 | 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4 項 | 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6、8 項 | 第 18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3、10 項；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8 項。 | X | 第 22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5 項 |
| 經社文公約 | X | X | 第 15 條第 1 項 | X | 第 13 條第 2 項至 4 項 | 第 2 條第 2 項 | 第 12 條 | 第 15 條第 1 項 |
| 經社文公約一般性意見書 | X | X | 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15、63 及 64 項 | X | 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2 項 | 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3、52 項 | 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書 | 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15 項 |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一）《公政公約》第 18 條

第 1 項 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此種權利包括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私自以禮拜、戒律、躬行及講授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第 2 項 任何人所享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不得以脅迫侵害之。

第 3 項 人人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此項限制以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所必要者為限。

第4項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

（二）《公政公約》第22號一般性意見書

第4點 表明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行使方式可以是：「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以禮拜、戒律、實踐和教義來表明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包含著許許多多的行為。禮拜的概念擴及於直接表明信仰的儀式和典禮，以及這些行為整體所包含的若干實踐，包括建築禮拜場所、儀禮和器物的使用、陳列象徵物和過節假日和休息日。宗教或信仰的實踐和教義包括與宗教團體進行其基本事務不可分割的行為，例如選擇其宗教領袖、牧師和教師的自由、開設神學院或宗教學校的自由、以及編製和分發宗教文章或刊物的自由。

第5點 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妨礙他維持或接受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強迫，包括以使用暴力或刑法制裁相威脅的方式來強迫信的人或不信的人維持其宗教信仰和聚會、放棄或改變其宗教信仰。具有同樣意圖或結果的政策或實踐，例如限制受教育、接受醫療或就業的機會...。持有非宗教性質的一切信念的人也都得到同樣的保障。

第6點 第十八條第四項允許學童在公立學校接受有關宗教和道德的一般歷史的教育，但應該採取中立和客觀的教育方式。第十八條第四項中所載，關於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涉及第十八條第一項中所載，關於教導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的保障。委員會指出，除非法規中有提供滿足父母和監護人期望而不發生歧視效果的豁免或替代措施，否則，在公立教育體系中教授特定宗教或信仰，即不符合第十八條第四項的規定。

第8點 第十八條第三項允許限制表明自己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的情況僅限於法律所規定的限制，以及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所必須的限制。

（三）《公政公約》第18號一般性意見書

第3點 不歧視、法律面前平等以及法律的無歧視的平等保障，是保障人權的基本而普遍的原則。

第10點 平等原則有時要求締約國採取積極行動，以減少或消除會引起《公約》所禁止的歧視或使其持續下去的條件。例如，如果一國中某一部分人口的普遍狀況阻礙或損害他們對人權的享受，國家應採取具體行動糾正這種狀況。這種行動可包

括在一般時間內給予有關部分人口在具體事務上某些比其他人口優惠的待遇。但是，只要這種行動是糾正事實上的歧視所必要，就是《公約》下的合法差別待遇。

（四）《公政公約》第 2, 3, 6, 20, 26 條

第 2 條第 1 項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無分種類、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一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

第 3 條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確保本公約所載一切公民及政治權利之享受，男女權利，一律平等。

第 6 條第 1 項 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

第 20 條第 2 項 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禁止之。

第 26 條 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在此方面，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

（五）《經社文公約》第 15 條

第 1 項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參加文化生活。

（六）《經社文公約》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書

第 2 點 個人和群體透過教育傳承其價值觀、宗教、習俗、語言和其他文化來源。

第 3 點 人人都有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並在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中得到承認：人人都有權自由參加社會的文化生活。其他國際文件提到了平等參與文化活動的權利；參與社會和文化生活所有方面的權利；充分參與文化和藝術生活的權利；取得和參與文化生活的權利；和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關於公民和政治權利的文件也載有關於這一主題的重要條款：屬於少數族群的人私下和公開享受其自己的文化、信仰其宗教和使用其自己的語言，和有效參與文化生活的權利，原住民繼承其文化體制、祖先土地、自然資源和傳統知識的權利，以及發展的權利。

第 15 點 (b)人人有權—單獨、或與他人結合一起或作為一個群體透過教育和資訊瞭解和理解自己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以及在充分顧及文化認同的情況下接受優質教育和培訓。(c)為文化生活作貢獻是指人人有權參與創造群體的精神、物質、知識和情感的表達方式。與此相配合的是參加自己所屬群體的發展的權利，以及參加對自己行使文化權利有影響的政策和決定的界定、闡釋和實施的權利。

第 52 點 締約國有義務促進人人有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為此，須採取廣泛的積極措施，包括有助於落實此權利的財政措施，例如：(b)制定政策，使屬於不同文化社群的人能夠在不受歧視的情況下自由地從事其自己的、以及別人的文化習俗，並自由選擇其生活方式；(g)採取適當措施糾正某些結構性歧視，以確保某些社群人員在公共生活中代表性不足不致於對其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產生負面影響；(h)採取適當措施，為在互相尊重、理解及容忍的基礎上建立個人和團體之間的建設性文化交流關係創造有利條件。

第 63 點 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的違反，還可因締約國不作為或未能採取必要措施以遵守本條下承諾的法律義務而發生。由不作為所造成的違反包括未能採取適當步驟充分實現人人都有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以及未能執行相關法律或提供行政、司法或其他適當救濟措施，使人民能充分行使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

第 64 點 違反還可因締約國未能採取措施消除對個人或團體的福祉有害的作法而發生。這些有害的作法包括歸因於習慣和傳統，如女性性器官割禮和巫術行為的咒語等，這些都阻礙了受其影響的人們充分行使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中所鄭重規定的權利。

(七) 《經社文公約》第 13 條

第 3 項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為子女選擇符合國家所規定或認可最低教育標準之非公立學校，及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

第 4 項 本條任何部分不得解釋為干涉個人或團體設立及管理教育機構之自由，但以遵守本條第一項所載原則及此等機構所施教育符合國家所定最低標準為限。

(八) 《經社文公約》第 2, 12 條; 《經社文公約》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書

第 2 條第 2 項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保證人行使本公約所載之各種權利，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而受歧視。

第 12 條第 1 項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

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36 點 各國還需採取措施，防止環境和職業健康危險，和流行病資料顯示的任何其他威脅。為此，他們應制定和執行減少或消除空氣、水和土壤污染的國家政策，包括重金屬的污染，如汽油中的鉛。

表二 我國現行法規(列舉)與宗教治理法規八項指標之歸納

| 構面 規範 | 1.宗教 財務自主 | 2.宗教土地使用 | 3.宗教團體運行之民主原則 | 4.宗教法人定位 | 5.宗教教育之範圍 | 6.宗教人權不歧視原則 | 7.宗教人權與環境保護 | 8.信徒與宗教團體之權義關係 |
|----------|-----------------------------|--|---------------|---|------------|-------------|----------------------------|----------------|
| 憲法 | 第 13、15 條 | X | 第 7、13 條 | X | 第 13 條 | 第 7、13 條 | X | X |
| 大法官會議解釋 | 釋字 573 號 | X | 釋字 573 號 | X | | 釋字 490 號 | | 釋字 490 號 |
| 內政部 | 監督寺廟條例第 2 條第 2 項、第 6 條第 1 項 | 國土計畫法；寺廟或宗教團體申請贈與公有土地辦法；監督寺廟條例第 8 條；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 第 1,2,5 條；未辦理登記寺廟補辦登記作業要點第 1,2 項；都市計畫法第 32 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0,30-1,30-2 條 | 監督寺廟條例第 8 條 | 宗教團體組織型態：財團法人、寺廟、社會團體 | X | X | 未辦理登記寺廟補辦登記作業要點第 3 項 | X |
| 環境部 | X | X | X | X | X | X | 大型慶典及民俗（宗教）活動空氣污染預防指引 | X |
| 財政部 | X | X | X | 土地稅法第 18 條；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 條 | X | X | X | X |
| 立法院 | X | X | X | X | 教育基本法第 6 條 | X | X | X |
| 地方政府 | X | X | X | X | X | X | 大型慶典及民俗活動空氣污染預防指引；優質宮廟行動公約 | X |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根據八項與國際人權規約接軌的評量指標，本文初步歸納若干現行國內法規與八項指標之對應情形(參見表二)。根據前述的分析及歸納，試初步以列舉法規條文的方式，提出制定宗教基本法應涵蓋的核心原則和條文如表三。

表三 宗教基本法的核心立法原則

| | |
|--------------------|---|
| 第 1 條 (目的) | 為落實宗教或信仰自由與文化參與權，確保國家中立與比例原則，並建立宗教團體自治與公共問責之平衡 |
| 第 2 條 (定義) | 宗教或信仰，包含有神論、非神論與無神論；宗教活動包括禮拜、儀式、宣教、教育、結社及其必要之準備行為 |
| 第 3 條 (不歧視) | 任何人不得因宗教或信仰而受差別待遇；政府制定或執行政策，不得產生直接或間接歧視之效果 |
| 第 4 條 (比例與最小侵害) | 對外在宗教實踐之限制，應基於法律、正當目的，並符合必要性、最小侵害及可受審查之程序 |
| 第 5 條 (公共給付中立) | 普惠性公共給付與補助，應對宗教與非宗教實體一體適用；涉及直接宗教儀典或宣教之支出，應受嚴格審查，避免造成助長或認可 |
| 第 6 條 (自治與問責) | 宗教團體有權依其教義管理內部事務；政府得以最小侵害之手段，就財務揭露、兒少保護、勞動權益與公益使用等事項，訂定一般適用之規範。 |
| 第 7 條 (教育與學校) | 公立學校之宗教教學，應採客觀、中立與多元之介紹；學生與家長享有選擇或免修之權利；教師之個人宗教表達，應與職務行為適當區隔，避免構成事實上之強迫 |
| 第 8 條 (宗教用地與設施) | 土地使用與古蹟保護規範應宗教中立；宗教設施之核准不得因宗教而受不利對待；但得為安全、環境與文化資產維護訂定中立之一般條件 |
| 第 9 條 (救濟) | 對行政處分或補助決定不服者，得循行政爭訟與司法救濟程序請求審查；法院於審理時，應適用比例與不歧視原則 |
| 第 10 條 (國際接軌) | 主管機關應定期檢討本法施行，參照 ICCPR 與 ICESCR 之一般性意見與比較法發展，提出改進報告 |

六、初步結論

從國際人權法的視角觀之，宗教與信仰自由的保障核心在於「不歧視」、「個人自由選擇與表達」以及「必要範圍內的宗教團體自治」。各國宗教治理相關立法應依此精神加以銜接。當然，除了政府之外，宗教團體不僅有權參與影響其「宗教或信仰制度、禮儀和儀式」有關的政策制定，作為公民社會的一份子，宗教團體亦

負有落實此一文化權利義務。²³相對地，公民社會中的其他個人、社團及群體亦有提出自身立論、看法及關切的權利。

本文已就兩人權公約有關宗教及信仰自由的定義及行使、相關保障的基本原則與範圍，以及政府及宗教團體的責任及角色，進行分析及歸納，並且提出評量宗教基本法立法的八大面向和核心原則。本文的分析歸納和指標建構，相信有助於廣化及深化對宗教管理立法與國際人權法律接軌的分析和論證，再者，亦可提供各國政府檢視兩宗教管理制度和決策思維的評量標準和原則，俾利政府在保障宗教自由與維護社會秩序之間，以及在信徒和聖職人員的互動上，取得均衡。換言之，宗教基本法的制定或今後宗教治理法規的修訂或完善，需全面參酌 ICCPR 第 18 條和 ICESCR 第 15 條及其一般性意見書的規範，並納入本文上述所列的指標和原則性條文，以確保法規既能有效管理宗教活動，亦能保障信仰自由的行使。

更重要的是，政府與立法機關應與公民社會充分討論，並借鏡他國的立法和實踐經驗，不斷檢視和完善宗教相關法令，使其真正成為實踐憲法與兩公約宗教權利保障的工具。政府更有義務及責任主動引導各方爭議的調處和協商。《經社文公約》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49 點 e 項指出，政府履行公約規定的具體法律義務，包括尊重任何人「以積極和知情的方式，在毫不受歧視的情況下，自由參加可能對其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活]權利有影響的任何重要決策程序」。²⁴因此，在宗教基本法制定的過程中，政府若同時推動相關配套法案時亦應主動積極與宗教團體協商，化解誤解，以包容與對話的方式促成共識，如此才能讓宗教治理法制體系達到對個人自由與公共利益兼顧的最終目標。

²³ Point 15, UN CESCR, ICESCR art. 15; General Comment No.21 (E/C.12/GC/21, 2009)：「人人有權參與或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至少有三個互相關聯的主要組成部分：(a)參與；(b)取得；(c)為文化生活作貢獻。... (c)為文化生活作貢獻是指人人有權參與創造群體的精神、物質、知識和情感的表達方式。與此相配合的是參加自己所屬群體的發展的權利，以及參加對自己行使文化權利有影響的政策和決定的界定、闡釋和實施的權利。」

²⁴ 前揭書，頁 336。

參考文獻 (暫列修訂中)

Carson v. Makin, 596 U.S. 767 (2022).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21pdf/20-1088_dbfi.pdf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2009). General comment No. 21: Right of everyone to take part in cultural life (E/C.12/GC/21). United Nations.

<https://www.refworld.org/legal/general/cescr/2009/en/83710>

Espinoza v. Montana Department of Revenue, 591 U.S. ____ (2020).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9pdf/18-1195_g314.pdf

Fulton v. City of Philadelphia, 593 U.S. ____ (2021).

Goodman, Ryan and Derek Jinks. 2008. “Incomplete Internalization and Compliance with Human Rights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9 no.4, pp. 725–748.

Groff v. DeJoy, 600 U.S. 447 (2023).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22pdf/22-174_k536.pdf

Harold Hongju Koh. 1997. Why Do Nations Obey International Law? *Yale Law Journal*, vol. 106, no.8, pp. 2599-2659

Human Rights Committee. (1993). General comment No. 22: Article 18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or religion). United Nations.

<https://hrlibrary.umn.edu/gencomm/hrcom22.htm>

Kennedy v. Bremerton Sch. Dist., 597 U.S. ____ (2022).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21pdf/21-418_i425.pdf

Locke v. Davey, 540 U.S. 712 (2004).

OSCE/ODIHR. (2007). Toledo Guiding Principles on Teaching about Religions and Beliefs in Public Schools.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c/e/29154.pdf>

Ravitch, F. S. (2014). Religion, culture, or both—The Japanese Supreme Court and the Tsu City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Case. *BYU Law Review*, 2014(3), 747–784.

Satoh, J. (2004). Judicial review in Japan: An overview of the case law and scholarship. *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 38, 603–674.

Supreme Court of Japan (Grand Bench). (1977, July 13). Tsu City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Case, *Minshu* 31(4), 533. <http://www.courts.go.jp>

Supreme Court of Japan. (1997, Apr. 2). Ehime Tamagushi-ryo Case, Minshu 51(4), 1673.

Supreme Court of Japan. (2010, Jan. 20). Case on gratuitous lending of municipal land to a Shinto shrine (decision summary).

Trinity Lutheran Church of Columbia, Inc. v. Comer, 582 U.S. ____ (2017).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6pdf/15-577_khlp.pdf

Zelman v. Simmons-Harris, 536 U.S. 639 (2002).

42 U.S.C. § 2000bb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of 1993).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42/2000bb>

42 U.S.C. § 2000cc (Religious Land Use and Institutionalized Persons Act).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42/2000cc>

周志杰，(2021)，〈從教俗共贏思維析論宗教基本法制定之意義〉，收錄於周志杰等著《宗教基本法與宗教基本權保障：宗教覺醒四周年紀念》(第2章)。台北：永然文化出版社，(9月)，頁70-94。(in Chinese)

周志杰，(2018)，〈人權與國際關係〉，收錄於李明主編《國際關係》(第14章)。台北：前程文化出版社，頁285-310。

題目十一

從天人合一思想，探討宗教基本法之必要性與立法方向

陳清秀教授

（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與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從天人合一思想，探討宗教基本法之必要性與立法方向

陳清秀教授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

壹、問題之提出

貳、宗教基本法之規範對象之事件本質：宗教之意義及其功能

一、宗教之意義

二、宗教之功能

（一）宗教培養人類「靈魂德性」，提升人格道德素養：「修心養性」

（二）宗教培養人類慈悲博愛之「利他價值觀」與「利己利人」之共善思想

（三）宗教之教化人心、淨化社會的功能

（四）宗教安定人心（療癒心靈）之功能

（五）宗教對於傳統倫理價值觀以及文化風俗習慣之貢獻

1. 宗教對於傳統倫理價值觀之貢獻

2. 宗教對於傳統文化風俗習慣之貢獻

三、宗教團體為公益團體

（一）宗教團體之意義

（二）德國公法人之宗教團體

（三）私法上之宗教團體，促進宗教及道德教育，具備公益團體性質

1. 宗教團體為非營利組織

2. 宗教團體得經營附屬收益事

（四）宗教團體為道德共同體

（五）宗教團體享有宗教自由

參、宗教基本法之立法必要性：傳統優良倫理道德價值觀與精神文化傳統之制度保障

一、人類社會共同倫理價值觀之維護

二、社會精神文化傳統之制度保障

三、宗教基本法之立法目的

肆、宗教基本法之立法原則：通達民情，符合事理，為民興利除害

一、宗教自由之尊重與保障

(一) 宗教行為自由（傳教、禮拜、集會、設立宗教團體、宗教教育）

(二) 宗教團體之自治權

1.組織自主權

2.人事自主權

3.財政自主權

(1) 概說

(2) 宗教用財產權保障：連結宗教自由權利

二、宗教團體之憲法上基本權利保障

1.私法自治權之保障

2.隱私權保障（資訊自主權）

(1) 主管機關對於宗教團體資訊之保密

(2) 宗教團體對於信徒資訊之保密

三、宗教外在實踐之自由：經營公益慈善事業之自由

(一) 宗教自由的積極保障（positive dimension of Religionsfreiheit）（宗教信仰自由之積極面）。

(二) 宗教活動之社會延伸（Sozialdimension der Religionsfreiheit）（宗教自我實現與社會責任）

(三) 宗教作為倫理與社會救助體系

1.宗教的倫理功能與社會教化作用（宗教慈善作為「信仰實踐」與「社會共善」之交會）

2.公益事業的社會協同機制

四、應營造友善政教關係

(一) 宗教團體的遵守憲法義務（守法性，Rechtstreue）

1.忠誠於法秩序

(二) 國家法對於宗教團體之管制規範

(三) 政教合作關係

五、宗教平等中立性原則

(一) 公平對待原則

(二) 宗教中立性原則之限制：宗教設施及宗教活動，構成社會世俗化之善良風俗文化活動

1. 都市公園內得設置祭祀孔廟等文化觀光用途之設施，以振興地域經濟

2. 「工程開工」之宗教活儀式動，屬於世俗性文化風俗習慣

（三）宗教中立性原則不得妨害傳統文化之保存與發揚

1. 宗教活動與文化傳承之交互關係

2. 宗教中立原則應不宜影響傳統文化之保存與發揚

（四）宗教中立性原則與傳統文化保存之利益衝突

陸、結論與建議：宗教基本法草案方向（草案建議稿）

壹、問題之提出

宗教作為人類文明最早的精神形態之一，其功能不僅止於個人信仰與超越追求，更深刻地滲入倫理秩序、文化傳統與社會制度之中。然在現代憲政國家中，宗教的社會角色與法律定位，卻面臨前所未有的轉型挑戰。國家世俗化、宗教多元化與文化資產化的並行，使得宗教在公共領域的存在，既不可忽視，又亟需法律上之明確規範。

在臺灣現行法制中，有關宗教之規定散見於《人民團體法》、《監督寺廟條例》、及相關行政命令，缺乏一部統一的「宗教基本法」。此種碎片化規範，導致宗教團體法人格不明、財務監理標準不一、宗教文化保存缺乏制度支撐等問題。宗教在現代社會之公益功能，如社會救助、教育、文化保存與倫理教化，亦未獲完整法律承認。宗教法制之欠缺，使國家與宗教之關係游移於「過度干預」與「消極放任」之間。

此種現象，顯示出宗教問題不僅是制度問題，更是世界觀與法哲學問題。若從中國傳統思想之「天人合一」觀出發，宗教並非僅屬於個人內心之超越經驗，而是人與天地、社會、文化互為呼應的整體秩序。所謂「天人合一」，乃強調人類行為與宇宙秩序、倫理價值、自然法則之內在連貫。此一思想提供了超越西方二元對立（神／人、宗教／世俗、國家／個人）之整體視角，可作為現代宗教立法正當性之哲學基礎。從法理上觀之，「宗教基本法」之制定，並非僅是行政監理之需求，而是憲法保障宗教自由、文化權與公共倫理的具體化。其立法意義，在於建立宗教與國家、宗教與社會之間的平衡架構¹：

1. 透過法律制度明確化宗教自由之內涵與界限；
2. 建立宗教自治與政教合作之原則，以促進社會公益；
3. 將宗教文化視為國家文化資產，予以保存與傳承。

¹ ChatGPT 說：「宗教基本法之必要性與立法方向之問題提出」，2025.11.10.

由是觀之，宗教基本法之制定，既是法制層面的整合工程，更是文化與價值層面的再生工程。它標誌著國家如何在多元社會中，透過法律建構宗教的正當位置，使宗教不僅為信仰之表現，亦成為文化秩序與倫理理性的根基。從「天人合一」的思想脈絡觀之，宗教基本法不僅是現代國家制度化之產物，更是人與天、法與道、自由與秩序重新調和的象徵。

貳、宗教基本法之規範對象之事件本質：宗教之意義及其功能

一、宗教之意義

宗教是對於終極的、超越經驗的、超越感知認識的、超自然的現象（例如上帝、神佛等）之「信仰」，並可能由此導出「倫理」（行為規範）。此一信仰不限於獨一無二的造物主（一神教，上帝），也包括多神教之宗教，例如道教、佛教之諸位仙佛等²。「宗教（religion）有多種定義，可以是聯繫人與神祇或超自然、神聖存在的文化體系；還可以定義為，以熱情和堅定地信念而堅持信仰的原則或理論體系。按前者定義，可分為多神論、泛神論、一神論。按後者定義，無神論，自然神論，不可知論等，也都是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宗教可能包含不同元素，包括但不限於神性，聖物，信仰，超自然存在（一個或多個），給予信徒規範或力量的終極性或超驗性生命體驗。其中『宗』表示對被神格化和人格化的自然宇宙及人類祖先神靈的尊敬和敬拜。『教』則指教育、育化、啓發等，進而側重於表述對神道、人道、或某一家理論體系的信仰和傳播³。」

典型的宗教基本要件，應包括教派名稱、經典教義、廟宇寺觀、教主信徒、聚會儀式、戒律規範等項要素⁴。我國傳統社會的宗教信仰，大致可區分為二種類型：一類是祖先崇拜，一類是多神崇拜。將兩者結合起來，即是我國宗教信仰之一大特色。民間信仰是起源於下層社會的原有信仰，並融入儒釋道的思想而產生的教派⁵。

德國實務上認為「宗教」與「世界觀」可定義為：人對於宇宙整體以及人類生命起源與目的之某些命題所產生的內在確信。其中，宗教以一種**超越人類、

² Tipke ,in:Tipke/Kruse, AO , 2009,§ 52 Tz.15.

³ 宗教，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宗教>.瀏覽日期：2025.11.16.

⁴ 莊吉發，清代民間宗教的源流及其社會功能，收於鄭志明編，宗教與文化，79年初版，台灣學生書局出版，頁101。

⁵ 同前註。

涵攝一切的超越實在（transzendente Wirklichkeit）為基礎；而世界觀則僅限於內在世俗（immanente）的理解⁶。

社會學家涂爾幹認為宗教是由神話、教義、儀式和典禮所組成之體系⁷。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一個特定集體的共同信仰，此一集體表示忠於這些信仰並履行與其有關的各種儀式。這些信仰是這個集體的全體成員所接受，並使這個團體團結一致⁸。宗教是一種與神聖事物（即性質特殊的、無法接觸的或不可冒犯的事物）有關的信仰與儀式組成的統一體系，這些信仰與儀式，將所有贊同的人團結組成一個「道德社群」，即所謂教會⁹。

二、 宗教之功能

（一）宗教培養人類「靈魂德性」，提升人格道德素養：「修心養性」

傳統各大正信宗教之教義思想，培養人類靈魂德性，提倡「修心養性」，「明心見性」，「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悟真篇》）¹⁰，性命兼修¹¹，以提升人格道德素養。

⁶ 參見聯邦行政法院判決 BVerwG, Urt. v. 27.3.1992 - 7 C 21.90, BVerwGE 90, 112, 115；聯邦勞動法院決定 BAG, Beschl. v. 22.3.1995 - 5 AZB 21/94, NJW 1996, 143, 146.

⁷ 涂爾幹，芮傳明/趙學元翻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92年，桂冠圖書出版，頁37。

⁸ 涂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頁45。

⁹ 涂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頁49。涂爾幹認為宗教的起源，包括「自然崇拜」與「精靈崇拜」，「自然崇拜」是一個宗教崇拜自然現象或偉大的宇宙力量，例如日月星辰、山川、天空、或遍佈大地的各類事物，如動植物、岩石等。「精靈崇拜」是一個宗教以「精神存在」作為崇拜對象，包括上帝、靈魂、守護神、魔鬼、精靈等，它們像人類一般具有生命和意識的角色，但其仍然與人類有區別，其威力性質不同，尤其它們擁有以另一方式影響感官的獨特性能——人類的眼睛看不見它們（涂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頁55以下）。我國道教是道法自然的信仰，提倡效法自然法則規律處世，同時又創立「三清道祖」（元始天尊、靈寶天尊與道德天尊）之人格神，引導人們回歸於自然本性（莊璧嘉編著，大道寶籙，上輯，第1版，2011年，頁92以下）。

¹⁰ 道教提倡「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係強調「自然一人一道之統一」，「精」屬於自然生理（形體），「氣」屬於生命活動（流行運化），「神」屬於精神意識（主宰中樞）。修煉之路即「由下而上、由有入無」，實現天人合一。其表現在道德與理性修養上，「煉精」非單指性節制，更包含道德節制與慾望轉化。「煉氣」為心氣平和，對應儒家「中庸」與佛家「止觀」。「煉神」乃心靈覺悟，近似康德所言「實踐理性之自覺」或亞里斯多德之「理智德」。其與「天人合一」思想的關聯，「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是內在天人合一的修證過程。「精」對

康德在「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一書中，將宗教區分為二種：

(1) 理性宗教 (Vernunftreligion)：以道德律命 (kategorischer Imperativ) 為中心，認為宗教的真正內容是實踐理性的道德法則。宗教＝道德的內在化 (理性宗教)，以後設主張 (上帝、來世) 保證最高善的可能。

(2) 啟示宗教 (Offenbarungsreligion)：依據歷史事件與啟示的信仰，例如基督教。康德主張：若啟示宗教之內容可與理性道德一致，則其具有價值；反之，若違背理性，應予以否定¹²。康德上述理性宗教理論，試圖以實踐之道德理性 (praktische Vernunft) 為宗教的基礎，使宗教從啟示信仰轉向倫理理性。其承認內在宗教 (innere Religion)，為道德自律之表現，人依理性而行善¹³。康德在上

應地氣 (物質本原)，「氣」對應人氣 (生命之流)，「神」對應天道 (精神原理) 三者融合，即「由地通人、由人合天」，實現「內在宇宙」與「外在宇宙」的契合 (資料來源：ChatGPT「煉精化氣、煉氣化神」之回應，2025.10.26.)

¹¹ 道教修練「性命雙修」之方法，可參照呂洞賓，太乙金華宗旨：「法子欲入靜。先調攝身心。自在安和。放下萬緣。一絲不掛。天心正位乎中。然後兩目垂簾。內照坎宮。光華所到。真陽即出以應之。離外陽而內陰。乾體也。一陰入內而為主。隨物生心。順出流轉。今回光內照。不隨物生。陰氣即住。而光華注照。則純陽也。同類必親。故坎陽上騰非坎陽也。仍是乾陽應乾陽耳。二物一遇便紐結不散。綱縕活動。條來條往。條浮條沈。自己元宮中。恍如太虛無量。徧身輕妙欲騰。所謂雲滿千山也。」(逍遙訣第八)，「如何人道合天心。天若符兮道自合。放下萬緣毫不起。此是先天真無極。太虛穆穆朕兆捐。性命關頭忘意識。意識忘後見本真。水清珠現玄難測。無始煩障一旦空。玉京降下九龍冊。步霄漢兮登天關。掌風霆兮驅霹靂。凝神定息是初機。退藏密地為常寂。」「回光在純心行去。只將真息凝照于中宮。久之自然通靈達變也。總是心靜氣定為基。心忘氣凝為效。氣息心空為丹成。心氣渾一為溫養。明心見性為了道。」(勸世歌第十三)」
(<https://taolibrary.com/category/category86/c86087.htm>，劉瀾日期：2025.10.26)

¹² 參見吳汝鈞，論宗教與道德之關係，https://www.litphil.sinica.edu.tw/newsletter/53/137-164.pdf?utm_source=chatgpt.com，瀏覽日期：2025.11.7.

¹³ 康德之宗教理論，將宗教從神學權威轉向理性自律，是現代宗教自由與世俗倫理的哲學基礎 (ChatGPT 說：「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2025.11.6.)。

述論宗教之第二篇〈論人類天生之惡〉中，提出「**徹底的惡（radikale Böse）**」概念。他認為人類具有自由理性，能選擇善惡，但人性中潛在傾向（Hang zum Bösen）使人容易偏離道德法則。因此，宗教的功能不是外在救贖，而是引導人進行「**道德重生（moralische Wiedergeburt）**」，即由內在理性自我改造的過程¹⁴。

黑格爾亦認為「宗教是絕對精神（des absoluten Geistes）以想像的形式（in der Form des Vorstellens）展現，並屬於倫理道德（Sittlichkeit）的領域。」¹⁵明確指出宗教屬於倫理道德生活之領域——不僅是內在信仰或超越假定，而是作為具體社會與歷史之「精神實現」。黑格爾認為：宗教＝精神自我實現的歷史形態之一，**只有在倫理生活與制度中才獲真實**；因此要把良心－義務－救贖，轉譯成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的教育、法律、習俗與公共生活。以「整合理性與歷史」。

（二）宗教培養人類慈悲博愛之「利他價值觀」與「利己利人」之共善思想

宗教培養人類慈悲心（心中有佛），仁民愛物，博愛世人，「愛人如己」（心中有上帝）¹⁶，有容乃大，包容萬物，「厚德載物」，「兼善天下」之「利他思想」，鼓勵人類行善積德，有助於人類社會共存共榮，營造共善社會，而非個人主義「自私自利」之價值觀。

例如佛教及道教均提倡「因果報應」觀念，「善有善報，惡有惡報」¹⁷，「諸惡莫作，眾善奉行」¹⁸，以鼓勵人類行為應「止惡揚善」，「己所不欲，勿施於

¹⁴ ChatGPT 說：「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2025.11.6.

¹⁵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宗教哲學講演錄》), Einleitung.

¹⁶ 舊約聖經《利未記》19:18 (Leviticus 19:18)：「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卻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英譯：You shall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I am the Lord.）新約聖經《馬太福音》22:37-39 記載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馬可福音》12:31「要愛人如己。」

¹⁷ 道教太上感應篇記載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¹⁸ 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卷一：迦葉問言：「何等偈中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時，尊者阿難便說此偈：「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是諸法本，

人」（勿傷害他人）。儒家及墨家均提倡祭祀感恩天地及祖先，敬畏鬼神「賞善罰惡」¹⁹，教導人民培養「感恩之心」與「孝道倫理」觀念，以營造社會之善良風俗習慣。

按西方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源自拉丁文*individuum*，意指「不可分割之個體」）思想，主張個人之個體具有獨立的價值、尊嚴與自主權，社會與國家制度應以個人之自由與權利為中心設計。「個人主義」亦指一種個人人格或生命態度：即盡可能追求自主的決定與意見形成，而不論其是否符合社會環境或群體規範。個人主義的核心理念是一種「解放的理念」。個體擺脫過度的束縛被視為愉悅，集體則被認為具有限制性與壓迫性。在價值體系方面，個人主義強調個人的抱負，並在「自我實現」理念，自主性、自我負責之外，特別突顯競爭觀念與能力導向。支持個人主義的另一種理由則來自經濟效率：西方的個人主義體制被認為是地球上最具生產能力的制度；從這個觀點來看，普遍的社會富裕可被理解為無數「自利行為」的結果（可比較 Adam Smith 的理論）。從思想史觀點看，個人主義的推進來自自由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其在極端情形下，甚至可能走向的「利己主義」（Egoismus），此種彼此自由公平競爭，固然有利於經濟發展，但也因為人類知識經驗能力之差異，勢必導致以強凌弱，弱肉強食，擴大貧富差距，影響社會均衡和諧發展²⁰。亦即個人主義之價值理論思想，容易流於個人自我為

便出生一切善法；以生善法，心意清淨。是故，迦葉！諸佛世尊身、口、意行，常修清淨。」迦葉問曰：「云何，阿難！增壹阿[＊]含獨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餘四阿[＊]含亦復出生乎？」阿難報言：「且置。迦葉！四阿含義，一偈之中，盡具足諸佛之教，及辟支佛、聲聞之教。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諸善奉行；心意清淨，自淨其意；除邪顛倒，是諸佛教，去愚惑想。云何，迦葉！戒清淨者，意豈不淨乎？意清淨者，則不顛倒；以無顛倒，愚惑想滅，諸三十七道品果便得成就。以成道果，豈非諸法乎？」（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0125_001，瀏覽日期：2025.10.20）

¹⁹ 墨子明鬼下篇：「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意指古代聖王必定認為鬼神是存在的，所以他們盡力侍奉鬼神很厚重。）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意指應當相信鬼神能夠賞賢和罰暴。這本是應施之國家和萬民，確實可用以治理國家、謀利萬民的大道。）

²⁰ <https://de.wikipedia.org/wiki/Individualismus>，瀏覽日期：2025.11.13.

中心之自私自利觀念，而危害他人或社會、環境等公共利益，導致人類彼此鬥爭，互相傷害，無法共善共存共榮。

宗教之利他思想，強調利己與利人兼顧，則可導正上述極端個人主義思想之缺失。學者即有指出「自由意謂著個體人格能不受阻礙地發展其特質，並能完全展現其能力。隨著這種實現的程度加深，不同天性的差異必然愈加銳化。當這些內在差異透過個人自由得以完全展開時，它們便不可避免要在人的相互關係中尋求表現，並因此也產生出一種外在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雖然（或正因為）更為「公正」，卻不一定比歷史上形成的不平等更小。或許正是對此情勢的一種本能感知，才使得「博愛」被加入自由與平等之後，成為第三項訴求。因為唯有透過明確的利他主義——即用道德方式自我克制，不主張天然優勢——才能在自由已然破壞平等之後，再度恢復平等。」²¹

宗教提倡「責任個人主義」（Verantwortlicher Individualismus，individualism of responsibility）²²，主張：自由應與責任並行（Freiheit und Verantwortung），權利與義務對等原則（享受權利，應同時負擔義務），個人之自由及權利之行使，

²¹ Georg Simmel（齊美爾，被視為「現代性社會理論之父，社會學的印象派大師」

（the impressionist of sociology），*Die beiden Formen des Individualismus*，（原載：《自由之言》，法蘭克福精神生活領域進步雙週刊，1901 年 10 月 5 日，第 1 卷第 13 號，397 - 403 頁）認為個人主義有兩種類型：「形式化個人主義」與「質量化個人主義」。其一是 18 世紀之個人主義思想，為「形式化個人主義」，其理想要求：「孤立而本質相同的個體，由理性普遍法則與自然利益協調維繫。」把人立於完全解脫一切束縛的「自我」之上，而這個自我又被詮釋為所有人共有、同等價值的「普遍人性」。由此將自由與平等（或：個體性與平等）統一融合。其二是 19 世紀提倡「質量化個人主義」，主張各種高度分工、彼此異質、由基於分工的組織結構彼此聯繫的個體所構成。在現代經濟中，這兩種原則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

<https://socio.ch/sim/verschiedenes/1901/individualismus.htm>. 瀏覽日期：2025.11.13.

²² 責任的個人主義強調：個人是道德行為者，個人對行為後果負責，個人對自身生命方向負責，個人與超越者（上帝、道、法）之間建立直接倫理關係，群體不再完全替個人承擔救贖、罪責或命運，它代表一種道德上的個人化（moral individualization）。基督教早期思想中強調：每個人都需為自己的罪與救贖負責，而非由民族或家族承擔。例如聖經《以西結書》第 18 節表示：「子不為父擔罪，父不為子擔罪。義人的善果必歸自己，惡人的惡報也必歸自己。」

須同時顧及他人、社會與自然環境之利益。法律體系應從「權利中心主義」轉向「責任倫理中心」。亦即**責任個人主義**，要求個體在行使自由與權利之「利己行為」時，必須同時兼顧「利他行為」：承擔對他人、社會與自然的倫理責任。此一「利己利人」之行為模式，可認為「個人主義 × 天人合一」之整合理論：以**自由為體、以和諧為用；以理性為器、以仁心為道**。它融合了：西方自由主義的**自律與尊嚴**（Kant）；現代社會倫理學的**責任原則**（Jonas, *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 1979）；東方「天人合一」思想中「和諧與節制」的觀念。

（三）宗教之教化人心、淨化社會的功能

宗教之慈悲利他思想，提高人類之人格道德情操，可促進人際間「愛心與和諧」關係，增進社會祥和之氣，化解暴戾之氣，具有淨化社會人心功能，可營造社會善良風俗習慣與優良生活文化。

在儒家思想中，提倡以天道人道教化人心，展現「天人合一」思想。在易經觀卦「《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²³《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表示古代聖王透過灌禮²⁴來展示王道，達到風行草偃的教化功效。這是以宗教來感化人心，也就是所謂的「神道設教」²⁵。透過宗教儀式之觀摩學習，萬民觀仰，神道設教。

有關神道設教，有認為「神道設教」，就是指君王順應自然的天道來教化百姓，使天下萬民馴服，從而達到社會有序治理的目的。「神」亦可理解為「上天上帝」或鬼神之意義，上天（上帝）為萬物之主宰，神道成為一種君王利用上帝

²³ 白話翻譯：「偉大的視野居於上位，行事謙順而柔和。以公正中正之道來觀察天下。仔細審視（如洗手潔淨）而不貿然奉獻；誠信而端莊。藉由從下而上的觀察來教化眾人。觀察天地之神聖大道，使四季運行無誤。聖人便依這大道來施教化，所以天下人心歸服。」

²⁴ 觀摩學習、萬民觀仰，神道設教。「觀」的字義有兩面性：展示讓人用心觀看是觀，用心觀看展示也是觀。觀卦也有兩面性，而這個兩面性則是用古代的「灌」禮來體現，觀卦典故即源自於「灌禮」：帝王以灌禮展示王道，下則以觀看灌禮而受到教化。灌與觀的字源同樣來自於藺字，因此觀亦假作灌，王家台秦簡就作「灌」。灌通盥、裸。灌禮是禘祭中在獻牲之前，以加了香料的酒澆到地面以求神降臨。（易經今解，**觀卦** 風地觀，易學網，<https://www.eee-learning.com/book/neweee20>. 瀏覽日期：2025.10.20）

²⁵ 易經今解，**觀卦** 風地觀，易學網，<https://www.eee-learning.com/book/neweee20>.

或鬼神「賞善罰惡」觀念，以統治和教育人民的方式和方法。因此，「神道設教」也就逐漸從一種現實的政治理論，轉變為一種宗教統治理論。²⁶

我國民間信仰的共同宗旨，主要在勸人燒香誦經，導人行善，多做功德，祈福消災，解說沈淪，求生淨土，其思想觀念與佛教教義相近²⁷。

就此有認為宗教對於社會的功能如下：「宗教具有超越個人與社群的力量，並提供道德與規範的來源。透過該等力量達到促進社會整合與強化成員集體間的認同感。另外宗教可以使現有的社會規範加以神聖化，有利於社會穩定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合理強化社會階層存在的必要性。對文化而言，宗教具有讓文化被神聖化的功能，同時也進一步影響文化的價值觀與規範。宗教亦給提供人們一套的世俗價值理念，尤其是善與惡的解釋，並提供個人更寬廣的角度看待世界。」

28

（四）宗教安定人心（療癒心靈）之功能

宗教提倡因果報應觀念，尤其佛教三世因果循環觀念，對於個人的功能而言，「宗教提供個人慰藉心靈滿足的需求，並透過信仰中心的方式提供歸屬感、以儀式的方式提供成員彼此間的認同感。」宗教解釋人類的苦難（生老病死）原因，並提出療癒心靈的方法²⁹，使人類心靈安定，無有恐懼³⁰，而有信心繼續生

²⁶ 道教文化中心資料庫，神道設教之解說，<https://zh.daoinfo.org/index.php?title=神道設教&variant=zh-hant>，瀏覽日期：2025.10.20.

²⁷ 莊吉發，清代民間宗教的源流及其社會功能，收於鄭志明編，宗教與文化，79 年初版，台灣學生書局出版，頁 102。清末民初王鳳儀著，性理療病徵驗錄，提出經由宗教信仰及修心養性與陰陽五行理論，調理身心氣息循環，而發揮治病效果之實例（<http://taolibrary.com/category/category87/75.htm>，瀏覽日期：2025.11.22）。

²⁸ 宗教社會學，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宗教社会学>，瀏覽日期：2025.11.15.

²⁹ 佛經認為誦經唸佛連結正能量，營造良善能量場，而排除負能量，具有（因果病）醫療／消災解厄功能的，例如大方等陀羅尼經護戒分卷第四：七佛滅罪真言。《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藥師佛名號「聞我名者，諸病悉愈。」。《大悲心陀羅尼經》：大悲咒「能除一切病。」《楞嚴經》：楞嚴咒「能滅毒害。」《金光明最勝王經》：四天王護持誦持者消災、治病、護國安民「病災皆消。」《觀世音普門品》：念觀音名號「諸病苦惱，念彼觀音，即得解脫。」就此有認為佛教所說的治病，其機制不是「神力直接治病」，而是誦經唸佛使心念安定（心理），調整呼吸與壓力（生理），消除煩惱（精神），善業與福德圓滿（因果），菩薩護念（信仰層次）（ChatGPT 說：「佛經是否記載咒語、佛號具有治病／預防疾病的效果？」之回答，2025.11.22）。

存發展，就此宗教可以發揮協助人類生存之功能³¹，並可以發揮整合社會群體，營造共同價值觀，協助人類認識理性的社會規範的功能³²。亦即宗教關心「了脫生死」問題，包括「肉體苦難的解除」與「精神極樂的長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上天堂）³³。此外，早年民間信仰也多有民俗醫療的知識與經驗，可以協助病人療癒身心；並從事許多公益慈善活動，救濟貧困，發揮社會救助與社會福利功能³⁴。

心理學研究證實佛教修行能：（1）減少焦慮與憂鬱（meta-analysis），（2）降低壓力荷爾蒙（皮質醇），（3）強化腦部與情緒控制（前額葉皮質），（4）增加同理心與慈悲，（5）降低 PTSD 症狀（軍人、創傷患者研究）³⁵。

³⁰ 潘樹仁（香港天德聖教廿字學會創會會長），蕭大宗師在宗教哲學上之偉大成就— 由精神治療建構聖者之道，指出：「問：天地氣數，何以致變？（大宗師）答：即是因人心所轉移，今日之殺伐，非天之殺伐，乃人之殺伐，非人之殺伐，乃人之心地殺伐，殺伐者怨氣也，怨氣充之於上，凝之於下，結之於中，以致於劫運起矣，若要挽此浩劫，除非回此人心，既要回此人心，必須治其病，若要治其病，必須光明其心，行診者若是，被診者若是，其病莫不霍然。」」

<https://www.tienti.tw/node/1093>. 瀏覽日期：2025.11.15.

³¹ 法藏法師認為宗教有五種功能：生命覺醒力，苦難療癒力，人性（理性）的超越力（善超越惡），人生指引底佑力以及善性的凝聚力（人生價值）（參見法藏法師演講，Day6 上午場/玉靈千手觀音院-天地人三光共照臺灣寶島現出乾坤日月大聖會(114.11.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Cbj28Tns7M>. 瀏覽日期：2025.11.22.）。

³² 莊吉發，清代民間宗教的源流及其社會功能，收於鄭志明編，宗教與文化，79 年初版，台灣學生書局出版，頁 128。

³³ 鄭志明，台灣民間鸞書的神道設教，收於鄭志明編，宗教與文化，79 年初版，台灣學生書局出版，頁 205。

³⁴ 清代民間宗教教首許多具備民俗治知識經驗，常為村民治病，茶葉治病（具有清熱解毒）為常用方法（莊吉發，清代民間宗教的源流及其社會功能，收於鄭志明編，宗教與文化，79 年初版，台灣學生書局出版，頁 129）。

³⁵ 以佛教禪修為基礎的正念介入，可以顯著減少焦慮與憂鬱症狀。詳見 Zuo, X., et al. (2023). *The efficacy of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on mental health of adults: A meta-analysis*.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https://www.frontiersin.org/journals/public-health/articles/10.3389/fpubh.2023.1259250/full?utm_source=chatgpt.com. 瀏覽日期：2025.11.21; Goyal, M., et al. (2014). *Meditation programs for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well-be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AMA Internal Medicine*, 174(3), 357 – 368.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internalmedicine/fullarticle/1809754?utm_source=chatgpt.com. 瀏覽

依據德國社會學家盧曼（Niklas Luhmann）之系統理論，宗教是一個自我指涉的社會功能系統（Funktionssystem），其核心任務並非「與神溝通」或「維護道德」，而是在社會溝通中處理「內在」（經驗世界）與「超越」（非經驗世界）³⁶之間的差異，藉此產生意義與秩序³⁷。亦即宗教的功能是：把可處理的「內在」與不可處理的「超越」連接起來，使世界變得有意義（Sinn）。

宗教提供人類在面對「不可理解之事」（死亡、苦難、命運）時的一種**意義生成機制（Sinnproduktion）**，透過象徵與儀式，將不可知的「超越領域」轉化為可理解的社會語意。此一轉換功能，使宗教能夠：

1. **化解偶然與不確定性（Kontingenzbewältigung）**：以信仰與教義賦予事件意義，維繫世界之秩序感³⁸。
2. **建立終極意義與安慰（Sinnhorizont）**：將有限生命置於無限與永恆的脈絡中，賦予行動以道德方向³⁹。
3. **制度化超越經驗**：透過禮儀、聖典與宗教組織，使宗教經驗得以在社會中重現並持續⁴⁰。

日期：2025.11.21.ChatGPT 說：「佛教如何療癒心靈？」指出：佛教的核心觀點：心靈本身具有「可療癒性」，佛教並不把痛苦視為「外來敵人」，而視為：情緒、思想、欲望、執著與無明（avidyā）所造成的「心的狀態」。只要心的結構改變，痛苦也會改變。因此，佛教治療的方向是**調整「心的機能」**：「轉念（正念），覺察，放下（止觀禪、空性觀），慈悲（慈心禪：用慈悲療癒傷痛），智慧」，而不是僅僅壓抑情緒或逃避現實。

³⁶ 在此所謂「內在」（Immanenz），指經驗領域，可以被人類經驗、感知、處理、理解的「此界範圍」：可在世界中經驗到，可由人類行動改變，可用語言描述，可被科學或日常經驗理解。例如：生命、疾病、財富、社會關係，自然事物與生活事件，人類能以行動介入與調整的領域。、**內在＝「此世」、「可處理的世界」**。所謂「超越」（Transzendenz），指超越人類可經驗、可掌控、可理解範圍的領域：無法直接經驗，無法由人為改變，超出理性與語言可完全掌握，與「不可測、不可控、不可知」相關。例如：死亡、永恆、神、神性，救贖，宇宙的終極秩序，生命意義的終極來源。**超越＝「彼岸」、「不可掌握的領域」**（ChatGPT 說「什麼是：超越／內在」，瀏覽日期：2025.11.16.

³⁷ Niklas Luhmann, *Die Religion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Suhrkamp, 2000, S. 45 ff.

³⁸ Ibid., S. 132 – 135（關於「Kontingenzbewältigung」功能）。

³⁹ Niklas Luhmann, *Funktion der Religion*,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82, S. 17 – 20.

因此，宗教的社會功能不在於消除「超越／內在」的差異，而在於以**溝通結構將其轉化為可理解的意義秩序**。宗教在法社會學意義上，即是社會中處理「意義危機」的制度化機制⁴¹。宗教協助社會在無限複雜的世界中「創造意義」（Sinn）與「減少不確定性」，以處理無法完全掌控的未來、痛苦、死亡等問題。

此理論啟示現代法制中對宗教之保障：宗教自由的憲法意義，不僅在於個人信仰之內在自由（innere Freiheit），亦在於宗教作為「意義產生系統」對整體社會倫理與文化秩序的功能性貢獻。故宗教基本法應從此觀點出發，強化宗教制度之社會整合與精神安定功能⁴²。

（五）宗教對於社會倫理價值觀以及傳統文化風俗習慣之貢獻

宗教為文化與倫理之「深層制度資本」，宗教對文化風俗與倫理價值之貢獻，不在於形式上之信仰，而在於：

1. **倫理規範性**——維繫社會良知與道德秩序；
2. **文化延續性**——保存民族精神與生活儀式；
3. **公共參與性**——透過慈善、教育、環保等具體行動實踐倫理；
4. **跨世代意義性**——讓社會價值具歷史深度與未來導向。

因此，宗教在現代法治國中不僅是自由保障的對象，更是倫理秩序與文化之共建者（Mitgestalter der kulturellen und ethischen Ordnung）。

1. 宗教為形成傳統倫理價值觀之主要淵源（Religion als Quelle der ethischen Werteordnung）

⁴⁰ Ibid., S. 52 – 56（宗教作為「意義再生機制」）。宗教的「超越經驗」（如啟示、神秘體驗、與神聖者相遇）若僅停留於個體內心，就無法形成「宗教」。宗教得以成為社會制度，是因為：**個體的超越經驗，透過禮儀、象徵、聖典與組織，被社會化、制度化，得以重現、延續、傳遞**。這個觀念在宗教社會學屬於「宗教制度化理論」核心。亦即宗教乃「集體再現」（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儀式，使神聖經驗從個人轉化為社會共同體的持續活動，集體的神聖經驗透過制度持續化（涂爾幹著，渠敬東/汲喆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2018年1版5刷，商務印書館，頁313-323）。

⁴¹ Niklas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84, S. 489 – 492.

⁴² Niklas Luhmann, *Die Religion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Suhrkamp, 2000, S. 221 – 228.

宗教教義提倡人格道德修養，培養人類公共倫理道德價值觀。例如各大宗教共同之價值理念：「諸惡莫作，眾善奉行。」⁴³儒家提倡孝道倫理與仁義禮智信（智仁勇），居仁由義及仁民愛物之處世態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傷害他人）等倫理道德觀念深植人心，佛教提倡眾生平等、慈悲利益眾生以及三世因果報應之思想觀念，道教提倡「舉頭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的善惡因果觀念，凡此均主張「行善去惡」的人格價值理念以及「博愛利他」的處世態度，建立人類相互寬容待人接物的和諧價值觀，已經逐漸形成我國傳統社會普遍接受的倫理價值觀，是凝聚社會團結力量之基礎，並可協助促進人類社會和平相處。

哲學家黑格爾亦認為宗教若要「在理性範圍內」成立，必須化為**歷史共同體的倫理力量**，在法制、習俗、教育與公共制度中具體化，而不是僅停留在個體的內在確信與對超越者的道德後設假定。這就是黑格爾所謂把「理性與歷史」真正統合：理性作為歷史的自我展開⁴⁴。

黑格爾認為真正自由的意志是倫理的意志（der sittliche Wille），它在倫理性（Sittlichkeit）之中、在普遍共同倫理生活的實存中——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獲得其現實性⁴⁵。黑格爾在此指出，理性與自由並非抽象理念，而是「在倫理生活之制度結構中」獲得具體化。宗教若要「合理存在」，也必須內化為這一倫理共同體的實踐理性力量。「宗教是國家的基礎，因為它是普遍的心志（Gesinnung），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紐帶⁴⁶。」宗教的真理不是停留於個人信仰，而是構成社會公共精神的核心，並在制度、教育與法之中實現。這正是宗教「化為歷史共同體的倫理力量」的含義。黑格爾認為「凡是理性的，就是現實

⁴³ 鄭志明，台灣民間鸞書的神道設教，收於鄭志明編，宗教與文化，79 年初版，台灣學生書局出版，頁 208。

⁴⁴ sergiotenzenbaum.org. 瀏覽日期：2025.10.26.

⁴⁵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1, §33 Zusatz. 黑格爾，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五南出版，2020 年初版，頁 189 以下。

⁴⁶ Hegel, Philosophie des Rechts, §270 Zusatz. 黑格爾，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五南出版，2020 年初版，頁 429。

的；凡是現實的，就是理性的。」⁴⁷這句名言表達了理性與歷史的統一：理性不在歷史之外，而是通過歷史、制度與共同體展開自身的真實性。

宗教團體除弘揚教義之外，更基於**博愛精神，提供愛心社會服務**，從事許多慈善公益活動事業，以實踐宗教愛心倫理。此種公益活動已納入社會福利體系，顯示宗教價值轉化為公共倫理資源。

2. 宗教對於傳統文化與風俗習慣之貢獻 (Die Beiträge der Religion zur Bewahrung traditioneller Kultur und Sitten)

宗教不僅是信仰體系 (Glaubenssystem)，更是文化與倫理秩序的深層制度資本。宗教思想與儀式長期滲透於生活風俗，形成民族文化記憶與倫理規範。宗教在此意義上，兼具倫理功能 (Ethosfunktion) 與文化延續功能 (Kulturkontinuität)，構成「精神文明」之核心⁴⁸。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 條第 2 款第 4 目規定：「二、無形文化資產：-----
(四) 民俗：指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儀式、祭典及節慶。」宗教節慶、祭祀儀式、建築藝術及相關物件，皆屬可歸入之文化資產。是以，宗教對於文化風俗之保存與再生，具備法律上之公共利益意義。

宗教為風俗文化的生命脈絡，宗教對傳統文化風俗習慣的貢獻，可總結為三重層次⁴⁹：

歷史層面（傳承）：保存民族記憶與地方儀式。

倫理層面（規範）：賦予行為以價值意義與道德方向。

社會層面（凝聚）：透過共同節慶與禮儀鞏固社群認同。

宗教不僅塑造了風俗習慣，更構成文化持續與社會秩序之核心力量。如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 *Kruzifix-Beschluss* 所指出：數個世紀以來，許多基督教傳統已成為社會普遍文化基礎的一部分，數個世紀以來，許多基督教傳統已成為社會普遍文化基礎的一部分。聯邦憲法法院早於審理具有傳統巴登意義之「具有基督宗教性質之聯合學校 (Simultanschulen)」是否合憲之案件中，即已指出：國家對基督宗教之「合法的肯定」 (zulässige Bejahung des Christentums)，主要係指承認基

⁴⁷ Hegel, Philosophie des Rechts, Vorrede.

⁴⁸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 Tübingen: Mohr, 1920, S. 237.

⁴⁹ 同前註。

督宗教作為一種對西方歷史具有深刻影響之文化與教育因素，而非承認其信仰真理。唯有在此種限度內，此一對基督宗教之肯定，方可因歷史事實之持續影響，而對非基督徒仍具正當性（參見 BVerfGE 41, 29〔第 52 頁〕）⁵⁰。即認為基督教—西方文化傳統深刻地形塑了社會的倫理與風俗基礎，國家在維持中立的同時，仍可承認並尊重其文化貢獻。

（1）倫理層面：宗教以信仰與教義內化道德規範，形塑「善惡有報」「賞善罰惡」之社會良知。黑格爾（Hegel）指出，宗教乃倫理生活（Sittlichkeit）的精神根基，透過制度、教育與風俗轉化為公共理性⁵¹。

表：宗教－倫理功能－文化貢獻對照表

| 宗教(Religion) | 倫理功能(Ethosfunktion) | 文化貢獻(Kulturbeitrag) |
|--------------|---------------------|-----------------------|
| 儒家 | 仁義禮智信；孝道倫理；強調人倫秩序 | 春秋祭祀、清明掃墓、鄉飲酒禮；禮樂文化保存 |
| 佛教 | 慈悲利他、因果報應、明心見性 | 盂蘭盆節、法會儀式、寺院建築與雕塑藝術 |
| 道教 | 天人合一、尊天敬祖、齋戒修身 | 王船祭、迎神遶境、廟宇藝術與方士符籙文化 |
| 基督宗教 | 愛人如己、寬恕與博愛、公益慈善 | 聖誕節、復活節、教堂音樂藝術與社會服務 |
| 伊斯蘭教 | 敬主守法、節制生活、社群互助 | 齋戒月、清真寺建築、美術與書法傳統 |

宗教風俗的倫理意涵，乃是風俗的道德化（Ethosbildung）。宗教透過禮儀反覆實踐，使社會行為內化為道德規範。宗教儀式連結個體與群體，賦予生命神聖意義；這種「文化資本」（*kulturelles Kapital*）構成人類社會的倫理結構。宗教禁忌（如齋戒、守節）在歷史上維繫社會秩序與公共道德。即使世俗化後，其象徵功能仍在，形成「世俗宗教性」（*Säkularisierte Religiosität*）。基督教之「愛人如己」（*Nächstenliebe*）與儒家之「禮義廉恥」，皆為宗教所生成的社會倫理語彙。

⁵⁰BVerfG Kruzifix-Beschluss, Rn.43. BVerfGE 93, 1 [15].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DE/1995/05/rs19950516_1bvr108791.html. 瀏覽日期：2025.10.26.

⁵¹ G.W.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270.黑格爾著，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第一版，2020 年，頁 428-440。

（2）文化層面：

人類社會的風俗習慣（*Sitten und Bräuche*）多根源於宗教禮儀與祭祀制度。宗教提供了行為的意義結構，使人類生活的重複性行動獲得神聖與倫理的正當性。

宗教儀式（Ritual）與節慶（Feierlichkeit）具再現性功能，透過時間週期與共同體參與，重構文化記憶（kollektives Gedächtnis）。這種「象徵秩序的再生」（Reproduktion von Sinn）使文化得以延續⁵²。亦即宗教儀式（Rituale）是一種「可預期、可複製、可重複」的操作，宗教儀式將時間「節奏化」（rhythmisieren），年度節慶、禮拜週期創造「可預期的再現（Wiederkehr）」，這種週期性本身就是「再現文化記憶」的形式。世界各地均有保留以宗教為核心的習俗，如神明遶境活動，復活節篝火（*Osterfeuer*）或聖尼古拉遊行（*Nikolauszug*）。這些活動兼具信仰與文化象徵意義，成為地方社群的共同記憶（**地方風俗之文化再生**）。

正如韋伯（Max Weber）所言：「宗教倫理是文化生活的內在靈魂」〔*Die religiöse Ethik ist die innere Seele des Kulturlebens*〕⁵³。宗教倫理在文化結構中的**導向功能（Richtungsfunktion）**：（1）宗教倫理賦予文化以價值意義（*Sinn*）；（2）決定人類行動的「意向性」與「合理性」形式；（3）因而宗教成為文化體系的內在靈魂。亦即宗教構成一個社會的文化記憶與社會秩序的深層結構⁵⁴。宗教因此不僅是信仰現象，更是文化秩序與社會倫理的基石。

在我國，儒釋道以及民間信仰的宗教哲學思想，數千年來已經融入社會人心，轉化成民眾固有的處世經驗與生活態度，構成中華文化之精華與一般國民生活之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與人生哲學⁵⁵。「宗教活動」與「民俗活動」常有重疊。一般而言，**民俗活動**係指具有群體傳承性、社會文化功能與祭儀性之公共儀典，不必以「特定宗教教義」為基礎，而可能涵蓋宗教色彩、祖靈信仰與地方信仰。

⁵² Niklas Luhmann, *Funktion der Religion*,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82, S. 52 – 56.

⁵³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 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 –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20 [= 1988 Suhrkamp Ausgabe], S. 237.

⁵⁴ ChatGPT 對於「宗教對於傳統文化風俗習慣之貢獻」之回應，2025.10.28.

⁵⁵ 鄭志明，台灣民間鸞書的神道設教，收於鄭志明編，*宗教與文化*，79 年初版，台灣學生書局出版，頁 204。

下列可被視為**兼具宗教性與民俗性**、或可被定性為**民俗活動**之例：（1）迎神賽會（遶境），其性質：公共儀式、神明巡安、保境安民 → **典型民俗活動**
（2）祭祀祖先與春秋祭，（3）中元節普度（拜好兄弟、放水燈、施食）。具有民俗儀典與生命禮俗之**民俗活動性質**。

上述民俗活動為由群體共同實踐、具歷史傳承性、公共參與性與社會記憶功能之儀式、節俗、祭典與表演行動，並不以特定宗教教義為必要條件。此類活動具公共性（非純私人個人），具傳承性與節令性，具有社會文化象徵與地方認同，儀式性但非僅教義性，可列為文化資產。可以「文化保存」框架保障，而非單純宗教自由⁵⁶。

（3）社會層面

宗教節慶、廟宇建築、祭祀儀式等，不僅具宗教意涵，亦為全民共享的文化象徵。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條第2款及第15條規定，地方政府得指定具文化價值之宗教活動為「無形文化資產」，並予以登錄與保存。

（4）經濟層面：經濟理性與經濟倫理

韋伯認為宗教形成特定人格類型（Berufsmensch），而這種人格類型，適應並推動了特定經濟制度的發展。亦即宗教信仰所內化於人之生活態度、行動動機與行為規律，並對經濟行為與經濟制度產生深刻且持續的塑型力量的那些實際倫理導向，即是所謂「經濟倫理」（Wirtschaftsethik）。經濟倫理係以宗教為根源之生活態度與行為規範，它是宗教內在化成行動傾向之後，在經濟生活中的具體表現。亦即宗教養成某種「職業倫理人格」（Berufsmensch），此一人格成為現代社會的普遍型態⁵⁷。

⁵⁶ ChatGPT 對於「台灣哪些宗教活動可認為屬於民俗活動」之問題回應，2025.11.2.

⁵⁷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 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 –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22, S.203. <https://ttu-ir.tdl.org/items/f5083b6f-3f21-481e-8341-5ea70ca59c31/full>. 瀏覽日期：2025.11.3.

韋伯觀點下的「經濟倫理」三重性：

| 層面 | 內容 |
|------|-----------------|
| 宗教心理 | 人對命運、救贖、責任之理解 |
| 生活方式 | 工作態度、節制、金錢觀、時間觀 |

韋伯的「經濟倫理」不是一套教義，而是：（1）人如何看待工作、財富、節制、欲望、命運。（2）什麼被視為「正當獲利」、「正當生活方式」。（3）什麼激勵人追求成功、勤勞、節約、理性、責任。（4）什麼約束人避免奢侈、揮霍、無序、宿命⁵⁸。

例如：

| 宗教 | 形成之核心倫理 | 經濟影響 |
|-------|-----------------------|--------------------|
| 新教禁慾派 | 呼召（Beruf）、勤勞、節制、理性、自律 | 現代資本主義精神 |
| 儒家 | 和諧、關係倫理、官僚文化、調和心態 | 中庸之道 均富思想 |
| 佛教 | 出世、破除欲望、苦行 | 利人利己之價值觀 社會主義精神 |

韋伯指出：「工作被視為「天職」對現代勞動者而言，正如同獲利被視為「天職」對企業家而言一樣具有典型意義。17 世紀敏銳的英國觀察者佩蒂爵士（Sir William Petty）正因此將荷蘭的經濟力量歸因於其眾多「異議者」（加爾文派與浸禮派），因為這些人認為「勤勞與事業乃其對上帝的本分」。-----總言之：現代資本主義精神的一個構成要素——以天職理念為基礎的理性生活方式——誕生於基督教禁慾精神之中。」⁵⁹

三、宗教團體為公益團體

（一）宗教團體之意義

| | |
|---|----------------|
| 社會表現 | 商業習慣、財富分配、制度形成 |
| <p>即：深層信念 → 行動習慣 → 經濟秩序</p> <p>經濟倫理 = 宗教價值 → 行為動機 → 經濟行為模式 → 制度結果</p> | |

⁵⁸ ChatGPT 對於「韋伯所謂「經濟倫理」是何意義？」之回應，2025.11.3.

⁵⁹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I: 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 –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22,S.200f. <https://ttu-ir.tdl.org/items/f5083b6f-3f21-481e-8341-5ea70ca59c31/full>. 瀏覽日期：2025.11.3.

宗教團體（Relionsgemeinschaft）為全面履行宗教任務之團體，亦即「宗教團體係指一種聯合組織，將信奉同一宗教信仰或若干相關信仰的成員結合起來，以全面履行由共同信仰所設定之任務。」⁶⁰「宗教團體之『全面任務履行』要件，旨在將宗教團體與宗教協會加以區分；後者之目的僅為部分維護成員宗教生活。」因此，宗教團體應被理解為一種以**全面維護宗教信仰**為核心任務之人群結合，同時具備以下三項特徵：（1）**宗教或世界觀之培養**（Pflege einer Religion bzw. Weltanschauung）；（2）**特定的共同體組織結構**（spezifische gemeinschaftliche Struktur）；（3）若屬聯合組織（Dachverband），則需符合額外之特別要件⁶¹。

（二）德國公法人之宗教團體

德國承認正規宗教團體具有公法人地位，德國基本法第140條連結威瑪憲法第137條第5項即規定：「宗教團體在以往為公法人者，仍為公法人；其他宗教團體如依據其章程及成員人數足以確保其存續者，可依申請，授與其相同公法人之權利。」但基本法並未規定授予公法人權利之「程序形式」，因此各邦可自行決定：由行政機關以行政處分（Verwaltungsakt）作成，或由邦政府以法規命令（Rechtsverordnung）方式發布。

例如德國巴伐利亞邦2019年5月1日《巴伐利亞邦教會稅法》（Kirchensteuergesetz – BayKirchStG）第1條第2項規定教會、宗教團體及世界觀團體，具有下列情形，應依申請，授與其公法人權利：（1）依其章程與會員人數，能保證其持續存在（Gewähr der Dauer）；所稱「持續存在之保證」亦包含該團體有能力**長期履行財務義務**。（2）忠於法秩序（Rechtstreue）；（3）其事

⁶⁰ 德國聯邦行政法院判決（BVerwG, Urt. v. 23.2.2005 – 6 C 2.04, BVerwGE 123, 49, 54）。

⁶¹ 德國北萊因－西發邦利亞邦（NRW）關於宗教與世界觀團體授予公法人權利之準則（2017年3月14日公布）（Leitfaden für die Verleihung der Körperschaftsrechte an Religions- und Weltanschauungsgemeinschaften vom 16. Februar 2017 Bekanntmachung der Staatskanzlei vom 14. März 2017.）

https://recht.nrw.de/lmi/owa/br_bes_text?anw_nr=1&gld_nr=2&ugl_nr=222&bes_id=36407&val=36407&ver=7&sg=&aufgehoben=N&menu=1#NORMFUSS. 瀏覽日期：2025.10.24.

務所所在地設於巴伐利亞邦，或設於德國其他邦，若該邦已授與其公法人地位者。申請人應具體說明並證明其符合授予要件⁶²。

又如德國北萊茵-西伐利亞邦在2014年9月16日公布《關於宗教與世界觀團體被授與及剝奪公法上法人權利之法律》(公法人地位法)(Körperschaftsstatusgesetz)⁶³第1條規定宗教與世界觀團體，若符合下列授予要件(Verleihungsvoraussetzungen)情形，應依申請授予公法上法人之權利：

1. 其宗教團體之章程(Verfassung)及會員數量須提供**持續存在之保障**，即該團體應能**跨世代長期存在**，並具備履行授予後所賦予公法人權利之能力；
2. 該團體應具備**法律忠誠(Rechtstreue)**，且此應可自其章程(Satzung)及實際行為中具體展現⁶⁴；

⁶² 同條第3項規定：若公法人地位之授與**違法**，即使該決定已確定(不可爭訟)，仍得向將來撤銷，並於《巴伐利亞行政程序法》(BayVwVfG)第48條第2項第3句第1款情形下，得溯及既往撤銷。若授與合法，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將來廢止(Widerruf)：

1. 該團體自行申請撤回者；
2. 該團體不再屬於宗教或世界觀團體者；
3. 對其守法性產生合理懷疑者；
4. 該團體**資產無法清償債務或無力清償者**；
5. 該團體連續一年無法運作，因其無合法代表者；
6. 該團體將其**所在地遷往國外者**。

⁶³ Gesetz zur Regelung der Verleihung und des Entzugs der Rechte einer Körperschaft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an Religions- und Weltanschauungsgemeinschaften in Nordrhein-Westfalen – Körperschaftsstatusgesetz. (載於《北萊茵-西發利亞邦法律公報》GV. NRW. S. 604). https://recht.nrw.de/lmi/owa/br_text_anzeigen?v_id=10000000000000000520. 瀏覽日期：2025.10.25.

⁶⁴ 本件判決指出：「當然，並非行為一有牴觸權利與法律，即使得行為係忠於法律之保證遭受質疑。被授與法人團體地位的**宗教團體，亦不被禁止對於個案中法律就宗教自由(基本法第4條第1與第2項)與宗教自主決定權(基本法第140條結合威瑪憲法第137條第3項)所定的界限究應為何，與國家機關持不同的見解**，因而將爭議交由法院去釐清。

此外，許多原則上承認國家法律權威的宗教，**同時提出一項有利於其思想與其基於信仰所作成決定的例外保留，最後在無可避免的衝突情況下，堅持要優先遵從其信仰的要求，而非法律的規定。此類的保留，乃典型專屬於宗教的教義絕對性表徵。**在許多舊的與新的被授與法人團體地位的宗教團體，均有此種現象，但其並不被排除，依個案的情狀，獲得基本法第4條的保

聯邦憲法法院第二庭2000年12月19日「耶和華見證人取得公法人團體地位」判決要旨指出：「（1）宗教團體若想要成為公法社團（基本法第140條結合威瑪憲法第137條第5項第2句），則必須忠於法律。

a)其必須提供擔保，將確實遵守現行的法律規定，特別是當其受委託行使國家公權力時，將只有在符合憲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下，才會動用公權力。

b)此外，想要獲得公法社團地位的宗教團體亦必須要能擔保，其將來的行為不會危害基本法第79條第3項所規定基本的憲法原則、國家所託付保護的第三人基本權利，以及基本法中有關宗教自由與國家宗教法的基本原則。

（2）除此之外，基本法不另外要求必須對於國家忠誠。」

由於宗教教義所提出之天理天道以及自然法則思想，具有普世價值觀以及公共倫理道德之智慧精神，可指引人類法治社會邁向「真善美」的理想大同世界方向，以永續發展，因此經常可作為憲法基本人權價值之客觀目的解釋基準，而優越於實定法。此即所謂宗教的自然法思想⁶⁵。

3. 該團體應設有在北萊茵-西發利亞邦或德國其他邦之主事務所（Sitz）。

若其在他邦已獲授公法人地位，則本邦授與屬「第二次授與（Zweitverleihung）」。

在德國，宗教團體要成為「公法上法人（Körperschaft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KdöR）」之地位，強調必須具備「組織穩定性、財務（經濟）自立性、守法性（對於法秩序的忠誠）」三要件，於具備上述要件後，得申請授予公法人地位，而成為執行公共任務之公益團體⁶⁶。

護。當考慮到基本法第140條結合威瑪憲法第137條第5項規定，賦予公法人團體地位的最後目的，乃促進宗教自由，因此只要當宗教團體原則上已準備好，將遵守法與法律，以及適應合憲的秩序時，則其無論如何均得不受阻礙地被授與此項地位。」（張永明譯，聯邦憲法法院第二庭2000年12月19日「耶和華見證人取得公法人團體地位」判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十一）頁97以下/頁117以下）。

⁶⁵ 陳清秀，法理學，第3版，2020年，頁52以下。

⁶⁶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認為：「對於宗教團體之長期存在與否的估計，除了成員數量的標準外，該團體實際上的一切狀態，亦應被正確評斷。就此將有如下的其他指標作為依據：足夠的財政能力、最低的存立時間，以及宗教生活的強度（參考聯邦憲法法院裁判BVerfGE 66, 1【24】；柏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OVG Berlin, OVG 10,105【108 ff.】，以及NVwZ 1996, S.478；慕尼黑行政法院判決VGMünchen, ZevKR 29【1984】，S. 628,630 ff.）。此類的指標，當其並非被機械式地適用，且未干擾基本法第140條結合威瑪憲法第137條第5項第2句所要求的整體估計時，即具有實際的幫助作用。」（張永明譯，「耶和華見證人取得公法人團體地位」判決，聯邦憲法法院第二庭2000年12月19日判決，2 BvR 1500/97 - BVerfGE 102, 370，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集（十

德國「公法上法人」(Körperschaft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KdöR)之宗教團體，與一般的社團(Verein)相似，皆為以共同目的結合而成之人群體。但不同於普通社團，公法人具有公權力任務(hoheitliche Aufgaben)，有時其成員甚至是「強制加入」的(Zwangsmitglieder)⁶⁷。

(三) 私法上之宗教團體，促進宗教及道德教育，具備公益團體性質

1. 宗教團體為非營利組織

宗教團體以非營利為宗旨，不得以營利為主要目的。宗教團體依法設立之目的係「宗教信仰活動、教育與公益慈善」，其性質屬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又依據德國稅捐通則第 52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⁶⁸，無私的(非營利目的的)促進宗教事項之宗教團體，屬於有關「促進公益」活動之公益團體。

在公法人以外之其他一般宗教團體(得依據民法規定，取得權利主體能力之法人格地位)，雖然不屬於公法上團體，但因其宗教對於道德教育之貢獻，或者其經常參與社會公益慈善活動，而具有公益性，值得促進⁶⁹。例如德國巴登府騰堡邦憲法(Verfassung des Landes Baden-Württemberg)⁷⁰第 4 條第 2 項規定：「教會及公認的宗教以及世界觀團體對於在維護及加強人類生活的宗教及道德基礎方面的重要性，應予承認。」亦強調宗教對於道德教化具有重要性，值得鼓勵。又德國薩爾邦憲法(Verfassung des Saarlandes(SVerf))⁷¹第 40 條規定：「由教會

一)，頁107)。

⁶⁷ Benjamin Kirschbaum, Klare Regelungen für Anerkennung von Religionsgemeinschaften als KdöR, 09. August 2019. 瀏覽日期：2025.10.24. 德國萊茵蘭-普法茲邦(Rheinland-Pfalz)制定《公法人地位法》(Körperschaftsstatusgesetz)，針對宗教團體申請成為「公法上法人」(Körperschaft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KdöR)的認可程序，建立了更明確的法律依據。在符合相關條件的情況下，宗教團體享有依法請求承認為公法人之權利，並因此除了可徵收教會稅(Kirchensteuer)外，亦可在特定的法律框架下以公法人身分從事宗教及社會活動。

⁶⁸ 有關德國稅捐通則之中譯文，參見陳敏(1985)，《德國租稅通則》，財政部財稅人員訓練所出版。本文以下有關德國稅捐通則之中譯文，多參考其譯文，但更新最新條文。

⁶⁹ Tipke, in: Tipke/Kruse, AO, 2009, § 52 Tz.15.

⁷⁰ <https://www.lpb-bw.de/bwverf/bwverf.htm#Religion>. 瀏覽日期：112.3.15.

⁷¹ https://www.landtag-saar.de/media/32e11zo3/190410_verfassung-des-saarlandes_din-a4.pdf. 瀏覽日期：112.3.15.

及宗教團體或其所屬組織所支持之社會的及慈善的機構，以及其所設立之學校，應承認其公益性。」對於宗教團體參與公益慈善活動，認為具有公益性，值得促進。

一般宗教團體要符合公益目的之團體要件，必須其團體之活動，在對於大眾之物質、精神或道德領域，作無私之促進者（租稅通則第 52 條第 1 項）。亦即在此並非以該宗教團體信仰對象為何，其信仰之真理為何以及救贖之許諾為何，作為判斷基準。而應以該宗教在公益法上之作用以及在此一世界上之效果為準。亦即應以該宗教團體是否促進和平、自由與（統一和諧的）正義，以及該宗教團體是否想要追求在世界上以寬容的方式，尤其是人道關懷之方式生活，作為判斷基準。在此並應可認出該宗教團體所發生作用之成果。倘若宗教團體提倡不寬容甚至好鬥的方式生活（邪教），則無法促進大眾之道德領域，而欠缺公益性⁷²。

亦即受憲法保障之宗教自由之「宗教」，只有在符合憲法的內在界限範圍內，才值得促進，而具備公益性。亦即宗教活動不得牴觸較高位階之憲法價值（例如人性尊嚴），或者超越在相同憲法價值衝突時之法益衡量時之實踐整合性（融合性）之界限。此外宗教活動亦應受到公共秩序之限制，在此範圍內，宗教活動才值得促進⁷³。例如宗教團體或教派如果以從事犯罪為目標或實踐，則不具有公益性⁷⁴。

2.宗教團體得經營附屬收益事業

宗教團體若經營收益事業，必須具有**附屬性（Nebenzweck）**，即該業務：（1）不得背離宗教團體的主要宗旨；（2）所得應全部用於宗教或公益目的；（3）不得以分配盈餘為目的⁷⁵。因此，宗教團體可經營收益事業，但必須**限於宗教目的之輔助業務（Hilfsbetrieb）**⁷⁶。宗教團體雖屬於公益團體，但為獲得財政收入以穩

⁷² Tipke ,in:Tipke/Kruse, AO , 2009,§ 52 Tz.16.

⁷³ Leisner-Egensperger,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AO , 2008,§ 52 Rz.120.

⁷⁴ Leisner-Egensperger, in: Hübschmann/Hepp/Spitaler, AO , 2008,§ 52 Rz.123.

⁷⁵ 德國租稅通則第 55 條第 1 項第 1 句（AO§55 Abs.1 Satz 1）規定法人若不將收益用於法定目的，或將資產分配予會員，即喪失公益資格。

⁷⁶ 德國稅法將宗教團體活動分為三類（租稅通則 AO §64、§65、§66）：

| 類型 | 法律性質 | 稅務地位 |
|----|------|------|
|----|------|------|

定其財政基礎，應亦得經營公益事業以外之事業，此即所謂「收益事業」。宗教團體若從事收益事業，必須與其宗教或公益目的具「附隨性關聯」，即該事業之收入應主要用於宗教活動、教育、社福等公益支出，而非分配予個人或成員。宗教團體可以經營收益事業，但須符合以下三大原則⁷⁷：

- (1) 附屬性原則：收益事業僅為宗教或公益目的之輔助。
- (2) 公益化原則：所有收益應用於宗教、教育、慈善等宗旨。
- (3) 透明性原則：須依法設帳、課稅與揭露，不得分配盈餘。

因此，宗教團體得經營收益事業，但其合法性取決於「宗旨連結性」與「收益用途」。若脫離宗旨、營利為主要目的，即將喪失宗教法人之公益地位與稅務優惠⁷⁸。

日本宗教法人法第 6 條規定：「宗教法人得從事公益事業。宗教法人在不違反其目的下，得從事公益事業以外之事業。於此所生收益，應用於該宗教法人、該宗教法人所包括之宗教團體，或用於該宗教法人所援助之宗教法人或公益事

| | | |
|--|---------------------|--------------|
| 理念業務 (Ideeller Bereich) | 純宗教活動 (禮拜、傳道) | 完全免稅 |
| 目的業務 (Zweckbetrieb) | 直接服務宗教或公益目的 (醫院、學校) | 免稅 |
| 經濟業務 (wirtschaftlicher Geschäftsbetrieb) | 與宗教無直接關聯 (出版、旅館) | 課稅，但不得成為主要目的 |

⁷⁷ ChatGPT 說：「宗教團體可否經營收益事業」，瀏覽日期：2025.11.9.

⁷⁸ 宗教團體免辦所得稅結算申報認定要點第 3 點及第 4 點規定：「三宗教團體辦理下列宗教活動之收入，非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 (一) 舉辦法會、進主、研習營、退休會及為信眾提供誦經、彌撒、婚禮、喪禮等服務之收入。
- (二) 信眾隨喜佈施之油香錢。
- (三) 供應香燭、金紙、祭品、齋飯及借住廟(客)房之收入，由信眾隨喜佈施者。
- (四) 提供納骨塔供人安置骨灰、神位之收入，由存放人隨喜佈施者」、「四宗教團體之下列收入，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 (一) 販賣宗教文物、香燭、金紙、祭品等商業行為收入。
- (二) 供應齋飯及借住廂(客)房之收入，訂有一定收費標準者。
- (三) 提供納骨塔供人安置骨灰、神位之收入，訂有一定收費標準者。
- (四) 財產出租之租金收入。
- (五) 與宗教團體創設目的無關之各項收入及其他營利收入。」

業。」亦即其收益事業所產生之收益，應僅得使用於（1）該宗教團體、（2）上級宗教團體（指包括該宗教團體之宗教團體），（3）該宗教團體所援助之宗教法人，（4）該宗教團體所援助之公益、慈善事業（參見日本宗教法人法第 6 條）⁷⁹。宗教團體經營「收益事業」之所得，為維持租稅競爭中立性原則，一般認為應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⁸⁰。至於宗教團體本身之業務活動所產生收益，因不屬於收益事業之所得，依法應不課徵所得稅⁸¹。

（四）宗教團體為道德共同體

康德指出宗教有兩層形式：（1）**內在宗教（innere Religion）**：道德自律之表現，人依理性而行善。（2）**外在宗教（äußere Religion）**：儀式、教條、教會制度之宗教形式。他認為，真正的宗教應在理性與道德內心中，而非外在禮儀行為。這也是其「**道德化宗教（moralische Religion）**」的中心思想。康德提出「**理性教會（unsichtbare Kirche）**」概念，指真正的宗教共同體應是自由道德人格的聯合，而非依附於制度化教會。他稱之為「**倫理共同體**」或「**無形的道德共同體（ethische Gemeinde）**」，這是一種以道德為核心的普遍性聯合，與「**歷史教會（historische Kirche）**」形成對比。

許多宗教團體提倡身心靈修煉，配合靜坐、氣功等運動，以強健身心，故兼具運動團體之功能⁸²。

⁷⁹ 日本宗教法人法第 79 條規定，倘若宗教法人違反上述規定而違規使用其收益時，主管機關得處以一年以下之期間，命停止營業。

⁸⁰ 日本法人稅法第 4 條第 1 項及第 2 條第 6 款所定附表二。日本テンブルヴァン／朝日ビジネスソリューション／朝日税理士法人編，*図解宗教法人の法務・会計・税務*，第 1 版，2011 年，頁 134。

⁸¹ 參見日本法人稅法第 4 條第 1 項。我國財政部 86.3.19 台財稅字第 861886141 號函發布「宗教團體免辦所得稅結算申報認定要點」規定依法立案之宗教團體，無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者，亦無附屬作業組織者，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又公益團體包括宗教團體之公益事業所得，於具備法定要件時，原則上免徵所得稅。其中其年度公益事業活動支出，原則上應不得低於其收入之 60%（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8 款）。

⁸² 莊吉發，清代民間宗教的源流及其社會功能，收於鄭志明編，*宗教與文化*，79 年初版，台灣學生書局出版，頁 116。

（五）宗教團體享有宗教自由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2002 年 6 月 28 日「警示教派之危害」裁定⁸³指出：「宗教與世界觀自由之基本權除保障個人私下或公開信仰其宗教或世界觀的自由外，亦包括與其他具有共同信仰或共同世界觀認同的人結合在一起⁸⁴。經此結合而組成之團體本身，亦享有從事宗教或世界觀活動、公佈其信仰、傳播其世界觀，以及維護與促進其個人信仰之權利⁸⁵。此外，為自己的信仰與自己的確信作宣傳的自由，以及招募他人加入其宗教或世界觀的權利，亦同樣受保護⁸⁶。」

參、宗教基本法之立法必要性：傳統優良倫理道德價值觀與精神文化傳統之制度保障

一、人類社會共同倫理價值觀之維護

人類社會隨著科技進步，物質文明發展快速，社會逐漸邁向世俗化⁸⁷方向，社會價值觀也漸漸趨向「唯物主義」⁸⁸方向，由於不重視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又

⁸³ BVerfGE 105, 279. 張永明譯，聯邦憲法法院第一庭「警示教派之危害」裁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十一），頁 189 以下/頁 199。

⁸⁴ 參考聯邦憲法法院裁判 BVerfGE 53, 366 【387】；83, 341 【355】。

⁸⁵ 參考聯邦憲法法院裁判 BVerfGE 19, 129 【132】；24, 236 【246 f.】53, 366 【387】。

⁸⁶ 參考聯邦憲法法院裁判 BVerfGE 12, 1 【4】；24, 236 【245】。

⁸⁷ 「社會世俗化是指社會在發展過程中，宗教的影響力逐漸減弱，政治、教育、經濟等各個領域從宗教的束縛中分離出來的過程。這種轉型伴隨著社會思維模式從宗教轉向現代理性，以及價值觀念從終極關懷轉向現世價值的實現。世俗化在不同層面有不同表現，包括：宗教衰退、公私領域分離、社會制度的理性化以及個人行為的世俗化等。」（ChatGPT「社會世俗化」之回應意見，2025.11.2.）「世俗化就是非神聖化，它意指一個漫長的社會變化過程。這個過程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的變化，即指人類社會各個領域逐漸擺脫宗教的羈絆，社會種種制度日益理性化；二是宗教本身的變化，即傳統宗教不斷調節自身以適應社會世俗化。」（世俗化，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世俗化>，瀏覽日期，2025.11.2.）。

⁸⁸ 唯物主義（Materialism）是一套相關理論，「認為所有實體和過程都是由物質、物質力或物理過程所構成，或可歸結為物質、物質力或物理過程。所有事件和事實，實際上或原則上，都可以用身體、物質物體或動態物質變化或運動來解釋。一般而言，唯物主義的形上學理論否認精神存在、意識以及心理或精神狀態或過程的現實性，認為它們在本體論上與物質變化或過程截然不同

在政教分離的思想下，加上受到西方「價值相對主義」⁸⁹與「後現代主義」之哲學思想影響，而與宗教思想（絕對價值主義或普世倫理道德價值）脫離，邁向「極端個人主義」（強調個別化、破脆化、差異化）意識形態方向，導致自私自利、危害人類社會之結果。

而宗教教義則提倡提高靈魂理性與人格道德素養，建構普世統一之共同倫理價值觀，以建立共存共榮之和諧社會與大同世界，對於人類精神文明作出貢獻。現代法治國家強調人權、民主、環保等普世價值；對此宗教可提供深層倫理思想之資源。例如：儒釋道之天人合一思想，儒家仁義思想，道家清靜道德觀念，佛教慈悲明心見性思想、基督教愛人如己與博愛世人、伊斯蘭的*Khal ī fa*-責任倫理，皆強化友善社會與自然之永續理念。

或獨立於物質變化或過程。由於它否認精神存在或力量的存在，唯物主義通常與無神論或不可知論聯繫在一起。」（Stack, George J.. Materialism, 1998, doi:10.4324/9780415249126-DC098-1.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Taylor and Francis, <https://www.rep.routledge.com/articles/thematic/materialism/v-1>. 瀏覽日期：2025.9.16.）

⁸⁹ 相對主義（Relativism）「是指一種認為沒有普遍有效真理或價值存在的主張。相對主義者認為真理、價值的判斷往往因觀察的角度與立場不同，個人或團體之間千差萬別；而觀點之異多與所處之歷史、文化背景差異有關。相對主義根據『人的思考與價值觀不同』而推衍出『真理與價值乃相對，以情境為尺度』。依此論點，真理與價值本質上不具普遍有效性。正如知識社會學者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看法，一個社會及歷史的真理只能由該社會及歷史的觀點看方可理解。

相對主義的重要論點如下：

- 1.不同的文化與時期，對真理與價值的判斷有歧異；
- 2.沒有任何一種意見可較其他意見更能稱為真理；
- 3.客觀與真理的概念只能在一個具有共同反應的社群中，才能應用到知識與道德的判斷上。」（周淑卿，相對主義，2000年12月，教育大辭書，<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相對主義&search=主.>）。

價值相對主義是一種倫理學與價值哲學立場，認為價值判斷並沒有普遍、絕對的標準，而是依照不同的文化、社會、歷史或個人觀點而有所差異。價值相對主義挑戰「自然法」與「普遍正義」概念，傾向支持「程序正義」與「共識形成」（例如哈貝馬斯的溝通理論）。價值相對主義提醒我們：價值判斷並非中立或普世的，而往往深受文化與歷史脈絡影響。但若完全否定普遍性，則可能削弱我們對抗不正義的能力。因此現代主流立場多傾向於「**價值多元主義**」

（Wertpluralismus），在承認多元差異的同時，仍嘗試建立基本的共同規範（如人權、平等）。

故維護及促進人類社會共同倫理價值觀，有必要在法律制度上保障宗教及宗教團體之生存發展，防止國家機關不當干預與妨害。

二、社會精神文化傳統之制度保障

宗教活動兼具信仰性與公共文化性，屬於「具有社會公共性之宗教表現」。宗教文化的倫理與社會功能，不僅是信仰自由的外在展現，更是國家文化政策的核心要素。亦即宗教建構優良之社會精神文化，宗教團體為傳播人類精神文化教育之公益團體，分擔國家精神教育任務，為保存及發揚傳統優良中華文化，有必要在法律制度上保障宗教及宗教團體之生存發展，以增進全民認識宗教對於人類精神文明建設之重要性，防止國家機關不當干預與妨害，以保存優良中華文化傳統，提升全體國民之文化素養。

由於部分人士對於宗教之神聖任務與功能使命，仍有認識不足之情況，導致疏於注意保障其發展，甚至有不當危害其生存發展空間之情況，因此，制定宗教基本法，對於宗教之生存及發展，進行「制度性保障」，以確立其公益任務地位，普及社會大眾對於宗教之認識，並保障其良性生存發展，應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

三、宗教基本法之立法目的

宗教自由之保障不應僅限於信仰內涵，亦應涵蓋其文化實踐面。立法上可依《文資法》之精神，將宗教文化活動納入文化政策體系，形成宗教文化之「制度性保障」。宗教基本法之立法，應兼顧宗教文化之保存、傳承與制度性保障，使「天人合一」之理念在現代法制中獲得具體實現。

宗教基本法之立法目的，在消極方面，應保障宗教之活動自由，免於國家公權力過度干預，妨礙其生存發展空間。在積極方面，應友善促進其發展，以協助分擔國家教化人心之任務，協同進行倫理道德教育，營造社會善良風氣與良善風俗習慣。

肆、宗教基本法之立法原則：通達民情，符合事理，為民興利除害

一、宗教自由之尊重與保障

依憲法第13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90號解釋指出，宗教信仰自由係指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以及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或對人

民特定信仰界予優待或不利益。釋字第573號解釋理由書指出：「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範圍，包含內在信仰之自由、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釋字第490號解釋參照）。人民所從事之宗教行為及宗教結社組織，與其發乎內心之虔誠宗教信念無法截然二分，人民為實現內心之宗教信念而成立、參加之宗教性結社，就其內部組織結構、人事及財政管理應享有自主權，宗教性規範苟非出於維護宗教自由之必要或重大之公益，並於必要之最小限度內為之，即與憲法保障人民信仰自由之意旨有違。」

由上述大法官解釋可歸納**宗教自由之尊重與保障範圍**，包括以下三項：

- 1.個人內在信仰自由（內心信念絕對不可受限制）
- 2.宗教行為自由（傳教、禮拜、集會、設立宗教團體、宗教教育）
- 3.宗教團體之自治權

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⁹⁰（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 10 條規定思想、良心與宗教自由（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人人均有權享有思想、良心與宗教之自由。此一權利包括改變宗教或信念之自由，及不論係獨自或於社群中，亦不論係公開或私下，於禮拜、教學、職業與儀式中，表達其宗教與信仰之自由。基於良心而反對之權利應依國內法律行使此一權利之規定而確認之。」

（一）宗教行為自由（傳教、禮拜、集會、設立宗教團體、宗教教育）

有關宗教行為自由，包括宗教儀式自由。德國基本法第 4 條第 2 項即明文規定：「宗教儀式應保障其不受妨礙。」⁹¹宗教儀式體現宗教活動精神，其具有相當神聖意義與功能，應予以尊重與保障其儀式自由。

1.宗教儀式的意義

宗教儀式（Religiöses Ritual, religious ritual）係指一套由宗教團體或信仰者依循特定規範、象徵與行為形式所進行的實踐行動，用以表達、再現或維繫「超越者」（Transzendenz）與「此世」（Immanenz）之間的關係。宗教儀式在人類學語境，是「象徵性行動」（symbolic action），藉由重複與形式化的行為賦予生命事件意義。在社會學上，宗教儀式是維繫社會團結與再生集體意識的媒介。在神

⁹⁰ http://www.scu.edu.tw/hr/document_imgs/documents/cfreu.doc（瀏覽日期：2017.3.18）。

⁹¹ 中譯文引自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1.asp>（瀏覽日期：2017.3.18）。

學上，宗教儀式是「神聖顯現」（Hierophanie）的途徑，即有限之人與無限之神（上帝神佛）的會通⁹²。

宗教儀式是人類文化中最早形成的象徵行動之一，以具體的身體動作、語言、空間與時間結構，表達人對超越存在（Transzendenz）的體驗與回應。宗教儀式不僅是信仰的表現，更是社會秩序與倫理規範的象徵再現。正如盧曼（Niklas Luhmann）所言，宗教的社會功能在於「處理超越與內在之差」（die Differenz von Transzendenz und Immanenz），而儀式正是這一差異的具體操作形式：透過儀式，人得以在有限生命中經驗無限意義。

2.宗教儀式的功能

宗教儀式的功能在於將不可見的超越經驗（Transzendenz Erfahrung）轉化為可感知的社會行動⁹³。它是宗教系統的「溝通（交流）形式」（Kommunikationsform），使神聖與世俗、個體與群體之間得以建立象徵性連結。在此意義上，儀式並非單純重複的形式行為，而是文化意義的再生機制（Reproduktion von Sinn）。

宗教儀式的功能⁹⁴

| 功能類別 | 說明 | 示例 |
|--------------------|--|--------------------|
| 超越溝通功能 （人天交流功能） | 在人與神、有限與無限之間建立象徵性溝通（交流）管道橋樑。 儀式使超越的概念（神、救 | 祈禱、獻祭、誦經、中元普渡、燒香禮拜 |

⁹² ChatGPT 說：「宗教儀式」（2025.11.7）

⁹³ 有關宗教儀式之探討，參見張永明，**宗教對於法律發展之影響—以儀式為例**（上），植根雜誌，39 卷 2 期，2023 年 2 月，頁 70 以下。

⁹⁴ ChatGPT 說：宗教儀式，瀏覽日期：2025.11.8.再由作者進行補充。佛教的宗教儀式的哲學結構：從「空」到「行動」，佛教的儀式並非迷信，而是實踐「緣起」與「空」思想的具體化。「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雜阿含經》。透過儀式，人得以在行動中體驗「無我」與「法界緣起」的實相。禮拜、供養、誦經等皆非為他者，而是**轉化自我中心、培養慈悲心的過程**。佛教儀式並非外在形式主義，而是修行的延伸。儀式作為「覺悟之道」。其深層意義在於：以**身行法、以行顯理**，使「空」之智慧在「行」之當下實現。**儀式即修行、修行即覺悟的象徵結構**。透過儀式，人得以在日常中體驗超越的臨在這正是佛教將宗教哲學與社會實踐融為一體的精髓。（ChatGPT 說：佛教的宗教儀式，瀏覽日期：2025.11.8.）。

| | | |
|----------------------------------|--|----------------------------|
| | 贖、涅槃）轉化為可被觀察、參與、體驗的社會行為。 | |
| 社會整合功能 (Integrationsfunktion) | 透過共同參與儀式與象徵秩序，強化群體認同與共同價值。 | 節慶儀式、集體禮拜、法會 |
| 倫理教育功能 | 表達敬畏與感恩上帝、諸佛菩薩與神明（賞善罰惡），並懺悔業障，在重複行動中內化道德規範與社會秩序。 | 祈禱、獻祭、誦經、拜懺法會 成人禮、婚禮、喪禮 |
| 情感調節功能 | 在生死、苦難或慶典中釋放與轉化情感能量。如三世因果循環觀念。 | 祭祀、哀悼、感恩禮 |
| 文化再生功能 | 儀式作為傳承與更新文化記憶的媒介。 | 年度宗教節日、朝聖行動 |

以佛教為例，佛教的儀式（**禮拜 / 修法**）主要目的不是取悅神祇，而是：**透過身語意的行動，修習正念，培養慈悲與智慧，進而轉化心識**。其宗教功能主要有三層：（1）**修心功能（內在修持）**：藉由誦經、禪坐、懺悔等，調伏貪嗔癡。（2）**社會功能（群體秩序）**：形成僧俗共修、倫理教化與供養關係。（3）**象徵功能（超越連結）**：使眾生在內在修行中體驗「空」與「涅槃」之超越境界⁹⁵。

3.宗教儀式的結構與象徵邏輯

宗教儀式的結構，通常包含以下四個要素⁹⁶：

- （1）神聖時間（節日）（天時）（sacred time）：透過節期或禮拜週期，重現創世或救贖之時刻；
- （2）神聖空間（場所）（地利）（sacred space）：區隔凡俗與神聖，如寺廟、教堂、祭壇；
- （3）共同體參與（communitas）（人和）：透過集體參與，形成社會整合與心靈共振，創造群體認同（solidarity）⁹⁷。

⁹⁵ ChatGPT 說：佛教的宗教儀式，瀏覽日期：2025.11.8。

⁹⁶ ChatGPT 說：宗教儀式，瀏覽日期：2025.11.8。

⁹⁷ 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北京：商務印書館。。

(4) 象徵行動 (symbolic action)：如祈禱、獻祭、吟誦、跪拜，皆為神聖意義的媒介；

宗教儀式的象徵邏輯 (Symbolische Logik)，根據卡西勒 (Ernst Cassirer) 與盧曼的結構理論，宗教儀式的象徵性可視為三層：

(1) 符號層 (Symbol)：如十字架、香火、蓮花、祭壇等。

(2) 行動層 (Handlung)：如跪拜、誦經、祈禱。

(3) 語意層 (Sinnstruktur)：如「懺悔 → 救贖」或「死 → 再生」的象徵轉換。

宗教儀式的力量即在於這三層之交錯，使不可見之「超越意義」能在可見世界中被體驗。宗教儀式的深層意義在於：透過社會可操作的形式，使人類在內在世界中經驗超越的臨在（宗教儀式作為「超越之內化」）。因此，儀式不只是傳統的宗教行為，而是一種「意義的技術」(Technik des Sinns)，讓超越能在人間顯現，使有限的生命經驗被置於永恆的語境之中⁹⁸。

4. 宗教儀式的類型（依功能與形式區分）

| 類型 | 說明 | 例子 |
|-------------------------|-----------|-------------------------|
| 生命儀禮 (rites of passage) | 標誌人生階段轉變 | 洗禮、成年禮、婚禮、葬禮 |
| 週期性儀式 | 對應自然與宗教曆法 | 聖誕彌撒、齋戒月、農曆新年、清明祭祖 |
| 懺悔與淨化儀式 | 消除罪與穢污象徵 | 告解、沐浴、祈禱、燒香 誦經、拜懺、法會 |
| 祭祀與獻祭儀式 | 與超越者交換、感恩 | 祭天、供奉、燒紙錢、祭祀祖先 |
| 祈願與占卜儀式 | 尋求未來指引 | 卜卦、求籤、祈福法會 |

5. 宗教儀式對於人類社會之積極貢獻

⁹⁸ 宗教情感論旨在表明宗教的本質與意義非體現於理智的活動和成果，是一種直覺「無限者」、「神聖者」而生之絕對、無條件的依存感。宗教是「絕對的依存感」。透過直覺有限的活動，對我們面對那些不可見的、永恆的滿懷崇敬，一旦直覺宇宙，則認識自己之渺小而感謙卑，從而喚起「對無限的情感」（宗教，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宗教>，瀏覽日期：2025.11.16.）。

盧曼在《宗教的社會系統》中指出，宗教的核心運作邏輯即在於區分「超越」與「內在」。儀式正是此一差異的「操作形式」（Operationsform）：它將不可言說的超越意義轉譯為可經驗的社會符號。例如：在基督教中，聖餐將神恩以麵餅與葡萄酒象徵；在佛教中，誦經與禪定使修行者在感官與理性間體驗「空」的真理；在儒家中，祭祀以禮樂實踐人倫秩序，於人間呈現天道之理。宗教儀式之所以能長久存在，乃因其具有「產生意義」（Sinnproduktion）的社會功能⁹⁹（。每一次儀式的重演，都是對世界秩序與生命意義的再確認。它提供個體在面對不確定性（Kontingenz）時的安慰與秩序感，並在社會層面上再現文化的核心價值 zentrale Werte der Kultur）。

不同宗教雖形式上各有不同，但皆展現共同社會功能：佛教誦經與禪修象徵「覺悟」；基督教洗禮與聖餐象徵「救贖」；儒教祭祀與禮樂象徵「倫理秩序」；道教齋醮與符籙象徵「天地和諧」。儀式多樣性反映人類對「超越與內在」關係的不同詮釋。

（二）宗教團體自治權（組織、財產、教義之自我決定）

1. 組織自主權

宗教團體從事宗教活動，基於宗教結社自由原則，應得自由選擇自主決定其組織型態，是採取財團法人、社團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寺廟監督條例之法律型態運作，國家法律並無強制介入管制之必要。

宗教團體之內部組織之自治事項，包括宗教章程及組織構造，設置宗教團體內部單位之權限，以及其與下級或上級宗教組織之關係等，應享有自治權¹⁰⁰。

宗教團體之組織型態，得自主決定作為其他宗教團體之所屬分支機構，以建構金字塔體系的組織架構，而自我限制其團體本身之自主權。就此德國聯邦憲法院 1991 年 2 月 5 日在巴哈伊教會之分支教會（Geistigen Rat der Bahá'í）聲請法

⁹⁹ Émile Durkheim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人們在儀式中崇拜的，其實是社會本身。」這句名言揭示：儀式既是宗教的核心，也是社會自我維繫的象徵結構。盧曼則進一步說明：宗教儀式「使社會在面對偶然與不確定性時，仍能透過象徵性連結維持其意義連貫性。」

（Luhmann, *Religion der Gesellschaft*, S. 221）

¹⁰⁰ Linder/ Möstl/ Wolff, *Verfassung des Freistaates Bayern*, 1. Aufl., 2009, Art. 142. Rn. 40.

人登記事件之裁判¹⁰¹中表示，「普通法院以該分支教會章程規定不符合社團法人的特徵——社團自治原則，為理由裁判駁回聲請。惟查有關團體自治原則在民法之社團規定中沒有明確規定；相反，它是透過法學和教學從法規的整體中提取的，其目標與私人自治類似，是保持團體作為主要基於其成員意志的決心及活動的團體的特徵。本案分支機構要服從其上級教會機構之指揮領導，而在某些事項限制自己的部分自主權，以建構金字塔體系的組織架構，也是本於自主決定原則行使自治權的表現，亦即其自主權也可以透過根據章程限制團體的自我管理權的方式來行使，因此，如果此類自我限制自主權之自治法規被宣布為不可接受，則意味著自治權的縮減。

如果考慮到作為宗教團體一部分而組織起來的宗教團體的特殊性，鑑於在許多情況下可以觀察到的宗教團體基於信仰的內部等級組織，顯然宗教團體的細分或以特殊方式與他們相連，希望融入其宗教團體的等級制度。這不能簡單地視為服從影響宗教團體之獨立性以及自我管理核心的外部監管。

宗教團體在建立及組織方面的自主權，可以透過以下方式行使：該宗教團體的成立目的是成為宗教社會的一個分支機構，並根據宗教內部法規適應其結構。此種自我強加的分類目的，在宗教團體的情況下，正是其成員在其共同信仰中的宗教自決的表達，只要其仍可執行自主之任務時，即尚未喪失團體之特徵，故不應簡單地認為放棄了該團體的自決權。只有當宗教團體的自決及自我管理權不僅在某些方面被排除在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被排除在外，導致該宗教團體不再主要由其團體成員的意志運作時，才會達到違反宗教團體自主原則。在這個限度，該宗教團體成為他人的純粹的行政單位或特別財產。」（以上為判決摘要）

2.人事自主權

（1）負責人任免之自治權

為保障宗教活動之最大自由，對於董事資格、任免，盡可能按照宗教法人之特性，委由其內部規範自主的自律的運作。故日本宗教法人法對於董事等執事人員之任期，並無任期屆滿即不得連任或限制連任次數之介入管制規定。

以宗教各宗派領導人為例，通常由於其個人在宗教上之傑出表現而獲得廣大信徒之擁護支持，歷史上許多著名高僧住持該寺廟，而能聲名遠播，千古傳為美談，故各宗派領導人為永續經營其宗教活動事業，勢必須長期投入該宗教事業。

¹⁰¹ BVerfGE 83, 341. <https://www.servat.unibe.ch/dfr/bv083341.html>. 瀏覽日期：2021.5.23.

我國人民團體法第 20 條規定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如適用於宗教團體之人民團體，各宗派領導人縱然表現卓越，獲得廣大信徒之崇拜支持，並無任何重大違失行為，亦勢必無法久任其位，難以永續經營，即有妨礙人民宗教結社自由，並侵犯此一宗教團體人事自治權之嫌。

（2）內部人事管理自治權：宗教團體與構成員之關係

在德國公法人之宗教團體，與其所屬從事職務人員之間，得建立「公法上勤務關係」（öffentlich-rechtliche Dienstverhältnisse），而不適用國家之「勞動法規」（Arbeitsrecht）之規範¹⁰²。同時因其並非國家所屬公法人，並非一般公務人員，故亦不適用「國家公務員法」規範，而由宗教團體自行本於自治原則立法自律規範，除非在其自治法規中明文規定是否及如何「準用」某些國家公務員法規範，而成為其自治規範之一環，否則國家公務員法規範並無適用餘地¹⁰³。

宗教團體之自治事項，亦包括宗教團體之構成員（會員）之權利與義務關係之規律，加入或退出宗教團體之要件，內部爭議自己裁判制度會費（贊助金）之徵收（在無教會稅之情形），神職人員之法律關係之規律，神職人員之訓練，執事人員之在職訓練，教會之職務及勞動法規章，對於執事人員之懲戒措施，對於執事人員之照護規範¹⁰⁴等均屬之。

依據寺廟等宗教團體內部規律，其團體成員或限制於男性僧團，或限制於女性尼姑庵，此為其宗教內部事務之規範要求，自應予以尊重，以保障其宗教自由。而不得由國家以世俗觀點加以規律，認為其規律違反兩性平等法規。

蓋憲法上基本權利保障，主要適用於人民對於國家公權力之行使，而非針對人民彼此間、家庭成員間或雇主，在宗教團體依據自己的權力（在自治決定權範圍內），而非國家授予之宗教權力之範圍內而為活動時，並不受基本權利之拘束¹⁰⁵。故在宗教團體內部，並不承認信仰自由之基本權利。否則，如果承認信仰自由，則在教會裡，勢必產生此種情況：「可以否認教會之教義，亦毋庸受到教會紀律之處置！」同理，在宗教團體裡，也不承認憲法上之平等權，否則，依據教

¹⁰² Stefan Magen, Körperschaftsstatus und Religionsfreiheit: Zur Bedeutung des Art. 137 Abs. 5 WRV im Kontext des Grundgesetzes, 2004, S. 96.

¹⁰³ Stefan Magen, Körperschaftsstatus und Religionsfreiheit: Zur Bedeutung des Art. 137 Abs. 5 WRV im Kontext des Grundgesetzes, 2004, S. 96f.; BVerwGE 66, 241.

¹⁰⁴ Linder/ Möstl/ Wolff, Verfassung des Freistaates Bayern, 1. Aufl., 2009, Art. 142. Rn. 40.

¹⁰⁵ von Campenhausen/ de Wall, Staatskirchenrecht, 4. Aufl., 2006, S. 114.

義必須由男性擔任之神職人員，女性也將可以依據自己之意見，違反宗教教義之內容，以性別平等以及思想自由為由，而主張享有擔任此類神職人員之請求權¹⁰⁶。

為保障宗教自由，給予宗教自治。在單純涉及教會內部事務發生爭議，如不涉及適用國家法律時，則並非法律上爭議，不受法院之裁判¹⁰⁷。有關是否可歸屬於教會內部事務之處置，其判斷基準是：其處置在實質上依其事件之性質或依其目的關係，是否應視為屬於教會自己固有的事務¹⁰⁸。

3.財政自主權

(1) 概說

財產權保障個人在憲法上所享有之基本權利，亦適用於宗教團體及宗教法人。德國基本法第 19 條第 3 項即明文規定：「基本權利亦適用於國內法人，但以依其性質得適用者為限。」¹⁰⁹所有宗教法人或宗教團體在從事宗教活動時，亦享有基本法所規定信仰自由之基本權利之保障（所謂集體的或法人的信仰自由）¹¹⁰，且宗教團體亦得主張基本法（憲法）所保障所有的基本權利¹¹¹。

其中宗教團體之財產，亦應受憲法有關財產權規定之保障。釋字第 573 號解釋理由書即謂：「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人依其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寺廟之財產亦應受憲法有關財產權規定之保障。」

(2) 宗教用財產權保障：連結宗教自由權利

宗教團體所必須使用之基本財產，包括宗教寶物（佛像等）以及基礎宗教設施用地及其地上宗教建築物，為宗教活動所必需，其財產權之保障，涉及確保宗教自由權利行使所不可或缺之財產，應受特別保障。亦即倘若某項財產對於其宗教任務之實現與教義之遵循，有著決定性之地位，且難以被取代時，則其財產之保障也涉及宗教自由之保障，應特別考慮¹¹²。

¹⁰⁶ von Campenhausen/ de Wall, Staatskirchenrecht, 4. Aufl., 2006, S. 114f.

¹⁰⁷ Kopp/Schenke, VwGO, 15. Aufl., 2007, #40 Rn. 5c.

¹⁰⁸ Kopp/Schenke, VwGO, 15. Aufl., 2007, #40 Rn. 39.

¹⁰⁹ 德國基本法中文翻譯，參見司法院出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¹，頁 344。

¹¹⁰ Jarass/ Pieroth, GG, 15. Aufl., 2018, Art. 4 Rn. 19.

¹¹¹ Jarass/ Pieroth, GG, 15. Aufl., 2018, Art. 19 Rn. 29, Art. 140 Rn. 25.

¹¹² 周敬凡，德國宗教憲法的內涵與租教團體的保障，月旦法學雜誌，281 期，2018 年，頁 148 以下。

就此德國基本法第 140 條規定威瑪憲法第 138 條為基本法之構成部分，故有基本法之效力。該威瑪憲法第 138 條第 2 項即規定：「二、宗教團體及宗教聯合關於供為禮拜、教育及慈善目的而設置之機構、基金及其他財產之所有權及其他權利，應保障之。」對於宗教團體為達成宗教目的所需宗教財產之財產權特別給予保障，其立法目的乃是防止國家採取「世俗化」或類似世俗化之措施。所謂「世俗化」（Säkularisierung）措施，係指廢除教會機構及修道院等，並將其財產國有化（沒收教會財產）¹¹³，因此禁止國家無補償給付的徵收教會財產¹¹⁴。

有效的宗教團體之地位以及宗教自由之保障，必須有財產物質上的支持為基礎，並應有自治決定權。故此一財產之特別保障，係屬於基本權利之前提保護¹¹⁵。就此學者有認為此一財產權保障，並非包含基本權利或與基本權利相同之權利，而僅是一個接近基本權利之權利。其保障範圍在主體方面，包括所有的宗教團體，並不限於公法人之宗教團體，乃至世界觀團體亦包括在內¹¹⁶。在客體方面，包括所有權以及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而直接作為提供執行宗教任務使用者。此項任務範圍以宗教團體自我認知為準，可包括醫院及學校¹¹⁷。

對於宗教法人提供禮拜用之建築物以及其座落之基地，應特別給予保障。就此日本宗教法人法第 83 條即規定宗教法人所有提供禮拜用之建築物以及其座落之基地，得於權利登記簿上辦理註記登記，除有為行使不動產優先權、抵押權或質權之情形或開始破產程序之情形外，不得為其於登記後才發生原因之私法上金錢債權，而為扣押（禁止扣押原則）。以確保其繼續提供宗教禮拜使用。

¹¹³ 「例如亨利八世在 16 世紀將英格蘭的修道院解散，以及 18 世紀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後期行為，以及在 18、19 世紀被各種反教權主義的開明專制的歐洲政府沒收教堂的土地和建築物，最終導致占據教堂土地和建築物的宗教團體遭到驅逐和鎮壓。19 世紀德國和瑞士的文化鬥爭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類似事件也是世俗化的表現。」（Gould, Andrew in: *Origins of Liberal Dominance: State, Church, and Party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p. 82，轉引自世俗化，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世俗化>），瀏覽日期：110.5.29。）。

¹¹⁴ von Campenhausen/ de Wall, Staatskirchenrecht, 4. Aufl., 2006, S. 273.

¹¹⁵ Michael Kloepfer, Verfassungsrecht, Band1, 1. Aufl., 2011, §27 Rn. 139.

¹¹⁶ Jarass/ Pieroth, GG, 15. Aufl., 2018, Art. Art. 140/ Art. 138 WRV, Rn. 4f.

¹¹⁷ Jarass/ Pieroth, GG, 15. Aufl., 2018, Art. Art. 140/ Art. 138 WRV, Rn. 6.

本於宗教團體自治權，宗教團體得自行組織與管理其事務，包括：內部組織，教義，成員以及財務（包括資產、會計、預算、支出），因此，財務屬於宗教自治核心領域。德國宗教團體基於憲法保障宗教自由，隱私與資訊自主權，內部財務被視為宗教團體內部事務，並沒有「一般性強制財務公開制度」，對一般社會大眾，並沒有義務公開財務報表。在宗教團體屬於公法人團體之情形，教會委託國家徵收教會稅，必須向國家揭露必要的財務資料，但這是「行政審查」，不是「公開給全社會」。如果對於教會經濟活動進行全面性的國家監督，即與宗教團體自治權不符，教會稅制度（Kirchensteueraufsicht）僅允許國家「形式監督」，但不得演變為一般財務監控¹¹⁸。亦即教會財務管理為宗教自治核心，故禁止國家要求公法上法人之宗教團體提供完全經濟透明度，國家不得對其財務內容進行實質控制，不得要求全面揭露/公開），否則即構成全面控制。財務管理屬於宗教自治核心領域（kirchliche Selbstbestimmung），國家不得要求教會進行全面財務公開，亦不得審查教會財務使用內容（使用方向、支出正當性等）¹¹⁹。

¹¹⁸ BVerfGE 105, 279 (2002)：「教會稅規範是否符合法治國最低要求，係由國家法院審查，但限於教會成員尋求國家法律救濟之範圍內在此審查中，符合德國國家與教會關係的憲法理解：法院必須在教會自我決定權與法治國秩序要求之間，尋求憲法上可維持之平衡。」（BVerfG Beschluss vom 19. August 2002- 2 BvR 443/01 -, https://www.bundesverfassungsgerich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DE/2002/08/rk20020819_2bvr044301.html. ）

¹¹⁹ ChatGPT 說：「德國宗教團體財務有無強制公開制度？還是屬於團體資訊自主權或隱私權秘密事項？」，瀏覽日期：2025.11.17. 在德國，宗教法人作為公法上社團，並未因教會稅法（Kirchensteuergesetz）而承擔一部統一的「財務公開義務」。然而，（一）就宗教團體如有兼營「營利事業或經濟事業」部分，基於競爭中立性原則，仍應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宗教法人與一般企業相同，受德國租稅通則等一般稅法及商法（Handelsgesetzbuch）記帳與申報義務之拘束；ekbo.de+1（二）在教會內部法上，多數天主教教區與新教邦教會（Landeskirchen）透過內部財務管理規則規定，要求堂區與教區之年度結算報告及預算計畫定期公開，藉此提升對信徒及社會之財務透明度；公開內容包括：各個主體（Mandanten）與特殊設施（Sondereinrichtungen）的資產負債表（Bilanzen），損益表（Gewinn- und Verlustrechnungen）以及說明報告（Erläuterungsberichte）。然而，基於正式報告篇幅龐大以及採用較形式化的呈現方式，並不適合作為向各教會成員溝通的工具。因此，建議依照所附範本，額外製作一份摘要式的財務報告（erzbistum-koeln.de+2socialnet.de+2）。因此德國教會財務透明度，是自律（Selbstregulierung）規定，不是法律強制課予公開義務。

德國宗教團體若申請取得「公法人」地位（K.d.ö.R.），即屬於公益法人，其宗教活動並不需要再經租稅通則（AO §§ 51-68）認定為「公益」。因此：公法上宗教團體不須提出租稅通則第 63 條第 3 項所要求的公益證明文件，也無庸按照租稅通則第 60a 條申請免稅認定通知（Freistellungsbescheid），其宗教核心活動¹²⁰（Kultusbereich）視為公法上公益任務，而非民間經濟活動，因此其根本不構成所得稅（EStG/KStG）課稅主體的經濟活動，其收益完全免稅。在此由於宗教核心領域本身不屬課稅範圍，因此，也沒有向稽徵機關申報捐獻與宗教活動收入的義務。

但若公法人宗教團體，除宗教本業外，另有經營公益組織（如醫院、托兒所、福利機構），或宗教團體並未申請取得公法人地位，而為私法上法人或團體之組織型態，倘若採取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之組織型態，則應受主管機關監督，主管機關得要求提出財務報表等資料，以進行合法性監督，但該等資料並不對外（社會）公開。

又如此類社團或財團其以「公益團體」身份申請免稅，必須證明其符合德國租稅通則第 52 條規定之宗教目的或公益目的，在此情形，即必須依據德國租稅通則第 63 條第 3 項規定提供帳冊、支出明細、補助資料、與公益目的相符合之財務文件等給予稽徵機關審查認定（**公益團體之證明義務**）¹²¹。宗教團體只要主

（三）對於國家補助款，則常由國家與教會間締結之協定協議（Staatsverträge）或補助給付處分（Zuwendungsbescheide）規定，宗教團體須以經會計師查核之年度報告向國家證明補助款之使用情形，如聯邦與德國中央猶太人理事會 2003 年條約第 4 條即為一例。

¹²⁰ 下列情形，屬於「宗教核心活動」，其收益完全免稅：

- 禮拜、彌撒、祈禱、聖禮活動
- 神職人員活動
- 教義與教會教育（Religionsunterricht）
- 宗教建築與設施之維護
- 基督教救贖、傳道、牧靈事務（Seelsorge）
- 宗教文化活動

¹²¹ 德國租稅通則第 63 條第 3 項：「法人必須透過對其收入與支出的正規（合於規範）的記錄，證明其實際業務經營符合第 1 項的要件。」

張上述宗教及公益活動免稅，就必須提供上述財務資料。因此要求「向稅務機關揭露」，但不要求「向社會大眾全面公開」。

由於德國公司法採取目的自由原則（僅需合法目的），並未強制公司必須以營利為目的。有限責任公司（GmbH）與股份有限公司（AG）均可為公益、慈善、文化、教育等目的而成立¹²²。若公司依租稅通則（AO §§ 51-68）取得公益資格（Gemeinnützigkeit），則屬於「公益公司」。公益公司雖為非營利，但其法律形式仍屬資本公司，因此必須依商法典第 325 條（HGB § 325）對全社會公開年度財報，刊登於全國統一電子網站。HGB § 325 所謂的「公開」為真正的「對社會大眾公開」，而非限於股東或債權人。所有公開資料均登載於企業登記冊（Unternehmensregister）供任何人自由查閱。其立法目的在於以資訊透明，替代有限責任所造成的第三人風險，因此採取全社會公開原則。完全不同於「對股東或債權人提供資訊」，它是「對全體社會」公開的強制性法定透明制度，透明資訊降低風險，增進市場信任。保障第三人包括債權人、員工及交易相對人之權益¹²³。

三、宗教團體之憲法上基本權利保障

（一）私法自治權之保障

「契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並為私法自治之基礎。契約自由，依其具體內容分別受憲法各相關基本權利規定保障，例如涉及財產處分之契約內容，應為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又涉及人民組織結社之契約內容，則為憲法第十四條所保障；除此之外，契約自由亦屬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一種。」（釋字第 576 號解釋理由書，釋字第 602 號解釋）「基於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個人得自由決定其生活資源之使用、收益及處分，因而得自由

¹²²Iris Janina Weber. *Die gemeinnützige Aktiengesellschaft*, 1. Auflage, 2014,

https://beckassets.blob.core.windows.net/product/readingsample/14008930/9783863810375_excerpt_001.pdf?utm_source=chatgpt.com, 瀏覽日期：2025.11.20.

¹²³ 德國商法 HGB § 325 的財務狀況公開義務並不限於營利企業，但適用範圍以「資本公司（Kapitalgesellschaft）」為限。一般非營利公益法人如協會（e.V.）、基金會（Stiftung）及宗教公法人（Religionskörperschaften）並不屬於「資本公司」，故不適用該條公開義務規定。唯有當公益組織採用 gGmbH、gAG 等資本公司形式運作時，方需依 § 325 履行公開義務。

與他人為生活資源之交換，是憲法於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於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之契約自由。」（釋字第 580 號解釋理由書）

宗教團體為從事宗教活動，應得自由決定其財產資源之使用、收益及處分，因而得自由與他人為生活資源之交換。釋字第 573 號解釋指出：「宗教團體管理、處分其財產，國家固非不得以法律加以規範，惟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監督寺廟條例第八條就同條例第三條各款所列以外之寺廟處分或變更其不動產及法物，規定須經所屬教會之決議，並呈請該管官署許可，未顧及宗教組織之自主性、內部管理機制之差異性，以及為宗教傳布目的所為財產經營之需要，對該等寺廟之宗教組織自主權及財產處分權加以限制，妨礙宗教活動自由已逾越必要之程度；且其規定應呈請該管官署許可部分，就申請之程序及許可之要件，均付諸闕如，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遑論採取官署事前許可之管制手段是否確有其必要性，與上開憲法規定及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均有所牴觸。」而宣告該條規定違憲。因此，本於宗教團體自治原則，其處分不動產，除應符合宗教團體成立之宗旨、任務及不得損及本團體權益外，其章程通常規定：「並須提經執事會議（或信徒大會）決議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¹²⁴亦即主管機關之監督權行使，僅須「事前陳報備查」知悉即可。

（二）隱私權保障（資訊自主權）

「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釋字第 603 號解釋理由書）。

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釋字第 603 號解釋理由書）。上述人民資訊自主權保障，亦可適用於由人民組成之宗教團體。

1.主管機關對於宗教團體資訊之保密

¹²⁴ 參見內政部提供之章程範例，https://www.shli.gov.tw/archive/service/group/PDF_非財團法人制寺廟組織或管理章程範例.doc.pdf。瀏覽日期：2021.5.23。

宗教團體提出於主管機關之文件書類，其目的在持續確認宗教法人按照章程規定之目的從事活動，此類資訊屬於宗教法人之「內部資訊」，為避免資訊公開導致妨害該宗教法人及其關係人之信教自由，因此除登記事項等公知之事項外，原則上應以不公開處理，亦即不准一般民眾申請閱覽其提出之文件¹²⁵。日本宗教法人法第 25 條第 3 項即規定僅允許信徒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於有正當利益且無不當目的之要件下，始得申請閱覽文件。

日本個人情報保護法為保障人民之自由，包括表現自由、學術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政治活動自由，特別規定個人情報保護委員會在行使職權要求業者報告、提供資料、進入檢查、指導建議、勸告或命令時，不得妨害表現自由、講學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政治活動自由。故對於上述特種類型之個人資訊處理事業者等（宗教團體等），就各該款目的所處理之個人資訊等之範圍內，對於有關提供個人資訊等行為，不得行使其權限（日本個人情報保護法第 43 條）。

亦即對於特定類型之個人資訊處理事業機構（宗教團體、新聞報導機構、著作業者、學術研究機構團體以及政治團體等），就其有關活動而處理之個人資訊，不適用同法第四章有關個人資訊處理事業機構之相關義務規定（第 76 條第 1 項）。故宗教團體從事「宗教活動（包含附隨之活動）」，其處理個人資訊之全部或部分目的，是為提供宗教活動使用之目的時，即不適用同法第四章有關個人資訊保護之義務規定¹²⁶。

我國人民團體法第 66 條授權訂定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20 條規定社會團體處理財務收支應「定期公告」之。此一財務定期公開制度，如適用於宗教團體之人民團體，則倘若該宗教團體擁有相當財產，勢必容易引起不法之徒之覬覦，或者騷擾威嚇，或者鳩佔鵲巢侵入把持主導權，均容易妨害人民之信教自由，恐有侵犯憲法保障宗教自由與牴觸人民資訊自主權之虞。

2.宗教團體對於信徒之財務公開問題

¹²⁵ 參見日本文化廳依據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245 條之 9 第 1 項規定：「各部長對於都道府縣依據其主管之法律或法規命令處理法定受託事務，得規定都道府縣處理該項法定受託事務之基準。」於平成 16 年 2 月 19 日以「15 廳文 340 號文化廳次長通知」（行政命令）發布「有關宗教法人之都道府縣之法定受託事務之處理基準」（引自日本テンブルヴァン／朝日ビジネスソリューション／朝日税理士法人編，図解宗教法人の法務・会計・税務，第 1 版，2011 年，頁 40 以下）。

¹²⁶ 日本テンブルヴァン／朝日ビジネスソリューション／朝日税理士法人編，図解宗教法人の法務・会計・税務，第 1 版，2011 年，頁 38。

3.宗教團體對於信徒資訊之保密

宗教團體持有信徒名冊、董事名冊、捐贈者名冊等許多涉及個人隱私權資料，又透過諮商等掌握信徒之資產狀況、職業及家庭狀況、病歷等資訊，均屬於個人資訊，宗教團體應本於「自主管理」原則，予以保密，以免損害信徒之信賴¹²⁷。就此日本立法例即雖然規定宗教團體不受「個人情報保護法」之法律管制，但實務上仍認為宗教團體仍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精神，對於信徒資訊保密。

德國對於有關信徒個人資料之保護，亦採取宗教團體自治原則。德國基督教及天主教教會原本即有自己內部制定之「教會資料保護」之自治法規，可以適用。故德國資料保護法（Datenschutzgesetz）於立法時，規定教會自己內部制定之「教會資料保護法」規範，可以繼續有效適用，而不直接受到國家的資料保護法之拘束，故不受政府資料保護之主管機關之監督。但該法要求教會制定內容上與德國資料保護法相一致的資料保護規範，其中包括有關資料保護之監督，應由獨立之監督機關為之（Art. 91 DS-GVO）¹²⁸。

我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內政部指定宗教團體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宗教團體應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以下簡稱本計畫及處理方法），以落實個人資料檔案之安全維護及管理，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其適用對象之宗教團體，包括已完成寺廟登記之寺廟或宗教財團法人（辦法第 3 條）。

三、宗教外在實踐之自由：經營公益慈善事業之自由

宗教歷來承擔倫理建構與社會救助功能。宗教慈善乃宗教信仰之社會實踐，透過慈善活動使信徒內化助人、博愛與共善之價值。德國社會法之補充性原則（Subsidiaritätsprinzip）允許宗教團體與國家合作推行社會福利，形成公私協力之制度模式。

¹²⁷ 日本テンブルヴァン／朝日ビジネスソリューション／朝日税理士法人編，図解宗教法人の法務・会計・税務，第 1 版，2011 年，頁 38。

¹²⁸ Rüpke/ v. Lewinski/ Eckhardt, Datenschutzrecht, 1.Aufl., 2018, S. 322.

故宗教基本法應保障宗教團體之外在實踐之自由，得經營公益慈善事業。監督寺廟條例第 10 條即規定：「寺廟應按其財產情形，興辦公益或慈善事業。」

宗教團體得經營公益、慈善事業的理由如下：¹²⁹

（一）宗教自由的積極保障（positive dimension of Religionsfreiheit）（宗教信仰自由之積極面）

憲法第 13 條規定宗教自由不僅保障「信仰與儀式活動」的自由，也包含宗教團體得以依其教義實踐慈善、助人等宗教核心價值的自由。宗教慈善公益活動乃信仰實踐的一部分，例如基督教的「博愛」（Caritas）、佛教的「慈悲為懷」皆屬信仰的社會實踐。因此，國家若禁止宗教團體經營公益、慈善事業，反而可能構成對宗教自由的不當限制。宗教自由不僅是「信仰內心」的自由（forum internum），亦包含外在實踐（forum externum）之自由，如傳教、設立機構、舉辦儀式與從事公益活動。公益、慈善事業可視為宗教實踐的具體表現，反映宗教教義中的博愛、仁慈、救濟等核心價值。

（二）宗教活動之社會延伸（Sozialdimension der Religionsfreiheit）（宗教自我實現與社會責任）

憲法學理上，宗教不僅為個人內心的信仰狀態（forum internum），亦包含對社會公共善之貢獻（forum externum）。宗教團體透過慈善事業實現信仰理念，有助於社會福祉與社會整合，因此屬於宗教自由的合理行使範圍。多數宗教（如基督教的「愛人如己」、佛教的「慈悲濟世」、伊斯蘭的「天課制度」）皆將「助人」視為宗教義務。宗教團體設立醫院、學校、社福機構，即是宗教信仰自我實現的社會化途徑。

（三）宗教作為倫理與社會救助體系

宗教具倫理與救助功能，促進社會整合。

1. 宗教的倫理功能與社會教化作用（宗教慈善作為「信仰實踐」與「社會共善」之交會）

宗教歷來承擔「倫理教育」「社會救濟」等社會功能。慈善事業是宗教將其倫理教義轉化為具體社會行動的方式。例如：天主教的「慈幼會」、佛教的「慈濟功德會」皆以宗教信念為核心，從事救災、醫療、教育與貧困救助。

¹²⁹ ChatGPT 說：宗教團體得經營公益、慈善事業的理由為何

宗教透過公益行動使信仰具體化，將超越性的信念轉化為社會倫理（Ethos）（宗教倫理之社會化），例如：基督教的慈善濟貧（Caritas），佛教的放生與布施，伊斯蘭的天課（Zakat）。

依據涂爾幹（Durkheim）與盧曼（Luhmann）之社會理論，宗教具有整合社群、維繫社會價值秩序的功能。公益事業乃宗教組織參與社會體系的重要形式，透過救濟、教育等活動，實現社會整合與公共利益。即使在世俗化社會中，宗教公益仍提供人們道德啟發與社會支持，維繫「社會信任資本」(soziales Vertrauen)。

2.公益事業的社會協同機制

在福利國家制度下，國家往往採「公私協力模式」（Öffentlich-Private Kooperation），鼓勵宗教團體參與社會救助、醫療、教育、老人照護等領域，以分擔公共責任。德國法上稱之為「subsidiäres Prinzip」（補充性原則）：國家優先尊重社會自發團體（如教會）對公共善的貢獻。宗教慈善因此被視為**國家社會福利體系的重要補充力量**¹³⁰。

二、應營造友善政教關係

（一）宗教團體的遵守憲法義務（守法性，Rechtstreue）

1.忠誠於法秩序

宗教團體必須**尊重民主與社會法治國的規範**。德國宗教團體若要取得公法社團地位，必須具備**守法的保證**。其目的在於確保宗教團體在享有公法人地位（包括課稅權、教育合作權、公法契約締結能力）時，仍應遵守現代**法治國核心價值**。

亦即「其必須保證會遵守現行法律，尤其是僅會在符合憲法或其他法律拘束之情況下行使授與的公權力。-----由於一切公權力均受法、正義與憲法之拘束（基本法第 20 條第 3 項），因此，宗教團體作為公法社團，必須保證其行使之公權力與憲法及其他法律規範相一致。」¹³¹

「然而，並非任何違法行為都會動搖其守法保證。關鍵在於該宗教團體**是否**在原則上願意遵守法律並融入憲法秩序（參 BVerfGE 102, 370 (391 f.))。尤其是，宗教團體若希望取得公法社團地位，必須保證其未來行為**不會危及**：基本法第 79 條第 3 項所規定之根本憲法原則、國家應保護的第三人基本權利，及基本法宗教與國家關係的基本原理。此類守法義務包括：基本法第 1 條第 1 項之**人格尊**

¹³⁰ ChatGPT 說：宗教團體得經營公益、慈善事業的理由為何，瀏覽日期：2025.11.9.

¹³¹ 聯邦憲法法院判決 BVerfGE 102, 370 (390).

嚴保障；基本法第 20 條之法治國與民主原則；人之生命與身體完整之基本權保護；基本法第 6 條第 2 項所定國家保護之兒童福祉；禁止建立國教之憲法規定；以及宗教法領域的中立性與平等性原則。（參 BVerfGE 102, 370, 392 – 394）因此，若一宗教團體致力於建立神權統治秩序（theokratische Herrschaftsordnung），便不得授予其公法社團權利（參 BVerfGE 102, 370, 395）。但除此之外，並不要**求宗教團體對國家有超出上述之忠誠義務**（參 BVerfGE 102, 370, 395 f.）。¹³²

上述忠誠於法之義務，主要指不得危及人性尊嚴、民主、法治與聯邦秩序。實務上，違法行為若為個別或輕微事件，不致失去「守法性保證」；惟若宗教理念本身與憲法基本秩序衝突，則其申請給予公法人地位將被拒絕。申請宗教團體是否違反這些要求，並因此應被剝奪公法人資格，不應基於其信仰，而應基於其行為（參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BVerfGE 102, 370, 394）。然而，這並不排除以下可能性：信仰和教義，只要其表現形式是外在的，就可以推論出該宗教團體應有的行為；這是個案認定問題（BVerfG, NVwZ 2015, 1434, 1436, 第95段）。

忠於法秩序（Rechtstreue）：雖然不必對國家絕對忠誠，但團體必須遵守憲法基本秩序（包括基本法保障的自由民主秩序）和國家法，一旦嚴重違反則可能被拒絕或撤銷公法人資格。但可以在某些具宗教特性的領域與基本法部分原則有所差異，例如：僅允許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宗教婚姻。此類差異受到**宗教自由**的保障¹³³。

宗教團體人應遵守憲法上基本人權保障規定。例如有關權利救濟之保障，有關教會職員對於教會之財產法上權利之請求，倘若教會內部並無權利救濟途徑，

¹³² 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Nordrhein-Westfalen），關於授予宗教與世界觀團體公法人權利之指導手冊，2017 年 2 月 16 日版。Leitfaden für die Verleihung der Körperschaftsrechte an Religions- und Weltanschauungsgemeinschaften vom 16. Februar 2017 Bekanntmachung der Staatskanzlei vom 14. März 2017.
https://recht.nrw.de/lmi/owa/br_bes_text?anw_nr=1&gld_nr=2&ugl_nr=222&bes_id=36407&val=36407&ver=7&sg=&aufgehoben=N&menu=1#NORMFUSS. 瀏覽日期：2025.11.9.

¹³³ Benjamin Kirschbaum, Was ist eine Religiöse Körperschaft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28. Februar 2020, https://winheller.com/blog/religioese-koerperschaft-des-oeffentlichen-rechts/?utm_source=chatgpt.com. 瀏覽日期：2025.10.24.

或教會內部法規規定其爭議由法院裁判時，則行政法院即可准予受理此類財產請求權之訴訟¹³⁴。

又如憲法上有關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亦適用於宗教團體設立之大學教師解聘程序。例如在天主教大學講授法哲學，經天主教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認定其講授內容之思想觀念與天主教教義不符合，為維護真理以及學校與學生之福祉，因此通知大學不予續聘之案件，由於該項處分書並未具體說明哪些不符合天主教教義之「具體理由」，因此歐洲人權法院於 2009.10.20 判決（Lombardi Vallauri v. Italy (application no. 39128/05)）¹³⁵認為按照天主教之教義講學之規則，不得擴張及於損害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之講學自由之「程序保障」之核心，故認定學校之決定違法侵犯大學教師之言論自由。

2. 邪教之禁止

宗教團體應遵守憲法保障人權之基本價值理念，寬容對待其他宗教信仰者或無信仰者，以增進社會和諧秩序。宗教團體如有下列行為，可能被定性為邪教組織，而為法所禁止¹³⁶：

- （1）散佈仇恨性言論。
- （2）鼓吹暴力侵害他人生命、身體、健康之行為，或恐怖攻擊行為。

¹³⁴ AXEL FREIHERR VON CAMPENHAUSEN, Der staatliche Rechtsschutz im kirchlichen Bereich, Archiv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Vol. 112, No. 4, 1987, S. 623ff.; BVerwGE 66, 241.

¹³⁵ [https://globalfreedomofexpression.columbia.edu/laws/ecthr-lombardi-vallauri-v-italy-app-no-3912805-2009/Lombardi Vallauri v. Italy](https://globalfreedomofexpression.columbia.edu/laws/ecthr-lombardi-vallauri-v-italy-app-no-3912805-2009/Lombardi%20Vallauri%20v.%20Italy%20-%20Application%20No.%203912805-2009.pdf)（天主教大學教師不續聘案）.PDF (152KB)，歐洲人權法院裁判選譯，司法院出版。<https://jirs.judicial.gov.tw/JudLib/EBookQry04.asp?S=W&scode=W&page=1&seq=8>.

¹³⁶ 陳怡婷，法國反極端教派法律制度與反思，發表於 113.11.9 東吳大學法律與宗教研究中心等單位舉辦，第 13 回法律與宗教研討會：宗教自由與宗教法制。法國《2001 年阿布－皮卡爾法》（About – Picard Law），是法國國民議會於 2000 年通過，並於 2001 年 6 月 12 日公布的法律。該法旨在加強對侵犯人權與基本自由的教派運動之預防與制裁。立法主要針對被認為「邪教」（sectes）之團體，特別是那些侵害人權、基本自由或進行所謂「精神操控（manipulation mentale）」的組織（https://en.wikipedia.org/wiki/About_Picard_Law?utm_source=chatgpt.com。瀏覽日期：2025.11.9）。法國又於 2024 年 5 月 10 日所通過法律，旨在加強打擊極端教派之異常行為，以及改善對受害者之支持。本項法規對於極端教派煽動與鼓勵信徒於疾病當中，放棄或拒絕治療，設立新的刑事罪行，並強化對受害者之保障。

(3) 施行嚴重或反覆施壓或使用可能損害他人判斷力之手段，而使他人處於心理或身體受壓迫之狀態，並導致其身心健康受到嚴重損害，或導致他人施行嚴重損害其身心健康之行為。

(4) 通過反覆施壓或操縱，誘使任何病患放棄或不接受治療，致可能對病患之身體或精神健康造成嚴重後果者。

宗教團體違反前項規定，情節嚴重者，在立法政策上，應得由主管機關聲請行政法院裁定命強制解散。

(二) 國家法對於宗教團體之管制規範

國家宗教法體系乃是相對的「分離體系」，係植基於下列法律原則：國家法優先於教會法（宗教團體自治法規）之原則，國家與宗教團體在制度上分離（不存在國教），宗教中立性原則，宗教自由原則，宗教平等原則，宗教合作原則以及宗教促進原則（在遵守中立性以及平等原則之下）¹³⁷。

國家法對於一般世俗事務之規範倘若其事務性質，屬於國家事務，而非宗教團體自治事務者，例如宗教團體取得法律上之權利能力，賦予宗教團體公法人之資格，假期法，協會團體法，學校制度，高等教育制度。在此類領域，如果國家認為適當時，即得將宗教團體納入規範及管理¹³⁸。

國家法律僅能就關於「世俗的領域範圍內，直接發生法律效力」之活動事項進行規範。至於純粹宗教事務或宗教內部事務之事項，則不得規範。此即德國判例學說上所謂「事項範圍理論」（sog. Bereichslehre）¹³⁹。在此國家法律僅能以對於全體國民普遍適用之一般法律加以限制（Schranken der allgemeinen Gesetze），不得特別針對宗教團體制定特別法限制之，尤其排除將宗教「世俗化」之立法。

此類一般性法律，以往通說及實務見解採取較為狹義解釋，認為應限制於涉及政治上文化的社會與法治社會所不可或缺之法律，且唯有此種法律，才能基於國家整體秩序之觀點，承認對於宗教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¹⁴⁰。但亦有部分學者認為即使如建築法、警察法、關稅法等秩序法以及環境法，雖然難以認定屬於國家

¹³⁷ Ehlers, in: Sachs, GG, 2. Aufl., 1999, Art. 140 Rn. 7.

¹³⁸ Linder/ Möstl/ Wolff, Verfassung des Freistaates Bayern, 1. Aufl., 2009, Art. 142. Rn. 42.

¹³⁹ Linder/ Möstl/ Wolff, Verfassung des Freistaates Bayern, 1. Aufl., 2009, Art. 142. Rn. 48.

¹⁴⁰ Johannes Heckel, Das für alle geltende Gesetz, Ges. Aufs., S. 593. 轉引自 von Campenhausen/ de Wall, Staatskirchenrecht, 4. Aufl., 2006, S. 109. BGHZ. 22, 383 [387 ff.]

整體性所不可或缺之部分，但對於宗教團體仍應有其拘束力¹⁴¹。又如公益徵收，亦有可能，但應儘量以交換財產方式取代¹⁴²。但在對於宗教團體之基本權利之限制，應與宗教自由之價值決定，進行法益衡量¹⁴³。

歐洲人權公約第 9 條第 2 項即規定：「表達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僅受制於以法律規定，且在民主社會中，為維護公共安全，保護公共秩序、健康或道德，或為保護他人之權利及自由之利益，所為必要的限制。」亦即在有「強烈的公共利益」之必要時，才能對於宗教自治權，以「法律」規定加以限制。在此一方面基於憲法統一性原則，解釋宗教信仰自由與其他基本權利相互間之界限，另一方面法律保留應斟酌受保護之自由與限制規範間之關聯性。在此即須進行法益間之利益衡量¹⁴⁴。

德國宗教團體有其本土歷史淵源，其自成自主規範體系，許多世俗法規不予規範，而尊重其自主規範，以符合其「宗教」之教義要求，尊重其信仰自由。但仍要求應具備一定保護規範內容。

（三）政教合作原則

為避免宗教中立性演變為「價值真空式中立」（*wertfreie Neutralität*），德國與許多歐陸法制發展出「政教合作原則」（*Kooperationsprinzip zwischen Staat und Kirche*）。該原則認為，國家在保持中立立場下，仍得與宗教團體合作以追求公共福祉（*Gemeinwohl*），包括教育、社會福利與文化保育等領域¹⁴⁵。

現代國家基於政教分離原則，雖不介入宗教內容，但承認宗教在教育、社會福利及文化保存上的公共角色。宗教團體之公益活動，補充國家社會福利之不足，具有「副社會」（*Subsidiarität*）的功能。

¹⁴¹ von Campenhausen/ de Wall, Staatskirchenrecht, 4. Aufl., 2006, S. 109.

¹⁴² 依據柏林邦與基督教會訂立之行政契約（應適用國內法）（Vertrag des Landes Berlin mit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Berlin-Brandenburg-schlesische Oberlausitz (Evangelischer Kirchenvertrag Berlin) Vom 20. Februar 2006），其第 9 條約定柏林邦應考慮教會之利益，努力以同等價值土地替換方式，避免對於教會適用徵收規定（第 2 項）。又以往柏林邦對於教會依法所為徵收，倘若教會並未享有補償請求權時，柏林邦應就個別案件審查是否基於特殊理由，仍可給予補償給付（第 3 項）。

¹⁴³ Jarass/ Pieroth, GG, 15. Aufl., 2018, Art. Art. 140/ Art. 138 WRV, Rn. 7.

¹⁴⁴ von Campenhausen/ de Wall, Staatskirchenrecht, 4. Aufl., 2006, S. 109.

¹⁴⁵ Ehlers, Dirk, Religionsfreiheit und Umweltrecht, VVDStRL 60 (2001), S. 135 – 160.

1.宗教教育之合作模式

德國一方面遵守宗教平等及中立性原則，另一方面也採取政教友善合作原則。例如德國基本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三、宗教教育為公立學校課程之一部分，惟無宗教信仰之學校不在此限。宗教教育在不妨害國家監督權之限度內，得依宗教團體之教義施教，教師不得違反其意志而負宗教教育義務。」將宗教教育導入中小學之義務教育中，並由宗教團體按照其教義對於中小學生進行各種宗教教育¹⁴⁶，其目的在經由宗教經典（聖經、可蘭經、佛經等）思想教育，培養國民之倫理道德之人格素養情操¹⁴⁷。

依據柏林邦與基督新教的德國福音教會（Evangelischen Kirche）訂立之行政契約（應適用國內法）（Vertrag des Landes Berlin mit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Berlin-Brandenburg-schlesische Oberlausitz (Evangelischer Kirchenvertrag Berlin) Vom 20. Februar 2006）¹⁴⁸，落實「政教友善合作原則」，其第 2 條即規定契約雙方當事人應經常的、於需要時，就有關涉及雙方當事人關係間或雙方利益之問題共同對話。在直接涉及教會之利害關係之事項，於法規發布之前，或計劃決定準備階段，應給予教會相當的參與。為代表教會對於國家之申訴（Anliegen），並改善雙方資訊交流，教會應選任一個代表人，並設置一個業務單位負責。

其契約第 5 條約定宗教教育事項如下：「(1) 1 基督教之宗教教育是柏林學校所有課程及年級的一部分。 2 柏林邦保證提供宗教教育。

(2) 1 宗教教育應根據福音派教會的原則（Grundsätzen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進行。 2 （教師）授課的前提，是經過（教會之）授權（任命）。 3 通過宗教教育，福音派教會為柏林學校的培養及教育作出貢獻。

(3) 1 柏林邦與教會就與宗教教育直接相關的所有問題達成一致協議。 2 宗教教學應按照適用於學校教學的規定進行。

¹⁴⁶ 有關宗教教育導入中小學之義務教育之探討，參見陳清秀，宗教教育導入中小學義務教育之法律上可行性分析，收於城仲模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台灣公法學的墊基與前瞻—城仲模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上冊），2018 年出版，頁 195 以下。

¹⁴⁷ 德國許多邦法規定，如果父母不願意為其未成年子女選擇宗教教育，則應接受倫理道德課程教育。在宗教課程教育與倫理道德教育中，選擇一門必修科學習。詳見陳清秀，前揭文，頁 195 以下。

¹⁴⁸ <https://www.kirchenrecht-ekbo.de/document/4>. 瀏覽日期：2021.6.8.

(4) 關於在柏林邦學校實施宗教教育的細節，由柏林邦與教會之間的另外協議規定。」¹⁴⁹

2.文化資產與環境之保護

在宗教文化保存與環境保育領域，政教合作可採多元制度模式，如：（1）將宗教建築列為文化遺產，由政府與宗教團體共同維護；（2）設立宗教自然景觀保護區，由宗教法人參與管理；（3）建立宗教環境教育合作方案，以宗教倫理推廣永續價值觀。此等合作模式並非違反中立原則，而是其積極面之展現。

例如德國各邦與教會簽訂協定（*Staatskirchenverträge*），共同維護宗教文化財與節慶。教堂修復、修道院文化推廣均屬此類合作範疇。又如隨社會世俗化，宗教節慶轉化為文化節（如聖誕市集 *Weihnachtsmarkt*），仍保留倫理象徵與社群意義。多宗教共存促進文化交流，使節慶成為跨文化理解與尊重的契機。

3.宗教在精神衛生法領域之服務與貢獻¹⁵⁰

在德國，宗教團體（特別是基督教教會及其相關社會福利機構）在精神衛生領域發揮了**極為重要、且多元的服務與貢獻**。由於宗教信仰與精神健康之間存在良性互動：宗教信仰／靈性提供「意義感」與「歸屬感」，對於遭受創傷、喪失、孤立者具精神支持與療癒心靈創傷作用。¹⁵¹加上宗教團體通常擁有廣泛信任基礎、社區網絡與長期服務經驗，可及早發現並介入心理／社會困境。在社會福利

¹⁴⁹又本行政契約第6條規定：「（1）教會有權在宗派基礎上設立及經營由教會主辦的學校（私立學校）。（2）國家將支持教會學校作為多元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3）對此類學校的核准與國家承認的程序以及以公共資金共同資助此類學校，保留由柏林邦法律進行更詳細的規定。」

¹⁵⁰ ChatGPT 說：德國宗教在精神衛生法領域內從事哪些服務與貢獻？瀏覽日期：2025.11.1.

¹⁵¹有研究學者指出：「《基於信仰的人道主義行動憲章》指出：『宗教團體和信仰組織在為受衝突和災害影響的人們提供精神援助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德國聯邦經濟合作暨發展部（BMZ）在2016年的一份文件中也承認，宗教是重要的價值觀來源，並為人們提供倫理和法律規範的指導。BMZ認為，宗教能夠增強個人乃至整個社會的韌性，因為它提供的解釋和儀式能夠幫助人們應對失落、悲傷、失敗和災難。」（Sabine Schwirner, *How faith-based organisations are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2025.8.27.

https://www.dandc.eu/en/article/churches-and-other-faith-based-organisations-are-performing-important-work-mentally-ill?utm_source=chatgpt.com. 瀏覽日期：2025.11.9）

制度中，教會社會福利組織（如 Caritas、Diakonie）為政府與公益機構的重要補充力量，結合醫療、護理、社會工作、心理輔導。

宗教團體在精神衛生法領域之主要服務項目如下：（1）預防、諮詢與輔導服務¹⁵²。（2）精神衛生機構運營與醫療／社會護理整合，宗教社會福利機構不僅提供諮詢，也直接運營醫療／護理設施¹⁵³。（3）社會整合、社區支持與弱勢者服務¹⁵⁴。（4）提倡精神衛生文化、抗污名¹⁵⁵並倡議政策支持，宗教團體不僅在服務端，也在公共政策與文化層面發揮作用，如倡議政府改善精神衛生服務體系、提升社會對於精神疾病之理解、推動制度變革¹⁵⁶。

4.政教合作原則法制化

政教關係並非絕對對立，而應有合作共善機制。其合作項目，例如：

- （1）宗教教育（學校、監獄、醫院中之宗教輔導）
- （2）社會福利與精神衛生服務（Caritas、Diakonie 等）
- （3）文化與古蹟保存（宗教建築維護、宗教音樂推廣）
- （4）災害與社會救助（宗教慈善與公共合作專案）

¹⁵² 以德國福音教會社會福利機構（Diakonie Deutschland）為例，其工作範圍明列包括「支援精神疾病與成癮者」（Support for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es and addictions）—包括諮詢中心、療程、日間診所、轉銜設施、住宅輔助、整合服務。diakonie.de+1

¹⁵³ difaem.de，瀏覽日期：2025.11.9.

¹⁵⁴ diakonie.de，瀏覽日期：2025.11.9.

¹⁵⁵ 「抗污名」（anti-stigma或Stigmabekämpfung）在精神衛生領域指的是：

針對社會對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礙者的偏見、歧視與標籤化（stigma）所採取的反制與教育行動。

「污名」（stigma）意指社會對特定群體貼上的負面標籤，例如：認為精神病患者「危險」「無法自理」「不正常」「應該被隔離」等刻板印象。造成患者及家屬隱瞞病情、不願就醫，甚至自我貶抑、社會排除。「抗污名」即是：破除偏見（de-stereotyping），去除歧視（anti-discrimination），促進社會接納與包容（inclusion），鼓勵就醫與社區整合（treatment-seeking and reintegration）。

（ChatGPT 說：上述抗污名是什麼意思？瀏覽日期：2025.11.9）

¹⁵⁶ diakonie.de+1，瀏覽日期：2025.11.9.

政府機關得與宗教團體簽訂行政協定，明定合作目標、經費、責任分工及監督方式。監督與透明。合作計畫應建立報告與審查制度，以確保經費使用、行政中立與基本權之保障。

國家尊重宗教與世界觀之自由，維持宗教與國家之制度性分離。

為促進公益、社會福利及文化發展，國家得在不違反中立與平等原則下，與宗教或世界觀團體合作。合作計畫應以相互尊重、非歧視及透明原則為基礎。國家不得藉合作干預宗教內部教義或組織運作。

五、宗教平等中立性原則

（一）公平對待原則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73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憲法保障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係為維護人民精神領域之自我發展與自我實踐，及社會多元文化之充實，故國家對宗教應謹守中立及寬容原則，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界予優待或不利益，前已述及；且憲法第 7 條明文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國家如僅針對特定宗教而為禁制或界予不利益，即有悖於宗教中立原則及宗教平等原則。

為保障個人的宗教自由，現行法並不承認國家宗教（國教禁止原則）。依據此一原則導出：國家與宗教之組織上分離之要求，原則上不應有任何單位，是同時屬於國家組織與宗教組織。亦即不應由宗教神職人員執行國家任務，另一方面，也不應由國家公務人員執行宗教任務。由此確保宗教免於國家之干預，以及國家對於宗教與宗教團體保持距離，有關救贖問題以及宗教的真理之問題，排除於國家的管轄權之外。國家對各類宗教應保持中立、及開放，不得確認某一特定宗教之內容，並干涉有關宗教問題之探討¹⁵⁷。

（二）宗教中立性原則之限制：宗教設施及宗教活動，構成社會世俗化之善良風俗文化活動

宗教平等中立原則，並非要求齊頭式之形式上平等，而應按照一般人民生活需要以及一般國民普遍具有之倫理道德價值觀念，進行類型化區分，採取「比例

¹⁵⁷ Claus Dieter Classen, Religionsrecht, 2006, S. 47.

平等」之原則，以免假借宗教平等中立原則之名義，顛覆破壞傳統中華文化之儒釋道哲學思想所共同持有之普遍性倫理道德價值觀¹⁵⁸。

亦即宗教設施及宗教活動，由於歷史悠久，已經形成傳統文化之一環，構成社會世俗化之善良風俗文化活動，從傳統文化保存及發揚觀點而言，符合一般（多數）國民生活需要。在此即不應以宗教中立性原則為由，加以排斥，以免損害傳統文化之保存，反而危害善良風俗之建立。

即使在強調政教分離原則之美國，為考量宗教所構成之世俗文化內涵，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提出下列政府友善行為之合憲性容許基準：（1）系爭政府的行為具有「世俗的目的」。（2）其行為之「主要的效果」，並非在振興或打壓宗教。（3）政府並未與宗教過度糾葛（關係密切）¹⁵⁹。

1. 都市公園內得設置祭祀孔廟等文化觀光用途之設施，以振興地域經濟

日本琉球那霸市在所管理的都市公園內，許可民間團體設置供奉儒教始祖孔子等的久米至聖廟，作為觀光文化設施¹⁶⁰，是否違反宗教中立性原則之問題，日

¹⁵⁸ 以政黨平等對待原則為例，德國政黨法（Parteiengesetz, PartG）第 18 條規定公費補助公職人員之選舉亦設有選票門檻。聯邦／歐盟選舉：0.5%，各邦議會選舉：1%，並非不分大小政黨均給予同額補助。其理由包括：（1）防止公共財政被過度分散，若無最低得票要求，國家會被迫補助大量缺乏社會支持的小政黨。這將造成公共財政負擔不成比例。（2）確保政黨補助具民主正當性，國家補助只能給予「具有一定程度社會支持度」的政黨。選票是此支持度最客觀的指標。（3）避免濫用並維持政黨體系穩定，若沒有門檻：任意成立的小型團體即可取得公款，造成政治體系碎片化增加不具公共利益之政黨的湧出，因此，門檻保障政治系統穩定。（4）補助門檻並不構成違憲的政黨自由限制，因為它只是設定「取得補助的資格」，而不是禁止政黨活動（BVerfGE 73, 40（1986）——50% 自有收入規則（Halbierungsgrundsatz）；BVerfGE 85, 264（1992）——政黨補助制度大法庭重審（Parteienfinanzierungsurteil 1992）；BVerfGE 129, 300（2011）——小政黨補助門檻再確認）。引自 ChatGPT 說：「德國公職人員選舉，其政黨補助有無選票門檻？理由為何？」，瀏覽日期：2025.11.17.

¹⁵⁹ Lemon v. Kurtzman, 403 U.S. 602 (1971).

¹⁶⁰ 依據本件判決理由記載，本件設施的參觀時間為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參觀免費**。該設施所在的區域（以下稱「本件土地」），雖然以至聖門、明倫堂、圖書館及圍欄等，**與本件公園的其他部分加以區隔**，但在上述參觀時間內，**一般市民可以自由出入**。此外，參加人（即管理團體）除在明倫堂內，面向其會員及一般市民舉辦**有關歷史、文化等的教養講座**之外，明倫堂內的講堂與展示室也依照參加人所制定的使用規則，**提供一般市民使用**。本件設施在整修完成後，**被刊載於那霸市的官方導覽地圖中**，並被介紹為象徵昔日被稱為「久米村（クニンダ）」之現

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 2025 年（令和 7）年 3 月 17 日判決認為在一定要件下可以承認其合法性¹⁶¹。對於本件孔廟設施，承認其具有宗教設施性質，考量本件設施外觀與設計、儀式（例如孔子釋奠祭禮）等情形，與典型的「社寺」類似；該設施祀奉孔子等「靈」或神位，且建築配置、動線安排等均為實施該等儀式之目的而設。上述設施為紀念自中國渡海至琉球、在 17 世紀以後建立並支持琉球王國繁榮的人士所建築之祭祀孔子等人的祭祀設施，由此可認定，本件設施具有「宗教性」且其程度亦「非輕微」。

但本件設施之**設置許可與用途，具有世俗性文化觀光目的**：該設施亦具備歷史文化價值、觀光資源意義，且該公園的管理、開放、一般公眾使用情況都存在。市長核准設置許可，係基於該設施可作為體驗學習設施、學術或文化資源（亦以研究上述人士的歷史與推廣以《論語》為中心的東洋文化為目的或事業。），從而促進都市公園功能、地方振興／觀光資源開發等世俗、公共目的。故其目的並非純粹宗教活動。**對於宗教特定團體有無提供特別利益之判斷上，判決認為雖然設置許可及政府提供使用土地之行為使參加人得以在該土地設置宗教性設施並進行宗教活動，上述設施作為公園設施被管理，並供一般民眾使用。市政府在給予上述許可之前，已經土地利用計畫整理認定該設施可以作為體驗學習設施（依都市公園法施行令第 5 條第 5 項第 1 款）或具歷史或學術高價值的設施（同條第 2 款），從當初的至聖廟等以及舊至聖廟等的歷史與性質來看，大成殿與明倫堂可被整理、定位為體驗學習設施，或是具有高度歷史與學術價值的設施，因此可被視為公園設施的一部分。綜合以上所述內容一併考量後，可以認為：那霸市是基於本件設施所具有的歷史性、文化性價值，並著眼於其作為觀光資源的意義，為了提升本件公園作為都市公園的功能、並促進地區振興與城市建設的實現等世俗且公共性的目的，而對本件設施核准各項公園設施設置許可。因此，其目的不能被認為具有宗教性的意義。故並不能認為該提供公園土地建設孔廟行為構成「對特定宗教提供特別便益」。特別是，雖曾有公園使用費免除（無償使用）的**

今久米地區歷史的設施；此外，它也被納入一般社團法人那霸市觀光協會所主辦的「巡遊久米（クニンダ）史跡的觀光步行路線」中。

¹⁶¹日本最高裁判所，令和 7 年 3 月 17 日令和 5(行ツ)261 判決，久米至聖廟撤去を怠る事実の違法確認等請求事件，<https://www.courts.go.jp/hanrei/93901/detail2/index.html>，瀏覽日期：2025.10.20.

情況，但該免除後來已被撤銷，參加人亦已逐步繳納土地使用費用。由此，土地供給行為亦不構成違反政教分離的援助行為。

2. 「工程開工」之宗教活儀式動，屬於世俗性文化風俗習慣

日本最高法院判例也參照上述「目的及效果基準」進行審查，認為國家與宗教之關係，參照日本社會及文化的各項條件，從確保信教自由的目的間之關係而論，「超過相當的程度」時，即違反政教分離原則。亦即政府的行為之目的，如果具有宗教的意義，且其效果對於宗教有援助、助長、促進或壓迫、干涉等行為，才是憲法基於政教分離原則所禁止之宗教活動（津地鎮祭訴訟）。

適用上述目的效果基準，在下述情形，例如市立體育館開工、市政府以公費支出、以神道固有方式進行祭拜、考慮行為之場所、一般人之宗教評價、行為人之意圖目的、及宗教意識、對於一般人之影響等、各項情況綜合考量，依據社會通念，客觀判斷，其目的為世俗的、其效果也不是要援助助長神道、或對於其他宗教壓迫干涉，並非法律禁止之宗教活動。（津地鎮祭訴訟，最大判昭和 52.7.13 判決）。

上述工程開工動土典禮儀式，在華人傳統文化中具有深厚的宗教與民俗意義，不僅是工程或建築施工前的一項儀式，也是對「土地」、「神靈」、「時空秩序」的一種敬意與溝通。其目的在祈求工程順利、避免災禍。祈願平安（施工人員安全、建物安全）、祈願順利完工、祈願未來使用無虞。道教以「天人合一」「順天應地」為核心，認為天地萬物皆有靈氣。動土儀式即是向地神稟告、祈求開工順利的法事之一，屬於道教科儀中的「啟告禮」亦即在施工開始前，人們相信動土會「擾動」原本安穩於地底或土地上的神祇、地氣、煞氣等等，所以先透過祭拜儀式「告知」或「請示」神明：我們將於此地興工，請允許並保佑順利¹⁶²。因為施工可能導致地質變動、影響先住靈、影響土地守護神等，若未先行祭拜而動土，被視為可能「犯土」、「擾神」、「觸煞」，增加不利因素。此行為體現了人與土地／神靈之間的和諧關係：建築在土地上，不只是人類「佔用」或「改造」，亦是經過神靈同意、求得護佑，因此是一種敬「地」的儀式¹⁶³。動土祭拜

¹⁶² 台灣民俗文化工作室，台灣民間開工「動土」儀式，https://www.folktw.com.tw/culture_view.php?info=136&utm_source=chatgpt.com. 瀏覽日期：2025.10.11.

¹⁶³ （道教）建醮，全國宗教資訊網，宗教儀式，https://religion.moi.gov.tw/Knowledge/Content?ci=2&cid=172&utm_source=chatgpt.com.

通常選擇吉日良時，反映傳統文化重視「天時地利人和」的觀念。動土時辰通常選定在上午時間，因白天陽氣盛，避免陰煞靠近，祭祀對象則為當地宮廟神祇、土地公、地基主以及當地之好兄弟等，土地公為土地之神，建築物建築在土地之上，必須感恩建築基地之土地神，地基主是土地原本之主人，歷經時代變遷，土地主人亦歷經變換，但仍應對於歷代地主表示感恩，希望在不同時空中能和平共處，相安無事。

除了宗教層面，動土祭拜也具備**社會凝聚作用**：施工團隊、設計方、業主、監造、工人聚於典禮，共同參與、凝聚共識，使「工程啟動」成為一個象徵性的集體儀式。參與者的心理也因此對工程責任、安全、品質等更有重視¹⁶⁴。

（三）宗教中立性原則不得妨害傳統文化之保存與發揚

宗教中立性原則（Prinzip der religiösen Neutralität des Staates）在現代憲政體系中被視為政教分離的核心原理，其目的在於防止國家干預宗教、保障信仰多元。然而，在宗教活動與文化傳統高度交織的社會中，若將「中立」理解為「排除一切宗教因素」，可能反而導致宗教所孕育之文化資產與國民普遍認可及接受之傳統倫理價值被消解，進而造成傳統文化的斷裂¹⁶⁵。故宗教中立性原則不得妨害傳統文化之保存與發揚，以維護國家社會之重大公共利益。

1. 宗教活動與文化傳承之交互關係

宗教不僅是信仰體系，亦是文化、倫理與藝術的生成基礎。其祭祀、建築、音樂、服飾乃至自然環境價值觀皆形成文化記憶的重要載體。例如，日本的寺社庭園與森林景觀，多源自宗教性祭祀與修行活動。高野山金剛峯寺自平安時代以來，秉持「嚴密護林」的宗教理念，建立兼具信仰與生態管理功能的林業制度；其植林儀式（供木）與參拜路徑即為宗教行為與自然保育的融合體現¹⁶⁶。

此一現象顯示，宗教活動常透過「環境倫理」與「祖靈信仰」形成地方社會的生態文化秩序。若宗教中立性被過度理解為排斥宗教因素之行政原則，國家將失去與宗教文化共構倫理秩序的能力，使傳統文化的活態價值（lebendige Kulturwerte）逐漸式微。

2. 宗教中立原則應不宜影響傳統文化之保存與發揚

¹⁶⁴ ChatGPT「動土祭拜之宗教意義為何」之回應，2025.10.20.

¹⁶⁵ ChatGPT對於「宗教中立性原則是否會破壞傳統文化以及傳統倫理價」問題之回應，2025.10.26.

¹⁶⁶ 林倖如，《宗教活動自由與環境保育關係之探討》，2025年10月，東吳大學宗教信仰及現代法治研討會論文初稿，第5頁以下。

日本憲法第 20 條與第 89 條之政教分離規定，曾在實務上導致對宗教文化保存的爭議。例如「那霸孔子廟事件」中，法院雖最終認定設施設置目的屬於文化、教育及觀光用途而非宗教崇拜，惟初期行政審查中即曾因宗教中立性疑慮導致文化資產之使用受限¹⁶⁷。此類案例顯示，若國家於形式上過度追求「純粹中立」，則可能忽略宗教活動所承載的傳統倫理道德價值觀等文化精華與社會功能。

德國憲法理論中，聯邦憲法法院亦指出：「國家之宗教中立並非否定宗教，而是承認宗教在文化與公共生活中的多樣貢獻。」（BVerfGE 93, 1〈十字架案〉）¹⁶⁸由此可知，現代中立原則之正確理解應為「開放性中立」（*offene Neutralität*）——在維持國家非宗教立場的同時，允許宗教於倫理教育與文化維護上發揮積極功能。

3. 宗教中立原則不妨害政府在有正當理由下，發布新興宗教可能危害社會之警訊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2002 年 6 月 28 日「警示教派之危害」裁定¹⁶⁹指出：「依據基本法第 4 條第 1 項，以及第 3 條第 3 項第 1 句、第 33 條第 3 項和基本法第 140 條結合威瑪憲法第 136 條第 1、4 項與第 137 條第 1 項規定，就宗教或世界觀信仰問題，國家負有保持中立之義務，不能因其緣故危害社會中的宗教和諧¹⁷⁰。因此，基本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保護宗教或世界觀團體，免受誹謗性、歧視性或錯誤的描述。但國家與其機關並未被要求，不能去處理此類問題。而中立的國家亦未被禁止，對於宗教或世界觀派別的事實行為，或其成員的事實表現，依據世界性之標準去進行評價，即使當這些行為終究是源自宗教性的動機，亦然¹⁷¹。同樣地，對於承擔國家責任者而言，其並未自始被禁止，向國會、大眾或有興趣的國民，提供有關宗教和世界觀團體本身及其活動之資訊。相較之下，基本法第 4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並不保障國家機關不得與基本權之享有者，公開

¹⁶⁷ 最高裁平成 29 年 12 月 20 日判決（平成 24 年（行ヒ）第 349 號），久米至聖廟事件。

¹⁶⁸ BVerfGE 93, 1 (Kruzifix-Beschluss, 1995); 另參見 Christian Starck, *Das Grundgesetz und die Religion*, NJW 1996, S. 857 – 863.

¹⁶⁹ BVerfGE 105, 279. 張永明譯，聯邦憲法法院第一庭「警示教派之危害」裁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十一），民國 93 年，司法院出版，頁 189 以下/頁 199。

¹⁷⁰ 參考聯邦憲法法院裁判 BVerfGE 19, 206 【216】; 93, 1 【16 f.】; 102, 370 【383】。

¹⁷¹ 參考聯邦憲法法院裁判 BVerfGE 102, 370 【394】。

地，甚至激烈地進行爭辯。國家被禁止從事者，僅是專門針對宗教或世界觀問題訂定規定，以及以身為一方當事人的方式，介入諸多的信念和行為，並以該種方式干涉個人或宗教及世界觀團體的敘述¹⁷²。」（頁 199 以下）

「當事件具有涉外的關聯性，或者有超越各邦意義的跨區域性格，以及由政府採取廣及聯邦範圍的資訊工作，有助於提昇克服問題的效率時，則聯邦政府在這些情況下，特別擁有統領國家的權限。在此類案例中，當聯邦政府認為對於問題的解決有必要時，即得對相關的事件採取行動，包括向國會及社會大眾說明事件經過並評論之，以及提出建議或發布警告等。」（頁 207）

如果新興宗教或教派，具有可能危害社會之情況，則由聯邦政府提供相關資訊，「藉由其資訊工作，在對於新興的宗教性與世界觀派別的探討中，作出符合聯邦議會與民眾將聯邦政府當作是領導國家的機關所期望應有的貢獻。其他的國家機關，特別是各邦政府個別的資訊行為，亦如同在必要情況下，由行政機關以危險預防方式進行干預行動般，亦不應該因此而被排除其存在可能性。」（頁 208）、「但以「危害的」與「假宗教的」的附加語，冠在 Osho 運動及其所屬之小組上，以及指摘其操縱其成員，則無法被正當化。這些附加語與該項指摘對於訴願提起人而言，具有傷害性。因此當訴願提起人於訴訟上主張，因為這些言論的緣故，其必須擔憂嚴重的不利後果，如現有會員的流失，新會員的不參加，或者不再繼續給予財物上的支持等，亦屬合理。在節制要求的原則下，於此顯然不存在足夠重要的、有具體事實為依據的理由，能證明聯邦政府的此類言論係正確的。」（頁 209）

（四）宗教中立性原則與傳統文化保存之利益衝突

宗教中立性原則之目的，在確保信仰自由、維護宗教平等原則。又國家亦有義務保存傳統倫理道德價值觀、歷史遺產、文化表徵與傳統習俗，作為「社會共同體記憶」的一部分。此一保存義務亦屬於「文化國原則（Kulturstaatprinzip）」之實現。

當宗教符號或儀式屬於「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時，為保存傳統宗教文化，勢必與宗教中立性原則間產生衝突競合關係，亦即「宗教中立性（religiöse

¹⁷² 參考聯邦憲法法院裁判 BVerfGE 93, 1 【16】；102, 370 【394】。

Neutralität)」與「文化保存（Kulturerhalt）」兩種法律價值的衝突，在此應進行「個案中之法益衡量」。

此種價值衝突之利益衡量原則，亦為歐洲人權法院所採取。例如歐洲人權法院大法庭於 2014/06/12 就當事人 *Fernández Martínez v. Spain*（公立學校天主教信仰課程之教師不獲續聘案）之裁判¹⁷³指出：「當本院被請求就兩個同受公約保護權利間的衝突作成裁決時，必須衡量所涉及之利益。在本案中，此一衡量一方面涉及原告之私人生活與家庭生活權利，另一方面則涉及宗教組織之自主權。國家被要求要同時確保這二個權利，而如果對於其中一者的保護導致對於另一者的干預，國家必須選擇適當的手段使此一干預就其所追求的目的而言，符合比例原則。在此一情形中，本院認為國家享有廣泛之評斷餘地。」

「關於宗教團體的自主權，本院注意到，宗教社群傳統上與普遍上皆以組織化之結構形式存在。當所涉及的爭議是宗教社群的組織方式，公約第 9 條必須根據第 11 條（保障結社生活免於國家不當的干預）來解釋。從此一觀點來看，信徒的宗教自由權利包含了他們會被容許自由結社而不受國家恣意干涉的期待。宗教社群的自主存在對於民主社會的多元性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公約第 9 條所提供之保護中，居於最核心的地位。宗教社群自主存在的直接利益，不僅是為了那些社群的實際組織方式，也是為了社群中的所有成員有效享受宗教自由的權利。假若社群的組織性生活不受公約第 9 條的保護，那麼個人宗教自由的所有其他面向也會變得脆弱（第 126 段）。

「關於更為具體的宗教團體內部自主之問題，公約第 9 條並未保障於一個宗教社群內部進行異議的權利；當一個宗教社群與社群中的成員之間就教義與組織方式產生了不同意見，個人行使其宗教自由的方式就是選擇自由離開該社群。-----國家對於宗教社群自主性的尊重特別意味著，國家必須接受這些社群根據它們本身的規範和權益，就任何來自於內部而可能對社群的凝聚、形像、或團結造成威脅的異議運動作出回應。因此，國家權力機關並無責任擔任宗教社群與社群內部已存在或將出現的各種異議派別間的仲裁者。」（第 127 段）

¹⁷³ 林榮光譯，歐洲人權法院大法庭於2014/06/12 之裁判（公立學校天主教信仰課程之教師不獲續聘案），歐洲人權法院裁判選譯（五），111年，司法院出版，頁683以下。705

若文化行為可透過維護傳統文化、倫理道德價值觀、「象徵性展示」及或「教育詮釋」，而非「宗教強制參與」來保存，則不違反中立性原則。

在此如要試擬一個法律條文規範，或可規定如下：「凡涉及宗教象徵或儀式之文化活動，應以其道德倫理、歷史與文化意義為基礎，同時宜考量宗教之包容性與自願參與。」例如政府補助傳統文化節慶時，應以「道德倫理價值」以及「文化價值」為主要評估標準。學校、博物館、地方政府可展示宗教藝術品，但須附上「歷史文化說明」以及「社會公共道德倫理價值」啟示，以避免單純為特定宗教宣導。對少數宗教之傳統儀式（如回教、猶太教節慶）亦宜納入文化保存政策

174。

陸、 結論與建議：宗教基本法草案方向（草案建議稿）

一、立法目的與理念

為確保宗教自由，提升國民倫理道德素養與社會精神文明，促進宗教與國家、社會、文化之和諧共生，並實現「天人合一」永續發展之價值理念，特制定本法。

本法旨在：

1. 確保宗教信仰自由與宗教團體自治；
2. 建立政教合作與宗教中立之制度平衡；
3. 促進宗教文化之保存與發展；
4. 保障宗教在社會倫理與公益事業上之正面功能。

二、宗教基本法之五項立法原則與條文建議

| 立法原則 | 條文建議 | 立法說明 |
|---|--|---|
| 一、宗教自由保障原則 (Prinzip der Religionsfreiheit) | 第 1 條立法目的 為保障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維護人民享有宗教生活之權利與維護宗教團體之公益性及 | 一、宗教之本質在於提升人民之道德倫理素養與人類理性智慧為目的，為建構道德倫理社會與優良傳統文化之基礎，故具備強烈公共利益之精神 |

¹⁷⁴ ChatGPT 說：「宗教中立性原則與傳統文化之保存衝突時，應如何處理」，瀏覽日期：2025.11.10.

| | | |
|---|---|--|
| | <p>自主性，以提升人民倫理道德素養與精神領域，並維護優良傳統宗教文化，以落實憲法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對於宗教之保障規定，特制定本法。</p> <p>第 2 條（宗教自由） 宗教以提升人民之道德倫理素養與人類理性智慧為目的。 宗教團體屬於提升一般公眾之道德倫理素養為目的之公益團體。 人民有信仰、表達與實踐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 國家應保障宗教自由之實現，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預、歧視或強迫。</p> | <p>文明價值，值得國家進行制度性之保障。</p> <p>二、宗教基本法之終極目標在對於「傳統優良倫理道德價值觀與精神文化傳統」提供制度性保障，落實憲法第 13 條宗教信仰自由精神，並具體化「內在自由」與「外在行為自由」之保障範圍。</p> |
| <p>二、宗教自治原則 （Prinzip der religiösen Autonomie）</p> | <p>第 2 條（宗教自治） 宗教團體有權依其章程自主管理內部組織、人事及財產。 國家機關不得干預，但不得違反法律或重大公共利益。</p> | <p>承襲德國《基本法》第 140 條連結《魏瑪憲法》第 137 條第 3 項規定；強調自治為宗教法人之核心權能。</p> |
| <p>三、政教合作原則 （Prinzip der Kooperation zwischen Staat und Religion）</p> | <p>第 3 條（政教合作） 國家應在宗教中立之基礎上，與宗教團體協力推動社會公益、文化保存及道德倫理教育之事務。 政教合作應以尊重宗教信仰信念與維護公共利益為</p> | <p>採德國「積極中立性」（<i>positive Neutralität</i>）模式，允許宗教參與社會服務、教育及文化政策。</p> |

| | | |
|--|--|---|
| | 原則。 | |
| 四、宗教中立原則 (Prinzip der religiösen Neutralität des Staates) | 第 4 條 (宗教中立) 國家於制定法律、施政及教育中，應保持宗教與世界觀上之中立，不得偏袒或排斥特定宗教。 宗教符號之使用，應以尊重多元信仰與公共秩序為原則。 | 對應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BVerfGE 93, 1 - Kruzifix-Beschluss) 之中立原則，避免國家宗教化或反宗教化。 |
| 五、宗教文化保存原則 (Prinzip der Bewahrung des religiösen Kulturerbes) | 第 5 條 (宗教文化保存) 宗教文化、儀式及相關建築、文物，屬國家應予保存與扶助之文化資產。各級政府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保障宗教文化之傳承與發展。 | 連結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 條規定，承認宗教文化為公共文化財，並賦予保存義務。 |
| 六、適合生存發展原則 | 第 6 條 (宗教活動場所之設置與保障)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宗教團體得依法設置宗教活動場所，以供舉行禮拜、教育、慈善、文化或其他宗教相關活動。 2. 各級政府於土地使用計畫、都市計畫及建築許可之審議中，應尊重宗教自由與宗教活動之正當需要，不得以非必要之理由限制或差別對待。 3. 政府為維護公共安全、環境保護或 | 一、 宗教自由之實質保障： 憲法保障宗教自由，除內在信仰外，尚包含外在實踐 (<i>forum externum</i>)。宗教場所乃宗教實踐的物理前提，若土地管制過嚴，將構成間接侵害宗教自由。 二、 參照美國《宗教土地使用與收容人保護法》 (Religious Land Use and Institutionalized Persons Act) (RLUIPA) (2000) 規定，政府不得以 |

| | | |
|-------------|---|---|
| | <p>都市發展對於宗教場所所採之土地管制措施，應符合比例原則，並應與宗教團體協商適當替代方案。</p> <p>4. 宗教活動場所涉及文化資產保存、古蹟維護或民族傳統者，得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列入保護及輔助維修。</p> | <p>區域規劃或土地使用政策實質妨礙宗教活動。日本立法例亦原則容許宗教團體設置於人民生活所在之處，以就近接受宗教教化機會。</p> <p>二、比例原則與協商機制</p> <p>基於重大公共利益之必要（如環保、消防、噪音），對於宗教活動場所地點進行管制時，但應受比例原則拘束：(1) 目的正當、(2) 手段必要、(3) 效果衡量。其所採取土地管制措施，應事先與有關宗教團體協商，尋求兼顧宗教需求與都市發展的替代方案。</p> <p>三、文化資產與宗教多元並重</p> <p>許多宗教場所同時為文化資產與社會記憶的載體，應納入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條規定之文化資產體系，形成「宗教文化資產」之法律地位。</p> |
| 七、宗教自由之限制原則 | <p>(1) 人民之內在宗教信仰自由，應受絕對保障。(2) 人民之外在宗教行為及宗教結社自由，非出於維護宗教自由或</p> | <p>一、參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七三號解釋意旨，基本權固非不得以法律限制，惟宗教自由為基本人權之核心，與其他基</p> |

| | | |
|--|---|---|
| | 重大公益之必要，不得以法律限制之。(3) 前項限制應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及 應選擇對宗教或宗教團體權益損害最少者， 且不得與所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並不得授權行政命令定之。 | 本權仍有不同，應以出於維護重大公益之必要，始得限制。 二、限制宗教自由，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以法律為之，其目的與手段間須符合比例原則，且不得授權行政命令為之。 |
|--|---|---|

三、制度建議與施行規範

1. 宗教法人制度統整化

- 將現行《人民團體法》《寺廟條例》《內政部審查全國性宗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整合為單一宗教法人法制。
- 宗教團體得依本法登記為「宗教法人」，享法人格、財產管理權與稅務優惠。

2. 宗教與公共事務合作機制

- 設立「宗教事務委員會」，置於行政院下，作為政教溝通與文化政策協調平台。
- 宗教團體得參與公益、教育、環境、心理衛生等社會服務計畫。

3. 宗教文化資產之制度保障

- 將重要宗教節慶與儀式納入「無形文化資產」清單。
- 建立「宗教文化保存基金」，專供修繕、研究與傳承補助。

4. 法律監督機制

- 宗教團體具有倫理道德之公益團體性質，原則上僅受法律低密度監督，有關其信仰與儀式應尊重其宗教自由。

5. 宗教主管機關之定位

由於宗教涉及傳統倫理道德與文化內涵，與國民精神文化教育關係密切，故我國宗教主管機關之定位，不宜設於內政部或法務部體系（避免以治安、登記為主體的「監理導向」）。可採「文教整合型」模式，如日本文化廳，並以「宗教文化司」或「宗教事務署」名義設於文化部，兼顧宗教自治與文化保存。並應於宗教基本法中明定：「宗教主管機關之任務，為保障宗教自由、促進政教合作、保存宗教文化資產；不得干預宗教內部信仰或教義之形成」；並建立「宗教事務委員會」作為諮詢機制，確保政策多元性與信仰中立性。

四、總結性條文建議（立法範例）

第 X 條（宗教法制之保障）國家應依本法建構宗教法制體系，以確保宗教自由、促進政教合作及文化傳承。宗教團體之權利與義務，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其他相關法律辦理。

附錄

- 一、宗教基本法草案(宗華教信聯盟版)
- 二、宗教基本法草案(國民黨團版)
- 三、宗教基本法草案(許智傑委員版)
- 四、宗教基本法草案(葉元之委員版)

宗教基本法草案

宗華教信聯盟

中國佛教會

中華民國道教會

台灣佛教總會

台灣省道教會

中華佛教比丘尼協進會

中華道教團體聯合

總會

中華佛教護僧協會

台北市道教會

台灣宗教聯合會(籌備處)

聯合版本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9 日

宗教基本法草案

立法總說明

我國《憲法》第 13 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憲法》第 7 條亦明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宗教……，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明白揭示我國《憲法》對於「宗教信仰自由」與「宗教平等」之保障。又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將「國家肯定多元文化」列為我國之「基本國策」，而我國宗教在數百年之長期發展下，儼然成為我國社會多元文化之重要一環，同時亦為安定社會、淨化人心之重要力量，參酌我國係將「肯定多元文化」列為基本國策之一，國家對於宗教信仰所衍生之宗教文化，自應予以肯定，並加以保障與維護。

其次，我國業已於民國 98 年 4 月 22 日制定公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並自 98 年 12 月 10 日起施行，將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納入為我國國內之法律；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8 條明定：「一、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此種權利包括保有

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私自以禮拜、戒律、躬行及講授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二、任何人所享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不得以脅迫侵害之。三、人人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此項限制以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所必要者為限。四、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明確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具體內涵。是以，「宗教信仰自由」既為《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自應立法予以保障，始符合我國《憲法》第 7 條、第 13 條與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8 條之意旨。

關於宗教相關法規，我國雖有民國 18 年間制定之《監督寺廟條例》，該條例不符合現代社會所需。民國 89 年間，有立法委員提出《宗教團體法》草案，開始針對宗教法規進行討論，是為近年來我國推動宗教立法之始。至民國 93 年 2 月 26 日司法院大法官做出釋字第 573 號解釋，認為《監督寺廟條例》部分條文因妨礙宗教活動自由已逾越必要之程度，且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又該等條文僅適用於部分宗教，違背《憲法》上國家對宗教應謹守之中立原則及宗教平等原則，大法官會議因此宣告該等條文違憲。在大法官會議做出此號解釋後，進一步促使我國對於宗教立法進行更

廣泛、深入之討論。內政部雖曾於民國 90 年至民國 105 年間，多次將《宗教團體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並於民國 105 年 12 月間於北中南三區辦理 3 場座談會，更規劃於今年（民國 106 年）6 月起，至各縣市舉行 23 場座談會；嗣因內政部提出之《宗教團體法》草案各界仍有侵害「宗教信仰自由」之疑慮，經宗教團體向地方政府遞交陳情書後，內政部也從善如流宣布暫緩續推。

為貫徹我國《憲法》第 7 條、第 13 條與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8 條等規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與「宗教平等」之意旨，同時參照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之基本國策，在制定《宗教團體法》前，實有必要先行凝聚社會共識，制定《宗教基本法》以確立我國宗教政策與立法之最高原則；俟《宗教基本法》立法完竣後，未來制定《宗教團體法》或其他宗教法規，即有立法準繩可資依循，避免重蹈過去十餘年來，內政部未能整合各方意見其草率提出《宗教團體法》草案，而遭社會大眾質疑有侵害「宗教信仰自由」之疑慮，未能順利完成立法之憾。

綜上所述，爰依《憲法》第 7 條與第 13 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8 條等規定，並參酌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 490 號、第 573 號等相關解釋之意旨，擬定並提出《宗教基本法》草案如下。

本法草案要點如下：

- 一、實現憲法平等原則與宗教信仰自由之立法目(草案第一條)。
- 二、宗教團體之定義(草案第二條)。
- 三、宗教法人登記及其證書(草案第三條)。
- 四、依大法官釋字第 460 號、第 490 號與第 573 號解釋充實憲法第十三條宗教信仰自由之規定(草案第四條)。
- 五、政府應設置宗教事務行政機關或單位(草案第五條)。
- 六、宗教行為自由及宗教結社之自由之內涵(草案第六條、第七條)。
- 七、各宗教與各宗教團體在法律上之權利義務一律平等(草案第八條)。
- 八、禁止國家對宗教實施差別待遇(草案第九條)。

九、國家立法與行政應尊重宗教特性及習慣(草案第十條)。

十、國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及其限制方式(草案第十一條)。

十一、 禁止國家法令干涉宗教事項之自主(草案第十二條)。

十二、 中央機關專屬宗教立法權限(草案第十三條)。

十三、 禁止妨害或歧視他宗教之言論、行為及其罰則(草案第十四條)。

十四、 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應尊重傳統宗教信仰行為(草案第十五條)。

十五、 明定宗教中立原則(草案第十六條)。

十六、 宗教自主範圍及其保障(草案第十七條)。

十七、 宗教身分資格之得喪變更及其財產與遺產之歸屬(草案第十八條)。

十八、 宗教教育之實施、宗教信仰之決定及宗教教育方針之制定(草案第十九條)。

- 十九、 宗教研修機構之申請設立(草案第二十條)。
- 二十、 就業服務法之例外(草案第二十一條)。
- 二十一、 資訊公開之例外(草案第二十二條)。
- 二十二、 醫療院所應尊重宗教行為自由之實踐(草案第二十三條)。
- 二十三、 宗教團體社會責任及其自律機制(草案第二十四條)。
- 二十四、 各宗教法物受保障，不得強制執行(草案第二十五條)。
- 二十五、 都市道場設置與管理(草案第二十六條)。
- 二十六、 明定宗教建築物及其用地、宗教活動所得免稅(草案第二十七條)。
- 二十七、 受私人或團體捐贈宗教團體作特定用途之用者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宗教團體所有之宗教建築物或土地作為宗教活動使用者免徵房屋稅或地價稅(草案第二十八條)。
- 二十八、 宗教團體因買賣、贈予取得之耕地得申請移轉登記為所有，宗教團體之耕地或一般土地

得優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或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為宗教用地使用(草案第二十九條)。

二十九、 宗教團體申請公有非公用土地之租售(草案第三十條)。

三十、 本法優先適用，宗教相關法令不得牴觸本法(草案第三十一條)。

三十一、 明定施行日(草案第三十二條)。

| 條文內容 | 立法理由 |
|--|--|
| <p>第一條（立法目的）</p> <p>為保障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及各宗教之平等，尊重宗教團體之神聖及自主性，並維護宗教團體之權益，特制定本法。</p> | <p>本法之立法目的，係為落實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與第十三條「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並符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90號、第573號等解釋之意旨，以達尊重宗教團體之神聖及自主性，並維護宗教團體權益之目的。</p> |
| <p>第二條（宗教團體定義）</p> <p>本法所稱之宗教團體，係指從事群體運作與教義傳佈及活動之組織或團體，分為下列三類：</p> <p>一、寺院、宮廟、教堂及其他類似團體。</p> <p>二、宗教法人、宗教財團法人及宗教社團法人。</p> <p>三、宗教社會團體或其他宗教非法人團體。</p> | <p>宗教團體係指從事群體運作與教義傳佈及活動之組織或團體，依我國現行宗教團體之型態，可以分為三類：</p> <p>一、寺院、宮廟、教堂及其他類似團體。</p> <p>二、宗教法人、宗教財團法人及宗教社團法人。</p> <p>三、宗教社會團體或其他宗教非法人團體。</p> |
| <p>第三條（宗教團體登記為宗教法人）</p> <p>具有宗教建築物或財產，以對外從事宣揚宗教教義及舉行宗教儀式者，得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登記為宗教法人及發給法人登記證書。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p> | <p>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登記為宗教法人及發給法人登記證書，以賦予宗教法人地位，使各宗教有平等基礎，取得宗教法人資格。</p> |

| | |
|---|---|
| <p>第四條（宗教信仰自由）</p> <p>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以及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p> <p>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之機關行使公權力，應尊重憲法保障之宗教信仰自由。</p> | <p>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60 號、第 490 號與第 573 號解釋，憲法第十三條規定之「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係指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以及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並明示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之機關行使公權力時，應尊重憲法第十三條所保障之「信仰宗教自由」。</p> |
| <p>第五條（設置宗教專責機關或單位）</p> <p>政府為處理宗教事務應於中央政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分別設置宗教事務專責機關或單位，以推行宗教事務之健全發展。</p> <p>其設置相關事項，以法律或地方自治條例定之。</p> | <p>宗教行政業務，在內政部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置宗教專責機關或單位。</p> |
| <p>第六條（宗教行為自由）</p> <p>個人或宗教團體為實踐或宣揚其教義，得依教制從事宗教活動；研習教義、禮儀；指導信眾戒律、修行等教務事業。</p> <p>任何人不得請求個人或宗教團體為其教制、教義外之</p> | <p>明定個人或宗教團體得依其教制，從事各種宗教活動，研習教義、禮儀，或指導信眾戒律、修行等教務事業，以達實踐或宣揚教義之目的；並明定任何人不得使個人或宗教團體從事逾越其教制或教義以外之行為或儀式，</p> |

| | |
|---|---|
| <p>其他行為或儀式；個人或宗教團體亦不因此負擔任何法律責任。</p> | <p>以落實憲法第十三條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意旨。</p> |
| <p>第七條（宗教結社自由） 人民得組織宗教團體；宗教團體得與其他宗教團體自由結社。</p> | <p>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90 號解釋，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範圍，包含宗教結社之自由，爰制定本條規定，除人民得組織宗教團體外，各宗教團體之間亦得自由結社。</p> |
| <p>第八條（各宗教及宗教團體平等） 國內各宗教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各宗教團體享有之權利及負擔之義務一律平等。</p> | <p>為貫徹憲法第七條所保障之平等原則，爰制定本條規定，明示各宗教與各宗教團體在法律上之權利義務一律平等。</p> |
| <p>第九條（禁止宗教差別待遇） 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教予以獎勵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信仰予以優待或不利益。</p> | <p>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60 號、第 490 號與第 573 號解釋，憲法第十三條規定之「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係指國家亦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助或禁止，或基於人民之特定信仰為理由予以優待或不利益。</p> |
| <p>第十條（尊重宗教特性及習慣） 國家制定之法律及執行法律應尊重宗教上之特性及習慣。</p> | <p>明定國家於立法與執法時，應尊重各宗教之特性與習慣，始不違反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及憲法第十三條所保障之宗教信仰自由之。</p> |

| | |
|--|--|
| <p>第十一條（禁止限制宗教自由）</p> <p>對於宗教行為與宗教結社自由之限制，應嚴守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及比例原則。</p> | <p>國家限制人民受憲法第十三條所保障之信仰宗教自由時，自應嚴守法律保留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意旨。</p> |
| <p>第十二條（禁止干涉宗教自主）</p> <p>任何法令皆不得對於個人或宗教團體之信仰、規律、習慣等宗教上之事項以任何形式調解或干涉，亦不得對於宗教上職員之任免或其他進退為勸告、勸誘或干涉。</p> | <p>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90 號解釋，內在信仰之自由，涉及思想、言論、信念及精神之層次，應受絕對之保障；以及釋字第 573 號解釋，宗教性結社之內部組織結構、人事及財政管理應享有自主權之意旨，明定任何法令不得干涉宗教上之事項與宗教上職員之任免。</p> |
| <p>第十三條（宗教立法權限）</p> <p>有關宗教或宗教團體之立法，均屬中央機關權限，不得授權地方自治團體訂定自治條例。</p> | <p>基於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為避免不同地方之宗教團體負擔不同之義務或受到不同之限制，爰限制宗教或宗教團體之立法為中央機關之權限，中央機關不得授權地方自治團體訂定自治條例。</p> |
| <p>第十四條（歧視與煽動之禁止）</p> <p>國家對於任何歧視他人宗教信仰之言論及行為，應制定相關罰則。</p> <p>各宗教間應互相尊重，不得</p> | <p>為貫徹憲法第七條所保障之平等原則，明定各宗教間應互相尊重不得妨害或歧視，並課與國家就歧視他人宗教信仰之言論或行為制定罰則之義務，以落實各宗教間互相尊重一律平等之原</p> |

| | |
|--|--|
| <p>有妨害或歧視他宗教之言論或行為。</p> | <p>則。</p> |
| <p>第十五條（尊重傳統宗教信仰行為） 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之機關不得禁止燒香、燒金銀紙錢以及燃放炮竹、蠟燭等宗教行為。</p> | <p>我國傳統宗教信仰，乃至於逢年過節之祭祖儀式中，皆有燒香、燒金銀紙錢，以及燃放炮竹、蠟燭等行為，為避免限制上揭傳統宗教信仰行為而產生禁制特定宗教行為之結果，爰制定本條規定，以落實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與第十三條之宗教信仰自由。</p> |
| <p>第十六條（宗教中立原則） 私立學校、軍隊、監獄或其他公共設施，因教化或禮拜之必要，得使個人或宗教團體為宗教行為，但不得強迫參與。</p> | <p>宗教具有教化社會、淨化人心之功能，若私立學校、軍隊、監獄或其他公共設施，為達教化之目的或有禮拜之必要時，得使個人或宗教團體為宗教行為，惟基於憲法所保障之宗教信仰自由，不得強迫他人參與該宗教行為。</p> |
| <p>第十七條（宗教自主） 宗教團體之自主性，包括內部組織、人事自主以及財政管理、處分自主，但不得有違反法令之行為。 基於各宗教固有之傳統，國家不得強制要求宗教團體遵守民主與公開之原則。 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法人有關行政主管機關之</p> | <p>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73 號解釋，宗教團體內部之組織結構、是否加入其他宗教性人民團體（教會）成為團體會員，及其與該宗教性人民團體之內部關係，暨其財產之管理、處分等事項，均屬宗教結社自由之保障範圍。又各宗教團體之組織依其教制，未必與現今社會採合議之方式相同，自不能強制要求宗教團體遵守民主與公開原則，亦不適</p> |

| | |
|---|--|
| <p>監督、管理規定不適用於宗教團體。</p> | <p>用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法人有關行政主管機關之監督、管理規定。</p> |
| <p>第十八條（身分資格之得喪變更） 各宗教傳教、佈道人士，其身分資格之取得、變更及喪失，悉依各宗教教制或傳統定之。 前項人士之遺產，除經其本人明示者外，其財產應歸屬於其宗教團體。</p> | <p>各宗教關於其傳教、佈道人士資格之取得、變更及喪失，其教制或傳統得以遵循，國家自應予以尊重。惟考量各宗教之傳教、佈道人士之生活係以宗教團體為中心，而非原本之親屬，為避免宗教團體產生遺產繼承之爭議，爰規定除經本人明示者外，其遺產應歸屬於其所屬之宗教團體。</p> |
| <p>第十九條（宗教教育方針） 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應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教育之自由。 適齡國民於登記有案之宗教團體就學者，應不適用強迫入學條例第九條之規定。 人民滿十六歲得自己決定其宗教信仰，其法定代理人不得干涉。 國家應制定義務教育有關宗教教育的學習指導綱要及相關課程，培養人民對於宗教的寬容及情操，並尊重宗教在社會的地位。</p> | <p>一、參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八條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第十三條，爰制定第一項規定。 二、現行法於國民義務教育外，家長本得以自主教育方式提供子女教育，為尊重宗教團體之自主性，應比照上揭方式，爰制定第二項規定。 三、參照瑞士、德國相關立法例制定第三項規定。 四、參照日本教育基本法制定第四項規定。</p> |

| | |
|---|--|
| <p>第二十條（宗教研修機構）</p> <p>宗教團體為培育神職人員及宗教人才，得設置宗教教義研修機構，並得依私立學校法規定申請設立宗教研修學院。</p> | <p>宗教團體為培育其宗教傳承之神職人員及宗教人才，得設立宗教教義研修機構，亦得依私立學校法相關規定，申請設立宗教研修學院。</p> |
| <p>第二十一條（就業服務法之例外）</p> <p>宗教團體僱用之人員，得要求其有與該宗教團體相同之信仰，不構成就業服務法第五條之宗教歧視。</p> | <p>為避免宗教團體所僱用之人員，其信仰與該宗教團體有所扞格而影響宗教事務之運作，爰制定本條規定使宗教團體不受就業服務法第五條之限制，而得要求其僱用之人員有與該宗教團體相同之信仰。</p> |
| <p>第二十二條（資訊公開之例外）</p> <p>宗教主管機關受理宗教團體陳報之文件、表冊等資料，應有守密之義務，不得將宗教團體之財產清冊、財務報表或其他未公開之資訊，提供予任何人。</p> | <p>一、宗教主管機關受理宗教團體陳報之文件、表冊等資料，應有守密之義務，以調和人民知的權利與宗教信仰自由。</p> <p>二、為了保障宗教上之隱私權，明定宗教主管機關不得將宗教團體之財產清冊、財務報表或其他未公開之資訊，提供予任何人。</p> |
| <p>第二十三條（尊重宗教行為自由之實踐）</p> <p>醫療院所應依在其場所往生者或其家屬之意願，提供依其教義實施宗教儀式之場所。</p> | <p>宗教信仰在親人往生時，經常成為家屬心靈之依靠與慰藉，為使往生者或家屬得依其意願進行宗教儀式，爰制定本條規定，俾使醫療院所得提供相關場所，以</p> |

| | |
|---|--|
| | 貫徹憲法第十三條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意旨。 |
| <p>第二十四條（宗教團體之社會責任）</p> <p>宗教團體宜依其收入情況，從事慈善、醫療、文化、教育、災害救助及其他公益事業。</p> <p>宗教團體應於其章程或規約訂定有關財產保管運用方法、處分及設定負擔之程序，並建立內部自我監督機制。</p> | <p>宗教具有安定社會，淨化人心之社會教化功能，為使宗教團體在宗教事業外，能以多元方式進行社會公益事業，並就其財產保管運用方法、處分及設定負擔有所依據，爰制定本條規定，明示宗教團體應依自身收入情況從事公益事業，並課與宗教團體應於章程或規約中訂定相關規定，及建立內部自我監督機制之義務。</p> |
| <p>第二十五條（法物保障）</p> <p>各宗教之法物，不得強制執行；宗教團體所有且現專供禮拜、傳佈宗教或祭祀之不動產，亦同。</p> <p>前項法物，指於宗教上、歷史上、美術上有關係之圖像、禮器、樂器、法器、經典、雕刻、繪畫及其他應行保存之一切古物。</p> | <p>參照強制執行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禁止查封之動產包括「遺像、牌位、墓碑及其他祭祀、禮拜所用之物」之意旨，明定各宗教之法物與宗教團體專供禮拜、傳佈宗教或祭祀之不動產，不得強制執行；第一項所稱法物之範圍，則參酌寺廟登記規則第六條規定，制定第二項規定。</p> |
| <p>第二十六條（因應都市道場之需）</p> <p>不妨礙公共安全、環境安寧及不違反建築或土地使用，經公寓大廈管理組織</p> | <p>都市土地價格高昂，供宗教團體使用之土地，取得不易，為因應都市道場、教會傳教之需，爰以區分所有建築物，為宗教建築物之一部分。</p> |

| | |
|---|--|
| <p>之同意，得以區分所有建築物為宗教建築物，以因應都市道場，教會傳教之需要，其相關事項，另以法律定之。</p> | |
| <p>第二十七條（宗教建築用地及免稅）</p> <p>墓地、納骨塔、火化及喪葬設施為宗教團體固有宗教事務，該建築物、設施及其基地，應屬宗教建築物及宗教用地，不適用殯葬管理條例之規定。</p> <p>宗教團體經營前項事業之收入屬宗教活動所得，不論有無標示價格，均應與宗教團體其他宗教活動所得同享免稅待遇。</p> | <p>按墓地、納骨塔、火化及喪葬設施等，係宗教團體之固有業務，美國與日本等國亦無不同，且參酌美國加州憲法第十三章第三條（g）規定，與日本中央主管機關文部省於昭和二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給各地方自治團體有關宗教法人事務處理之應注意事項大綱，兩者均給予免稅之優惠，爰制定本條規定，明定該建築物及設施並其基地均屬宗教建築物及宗教用地，且該收入屬宗教活動所得，與其他宗教活動所得同享免稅待遇。</p> |
| <p>第二十八條（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p> <p>私人或團體捐贈宗教團體專供宗教、教育、文化、醫療、公益、慈善事業或其他社會福利事業等直接使用之土地，得由受贈人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p> <p>宗教團體所有之宗教建築</p> | <p>私人或團體捐贈與宗教團體，而專供宗教、教育、文化、醫療、公益、慈善事業或其他社會福利事業，並且直接使用之土地，由於該土地係用於公益與社會福利，而非營利性質，免徵土地增值稅、至該房屋、土地免徵房屋稅或地價稅。</p> |

| | |
|---|---|
| <p>物或土地供其作為宗教活動使用者免徵房屋稅或地價稅。</p> | |
| <p>第二十九條（耕地取得） 宗教團體所取得而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之耕地，得申請更名登記為宗教團體所有；私人捐贈或出賣予宗教團體之耕地，得申請移轉登記為宗教團體所有，均不受農業發展條例之限制。 宗教團體依前項規定取得之耕地，或其他供宗教目的使用之土地，得優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為宗教專用區或使用地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以作為宗教團體使用。</p> | <p>宗教團體因買賣、贈予之原因取得之耕地，受農業發展條例之限制，無法申請承受耕地為宗教團體所有使用，爰制定本項規定排除農業發展條例之限制。 如宗教團體之耕地或一般土地不得優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或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將耗費十分冗長之時程，為使宗教團體得快速將土地作為宗教用地使用，爰制定本項規定。</p> |
| <p>第三十條（公有非公用土地之租售） 宗教團體已繼續使用公有非公用土地從事宗教活動滿五年者，得申請公有非公用土地之出租、讓售或委託經營，不受公產管理法規之限制。</p> | <p>現有之公產管理法規繁多複雜，且大多模稜兩可，實際上顯然窒礙難行；若已長期使用公有非公用土地從事宗教活動之宗教團體，無法以出租、讓售或委託經營方式繼續使用土地，將有礙其宗教事務之運作，爰明定宗教團體繼續使用公有非公用土地從事宗教活動已達五年者，得申請公有非公用土地之出租、讓售或</p> |

| | |
|--|---|
| | 委託經營，以排除現有公產管理法規之限制。 |
| 第三十一條(宗教相關法令不得牴觸本法) 本法施行後，應依本法之規定修正、廢止或制(訂)定相關宗教法令，並不得牴觸本法。 | 本法施行後，應依本法之規定意旨修正、廢止或制(訂)定相關宗教法令，且不得牴觸本法。 |
| 第三十二條（施行日） 本法自公布日起施行。 | 明定本法之施行日。 |

※本《宗教基本法》草案係為「初稿」，俟廣納各方意見予以整合後，將再行增補調整草案條文內容。

立法院第 11 屆第 2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議案編號：20211008319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5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提案第 11008319 號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有鑑於宗教具有安定社會人心、充實多元文化及厚植國家精神文明等力量，惟我國迄今缺乏保障宗教自由的專屬法規範，以致產生諸多紛爭，不但影響宗教健全發展，也難以實踐宗教多元和諧及政教互助協力的理念。為落實憲法及兩公約施行法保障宗教人權之精神，體現國家對宗教之中立及寬容原則，並建構保障宗教發展之良善法制環境，爰擬具「宗教基本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傅崐萁 林思銘 王鴻薇

宗教基本法草案總說明

宗教具有生命醒察、人性超越、苦難療癒、指引庇佑與善性凝聚等力量，性質上具有勸人為善，助人修心養性，提升道德情操，培養慈愛精神之作用，是國家道德與文化之共同基礎。其對社會所產生的淑世利益，乃為一切國民所共享，具有提升人類社會精神文明之強烈公益色彩。國家既為滿足人民之基本需要而存在，而人民之需要蓋分為物質及心靈兩大部分，物質之滿足雖由政府所完成，然心靈之滿足則需由宗教之協助方得以完備，因此建構保障宗教發展之良善法制環境，乃為國家回應人民需要之重要義務。

惟近代憲政主義興起，西方為避免過去政教結合之弊而有政教分離乃至中立原則之建立，但此原則非謂國家對宗教冷漠或不關心。而是在國家與宗教團體互不隸屬、互不干涉的前提下，基於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行為自由及宗教結社自由等三項基本宗教人權，以政教互助協力的精神，積極制定各類對宗教具尊重、保障及履行義務的法律。建構國家良善宗教人權發展之法治，使我國的人民無論在物質或心靈上，都得到國家最大的保障，同時也讓宗教成為國家良善政策之有力後盾。

我國雖於憲法第十三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但受限於數千年君主封建之固有文化，及長期戒嚴的政治氛圍影響。使得我國宗教界、法學界、各級政府及社會大眾，都甚少對保障宗教人權之深義，進行深入的研究與對話，多淪為空洞的「尊重宗教自由」之口號，難以內化成我國文化的內涵。此等因對宗教價值，與保障宗教人權之具體立法的認識不足，除了會造成對宗教缺乏尊重、保障與履行保護的法意識，削弱宗教護國、助人的價值外，並容易增強社會對宗教的不寬容心態。另一方面，又常因少數團體或個人假借宗教名義所發生之不法行為，使政府在制定宗教相關法規或實務作為時，模糊了必要的宗教人權保障分際。因此制訂具體保障宗教基本權之《宗教基本法》，同時作為憲法第 13 條之細則說明，於我國特有文化背景下實有其必要，亦使憲法對人民宗教基本權之保障得以完善。

宗教人權既為人類心靈自由之基本權，今為落實憲法及兩公約施行法保障宗教人權之精神，體現國家對宗教之中立及寬容原則，尊重宗教（團體）之特殊性與自主性，維護宗教團體應有權益，加強國民宗教常識修養與國際文化視野，翻轉宗教價值認識失衡現象，充實多元文化，以厚植國家之精神文明。乃廣泛參考世界各民主先進國家宗教相關法例制定本法，作為上位法源，使日後政府宗教相關法規之制（訂）定及行政措施之執行有所準據，政教關係得以和諧進步，同時亦藉此使我國躋身保障宗教人權先進國家之列，爰擬具「宗教基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 一、本法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 二、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及內容。（草案第二條）
- 三、宗教平等、中立原則及宗教歧視之排除。（草案第三條）
- 四、宗教自由之限制。（草案第四條）

五、宗教立法權限及法律明確原則。（草案第五條）

六、本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六條）

宗教基本法草案

| 條 | 文 | 說 | 明 |
|-----|---|---|---|
| 第一條 | <p>（立法目的）</p> <p>為落實憲法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規定，保障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及表達與行使是項自由之權利，維護人民享有宗教生活之權利，增進宗教平等及宗教多元之發展，尊重宗教團體之特殊性及自主性，確立教俗分離及宗教治理之基本原則，以協助人民精神領域之自我實現，充實多元文化，特制定本法。</p> <p>宗教及信仰相關事務，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且無妨害宗教自由及其行使權利外，適用本法之規定。</p> | <p>一、本條旨在揭櫫本法係以落實憲法與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稱兩公約）中有關宗教自由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維護宗教團體特殊性及自主性，以協助人民精神領域之自我實現，充實多元文化為目的而制定。</p> <p>二、我國現有法律中不乏對宗教及信仰事務規定者，為相對於本法之特別規定，為釐清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爰訂定第二項規定。</p> <p>三、基於上述立法目的，本法之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限制個人、集團或團體，基於憲法保障之宗教自由，而從事宣揚教義、舉行儀式及其他宗教行為。</p> | |
| 第二條 | <p>（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及內容）</p> <p>國家應保障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行為自由與宗教結社自由。</p> <p>稱宗教信仰自由者，指下列內在思想、信念及精神層次之信仰選擇自由：</p> <p>一、不受壓抑，而理解並選擇宗教信仰之自由，及選擇以個別或集體方式、公開或私下以禮拜、遵守教規、舉行儀式或傳播教義等方式，表示其宗教信仰之自由。</p> <p>二、選擇表明或不表明自己宗教信仰之自由。</p> <p>稱宗教行為自由者，指為表明其宗教信仰而為下列行為之自由：</p> <p>一、宗教禮拜、集會之自由，及為此目的設立與保持宗教場所之自由。</p> <p>二、設立和保持慈善、教育或人道主義性質機構之自由。</p> <p>三、製造、取得和使用有關宗教儀式或習慣所需用品之自由。</p> <p>四、編寫、發行及散發有關宗教刊物之自由。</p> <p>五、傳播宗教之自由。</p> <p>六、徵求、接受個人或機構自願捐款及其他</p> | <p>一、本條旨在明定宗教自由之內涵，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行為自由與宗教結社自由，並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七三號解釋意旨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八條第一項、歐洲人權公約第九條、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聯合國消除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之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視宣言第一條及第六條之規定。特於第二項、第三項揭櫫其具體內容，作為國家應予保障之事項。另為解決國際性宗教對其在內國宗教之聯繫及教職人員之任命，如天主教教宗任命內國之樞機主教等類此情形，爰制定第三項第九款規定。</p> <p>二、第三項所列為例示，非列舉。</p> <p>三、第四項宗教結社自由部分，指人民以各種方式進行宗教結社之自由，包括個人或宗教團體得與其他教義、理念相同之個人或宗教團體結社，成立或參與內國性或國際性宗教結社或其他相類之團體，此係當然之理，爰不予明定，併予敘明。該自由係源自憲法第十三條之宗教自由，而非憲法第十四條之一般結社自由，具有更高度之自主性。合乎聯合國公約普世認同之價值</p> | |

| | |
|--|---|
| <p>捐獻之自由。</p> <p>七、按照宗教之要求及標準，培養、委任、選舉領導者或指定繼任者之自由。</p> <p>八、按照宗教戒律奉行安息日、過宗教節日及舉行宗教儀式之自由。</p> <p>九、在內國或國際，與個人或團體建立、保持宗教聯繫之自由。</p> <p>十、其他為表明及行使宗教信仰相關作為之自由。</p> <p>稱宗教結社自由者，指為實現宗教信仰，由一人或多人，成立、合併或解散內國或國際性宗教團體之自由。宗教團體得自主規範並管理自身事務。</p> | <p>，以彰顯宗教結社自由與一般結社自由之迥異，國家不得任意干涉。</p> <p>「規範」係指針對團體事務制定相關規定而言，例如訂定教規、教條及戒律等。</p> <p>「管理」則指廣義之行政管理，不僅包含狹義的行政管理措施，亦包含對團體領導、聖職的自由任命；及根據自身教義判定，以終止自身宗教教義紛爭等活動。</p> <p>四、第四項宗教自身事務隨多元社會之發展，其樣態亦趨多元，故宗教自身事務之判定，應尊重宗教團體之自我理解，以免過早排除基本權主體之基本權主張，導致保障不周之情況發生。</p> |
| <p>第三條（宗教平等、中立原則及宗教歧視之排除）</p> <p>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對於各宗教，不論其教別、組織型態及運作模式，均應謹守平等、中立與寬容之原則。</p> <p>應致力於制定或廢除法律，以禁止任何宗教歧視行為，或任何鼓吹宗教仇恨，煽動敵視、強暴等之主張。</p> <p>人民享有之宗教信仰自由及行使之權利，不因種族、語言、性別、年齡、黨派、身心狀況、社會階級，及因其選擇表明或不表明其信仰，認同或不認同特定宗教，參與或不參與特定宗教結社團體，從事或不從事特定宗教活動或作為等其他條件，而在法律上及公權力行使時，受歧視或不合理之差別待遇。</p> <p>前項以不得剝奪及限制他人及宗教團體，基於教制、教義、傳統、戒律及相關規範，而行使或不行使與其信仰相關之制度、禮儀、儀式及相關活動或行為之自由為限。</p> | <p>一、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七三號解釋意旨，明定宗教平等、中立與寬容原則。</p> <p>二、為賦予國家致力於排除宗教歧視之職能，爰參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三條、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六條、消除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之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視宣言第四條、世界人權宣言第七條，日本憲法第二十條規定之立法例，設第二項規定。</p> <p>三、禁止歧視之理據在於尊重他人可公開或私下透過禮拜、戒律、實踐和教義表明自行選擇信奉的宗教或信仰（包括不表明信奉任何宗教或信仰）之自由。此原則乃參照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號一般性意見書，爰制定第三項。</p> <p>四、禁止對於宗教信仰之歧視，與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兩者不僅為一體兩面之權利，且須為主客雙向之調合，此為平等及不歧視原則之核心要義，爰訂定第四項。</p> |
| <p>第四條（宗教自由之限制）</p> <p>人民之內在宗教信仰自由，應受絕對保障。</p> <p>人民之外在宗教行為及宗教結社自由，非出於維護宗教自由或重大公益之必要，不得以法律限制之。</p> <p>前項限制應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及應選擇對宗教或宗教團體權益損害最少者，且不得與所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並</p> | <p>一、參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七三號解釋意旨，基本權固非不得以法律限制，惟宗教自由為基本人權之核心，與其他基本權仍有不同，應以出於維護重大公益之必要，始得限制。</p> <p>二、限制宗教自由，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以法律為之，其目的與手段間須符合比例原則，且不得授權行政命令為之。</p> <p>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二號一般</p> |

| | |
|--|---|
| <p>不得授權行政命令定之。</p> | <p>性意見書第八點敘明，對宗教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必須以法律作出規定」，且「僅限於明文規定的」目的，且「必須與所指特定需要直接有關且合比例性」，亦「不許基於其中不曾規定的原因施加限制」，即使此一限制已是其他公約中受保障權利的限制。另限制之施行方式不得「損害第十八條中所保證的〔宗教自由〕權利」。故對宗教信仰自由之限制必須以基於公益性及不侵害他人之自由及權利為限，且所為之限制應當符合法規明確性、直接相關性、特定需要性、比例相稱性等四原則。</p> |
| <p>第五條（宗教立法權限及法律明確原則）</p> <p>宗教事務與治理之相關規範應由國家以法律定之，不得授權地方政府訂定。其立法程序，必須公開、透明，經六個月以上公布草案於公眾媒體中，並於公布後滿三個月，六都各舉辦一場以上聽證會，徵詢全民意見。</p> <p>前項規範之執行，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自行辦理，並得委由地方政府執行之。</p> <p>對宗教所為之規範，其用字、意義、內容及適用範圍必須具體明確，為人民所能理解並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p> | <p>一、憲法第一百零八條雖未明文規定宗教事務性質屬全國一致之中央事務，惟考量宗教本質具有全國性，乃至具有世界性或宇宙觀。復參酌美、日、德等國均以宗教自由為憲法保留事項，而我國宗教自由權與宗教平等權乃憲法宣示應予保障之基本人權，自應由中央立法（國會保留）並執行。特於本條明定宗教事務之立法權應專屬中央權責事項，不得授權地方自治團體訂定。以免地方政府自行訂定自治法規規範宗教事務，造成中央與各地方政府之宗教法令歧異，乃至形成各地方政府之宗教法令各不相同、一國多制之不平現象。故我國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三款第四目及第十九條第三款第四目之規定，明定宗教輔導為直轄市、縣（市）自治事項，因與第一項規定不符，應於本法施行後修正或廢止。</p> <p>二、宗教人權既屬憲法所高度保障之重要基本人權，因此宗教事務與治理之相關規範，其制訂之過程必須公開、透明。並讓人民有充分理解與討論之時間，方能達到徵詢全民意見、確實保障宗教人權之目的。</p> <p>三、礙於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宗教事務之人力有限，爰依地方制度法第二條第三款、第十四條規定，並參考日本宗教法人法第八十七條之二（事務之區分）立法例，得將宗教事務交由地方自治團體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p> <p>四、爰參考大法官釋字第四四五、四九一、五</p> |

立法院第 11 屆第 2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 | |
|------------------------|--|
| | 七三號解釋意旨，明定對宗教所為之規範，其意義、內容及範圍必須具體明確、人民可得預見與理解，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
| 第六條（施行日期）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 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

立法院第 11 屆第 2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議案編號：20211006838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3年10月1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提案第 1100683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許智傑、邱志偉等 38 人，鑒於宗教為許多生命的心靈支柱與撫慰力量，亦豐富我國人民精神及生活，更能淨化社會人心、提昇國家文化與文明，世界各民主先進國家基於前述對宗教特別採取謙抑、尊重及寬容原則。為落實我國憲法及兩公約施行法保障宗教自由之精神，爰擬具「宗教基本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 | | | | |
|---------|-----|--------------------|-----|-----|
| 提案人：許智傑 | 邱志偉 | | | |
| 連署人：林宜瑾 | 林楚茵 | 陳 瑩 | 張宏陸 | 賴惠員 |
| | 何欣純 | 王美惠 | 王定宇 | 陳秀寶 |
| | 黃秀芳 | | | |
| | 洪申翰 | 蔡易餘 | 陳冠廷 | 陳俊宇 |
| | 郭昱晴 | | | |
| | 林月琴 | 鍾佳濱 | 邱議瑩 | 李柏毅 |
| | 李坤城 | | | |
| | 伍麗華 | Saidhai Tahovecahe | 林淑芬 | 黃 捷 |
| | 陳素月 | 羅美玲 | 沈伯洋 | 沈發惠 |
| | 李昆澤 | | | |
| | 王正旭 | 郭國文 | 陳培瑜 | 蘇巧慧 |
| | 張雅琳 | | | |
| | 賴瑞隆 | 范 雲 | 徐富癸 | |

宗教基本法草案總說明

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三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宗教不但先於國家、法律，也是一切人類道德與法律的先驗基礎，可以說是比道德和法律更為自覺與自發的社會安定力量，其對社會所產生之利益，乃為一切宗教徒及非宗教徒之國民所共享。

然我國受限於數千年封建思想，及過去國民政府統治的政治氛圍影響，使我國宗教界、法學界、各級政府及社會大眾，對保障宗教人權之深義瞭解甚少，「尊重宗教自由」多淪為口號，難以內化成我國文化的內涵。爰此對宗教價值，與保障宗教人權之具體立法的認識不足，除了會普遍造成對宗教文化的不理解、對宗教缺乏尊重，沒有保障與履行保護法的意識，容易增強社會對宗教的不寬容心態。

今為落實憲法及兩公約施行法保障宗教人權之精神，體現國家對宗教之中立及寬容原則，尊重宗教（團體）之特殊性與自主性，維護宗教團體應有權益，加強國民宗教常識修養與國際文化視野，翻轉宗教價值認識失衡現象，充實多元文化，以厚植國家之精神文明。乃廣泛參考世界各民主先進國家宗教相關法例制定本法，作為上位法源，使日後政府針對宗教相關法規之制（訂）定及行政措施之執行有所準據，政教關係得以和諧進步，同時亦藉此使我國躋身保障宗教人權先進國家之列。

- 一、立法目的。（第一條）
- 二、規範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及內容。（第二條）
- 三、宗教平等、中立原則及宗教歧視之排除。（第三條）
- 四、針對宗教自由之限制。（第四條）
- 五、確立宗教立法權限及法律明確原則。（第五條）
- 六、本法施行日期。（第六條）

宗教基本法草案

| 條 | 文 | 說 | 明 |
|-----|--|--|---|
| 第一條 | <p>為落實憲法與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對宗教之保障，保護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維護宗教團體特殊性及自主性，以協助人民精神領域之自我實現，特制定本法。</p> <p>宗教及信仰相關事務，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外，適用本法。</p> | <p>一、明確立法目的，本法係以落實《憲法》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稱兩公約）中有關宗教自由，保障人民宗教信仰自由之權利、充實多元文化之願景為目的而制定。</p> <p>二、鑒於我國許多法律對宗教及信仰有相關規定，為釐清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爰訂定第二項之規定。</p> <p>三、基於上述立法說明，本法之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限制個人、集團或團體，基於憲法保障之宗教自由，而從事宣揚教義、舉行儀式及其他宗教行為。</p> | |
| 第二條 | <p>國家應保障人民宗教信仰、宗教行為與宗教結社之自由。</p> <p>稱宗教信仰自由者，指下列在思想、信念及精神層次之信仰選擇自由：</p> <p>一、有不受壓抑，而選擇宗教信仰之自由，及選擇以個別或集體方式、公開或私下以禮拜、遵守教規、舉行儀式或傳播教義等方式，表示其宗教信仰之自由。</p> <p>二、有選擇表明或不表明自己宗教信仰之自由。</p> <p>稱宗教行為自由者，指為表明其宗教信仰而為下列行為之自由：</p> <p>一、宗教禮拜、集會之自由，及為此目的設立與保持宗教場所之自由。</p> <p>二、設立和保持適當慈善機構或人道主義性質機構之自由。</p> <p>三、適當製造、取得和使用有關宗教儀式或習慣所需用品之自由。</p> <p>四、編寫、發行及散發有關宗教刊物之自由。</p> <p>五、有在適當場所傳播宗教之自由。</p> <p>六、徵求、接受個人或機構自願捐款及其他捐獻之自由。</p> <p>七、按照宗教之要求及標準，培養、委任、選舉適當領導者或指定繼任者之自由。</p> | <p>一、明定宗教自由之內涵，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行為自由與宗教結社自由，並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七三號解釋意旨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八條第一項、歐洲人權公約第九條、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聯合國消除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之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視宣言第一條及第六條之規定，爰訂定第二項及第三項其具體內容，作為國家應予保障之事項。</p> <p>二、宗教結社自由係指人民以各種方式進行宗教結社之自由，包括個人或宗教團體得與其他教義、理念相同之個人或宗教團體結社，成立或參與國內性或國際性宗教結社或其他相類之團體，此係當然之理，爰不加以論述，併予敘明。</p> | |

| | |
|--|--|
| <p>八、按照宗教戒律奉行安息日、過宗教節日及舉行宗教儀式之自由。</p> <p>九、在國內或國際，與個人或團體建立、保持宗教聯繫之自由。</p> <p>稱宗教結社自由者，指為實現宗教信仰，由一人或多人，成立、合併或解散國內或國際性宗教團體之自由。</p> | |
| <p>第三條 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對於各宗教，不論其教別、組織型態及運作模式，均應謹守平等、中立與寬容之原則。</p> <p>應致力於制定或廢除法律，以禁止任何宗教歧視行為，或任何鼓吹宗教仇恨，煽動敵視、強暴等之主張。</p> <p>任何人享有之宗教信仰自由及行使之權利，不因種族、語言、性別、年齡、黨派、身心狀況、社會階級，及因其選擇表明或不表明其信仰，認同或不認同特定宗教，參與或不參與特定宗教社團，從事或不從事特定宗教活動或作為等其他條件，而在法律上及公權力行使時，受歧視或不合理之差別待遇。</p> <p>前項以不得剝奪及限制他人及宗教團體基於教制、教義、傳統、戒律及相關規範，而行使或不行使與其信仰相關之制度、禮儀、儀式及相關活動或行為之自由為限。</p> | <p>一、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七三號解釋意旨，明定宗教平等、中立與寬容原則。</p> <p>二、為賦予國家致力於排除宗教歧視之職能，爰參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三條、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六條、消除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之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視宣言第四條、世界人權宣言第七條法例，訂定第二項規定。</p> <p>三、禁止歧視之理據在於尊重他人可公開或私下透過禮拜、戒律、實踐和教義表明自行選擇信奉的宗教或信仰（包括不表明信奉任何宗教或信仰）之自由。此原則乃參照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號一般性意見書，爰制定第三項。</p> <p>四、禁止對於宗教信仰之歧視與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兩者不僅為一體兩面之權利，且須為主客雙向之調合，此為平等及不歧視原則之核心要義，爰訂定第四項。</p> |
| <p>第四條 人民之內在宗教信仰自由，應受絕對保障。</p> <p>人民之外在宗教行為及宗教結社自由，非出於維護宗教自由、重大公益之必要或有損害他人之權利之虞，不得以法律限制之。</p> <p>前項限制應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及應選擇對宗教或宗教團體權益損害最少者，且不得與所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並不得授權行政命令定之。</p> | <p>一、依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九〇號解釋，宗教信仰之自由與其他之基本權利，雖同受憲法之保障，亦同受憲法之規範，除內在信仰之自由應受絕對保障，不得加以侵犯或剝奪外，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自由，在必要之最小限度內，仍應受國家相關法律之約束，非可以宗教信仰為由而否定國家及法律之存在。</p> <p>二、限制宗教自由，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以法律為之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二號一般性意見書第八點敘明，對宗教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必須以法律作出規定」，且「僅限於明文規定的」目的，且「必須與所指特定需要直接有關且合比例性」，爰制定第三項，不得授權行政命令為之。</p> |

| | |
|--|--|
| <p>第五條 宗教事務之規範應由國家以法律定之，不得授權地方自治團體訂定。其立法程序，應公開、透明。</p> <p>前項規範之執行，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自行辦理，並得委辦地方自治團體執行之。</p> <p>對宗教所為之規範，其用字、意義、內容及適用範圍應具體明確。</p> | <p>一、憲法第一百零八條雖未列舉宗教事務屬全國一致之中央事務，惟宗教本質具全國性，且美、日、德等國均以宗教自由為憲法保留事項，而我國宗教自由權與平等權乃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應由中央立法並執行。特於本條明定宗教事務之立法權應專屬中央權責事項，不得授權地方自治團體訂定。以免宗教法令歧異，形成宗教事務一國多治之現象。故我國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三款第四目及第十九條第三款第四目之規定，明定宗教輔導為直轄市、縣（市）自治事項，與第一項規定不符，應於本法施行後修正或廢止。</p> <p>二、宗教人權屬憲法所保障之重要基本人權，因此宗教事務與治理之相關規範，法律制訂過程必須公開、透明，並提供人民充分理解與討論之時間。</p> <p>三、基於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宗教事務之人力有限，爰制定第三項，依地方制度法第二條第三款、第十四條規定，並參考日本宗教法人法第八十七條之二（事務之區分）立法例，得將宗教事務交由地方自治團體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p> <p>四、參酌大法官釋字第四四五、四九一、五七三號解釋意旨，明定第四項對宗教所為之規範，其意義、內容及範圍必須具體明確、人民及各主管機關可得預見與理解。</p> |
| <p>第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p> | <p>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p> |

立法院第 11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議案編號：20211008585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4年1月8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提案第 11008585 號

案由：本院委員葉元之等 18 人，鑑於宗教在人類社會中承擔心靈療癒、道德提升及文化凝聚之功能，並對國家精神文明與公益具有重要貢獻，然我國現行法制對宗教基本權之保障不足，不僅影響宗教人權之落實，亦難以實現多元文化共融。為具體落實憲法第十三條及兩公約施行法保障宗教自由之精神，建構良善之宗教法制，彰顯國家對宗教中立、寬容與尊重之原則，爰擬具「宗教基本法草案」，作為保障宗教發展及人權之法治基礎。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葉元之

| | | | | |
|---------|-----|-----|-----|------|
| 連署人：馬文君 | 黃健豪 | 張智倫 | 廖先翔 | 高金素梅 |
| 邱鎮軍 | 羅智強 | 林思銘 | 張嘉郡 | 林倩綺 |
| 林沛祥 | 洪孟楷 | 黃建賓 | 陳永康 | 丁學忠 |
| 呂玉玲 | 游 顥 | | | |

宗教基本法草案總說明

宗教具有生命醒察、人性超越、苦難療癒、指引庇佑與善性凝聚等力量，性質上具有勸人為善，助人修心養性，提升道德情操，培養慈愛精神之作用，是國家道德與文化之共同基礎。其對社會所產生的淑世利益，乃為一切國民所共享，具有提升人類社會精神文明之強烈公益色彩。國家既為滿足人民之基本需要而存在，而人民之需要蓋分為物質及心靈兩大部分，物質之滿足雖由政府所完成，然心靈之滿足則需由宗教之協助方得以完備，因此建構保障宗教發展之良善法制環境，乃為國家回應人民需要之重要義務。

惟近代憲政主義興起，西方為避免過去政教結合之弊而有政教分離乃至中立原則之建立，但此原則非謂國家對宗教冷漠或不關心。而是在國家與宗教團體互不隸屬、互不干涉的前提下，基於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行為自由及宗教結社自由等三項基本宗教人權，以政教互助協力的精神，積極制定各類對宗教具尊重、保障及履行義務的法律。建構國家良善宗教人權發展之法治，使我國的人民無論在物質或心靈上，都得到國家最大的保障，同時也讓宗教成為國家良善政策之有力後盾。

我國雖於憲法第十三條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但受限於數千年君主封建之固有文化，及長期戒嚴的政治氛圍影響。使得我國宗教界、法學界、各級政府及社會大眾，都甚少對保障宗教人權之深義，進行深入的研究與對話，多淪為空洞的「尊重宗教自由」之口號，難以內化成我國文化的內涵。此等因對宗教價值，與保障宗教人權之具體立法的認識不足，除了會造成對宗教缺乏尊重、保障與履行保護的法意識，削弱宗教護國、助人的價值外，並容易增強社會對宗教的不寬容心態。另一方面，又常因少數團體或個人假借宗教名義所發生之不法行為，使政府在制定宗教相關法規或實務作為時，模糊了必要的宗教人權保障分際。因此制訂具體保障宗教基本權之《宗教基本法》，同時作為憲法第 13 條之細則說明，於我國特有文化背景下實有其必要，亦使憲法對人民宗教基本權之保障得以完善。

宗教人權既為人類心靈自由之基本權，今為落實憲法及兩公約施行法保障宗教人權之精神，體現國家對宗教之中立及寬容原則，尊重宗教（團體）之特殊性與自主性，維護宗教團體應有權益，加強國民宗教常識修養與國際文化視野，翻轉宗教價值認識失衡現象，充實多元文化，以厚植國家之精神文明。乃廣泛參考世界各民主先進國家宗教相關法例制定本法，作為上位法源，使日後政府宗教相關法規之制（訂）定及行政措施之執行有所準據，政教關係得以和諧進步，同時亦藉此使我國躋身保障宗教人權先進國家之列，爰擬具「宗教基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 一、本法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 二、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及內容。（草案第二條）
- 三、宗教平等、中立原則及宗教歧視之排除。（草案第三條）
- 四、宗教自由之限制。（草案第四條）

五、宗教立法權限及法律明確原則。（草案第五條）

六、本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六條）

宗教基本法草案

| 條 | 文 | 說 | 明 |
|-----|---|---|---|
| 第一條 | <p>（立法目的）</p> <p>為落實憲法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規定，保障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及表達與行使是項自由之權利，維護人民享有宗教生活之權利，增進宗教平等及宗教多元之發展，尊重宗教團體之特殊性及自主性，確立教俗分離及宗教治理之基本原則，以協助人民精神領域之自我實現，充實多元文化，特制定本法。</p> <p>宗教及信仰相關事務，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且無妨害宗教自由及其行使權利外，適用本法之規定。</p> | <p>一、本條旨在揭櫫本法係以落實憲法與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稱兩公約）中有關宗教自由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維護宗教團體特殊性及自主性，以協助人民精神領域之自我實現，充實多元文化為目的而制定。</p> <p>二、我國現有法律中不乏對宗教及信仰事務規定者，為相對於本法之特別規定，為釐清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爰訂定第二項規定。</p> <p>三、基於上述立法目的，本法之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限制個人、集團或團體，基於憲法保障之宗教自由，而從事宣揚教義、舉行儀式及其他宗教行為。</p> | |
| 第二條 | <p>（宗教自由之保障範圍及內容）</p> <p>國家應保障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行為自由與宗教結社自由。</p> <p>稱宗教信仰自由者，指下列內在思想、信念及精神層次之信仰選擇自由：</p> <p>一、不受壓抑，而理解並選擇宗教信仰之自由，及選擇以個別或集體方式、公開或私下以禮拜、遵守教規、舉行儀式或傳播教義等方式，表示其宗教信仰之自由。</p> <p>二、選擇表明或不表明自己宗教信仰之自由。</p> <p>稱宗教行為自由者，指為表明其宗教信仰而為下列行為之自由：</p> <p>一、宗教禮拜、集會之自由，及為此目的設立與保持宗教場所之自由。</p> <p>二、設立和保持慈善、教育或人道主義性質機構之自由。</p> <p>三、製造、取得和使用有關宗教儀式或習慣所需用品之自由。</p> <p>四、編寫、發行及散發有關宗教刊物之自由。</p> <p>五、傳播宗教之自由。</p> <p>六、徵求、接受個人或機構自願捐款及其他</p> | <p>一、本條旨在明定宗教自由之內涵，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行為自由與宗教結社自由，並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七三號解釋意旨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八條第一項、歐洲人權公約第九條、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聯合國消除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之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視宣言第一條及第六條之規定。特於第二項、第三項揭櫫其具體內容，作為國家應予保障之事項。另為解決國際性宗教對其在內國宗教之聯繫及教職人員之任命，如天主教教宗任命內國之樞機主教等類此情形，爰制定第三項第九款規定。</p> <p>二、第三項所列为例示，非列舉。</p> <p>三、第四項宗教結社自由部分，指人民以各種方式進行宗教結社之自由，包括個人或宗教團體得與其他教義、理念相同之個人或宗教團體結社，成立或參與內國性或國際性宗教結社或其他相類之團體，此係當然之理，爰不予明定，併予敘明。該自由係源自憲法第十三條之宗教自由，而非憲法第十四條之一般結社自由，具有更高度之自主性。合乎聯合國公約普世認同之價值</p> | |

| | |
|--|---|
| <p>捐獻之自由。</p> <p>七、按照宗教之要求及標準，培養、委任、選舉領導者或指定繼任者之自由。</p> <p>八、按照宗教戒律奉行安息日、過宗教節日及舉行宗教儀式之自由。</p> <p>九、在內國或國際，與個人或團體建立、保持宗教聯繫之自由。</p> <p>十、其他為表明及行使宗教信仰相關作為之自由。</p> <p>稱宗教結社自由者，指為實現宗教信仰，由一人或多人，成立、合併或解散國內或國際性宗教團體之自由。宗教團體得自主規範並管理自身事務。</p> | <p>，以彰顯宗教結社自由與一般結社自由之迥異，國家不得任意干涉。</p> <p>「規範」係指針對團體事務制定相關規定而言，例如訂定教規、教條及戒律等。</p> <p>「管理」則指廣義之行政管理，不僅包含狹義的行政管理措施，亦包含對團體領導、聖職的自由任命；及根據自身教義判定，以終止自身宗教教義紛爭等活動。</p> <p>四、第四項宗教自身事務隨多元社會之發展，其樣態亦趨多元，故宗教自身事務之判定，應尊重宗教團體之自我理解，以免過早排除基本權主體之基本權主張，導致保障不周之情況發生。</p> |
| <p>第三條（宗教平等、中立原則及宗教歧視之排除）</p> <p>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對於各宗教，不論其教別、組織型態及運作模式，均應謹守平等、中立與寬容之原則。</p> <p>應致力於制定或廢除法律，以禁止任何宗教歧視行為，或任何鼓吹宗教仇恨，煽動敵視、強暴等之主張。</p> <p>人民享有之宗教信仰自由及行使之權利，不因種族、語言、性別、年齡、黨派、身心狀況、社會階級，及因其選擇表明或不表明其信仰，認同或不認同特定宗教，參與或不參與特定宗教結社團體，從事或不從事特定宗教活動或作為等其他條件，而在法律上及公權力行使時，受歧視或不合理之差別待遇。</p> <p>前項以不得剝奪及限制他人及宗教團體，基於教制、教義、傳統、戒律及相關規範，而行使或不行使與其信仰相關之制度、禮儀、儀式及相關活動或行為之自由為限。</p> | <p>一、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七三號解釋意旨，明定宗教平等、中立與寬容原則。</p> <p>二、為賦予國家致力於排除宗教歧視之職能，爰參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三條、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六條、消除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之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視宣言第四條、世界人權宣言第七條，日本憲法第二十條規定之立法例，設第二項規定。</p> <p>三、禁止歧視之理據在於尊重他人可公開或私下透過禮拜、戒律、實踐和教義表明自行選擇信奉的宗教或信仰（包括不表明信奉任何宗教或信仰）之自由。此原則乃參照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號一般性意見書，爰制定第三項。</p> <p>四、禁止對於宗教信仰之歧視，與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兩者不僅為一體兩面之權利，且須為主客雙向之調合，此為平等及不歧視原則之核心要義，爰訂定第四項。</p> |
| <p>第四條（宗教自由之限制）</p> <p>人民之內在宗教信仰自由，應受絕對保障。</p> <p>人民之外在宗教行為及宗教結社自由，非出於維護宗教自由或重大公益之必要，不得以法律限制之。</p> <p>前項限制應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及應選擇對宗教或宗教團體權益損害最少者，且不得與所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並</p> | <p>一、參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七三號解釋意旨，基本權固非不得以法律限制，惟宗教自由為基本人權之核心，與其他基本權仍有不同，應以出於維護重大公益之必要，始得限制。</p> <p>二、限制宗教自由，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以法律為之，其目的與手段間須符合比例原則，且不得授權行政命令為之。</p> <p>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二號一般</p> |

| | |
|--|---|
| <p>不得授權行政命令定之。</p> | <p>性意見書第八點敘明，對宗教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必須以法律作出規定」，且「僅限於明文規定的」目的，且「必須與所指特定需要直接有關且合比例性」，亦「不許基於其中不曾規定的原因施加限制」，即使此一限制已是其他公約中受保障權利的限制。另限制之施行方式不得「損害第十八條中所保證的〔宗教自由〕權利」。故對宗教信仰自由之限制必須以基於公益性及不侵害他人之自由及權利為限，且所為之限制應當符合法規明確性、直接相關性、特定需要性、比例相稱性等四原則。</p> |
| <p>第五條（宗教立法權限及法律明確原則）</p> <p>宗教事務與治理之相關規範應由國家以法律定之，不得授權地方政府訂定。其立法程序，必須公開、透明，經六個月以上公布草案於公眾媒體中，並於公布後滿三個月，六都各舉辦一場以上聽證會，徵詢全民意見。</p> <p>前項規範之執行，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自行辦理，並得委由地方政府執行之。</p> <p>對宗教所為之規範，其用字、意義、內容及適用範圍必須具體明確，為人民所能理解並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p> | <p>一、憲法第一百零八條雖未明文規定宗教事務性質屬全國一致之中央事務，惟考量宗教本質具有全國性，乃至具有世界性或宇宙觀。復參酌美、日、德等國均以宗教自由為憲法保留事項，而我國宗教自由權與宗教平等權乃憲法宣示應予保障之基本人權，自應由中央立法（國會保留）並執行。特於本條明定宗教事務之立法權應專屬中央權責事項，不得授權地方自治團體訂定。以免地方政府自行訂定自治法規規範宗教事務，造成中央與各地方政府之宗教法令歧異，乃至形成各地方政府之宗教法令各不相同、一國多制之不平現象。故我國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三款第四目及第十九條第三款第四目之規定，明定宗教輔導為直轄市、縣（市）自治事項，因與第一項規定不符，應於本法施行後修正或廢止。</p> <p>二、宗教人權既屬憲法所高度保障之重要基本人權，因此宗教事務與治理之相關規範，其制訂之過程必須公開、透明。並讓人民有充分理解與討論之時間，方能達到徵詢全民意見、確實保障宗教人權之目的。</p> <p>三、礙於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宗教事務之人力有限，爰依地方制度法第二條第三款、第十四條規定，並參考日本宗教法人法第八十七條之二（事務之區分）立法例，得將宗教事務交由地方自治團體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p> <p>四、爰參考大法官釋字第四四五、四九一、五</p> |

立法院第 11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 | |
|------------------------|--|
| | 七三號解釋意旨，明定對宗教所為之規範，其意義、內容及範圍必須具體明確、人民可得預見與理解，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
| 第六條（施行日期）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 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

